

人吾家君

元吉

目 录

序.....	1
前言.....	7
祖籍与故乡.....	9
一、祖籍——山东蓬莱.....	9
二、故乡——旅顺口.....	10
三、三里桥——张家屯.....	12
儿时之家.....	18
一、家境.....	22
二、家人.....	24
1、祖父与祖母.....	24
2、父辈们.....	27
3、母辈们.....	28
4、兄弟姐妹.....	29
三、家变.....	30
1、父亲北上齐齐哈尔.....	30
2、四叔的婚变与出走.....	31
3、三叔去沈阳务工.....	32
4、祖父病故.....	33
四、分家.....	34
齐齐哈尔一支小家.....	36
一、齐齐哈尔——我的第二故乡.....	36
二、小家庭——三口之家.....	39
我的父亲与母亲.....	45

一、父亲是一位粗通文化素食的劳动者·····	45
二、伪满时期的父亲·····	46
1、卫生股长·····	47
2、大民屯警察署长·····	47
3、碾子山警察署长·····	48
4、达呼店警察署长·····	49
三、兵荒马乱中的父亲·····	50
四、秋林公司的马夫·····	53
五、荣归与辱归·····	54
六、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父亲·····	55
1、清算斗争·····	55
2、土地改革运动·····	56
3、肃清反革命分子·····	59
4、文化大革命中的父亲·····	61
5、他们是勤劳治家的典范·····	66
三个叔叔及其家人·····	68
一、二叔与家人·····	68
二、三叔与家人·····	70
三、四叔与家人·····	72
我的人生之旅·····	83
一、出生与乳名·····	92
二、我的童年·····	93
三、小学生·····	96
四、中学生·····	103
五、大学生·····	111

六、胜利后的困惑与彷徨·····	118
七、走向人生新的征程·····	122
1、走向社会、走向革命·····	123
2、联合中学、第一中学的风华岁月·····	124
3、全省教育工作者大会·····	125
4、齐齐哈尔旧中国工业教育的终结·····	126
5、我参加了 1947 年夏的战地服务团·····	126
6、在土地改革的日子里·····	127
7、第一中学的数学组·····	128
8、我错过了“归队”的机会·····	129
9、第一中学的“球星”·····	130
10、齐齐哈尔市的先进工作者·····	130
11、东北教育学院的首期学员·····	131
八、我与齐齐哈尔工业技术教育·····	133
1.重建齐齐哈尔中等工业技术教育·····	134
2.齐齐哈尔化工学校·····	135
3.齐齐哈尔化工学院·····	138
4.文化大革命的“党外走资派”·····	141
5.齐齐哈尔轻工学院的成立·····	144
6.艰难进取的轻工学院·····	146
7. 离休后的日子里·····	150
九、我的政治生涯与社会活动·····	152
1、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54
2、加入中国共产党·····	159
3、人民代表与政协委员·····	160

我的婚姻、家庭与后人·····	162
一、千里姻缘，相会龙沙·····	162
二、同甘共苦，风雨人家·····	167
三、我的后人·····	180
四、休戚与共，赵家亲人·····	183
结束语·····	186
编后记·····	191
附录：	
1、历史经验 值得重视 [在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纪念中发【89】14号文件发表15周年座谈会上发言] （齐齐哈尔日报，2005年1月20日）·····	193
2、《齐齐哈尔轻工院校史》（1952—1985）结束语·····	197
3、北方技术教育的重要阵地——记齐齐哈尔轻工学院的发展历程·····	199
4、天齐小学教师节祝贺信·····	204
5、曼如的吊唁信·····	205
6、天啊、开晴吧！·····	206
7、对民盟四十年的简要回顾·····	207
8、我与齐齐哈尔民盟五十年·····	229

序

张元士同志是齐齐哈尔工业技术教育的奠基人，是齐齐哈尔轻工学院也是齐齐哈尔大学的创始人，更是我们最尊敬、爱戴的领导和老师。

九七年春节我去张老家拜年，这已成为我每年的惯例。张老尽管已离休多年，但今年才真正空闲了下来，我更想借此去冲淡他可能的寂寞。记得当时他依旧那么乐观。言语间谈到他要写点东西，总结这一生几十年的历程，以飨后人。2003年学校为张老祝八十大寿，席间张老说他的稿子已近完成，准备定名为《吾家吾人》。今年六月张老把排版的书稿交给了我，希望我为此书作序。接过这近14万字沉甸甸的书稿，产生一种一睹为快的喜悦：我将从中进一步了解老师，学习他做人的道理。读张老的书，如见其人。文风朴实，语言流畅，这是张老一生的回顾和感悟。一口气读了下来，被其一段段的家史和其家人所吸引。张老的描写细腻、生动。五代人，两个三世同堂的兴衰、甜苦，伴随着社会变革的脚步，又是那样的和谐和必然。家中的每个人在家庭的局限下又都有个性与追求：爷爷苦心维持一个家，却又无可奈何地看她散去；父亲崇尚性善、行善，却不得不在恶势力下苟且偷安；叔叔读书救国，离家出走，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看得出张老并没有用简单的史实来记事，而是站在了社会的角度总结自家几代人走的路。阶级分析、“有成分论”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使用并被验证的理论，张老用它去看家中的人走过的路，写起来十分自然，使我们看到的不是单纯的某人，而是社会中的某人。文化大革命中，不幸“有成分论”被歪曲为“唯成分论”，张老用家人各自不同的经历，批判了这一谬论。张老笔下的自己与家人既实事求是，又有他的爱憎与视角，

体现了张老几十年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张老在长达五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有足足四十年从事祖国的教育事业，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想到张老要我写序，又感到一种压力。好在我有在张老领导下工作、在张老支持下进步的经历，若能写出一、两件张老自传外的轶事，使读者能从书以外的角度先知张老的为人，也有助于对其书的理解，这也算是我最大的愿望了。

张老为组建齐齐哈尔轻工学院，在条件准备上、在国家政策范围内的抢抓机遇上，都参与了决策并亲自组织实施。这在本书中可见其过程的框架，在校史中可见较细的情节。事实上，张老在重大决策的战术研究过程中花费了更大的心血，他在战略上取得的辉煌，来自他战术上付出的巨大努力。

张老立志要振兴齐齐哈尔市的工业教育，要用教育兴国。可贵的在于他认识到教育的竞争归根到底取决于人才的竞争，在恢复轻工学院的高等教育时他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当初，张老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就是教师。早期的化工学院尚且仰仗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才政策，比如，我市虽地处偏远，但苍天有眼，分来了一些能人，其中还有一批右派分子，他们当中有中央部委的高级翻译和政治理论家，有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的高才生。这支队伍在当时条件下发挥了很大作用。但高等教育恢复时已处于文革结束后，有些人虽壮心不已，但已为老骥；有些人随政策的落实也远离而去，人才出现了暂时的真空。此时的张老只好重整旗鼓。他分析当时的形势，抓住了“老五届”这一断层，“网罗”了当时由于各种原因“流落”在齐市的这批人来校工作。尽管这些人中也有“另类”，但历史证明他们这一特定时期所做的贡献正中张老的眼光。

张老抓住的第二批人才是七七级、七八级，这是十年文革后人才的聚集。张老大胆地打破了七七年恢复高考时六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只许报师范类专业的戒律，招收了一大批六六、六七届的考

生。实践证明，这些学生毕业留校后起到了很好地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承“老五届”后继续做人梯，打了一场漂亮的“阻击战”，迎来了九十年代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我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因为七七级恢复高考时，我们三位好友，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中的佼佼者。虽抱负满腹，但正赶上“文革”高考制度的废除。下过乡，又去工厂做过工人。恢复高考时，虽然成绩出类拔萃，却受只许报师范类的限制。差点名落孙山。其中有后成为世界著名数学家的堵丁柱、有美国博士陈永茂。后来我们看到堵丁柱的录取档案，“不予录取”的大印一盖到底。张老曾知道我在工厂时为实习学生讲过课，是工厂的工人技术员，就批示招生人员将我们三人全部录取。非但如此，我们入校后，还被张老批示直接送往东北重机学院作为师资培养。

张老重视教师队伍中每位有长处的人，远没有今天这种唯学历论的偏见。记得我返校做教师一年后，我想组建一个计算机应用研究室，需要一些助手。张老听了我的打算，很兴奋，离开座位，踱来踱去，表示支持我的想法和建议。他除了满足我提出的设备条件外，还把我提出的名单上的人员全部调入校内，同时给每人解决了一个液化气罐（这在当时条件下，不仅大大方便了他们的生活，而且属于较高的待遇）。这个研究室后来承担了大量计算机应用推广项目，取得了省级科技进步奖，成为后来计算中心的基础。

张老重视教师中的人才，更重视干部。梁魁典同志是自动化专业的创始人，也是轻工学院的首任教务处长，一直任职到他病休。在那个“左”的嘴脸颇受偏爱的年代里，梁魁典同志的耿直、倔强多次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直到他病休后，当张老邀他一起写校志时，他身患胃癌也一直在床榻上坚持到写完。因为他自己都清楚，是张老一直在关心他、保护他、支持他，使他病休前一直在处长的位置上工作。说也奇怪，中国革命的道路上有一对内部敌人，“左

倾”和“右倾”机会主义，而“左倾”先生一直得到偏爱，张老在入党前，敢以“右”的面目出来反对“左倾”先生，得有多大的胆识和魄力啊！

张老有个吸烟的习惯，你很少看到他不吸烟的时候。有一次在全校学生大会上，他讲禁止学生吸烟，可他自己手中却拿着烟，大家哄堂大笑。可大家又都知道，这笑声不是嘲笑，而是带着对他人格爱戴的笑。因为他为了学校，为了学生付出的太多。如果说吸烟是缺点，大家是认可的，也许在他身上有这点缺点作陪衬，反而使他的人格更加完美。

张老给予我的甚多，但在序中是无法一一列举的。读罢此书，怀着崇敬之情作此序，衷心希望我的老师身体健康，颐养天年。更希望仍然在张老创办的这块事业奋斗的每一个人都能以张老为楷模，为齐齐哈尔大学的发展和祖国的教育事业奉献毕生。

唱江华

唱江华教授现任齐齐哈尔大学校长，全国人大代表，1977 年考入齐齐哈尔轻工学院，当即被学校选送东北重机学院计算机应用专业学习，1982 年毕业。

1985 年 1 月任齐齐哈尔轻工学院计算机应用研究室主任。

1990 年任齐齐哈尔轻工学院机电系主任。

1992 年任齐齐哈尔轻工学院副院长。

1994 年任齐齐哈尔轻工学院院长。

1996 年首任齐齐哈尔大学校长。



张元士生于 1924 年 10 月 8 日、夏历 9 月 10 日



2006 年 4 月齐大老科协成立一周年时与唱江华校长合影



作者张元士在写《吾家吾人》

吾家吾人

张元士

写于 1997 年 7 月，完稿于 2003 年 10 月

前 言

人生短暂几十秋，日头待落映山红；
七旬过后身尚健，任我走笔能画龙。
吾家吾人坎坷路，暮年尚偿苦水情；
大灾小难知多少，还有几回任其行。
身不挫折腰不直，心不磨炼志难成；
胸中自有真情在，人生路上何言愁。
生命从来不回头，上山下坡切忌停；
满目青山在脚下，天高地厚人悠悠。

这是我编完《齐齐哈尔轻工学院志》之后的心情。我的一生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倾注在这所学校——齐齐哈尔轻工学院。最后由我主编了这所学校的校志。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了。至于画得好坏且可不论。

这个时候，我已经 74 岁了，离休已经 11 年了。这 11 年，我没休息一天，民主党派、政治协商工作占去了大半时间，余下的就是学校的史、志工作，也干了 11 年，编完了两本校史和一部校志，我的校务才算画上了句号。至于民主党派、政协委员工作，如果不继续当选，再开几次会也该画句号了。74 岁得宽余，这是对校务、政务而言。这时节，我的心意自然要集中到家事。70 多年我对家

务没怎么管。对这个家来说，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说起这个家，世世湮湮远远流长，和谁的家都一样，都有各自的曲调，都是一部乐章。现在我要写出这部乐章的全过程那是很困难，也是难以办得到的。不管怎样，趁现在我还明白的时候，争取时间要尽力把它整理出来。尽到做家人的责任。当然，余下的时间不会太多了。现在，家里的愁情烦事还是不少，但愿有生之年，能如愿以偿。我就以《吾家吾人》为题，信笔由之，写到哪算到哪，写写我和家人的故事。目的是纪念先人，特别是我的父亲和母亲。以此教育后人，他们应择其善者而从之。

前面这一段话是在 1997 年 7 月写的。没想到，我又被推举为市政协八届、九届委员。现在是 2003 年了，我已年近八旬，还有最后一章没有写完。这中间，爱妻病床达七年之久，我没有写完她就走了。她很赞成我写这篇故事。我曾把有些章节念给她听，她高兴。那时她不能说话，从她的表情可以看出她鼓励我要写完这篇故事。我应该做到，也必须做到，也算是对她的纪念。

2003 年 3 月

现今已是 2009 年春天。这篇故事本来在 2004 年已经草就，可以出书了。为什么没做到，理由有三：其一，2005 年齐大成立老科技工作者协会，我被推选为会长。其二，2007 年我又被推选为齐市政协第十届委员会委员。看来，我的故事还要继续下去。其三，原稿有些涉及人际关系的事，不便刊出，需要修改。

今年，我已 86 岁了，希望在 88 岁时，米寿之年定稿印出。

2009 年春

祖籍与故乡

一、祖籍——山东蓬莱

1976年7月8日，我的父亲从故乡再返齐齐哈尔之前，亲自到旅顺口三里桥子的西山祭拜祖坟，抄写了下面一段墓志。这预示着他再也不会重返故里了。事情果真是这样。

先人自登州府蓬莱县鲁家邨迁居张家庄，始葬于村东南山是遥地名老柞山前，只因光绪34年日本人借此营盘之地为操兵之场。先人之墓俱迁于此，世远年湮示不忘也故志之

老坟碑文上标志

张公合葬之墓

男廷学廷芳奉祀

宣统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立

在旅顺口区水师营公社三里桥大队
营地址在寺沟新筑大水库下北大山
临归齐之前亲自到山抄写以备不忘

上面的父亲留字是爱妻在病中从她收藏的纸堆中找出来的。那时她不能说话，她示意要我保存下来。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丢掉，我也没有见过，可见她的细心、她的用心，令我十分感动。伟大的女性，伟大的女神。

人们都说山东蓬莱是仙境。这么好的地方，先人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呢？又是怎样从鲁家邨落脚到旅顺口，这些我都说不清楚，

我的父辈们也从未提起过这件事。我的四叔在北京有一次对我说过，他曾去过山东蓬莱亲自去鲁家邨看看。从鲁家邨走出来的张姓人家，显然不会是名门望族。很可能他们是由于饥荒，漂洋过海落脚到旅顺口的。旅顺口与蓬莱隔海相望，如果他们绕过长城从山海关到东北来，我想不会落脚到旅顺口的。再一种猜想就是随军而来的移民。旅顺口就是明朝派兵过海到旅顺口而得名的。

吾人与山东人流着相同的血，是地道的山东人。山东人对中国历史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中国的文化与文明不能说只发源于山东，至少是重要发源地之一吧！山东出了个历史名人孔夫子，东方圣人。他的“论语”流传至今，成为东方文化的基石。山东人引以为豪。我的祖父和我的父亲非常崇拜孔夫子。他们告诫后人不准用“字纸”擦屁股，说字是孔圣人留下来的。他们还在村子里挂起了“敬惜字纸”箱子，告诉人们把字纸捡起来，放进箱子里。可见他们对孔夫子的崇敬心意。

二、故乡——旅顺口

旅顺口是渤海的一个口岸，三面环山，面向南海，原名狮子口，像一头雄狮张开大口。明朝年代一位将领带兵过海，顺利靠岸而得名为旅顺口。旅字可以解释为旅行，也可以解释为兵旅。带兵旅顺利到岸，原名带口字，把狮子口改名旅顺口是太恰当不过了，一个多么好的名字啊！

清朝末年李鸿章兴建北洋海军，旅顺口就成为军港要塞。从我的家乡三里桥往北走也不过三、四里路有个水师营镇，那就是北洋海军的营地了。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旅顺口被日军攻陷。日本人占领旅顺口大肆屠杀中国人，约两万中国人，仅存 36 人。据说这 36 人是埋葬死去的中国人而幸存下来的。战后，日本侵略者逼清朝政府签署《马

关条约》。旅顺口要随台湾、澎湖列岛一块割让给日本。后来受到列强，特别是俄国的干预，清朝政府用重金收回大连和旅顺。1898年沙俄以保护其在满洲的利益为名，强租旅顺口成为它的军港。但日本人狼心不死，这就导致1904在旅顺口打起来的狗咬狗的日俄战争。在中国的土地上，两个侵略者厮杀起来，中国人遭受涂炭。我的祖父弃家而逃，携带妻儿向北走，吃过人家的猫食，真是国破家何在。战争以俄国失败而告终。从此，日本人霸占了旅顺口半个世纪，成为殖民地。直到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才收回旅顺口。

俄国人写了一本《旅顺口》小说，记述了日俄战争的情景。由于这本小说的名字吸引了我而读过这本文学著作，心里很不平静。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一本好书，有污辱中国人情节，尽管这本书获得过苏联时期的奖励。不过，我的后人，也应该看看这本小说，因为它是发生在家乡战争的记叙。这场战争是他们的耻辱，也是中国人的耻辱。

旅顺口地理位置显要，兵家必争之地，名闻天下。这里青山抱海，风景秀丽，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它是一个口岸、军港，人口不多，非常雅洁平静。但它却饱受战争之苦，战迹，殖民统治的遗迹到处可见。旅顺口的万忠墓、老铁山的炮台、鸡冠山的堡垒、坑道、俄国人的墓地、旅顺大狱，至今犹存。从这里可以回忆起一部中国悲惨的现代史，对后人来说也是一部教科书。

我记忆中童年时代的旅顺口，其东部是中国人居住的地方，算是旧区，其西部那时候是日本人居住的地方。旅顺口的民居大部分是建筑在山坡上，在松柏之中，好不美丽。有一所建筑房子不大但很别致，那是伪满皇帝溥仪在登基之前，日本人让他住的地方，至今还在。旅顺口的动物园、博物馆算是城区的两大名胜。到旅顺口观光的人，除了观赏战迹之外，这两个名胜是一定要浏览一番的。

那时，到这里来观光的人大多是日本人。我想日本人到这里观光因素之一，就是在那场战争中日本死的人比俄国人多得多。当时日本将领乃木大将的儿子就战死在 203 高地，乃木就称这个高地为“尔灵山”。日本人到这里是观光，也是寻找他们的亡灵吧！

三、三里桥——张家屯

吾家于三里桥又名张家屯，距离旅顺口岸很近，就在旅顺名山白玉山的脚下，站在白玉山上可以清晰地看见三里桥的村落。三里桥因何得名我不清楚。想必是这里曾有一座桥，离口岸三里。实际上三里桥距口岸也就是三里之路了。

三里桥是一个小盆地，它就在白玉山、老铁山、鸡冠山、二〇三高地的脚下。因为这里紧靠海岸，潮起海水可达村子的南沿，潮落人们就纷纷走出家门捡拾各种海鲜——海螺、海蟹、海参等，名曰赶海。“赶海”这个词不知是谁创造的，可以理解为把海赶走，也可以理解为追海，真是太有诗意，妙极了。

在村子的南部，那个时候有个跑马场，每年都要举行春秋两次赛马盛会，好不热闹。看赛马、买彩票的人很多，当然小商小贩也要云集到这里。六、七岁的我，也曾挎个小筐在这里卖过家产的桃子，能卖上几个铜板就很得意了。

村子西部紧靠着西山，那时候有日本人的焚尸炉，日本人死了都要火葬，把骨灰拿回家去。在旅顺口你是看不见日本人的墓地。相反日本人焚尸炉的旁边则是一大片俄国人的墓地，而山上则是中国人的墓地。为什么日本人霸占了这块土地半个世纪，连一块墓地都不留呢？而专给俄国人修墓地呢？说日本人给俄国人修墓地这是真的，因为我看到在俄国人墓碑上刻着“露西亚”的字迹，“露西亚”就是日语的“ルシヤ”的俄国人之称。日本人不留墓地可能是他们的风俗，我没去过日本，在日本国内恐怕也不会有墓地，

一个弹丸之国，那能给死人留地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苏联为纪念其出兵东北而牺牲的军人，就在俄国人的墓地上扩建为苏军烈士陵园。2000年我重返故里时在陵园前的广场上，耸立着一座中苏友谊纪念碑。这个碑是从大连市斯大林广场整体搬过来的。吾家距这个广场也不过几十米。今日的三里桥已成观赏旅顺的名胜之一了。

村子的北面是一片瘠薄的土地。就是这土地，养活着村子不过三、四十房户的人家。但仍显不足，人们就在山上破山造田。这里的人吃苦耐劳，见缝插针、寸土必争，把一块块石头抬出来，在山坡上到处可见十几平方米甚至几平方米的田块。为防止水土流失，块田的周围都用石块砌成隘墙。

村子的东部有一条公路和一条铁路，这是从旅顺通向大连的主要两条通道。火车每天至少要往返四次，旅游旺季几乎是一个小时就一趟。而公共汽车就更方便了，一会儿一趟。

这里的村民多半是半工半农。因为距市区很近，他们住在村子里，到市区上工，可以早出晚归。那个年代做工要比务农收益更多一些。尽管这样，我童年时代的三里桥则是一片田园风光的景象。

解放后的三里桥变样了。半个多世纪了，工厂建到村子里来了，越来越多，农业从主至副，三里桥已与市区连成一片。1992年、2000年我两次归里的故乡，只见有点滴村屯的痕迹，童年时代的田园风光消失殆尽了。

资料 1

历史名城旅顺

旅顺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东晋时称马石津，唐朝时称都里镇，辽金以后民间称之为狮子口。明洪武四年，派兵从山东渡海收

复辽东，在狮子口登陆。为纪念安抵辽东，取“旅途平顺”之意，遂改其名为旅顺口。

旅顺口扼渤海咽喉，其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尤其在近代史上，这里更经历了无数次战争，留下了很多战争的遗迹。

在市区中心，有两座高高的纪念塔，一座叫“胜利塔”；一座叫“友谊塔”。它们分别是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和中苏两国人民团结战斗的友谊而建的。

除了这些塔碑之外，在市区还有一座“万忠墓”。这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时日军屠杀中国同胞的罪证。当时日军凭借其船坚炮利的优势，抢占了旅顺，并在旅顺大肆屠杀我手无寸铁的同胞，三天三夜，血流成河，我两万无辜百姓惨遭杀害。翌年春，人们把殉难同胞的尸骨集中火化，埋葬在一起，就是现在的“万忠墓”。

说起战争的遗迹，最明显的当数城北东鸡冠山附近的“望台炮台山”。山顶一片裸露的岩石上并排架着两门15公分舰用加农炮，是沙俄于1899年铸造的，至今已过百岁。在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中，被沙俄军队临时运到这里参战。现在那漆黑闪亮的炮身上还依稀可见当年战争造成的伤痕，有一门炮的炮口还残缺了一块，估计那一定是当年日军炮火的“伟绩”了。

旅顺本是辽东半岛最南端的一座滨海小城，过去它和大连全称“旅大”，现在它是大连的一个行政区，这里周围群山拱卫如屏，黄海和渤海环抱着它，由于它有70余公里长的海岸线，加之水深港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898年沙俄强占旅顺、1905年日俄战争都发生在这座小城。日俄战争以后这里成了日本殖民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苏联军接管，1955年才将旅顺的管理权归还中国政府。

苏军烈士陵园坐落在旅顺西北部的三里桥，与旅顺其他旅游景点熙熙攘攘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烈士陵园显得格外宁静，整

座陵园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我们走在陵园的小路上也格外小心，不忍心惊动这些长眠于此的人们。陵园的正门朝东，紫色花岗岩砌成的大门显得庄严而雄伟，门垛上装饰有花环、五星、红旗、兵器等各种精美的浮雕图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一看就知道那是苏联红军留下的。陵园的中央是一座苏联烈士纪念塔，塔高约 1.5 米，塔身用白色花岗石砌成 12 角形。在第一层塔基正面的南北两端，各铸一尊高 1.5 米、分别身着陆军和海军军服的苏联红军战士跪式铜像，他们脱帽、握枪、是在向安息于陵园内的红军烈士行跪拜礼。在塔身的两侧，备置一个直径近二米的巨型铜铸花环，第三层塔基正面镶嵌着一块铜板，上面用中俄文写着：“为苏中两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塔的顶端是铜铸的环绕着橄榄枝的金星，象征着胜利与和平。这座充满俄罗斯风格的纪念塔连同大门都是 1955 年苏军撤离前修建的，是两件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俄罗斯建筑精品，也是陵园的主体建筑。

陵园占地面积有 48,000 平方米，它是 1945 年苏联红军进驻旅顺后在沙俄公墓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陵园的西部是 1896 年沙俄强占旅顺后修建的公墓，埋葬着 1904 年日俄争夺旅顺口战争中，俄军阵亡的 14,873 名阵亡官兵，这些官兵的遗骸大都是 1906 年迁葬于此的。由日本当局所修的十字架形墓碑上刻着“露兵之墓”的字样，碑座上刻着墓穴里埋葬的人数和死亡的地点。每个墓穴里少则几十人，多则几千人，基本上是按照同一或相近战争地点为单位埋葬死者的。如日俄战争中著名的 203 高地争夺战和椅子山战役中俄军死难者 6,550 人就埋葬在在同一座“露兵之墓”中。1907 年 10 月，日本政府还在这 12 座露兵之墓中修建了一座欧式建筑纪念碑——“旅顺阵歿露军将卒之碑”，纪念碑的正面白色雪花石上用俄文刻着“这里是在保卫旅顺港的战斗中悔过的、阵亡的俄罗斯士兵的遗骸。”显示出胜利者的得意忘形。这部分保留下来的旧陵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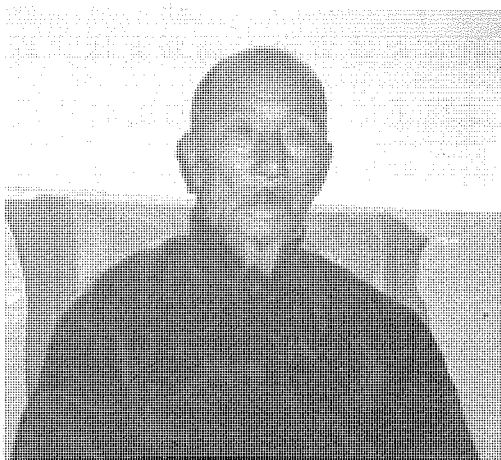
有着浓郁的东正教色彩，几乎每个墓上都可以见到多了一条斜杠的十字架。有的墓穴还围有精致的铁栏杆，那是死者生前为俄国贵族或随军牧师的象征。在这座旧陵园里，墓穴的规模、材质有明显的区别，反映出强烈的等级差别。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俄军旅顺要塞陆上防御司令康特拉琴柯少将的陵墓，这位在岸土地上阵亡的最高级别的俄军将领，曾在东鸡冠山北堡垒指挥俄军与日军殊死战斗 119 天，最终被日军的 280 毫米重炮炸死。这位曾让日军人为头痛的俄国将领，如今也安眠于苍柏之中，在他的旁边，埋葬着照料了他多年的情人——一位俄国护士的遗骸，高大的东正教十字架。大理石墓基和铁围栏显示着死者身前显赫的身份。

陵园的东部和西部部分地段作为主体，安葬着 1945 年 8 月苏联红军出兵我国东北，与日本关东军进行浴血奋战而牺牲的红军烈士，以及苏军驻旅顺期间死亡的官兵及其家属，还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部分苏联红军飞行员等，共有 1,323 座墓，安葬着 2,030 人。墓穴的规模差别不大，墓基以水泥为主，墓碑上的飞机、铁锚、坦克等浮雕图案，分别标志着烈士们身前所在的军兵种。镶嵌在墓碑上的死者照片或瓷像，有的还清晰可见，有的由于日久腐蚀已经看不清了，还有的也许是死者的家属或后代重新换了新的。他们大多是些英俊的小伙子，面对这些战士的遗像。我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受，也许在他们的背后，每个人都有着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是一部的乐章，如今谁能把它谱写出来呢？使我们感到诧异的是，个别的红军战士墓也有围栏保护，莫非这些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国际主义战士也要显示贵族身份，这些无神论者不会是牧师吧？仔细瞻仰我们才见到，在他们的墓碑上明显地刻有蛇、酒杯等图案，原来他们是红军的医务工作者，有的则是红军女战士。我们围着白杨、槐树、芙蓉花组成的林荫道绕了一圈又一圈，久久不想离去。整座陵园庄严、安静，也许都是俄罗斯后代的

缘故吧，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政府、不同性质战争的死难者如今真的“和平共处”到了一起，他们使这里成了中国土地上最大的外籍烈士陵园。

走出陵园，在正门前的广场上，耸立着一座中苏友谊纪念碑。这座纪念碑以前安放在大连市中心的斯大林广场，如今整体搬迁到了旅顺。据说搬迁过程还惊动过中俄两国的外交部。纪念碑的浮雕依然如旧，手握钢枪的红军战士等浮雕依然显示出它的姿态，铜牌上的文字依然能够让人记起那段中苏友谊的难忘岁月。如今苏联已经不复存在，友谊之碑随之也成了历史的纪念，但碑上那耀眼的红星和镰刀斧头却不会褪色，它将让我们牢记历史、牢记友谊。

儿时之家



父亲张有芝 (1899—1983), 时年 83 岁



母亲王延秀 (1895—1967), 1948 年居住证上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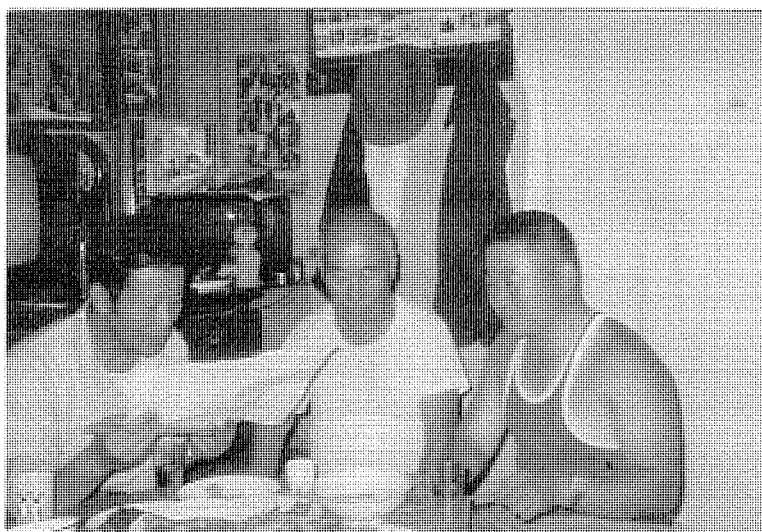
张有芝、张有兰、张有荃三兄弟在故乡老宅前合影



二叔父母在故乡老宅前合影



我与三叔在在故乡老宅前合影



我与三叔、元融在老宅三叔家共餐



1994 年我与朝珍在北京百万庄四叔父母家中合影



1994 年我与四叔在其家中合影

儿时之家——三世同堂

一、家境

1924 年——1934 年，我生长在旅顺口三里桥的家。这是一个大家庭。人口很多，在 1934 年算起来要有 20 几口人。祖父、祖母、父辈们兄弟四人都已成婚生子。我还有一个姑姑嫁给“羊头洼”村的陈姓人家。我同辈的兄弟姐妹当时活着的 10 个人。说活着的就有死的，我有四个兄弟姐妹都死在麻疹上。

这个家是以农业为主，多种经营的农户，在这个村子里算是一个大户人家，比较殷实小康。农田估计有 100 亩左右，在村子里是最多的了。农业上的主要劳动力是我的爷爷和母辈们。父辈们主要从事非农业劳动。因此，农业劳动力显得不足，常年要雇一个长工，农忙时还要加雇一、两个临时工。按毛泽东的家庭成份划法，这个家就是富农了。富不富呢？依我看在当时的全村算是富户，从土地占有量上说应该是首富了。在当时的人们观念里有钱买地最可靠了。

这个家有两套五间房子，都是正房。有一套东厢房，是供长工住的仓贮农具的地方。两套正房的中间，用一个简易的马圈间隔起来，形成两套院落。西院靠西墙设有猪圈。厕所设在两院过道门的南头与马圈分开。家人都住在正房里。东院正房的格局是：中间一进门就是厨房兼饭厅，设有两口大锅灶两侧分开靠在东西墙上，而且都带有手动风箱。大条饭桌顶在北墙上。一个大水缸不管冬夏都在屋外。冬季给它穿上草帘塞上草的衣服就可以过冬了。厨房占去了一间房子，剩下的四间就是居室了，东西部各两间。分配是：祖父母在东部一居室，其里屋分给三叔父母。西部的一居室就是我的父母了，因为他是长子，西部里屋分给四叔父母。二叔父母只好住在西院正房的一居室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把二叔父母分在西院。按

理说应该把二叔父母分在祖父母居室的里屋才是。现在我琢磨着可能是因为后来的二婶母的性格和我奶奶和不来的原因吧！而三婶母的性格和我奶奶很和得来。那么，为什么又不把二叔父母分到我父母的里屋呢？这可能是因为四叔婚后在大学住校，把新娘子一个人放在西院，都不放心，也有点不尽情理了。西院的正房除了二叔父母一居室外，剩下的房间就是人吃马喂的粮仓了。

两座正房的后面就是一块园地。那时主要种植桑树，是专供奶奶养蚕用的。把两座正房加上前庭后园用石头墙围起来，就形成一个很典型的农家住宅结构。而墙外的东部就是一块场园专供脱谷用的，在场园的东面有一口水井。

这个家是一个典型的农户人家，但我看她不是靠农业起家的。我记得当时有两辆供旅游用的马车，旅游淡季出一辆，旺季则是两辆了。这是一项重要收入。我的父亲和三叔从工，他们每月收入都在 30 元左右，这在当时就不算少了。马车的每天收入和父辈们的工资都要如数交给爷爷上账。

这个家既种地又养车，饲养的牲畜就比较多。马、骡、驴都有，就是没有牛，算起来能有十几匹，以马居多。其中有一匹大黄马，个高体形好，主要是用来参加赛马比赛，好几次还得过奖。养这么多牲畜是畜力的需要，也是积肥的需要。同样养猪、鸡、鸭也都有积肥的意义，连厕所的粪坑还要套上个大缸，以免粪尿流失。自然经济，良性循环。一到晚上，饭前、饭后人们就忙碌起来，为牲畜准备饲料。大门外有一个大草垛，多是谷物的秕棵，一是做饲料、二是做烧柴。但做烧柴很少，用多了畜生的饲料就不够了。怎么办？到市区运来煤灰，筛出煤核做燃料，这就是大锅灶要用手动风箱的主要原因。

儿时之家，至今留给我的印象是：三世同堂，敬老爱幼，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省吃俭用、殷实小康。

二、家人

我满 10 岁时，也就是 1935 年春节后随父母离开大家庭。这里记述的是那个时候的家人。那是一个三世同堂，以祖父意志为转移，以封建礼教为准则，有序运转的大家庭。

1、祖父与祖母

我的爷爷张福厚生于 19 世纪 60 年代，我估计是 1868 年，卒于 1941 年，享年 73 岁（1868-1941）。

爷爷是勤俭持家、治家的能人。他粗通文字、会木工手艺。我不知道他从先人那里继承下来多少家产。但从我家邻居二爷爷的家境相比，不会很多。二爷爷是爷爷的亲兄弟，他只有一个儿子，土地很少，而且没有牲畜，种地要靠我家帮助才行。到我童年的时候吾家要比二爷爷的家境好得多了，像前面记述的那样，已经是这个村的首富人家的了。应该说，这个家业是爷爷率领家人勤俭治家的结果。

现在，我还能回忆起我七、八岁时的爷爷。他每天晚上都带着眼镜，一边打算盘，一边记账的情形。马车的每天收入，父辈们的工资收入，以及每天的支出都要入账。这里的家人每天做什么都很清楚，都很有秩序。包括像我这样七、八岁的儿童都在内。拾粪是我每天早晨起来必须干的活，挎个粪筐，拿一个钎子，主要拾狗粪。可见这里的积肥连狗粪都不放过。早饭过后马车起动了，我就要跟在马车的后面，要把马粪拾到手才能回来，有时要一直跟到市区。

勤俭持家、治家是爷爷培养起来的家风。这里的家人吃的、穿的、用的都很节省。吃饭时丢掉一个饭粒都要捡起来吃。掉多了爷爷就要拽我们的耳朵。这是一种处罚。我看，童年时代的家业是家人勤俭节约，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爷爷是乐善好施的老人。我记得一位同族的老奶奶，她带着两个儿子，家贫穷。到吃不上、穿不上的时候，就要找爷爷寻求帮助。

村子里谁家有困难，或出什么问题，到我家找爷爷那是很平常的事。因此，爷爷在村民中声望很高，一举村长就把爷爷举出来。到现在我还能记忆吾家常贴的春联：忠厚传家远，积善庆有余，横批是勤俭持家。这也可以说是这个家的门风。

爷爷对儿孙的态度是一严一慈。我在这个家是长孙，二叔的长子比我小一岁。在我们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干活了。当我们偷懒或干不好活时，那就要遭到爷爷的训斥及至体罚，拽耳朵是爷爷常用的体罚，如果犯错误就得下跪了。

爷爷也很关爱我们。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可能是我九岁那年的旧历二月二日，家里吃猪头肉。总是不吃肉，吃一顿我就狼吞虎咽。没注意一块骨头卡在喉咙里，怎么弄也下不去。正赶上一位‘道士’到家化缘，实际是变相要饭的。他看到这种情形就说：拿一碗水来。他对着这碗水念念有词，也不知说些什么？然后叫我喝下去。爷爷信以为然。但我喝下这碗水仍不顶用，骨头照样卡住脖子。急得爷爷没办法，就只好领着我到旅顺口医院求治。快到医院了，骨头也下去了。爷爷说：这老道还真灵啊！灵不灵天知道。其实是在于走动，是我的走动把骨头顺下去的。这是我现在的认识。

我的奶奶王氏，叫什么名字至今我也不知道。奶奶比爷爷大四岁。1955年卒于北京四叔处，享年91岁（1864-1955）。奶奶是长寿老人。如果说这个家族后人能长寿的活，其基因就是来源奶奶了。据我了解奶奶的王氏家族的后人都比较长寿。

当我懂事的时候，奶奶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奶奶有一个养蚕小屋。为了养蚕屋后园田种的都是桑树，桑树长的不高，但叶子很茂盛。养蚕的一切活动都由奶奶亲自操办，她的助手就是堂姐小翠子，和后来的堂妹秀芳了。奶奶不仅会养蚕，还会抽丝和织布，还备有一台古老的织布机。可以看出奶奶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女人。童年时代的家业积累着奶奶的心血与辛勤劳

动。也可以想象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这个家的男耕女织的情景。但到了 20 世纪的 30 年代，园田的桑树都砍掉了，养蚕小屋变成仓库了，奶奶的蚕业也就洗手不干了。

婆婆治理媳妇是那个年代是天经地义的事。奶奶对媳妇要求高也很严。怎么个管法呢？给我的印象是除其直接管教以外，就是要通过儿子去治理媳妇。奶奶有四房儿媳，在她的眼睛里四房媳妇是不一样的，态度也不一样。我母亲是大儿媳，她干活不太利落，活也干不上去，在奶奶的眼中是不中意的，因为这个，我母亲常遭受父亲的毒打，动不动就饱以老拳。在这个家里我的母亲，受累最多，活干的最多，皮肉之苦受的最多，眼泪流的最多，可怜的母亲。对二婶母，奶奶也不中意，但二婶母能说还很厉害，二婶母对奶奶的治理常常不服，免不了二叔有时也要为媳妇说几句情理的话，奶奶就说他怕老婆。上不是、下也不是，二叔常唉声叹气心情不怎么舒畅。三婶母住在奶奶的里屋，比较会说话，活也能干上去，她是奶奶比较得意的一房媳妇了，依我看三婶母在这个家里受气要少一些，挨打受骂的机会比起两位嫂嫂要少得多了。四婶母在当时是新媳妇，四叔在大学读书常不在家，就住在我母亲的里屋，和我母亲的关系尚好。我没有发现四叔打老婆的情节。因为奶奶对四房媳妇的态度不一样，免不了在妯娌之间就有了隔阂，也免不了妯娌之间的嫉妒。

奶奶虽然不得意我母亲，但对我却又偏爱。我是她的大孙子，奶奶到大姑家休闲，都要带我去。姑姑家姓陈，住在《羊头洼》村，村中有一条河道，一到雨天河道满水，直到现在我还能忆起在那里戏水的欢乐。

在我读大学二年级的暑假，我回到旅顺老家，回到奶奶的身旁。那时奶奶已是 80 多岁的老人了。我晚上睡在奶奶的身旁，早晨起来奶奶对我说，你睡得很好，细细呼吸，没有鼾声。可想她这一夜

是怎样过的。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春季，奶奶来到齐齐哈尔，临回去时在我的未婚妻赵家等火车住过一夜。奶奶的爱至今仍留在我的心中。

2、父辈们

我的父亲有弟弟三人。父辈们兄弟四人。张有芝、张有兰、张有荃、张有萱。芝兰荃萱竞芬芳、清且香。多么好的名字，不知是那个学究给起的。爷爷辈家人的名字都犯“福”字，而父辈的家人都犯“有”字。这是这个家族延续下来的。在这个村子里的同族人家都遵循这个规定。

在重男轻女的世俗年代，我的父辈们都受过学校教育。父亲和四叔读书的时间长一些，而二叔和三叔读过小学四年级。父亲先读私塾，念过公学堂（高小），本来他已考取旅顺师范学校，但因当时的家境所迫，奉爷爷之命辍学了。父亲为此感到终生遗憾，常喋喋不休。四叔一直读到大，以工学士学位，毕业于旅顺工科大学。这是一所日本人在殖民地办的一所国立大学。这是日本人为侵略中国，吸引日本青年到这里就读，而掠夺东北资源一个策略。因此这所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是日本人，而中国人就微乎其微了。教育成为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工具，是日本人一大发明创造。四叔在这里读了六年。在吾家算是第一个知识分子了。说起四叔在这里读书也不容易，当时我父亲在旅顺工大的物理实验室做工，他的工资几乎都用在四叔的学习费用上，连父亲的工作服也多穿在四叔的身上。

这个家虽然是农业为主的家庭，但我的父辈都不从事于农业，而主要是从工。父亲是先学管工，后来因为铡草喂牲畜把大姆指铡掉一段，不能再做管工而去旅顺工大做工的。我的二叔因患眼疾唸书不多专门从事家庭副业——旅游马车的车夫。但不可小看这项家庭副业，它倒是家庭财富的重要来源之一，绝不比其他哥们贡献少。三叔是木工手艺，在旅顺船坞工作，工资收入也不比我父亲少。总

之，我的父辈们白天做工，晚上务农，可以说是日夜操劳，他们为这个家庭的振兴都竭尽全力，也为培养四叔成才予以有力支持。

3、母辈们

父辈们的婚姻都是祖父包办的封建式的婚姻。我的母辈们的年龄都比父辈们大四岁，我的奶奶也比爷爷大四岁。为什么这个家里的媳妇都要大四岁呢？我想得有个说法。一个说法是：“女大三抱金砖”，那么“女大四就是抱金櫃了”了。第二个说法是我想出来的，就是娶大媳妇对一个家庭来说就可以早一点进来一个好劳力。从我童年时经历过的家庭情形，我的想法是有道理的。我母亲 19 岁就嫁给我父亲，那时我父亲才 15 岁。我母亲就成为这个家庭的第一个外来的劳动力了。当我 8 岁时看到家庭的情形是：妯娌四人轮流主灶，供全家 20 多口人吃饭，其他母辈们都要到田野里务农。母辈们确实是这个家庭农业上的主要劳动力。娶大媳妇进家门，就当时的农村来说，就是买廉价的劳动力的最好办法。

我母辈们的第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没念书，都目不识丁了。第二个共同点，他们都没有名字，从娘家来的小名，这时也不能叫了，所以在家谱上只能写“张*氏”了。连我母亲的名字，自到齐齐哈尔以后为了上户口，才给起了名字——王延秀。我才知道母亲的名字。

我的母辈的第三个共同点都是小脚女人，又都是“裹放脚”就是先裹后放。从脚上看，我的奶奶小脚要比母辈们周正得多，也小得多。奶奶是“纯裹脚”了。中国的汉族女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裹脚，我没有考究。从我家女人脚上变化可以看到，从 20 世纪初裹脚的女人，能放的就开始放了，到 20 世纪 20 年代的女孩子，就不裹脚了。在中国不仅汉族女子裹脚，满族女人也裹脚。不同的是汉族裹尖裹小，而满族是裹瘦裹形，我的爱妻的脚就是这样。从审美观点上看，我认为满族的裹法是好的。

母辈们，一年到头总是劳累着，只是“过年”那几天可以休闲

一下，再就是“回娘家”就是放假了。但也不是年年都放这个假。在我的记忆里，我跟妈妈去姥姥家，能记得起来的也不过两次。有一次是舅舅用车来接的。再一次是我跟妈走着去的。我记得越过一座山，走了很长时间才到姥姥家——夏家屯。那时候姥姥家有姥爷和舅舅舅母们，姥姥已经过世了，我从未见到我的姥姥。母辈们为这个家确实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又都流尽了汗水，却又受到封建礼教，夫权的统治，挨打受骂也流尽了泪水。那个年代的母辈们说他们是繁衍后代的女奴，也许过分，也许不过分。母辈们的遭遇，是父辈们的过错吗？不！是中国历史的产物，时代的产物，能怨谁呢！

4、兄弟姐妹

当我满 10 岁离开这个家的时候，我这一辈人有四个男孩，五个女孩。就是说，我的同堂兄弟姐妹共有九人。

我们四个男孩：张元士，张元第（二叔的长子），张元斗（二叔的次子），张元仲（三叔的长子）。我们这一辈的名字都犯“元”字，取名士、第、斗、仲，反映出祖辈、父辈对我们的期待和愿望，状元及第都（斗）仲了。那个仲了呢？犯“元”字的适合于男孩，女孩子就没有这个份了。所以女孩们只有小名而没有大名了。

在这个家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男孩子到读书年龄都要去读书，至少要念四年书，那就是普通学堂了。念好了的可以多念。但对女孩子就不是这样了。二叔有个女孩叫小翠子比我大三岁呢，但一直没有上学，比我小一岁的三叔家的长女叫秀芳，在我离开家的时候还没能上学。她们不上学只有乳名，而没有大名了。那时候的学校，普通学堂（小学）只收男孩而不收女孩。可见，女孩子不上学在当时的社会，当时农村是普遍的。重男轻女的年代，女人从生下来就接受不公正的待遇。

三、家变

儿时的家，始建于 19 世纪 80 年代，也就是祖父 20 多岁的时候，它的顶盛时期应该是父亲 40 多岁左右，而 20 世纪 30 年代，应该说从我父亲离乡求职于齐齐哈尔，这个家就开始解体了，继而有三叔去沈阳。四叔的出走，这个家就摇摇欲堕了。祖父于 1941 年去世，这个家就彻底解体分家了。在那个年代的中国，一个封建式的大家庭持续多长时间呢？在吾家是半个世纪，50 年左右，这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呢？

1、父亲北上齐齐哈尔

1931 年 9 月 18 日，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从这一天起，祖国的东北大地和旅顺一样沦陷为日本人的殖民地。

1934 年的春天，我的同宗叔叔张有昌就职于齐齐哈尔工业学校，任校长。他来信邀我父亲去那里做学校的庶务工作，也就是主管学校的总务工作。月工资约 60 元左右，爷爷主张应该去，因为张有昌的妻子是我奶奶的亲侄女，到那里去求职是万无一失的。工资又高出一倍，机不可失啊！父命即从，我的父亲就只身来到齐齐哈尔，而且特买了一套西装，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西装。也就这一套，我再没看见过他穿第二套西装。而且这一套西装他穿着很不合体，太瘦小，就一直留在箱里，最后是穿在我爱妻的身上倒感到很合适。儿媳妇穿着老公公的衣服，在中国可算是很稀罕的事了。

做学校的庶务工作，本来是很好的工作，但事与愿违，当父亲到了齐齐哈尔时，张有昌叔叔被调任到省实业厅做技术行政工作。因为他曾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工业大学。没办法，张有昌叔叔只好为父亲另谋职业到龙江县县公署工作，先是做翻译，继而到县警务科工作。月工资也是 60 元左右。头一年下来，我父亲就为这个家赚回四百多元。爷爷当然高兴。

1935 年的春节，父亲省亲回家，对家人特别是向爷爷提出一些问题。一是在外吃住要花去很多钱，而且父亲吃素菜有许多困难和麻烦，如果把我母亲接到齐齐哈尔，也不见得花很多钱，还能解决父亲的生活问题，这是一条主要理由。第二就是我的学业问题。父亲不在家这一年，我的学习成绩下滑，并滑得很厉害，如果没人严管这个孩子就瞎了。这也是一条重要的理由。还有第三个理由，当时我的父母只有我一个独生子，他们也希望父亲和母亲在齐齐哈尔，为他们再生个一男半女。由于这些理由，爷爷点头了，就在这一年的春节正月初八那天，父母带着我离开家乡，来到齐齐哈尔，建立了三口之家的小家庭。

从旅顺到齐齐哈尔路程要有三千里。乘火车当时也要两天一宿。我和母亲第一次乘火车，特别高兴，特别快乐，我看最高兴的是我的母亲，在她看来快乐的不是坐火车，而是这下子可跳出这个苦海了。从大连到齐齐哈尔那时就有直通火车，我们坐的那趟火车的车长姓候，和父亲相识，在他的周旋帮助下，我们只花了两头小站的车票钱，其余的车票钱都省下了。我们还都坐在软座上，当然这是事前安排好的了。听父亲说，那位候车长是一位爱国志士，后来被日本人抓去牺牲了。

谁也没想到，所有的家人都在内，我们这一走就再也回不来了。而成为这个大家庭解体的开端，特别是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他们绝对是大家庭的捍卫者。他们在当时绝不会预想到这样的结果。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是唯物论。

2、四叔的婚变与出走

1936 年，四叔就要在旅顺工大毕业了。他参加过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在中学生时代，他就有过学生爱国行动。大学要毕业了，他不能不想大学毕业后该怎么办？四叔 1936 年的婚变与其后的出走是相联系的两件事。

这一年的夏天，四叔的同学到家里来请爷爷到旅顺口吃饭。爷爷走后。四叔就回家套上马车，把四婶母的嫁妆，连人带物拉到四婶母的娘家，当然还包括他们的女儿小云子，就这样四叔和婶母强制离婚了。这是一起有预谋的行为，背着爷爷干的。如果爷爷在家，事情不会这样顺利。联想到后来四叔的出走，我觉得四叔采取这样断然措施是可以理解的。

1936年四叔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大连的一家日商造船厂。没有几天，一个夜里他潜身于一轮货船的货仓里，偷渡到青岛不告而别，离家出走了。出走前他给我父亲一封信。大意是父亲年事已高，大哥应该回家帮助父亲照看家务，当然其中也包含不要再给日本人服务的意思。但是爷爷没有这个意识，我父亲是最顺从祖父的孝子，也只好唯命从父了。

四叔的婚变与出走，这个家又少了三口人。可以说这个家庭又断了一个支柱。家庭农业的劳动力大减了。四叔出走之后一点没有音信，谁也不知道他走向何方。这可苦了我的爷爷和奶奶，特别是我的奶奶日夜想念他的老儿子，最有出息的老儿子，夜里做梦，有一次梦里见他的老儿子在坟茔地里走着，并且一句话不说。奶奶找一个巫婆给圆梦：说你老儿子已经死了。奶奶当即泣不成声，以为老儿子真的死了。这样也好，长痛不如短痛，虽说还是想儿子，但不是那样牵肠挂肚了。不仅奶奶，我们全家人都以为四叔不存在了。我父亲常嘟哝道，这个人没了。

3、三叔去沈阳务工

大概是在1940年前后，三叔去沈阳兵工厂务工。三叔的木工活是很精巧的，到沈阳工资肯定是要比在旅顺船厂多得多，不然祖父不会准许三叔去沈阳。但是，这样一来，家里的人手又少了，前面讲过，家人在旅顺务工可以早出晚归兼职家庭农业。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三婶母提出要去沈阳探望三叔，当然也有意去

沈阳组建小家庭了。爷爷对此是不能同意的。当然三婶母也有理由，能许大嫂跟大哥去齐齐哈尔，我为什么就不行呢？奶奶曾得意的三媳妇造反了，去了沈阳。这样一来，这个家的第三根柱子，虽然还未断，已经弯了。

四房媳妇是大家庭的好劳动力，走了三房，留下一房就是二婶母，二婶母是奶奶最不得意的一房，而只剩下这一房在家干活，当然会对爷爷奶奶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总的看，第二根支柱虽然未弯，但已经挺而不力了。

4、祖父病故

1941年是爷爷73岁的那一年。这个大家庭，这座大厦的四根柱子，撤的撤，弯的弯，顶着的也无力了，压力几乎都压在一位老人的身上，他确实顶不住了。就在这一年的夏天爷爷突患痢疾。这本不是什么要命的病，却要了爷爷的命。在爷爷的病危中，急电召回我的父亲。父亲到家不久，又电告我的母亲，爷爷病逝。那时，我是中学三年级的学生，只好请假陪母亲归里奔丧。

我记得，我陪着母亲先乘齐齐哈尔到沈阳的火车，继而换乘沈阳到大连的“亚西亚”号，在当时这是最快的火车了。到大连又转到去旅顺的火车，到站已经是夜间了，我陪着母亲步行回到了已离开六年的家。这是我第一次自主远行并换过两次火车。我已经长大了。

当时的情景是院子里搭起一个灵棚，中间停放着的棺材。我和母亲当即跪在祖父的灵前痛哭，寄托哀思。忘记了是谁把我们母子扶起来回到堂屋里，如果没有人扶起，不知道要跪多长时间呢？

祖父的丧事办得很肃穆，隆重。在这个村子里祖父是有声望的老人，而且这个家是祖父一手操持起来的，他的儿女们当然要合力办好丧事。请了道士，还请了和尚，他们现场奏乐，念经。这个家信道教又信佛教，二教在这个家族精神世界里都有位置。我的父亲

是笃信佛教的人。但是在这个家供奉的是灶王爷，村头里还有土地庙。灶王爷，土地爷都是道教的代表又是彼岸的官员。他们不仅要管活人，还要管死人。

第七天是出殡的日子。祖父的棺材是人们用杠子抬着，有亲人和亲友的队伍，有纸制的童男、童女、车和马等队伍。这些纸制的东西是陪葬品，意思在彼岸为祖父所用。当然，这些东西没法和秦始皇能留到至今日的“兵马俑”相比，而是一烧了之。但意思是一样，给人的印象，后人尽了孝意。

爷爷的墓室是他在世时自己修的。我的堂弟张元第就是陪着爷爷辛辛苦苦干了很长时间才修成的。如果我不来北方，这个活肯定少不了我。自修墓室说明爷爷对死早有准备。同时也反映了爷爷一生的自力更生，勤俭持家的精神。按当时的家境，花一点钱，雇工修墓完全可以办得到的。愿爷爷的勤俭精神，自力更生精神永照后人。

爷爷的丧事结束了。我又陪着母亲先回齐齐哈尔。父亲怕我误了学业，只好让我和母亲先走了。他走不了，要处理爷爷去世后的家事——分家。他是长子啊！

四、分家

祖父丧事后，父辈们就要分家了。父亲是长子，如果那时他不来齐齐哈尔，我想这个家不会分得这样急，这样快。因为祖母还在。兄弟四人，老大在北，老四出走，老二，老三在家，妯娌不和。奶奶已快80岁的老人了，难于主持这个家。看来这个家非分不可了。

怎个分法呢？奶奶还在当然要算一份，就得按五份分家。其结果是：在三里桥子的家产分四份。在北大荒的财产算一份，分给我的父亲，有五间平房（在碾子山）和一方子荒地（45晌）。这是爷爷活着时候在北方准许父亲分置的家产，是大家的公产，而不是私产。但奶奶说话了：老大到时候还要叶落归根吧，所以也同意在家

乡分给父亲一块房基地。那么家里的财产就分成四份，三个叔叔和奶奶各一份，但奶奶要把四儿子那份领过来，还要和三叔一起过生活，实际上三叔已经领取了原来家产的四分之三了。分家就是把我父亲和二叔分出去了。这个分法奶奶满意，因为奶奶最看得上的是三房媳妇。最看不上的是二房媳妇。

福兮，祸兮！阴阳难测。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大局管小局，到了 1948 年我的家乡也开始土地改革划成分。三叔家经营原家产的三份，要雇工，就给划了富农。而二叔则是中农。三叔有理也说不清是三份还是一份。那时，四叔抗战胜利后归里，已经是大连市的工业厅长了。他把奶奶接到大连一起生活，奶奶享福了。至于在北方，抗战胜利后我父亲这一支的家产则自动全部放弃，在土改期间得到了农民的惠顾。幸也！

儿时之家，家大业大，可谓兴旺。从 20 世纪 30 年代算起，也不过 10 年的光景，到了 40 年代就土崩瓦解了。爷爷给后人留下的财富，家人的汗水，泪水的积累的财富，倒给后人留下了包袱。得到越多的人包袱就越重。可叹！可悲！

信笔开河，写到这，那时的吾家与吾人就算写完了。儿时之家的兴衰与变迁是同中国社会的大变动相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日本人的侵略，满洲国的存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新中国的成立，这个家的兴衰与变迁将不会是这个模样。一个家庭的兴衰与变迁总是有社会历史根源。是有时代特征的。

齐齐哈尔的一支小家庭

1935年春节后，我随父母来到齐齐哈尔，建立了三口之家的小家庭，是属于大家庭的一支，而不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到了1946年冬季我与朝珍结婚为止，三口之家延续了十一年。其中后五年，则是父亲自主的独立的三口之家了。按我父亲的意志一直想带着他的妻子重返故里。但事与愿违，永远回不去了。他的儿子却成了齐齐哈尔永久的居民了。齐齐哈尔就自然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一、齐齐哈尔——我的第二故乡

从1935年在齐齐哈尔建立的一支小家算起，至今已70多年了。在这里我娶妻生子，送父母归天，又经历了新的三世同堂，人口最多时达到九口之家。及至儿女们嫁娶生子，这个三世同堂就自然逐步解体分离。而没有那个大家庭的分家之说了。说实在当时也没啥可分的。房无一间，地无一垅。这样的家庭变迁是有时代特征。也许就是社会进步。在齐齐哈尔我延续生命70多年了，现在已经80多岁了，还能延续到多少年？天晓得？不管怎么说，齐齐哈尔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齐齐哈尔，我刚来的齐齐哈尔真是一片荒凉。这里的地理环境，气候与季候，文化与文明比起旅顺口就当时相比，那相差太远了。但这里是我成家立业的地方，我的青春年华，智能与精力都献给了这块黑土地。我也亲眼目睹齐齐哈尔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选我当人民代表、政协委员，鼓励我更好地为振兴齐齐哈尔教育出力。对齐齐哈尔，我不免也产生了同旅顺口哪样的乡情。当然，同样是乡情，但就我来说旅顺口更浓于齐齐哈尔。我爱我的第二故乡齐齐哈尔，我更爱我的故乡旅顺口。

齐齐哈尔位于松嫩平原的中心地带，地势平坦，可以说是一马平川。原来的齐齐哈尔是黑龙江省的政府所在地，它的辖区很广，

东起小兴安岭，西至大兴安岭，是我国东北三省面积最大的省份。嫩江、松花江是它的母亲河。在旅顺口有大山大海，而这里有大江大河。这就是两个故乡的最大的地理差别。

齐齐哈尔是一座古城。其建置至今已经 300 多年了。这座古城始建于清朝康熙年代 1691 年，它的建立，当时的清朝政府主要是为了防御沙俄的入侵。它经历了清朝、民国、伪满长达 255 年各个时期，是老黑龙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解放以后，齐齐哈尔经济发展很快，成为我国机械工业，军事工业的重要基地之一。20 世纪的 50 年代黑、松两省合并，省府移至哈尔滨，但它仍不失为黑龙江省西部地区经济、文化中心。

我刚来齐齐哈尔时，旧城还在，还有四个城门。城里有将军府，省公署，城里住的多是官宦人家，名门望族。东南城角有一座魁星楼，尚称壮观，魁星楼脚下有一座孔庙，在我读小学时，每年都到孔庙礼拜，祭祀孔夫子。经过文化大革命后，这座名楼、名庙都消失了。从城的南门也叫着迎恩门一直向南有一条大街，也就是今日的卜奎大街。这条大街的两侧就是商业区，店铺比林，有几家大的商店是经营百货的。当时的齐齐哈尔没有什么工业可言，有的也就是铁、木和皮的手工作坊，以及油、盐、米、面作坊而已。另外还有一条自东向西的一条大街，东起火车站西至龙江饭店也就是现在的中心广场。这条街很少有商店，好像是专供上火车站的交通要道，现在称之为龙华路。平民百姓则是居住在这两条大街的东南西北，形成各条胡同，房子多是矮小的土房。我刚来齐齐哈尔时就住在卜奎大街的延长叫永定街东侧的一条胡同里，先是安达胡同，后来又搬到其安裕胡同 10 号的一座平房的后暖阁里，也不过 10 平方米。当时的齐齐哈尔也有几处名胜的地方。首属是龙沙公园,至今还在。园里有个望江楼，登楼可远眺蜿蜒于城西部的嫩江，当时的嫩江不设堤防，大水时可及城下。现在因建设了堤防，登楼也看不见嫩江

了。在公园的南侧有个关帝庙，四月十八庙会的日子，这里便热闹起来，变戏法的、耍猴的、卖吃的都云集到这里，形成欢乐的海洋。后来日本人又在龙沙公园的南面，建立一个“神社”和“忠灵塔”。人们从这里通过就要鞠躬弯腰。不然，叫日本人看见了就要骂你个“马鹿”（ベカ），这是轻的。如果你是学生那就不得了啦！所以那时的学生尽量避免从这里通过。现在“忠灵塔”，“神社”都打倒了。那时齐齐哈尔还有一座庙，我看比关帝庙还要壮观，那就是天齐庙。每年也有一次庙会，其规模要比关帝庙大得多，更热闹，可惜，解放以后这座庙折除了，建立了一个制药厂和一座小学——“天齐小学”，现在的“天齐学校”（九年制），愿这所学校的名字永存，做为“天齐庙”的永久纪念，这座学校命名，反映了人们的意愿。另外，还有一座天主教堂，由于党的宗教政策，这座教堂至今还在。我小学就读的天主教私立小学，就在他的旁边，现在已拆除了。还有一处就是南郊的大佛寺了。还好，这个大佛寺虽遭到破坏，但又重修一新，香火又兴旺起来了。

解放后，这座古城变样了，改革开放之前，这座城市发展成为机械工业和军工业的基地，电力，化工，轻工，纺织业也有很大发展。但城市面貌没有大的变化。人口多了，从几万人增到几十万人，上百万人，而民居条件不仅没有改善，显得更困难了，虽然也扩建了不少平房，但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人们的生活水平拉平了。管你是干什么的，吃的，穿的，住的，用的都差不多一个样。

改革开放之后的齐齐哈尔可以说是旧貌变新颜了，如果不是火车站，龙沙公园，天主堂还在原来的地方，那你就认不出这是齐齐哈尔了。最主要的变化是楼房多了。民居条件改善了从平房上楼房了，当然还没都住上楼，我看用不了多久了。街道多了，宽了。以适应日益发展交通工具运行的需要。就这样，汽车之多，常见一长串的汽车受阻。昔日的马车不见了。民以食为天，人们的主食变样

了。过去是以粗粮为主，现在是以细粮为主了，大米，白面随你吃，生活是改善了，当然改革可以说是一场革命，既然是革命，那就是制度的变革，免不了一部份人先富，一部份人利益受损。人们的生活改善了，但尚有一部分人为吃饭问题担心。这就是改革中的问题，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就不了业，吃不上饭，就要出盗窃，社会稳定就有了问题。人们又怀念改革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年月。但是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还是要靠发展、靠变革解决问题。但愿改革的阵痛不要太久。党的“十六大”还说了，再过 20 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相信到那时人们再不会为吃饭问题担心了。

说齐齐哈尔，上面说了一些题外的话。不管怎么说它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是爱护它，关心它的。

我也有离开齐齐哈尔的机会。第一次是 1950 年。四叔任大连市工业厅长。来信同意我去大连钢厂工作，因为我是学冶金的。由于当时的第一中学说啥也不放，机会错过了。第二次就是 1986 年我离休时，省委同意我离休归里安居。我也为此回旅顺口考察一翻，校友王明顺是旅顺口的政协主席，表示帮忙在旅顺按家。但是考虑诸多原因还是作罢了，其中最主要的是社会人际关系。人是社会动物，或者说人的社会性，社会上的人是离不开人群而独自生活。那个时节，我的人际关系在那里呢？已经是齐齐哈尔而不是旅顺口了。这个决策也许对，也许错，有不少朋友都为我这个决策惋惜。说你的家乡多好啊！但我至今无悔。齐齐哈尔是我的第二故乡，后人的第一故乡。我眷恋旅顺口，但也离不开齐齐哈尔。写祖籍山东蓬莱，故乡旅顺口是让我的后人知道我这一家人来龙去脉，永不忘记而已。

二、小家庭——三口之家

父亲和我的母亲来到齐齐哈尔安家。有一个愿望，。希望能再生儿育女，这也是我爷爷奶奶的希望。但当时母亲都已经是 40 有

余的人，他们的希望破灭了，我就成为这个小家庭的独生子了。其实，我母亲没少生孩子，我也曾有过姐姐和哥哥，但我没见过都死在麻疹上，我还有一个弟弟——叫得庆子，比我小二岁，及至三，四岁的时候也死在麻疹上，我很少，也可说没有享受过兄弟姐妹之情谊。这样，三口之家一直延续到 1946 年冬，我结婚时为止。这个小家搬过六次家，主要是因父亲工作调动和时局的变化。先是从市内搬到大民屯，继而碾子山。又从碾子山搬到达呼店，哈拉坑子，最后又落脚到市内，又几次搬迁。没有自己的家产，租房子过日子，只能是这样漂泊不定。刚来齐齐哈尔我们落脚父亲的同事薛家，父亲租一个后暖阁。就在薛家的同屋对过。薛家当然是前暖阁了。什么叫“暖阁”，就是一个屋子前后分开两部就是了。中间用一个隔栅隔开。前暖阁要分一间房子的五分之三。那后暖阁的面积就很狭窄了，也不过 10 平方米左右。这样后暖阁就暗无天日了。一个小家庭，这样的居住条件当然不利于我的成长。为什么不住前暖阁呢？这是父亲的意志。他到这里安家是为了兴家——大家之家。一切都要把钱省下来，而不是没有钱。在这我们只住了半年的时间，就搬到前院去了。还是一个后暖阁，前院与后院既然相当，但却是两个胡同。一个是安达胡同 10 号，一个是安裕胡同 11 号。我们是从 10 号搬到 11 号，条件没有改善为什么要搬呢？主要是后来的前暖阁人家是我母亲的亲人。可以相互照顾，另外一个因素这里院子稍大一些方便堆放柴草。在这里我们一住就是四年。我的小学时光。就是在这暖阁里度过的，直到考上中学。

三口之家的伙食很简单，可以说是素食为主。同老家相比差不多，很少见到荤腥味，所不同的是隔三差五可以吃一顿白面。那时候买一袋白面很便宜，也就是三元左右。做饭用的烧柴同老家就不一样了。在这里春天买车苇子，可供一夏用的，临冬再买两车毛草，可供一冬用的，都很便宜。很少人家用煤。穿的也没有什么变化。

上学念书，学校规定要穿青兰色的阴丹士林布的长衫。小学生穿长衫是一个特色。但到伪满后期，就都不穿长衫了，而是制服、制裤。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勤俭持家的小家庭里渡过了孩提时期。一个10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样的居住条件，这样的吃食，不免要影响我的身体发育。在这个家庭里，从上辈到晚辈，在男性我的身长算是最短的了。正常发育，我的身长至少可达1.7米。很遗憾、我的实际身长还相差两厘米。

说这个家庭省吃俭用，艰苦度日，我举一件事情能说明问题，人们都说我这个头不好剃，硬说是“护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老家就是我母亲用一把老式的剃刀子给我剃头。那时我就怕剃头，剃一回头就像杀猪似的叫个不停。到齐齐哈尔来。母亲又把那个剃头刀子拿到齐齐哈尔给我剃头。有一次刀不快。我母亲手又笨，痛得我难以忍受。没等剃完，我就跑了。越过墙跑到后院的薛家。薛娘一看我的头竟发现有“十三个口子。”后来薛娘用一把洋刀子剃完了这个头，我很平静，不痛啊。后来就有“一刀子拉出十三个口子”的传说。这是夸张，怎么能一刀拉出十三个口子呢？十三个口子是事实，那是因为我痛得不老实，一刀一个口子，剃了十三刀就是了。这个小家庭就是这样省吃俭用，把钱积蓄下来，为大家庭服务。父亲是一心为大家。在老家的时候，家人就说他是个大傻子。傻在他的“公心”上哪！这样，每年给爷爷的钱不比我母子来齐前少啊！

三口之家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对母亲来说却是从地狱到天堂了。她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和快乐，也有了微笑的表情。一个目不识丁的女人，居然不时地哼着悦耳的小调。我从小到大从未听过父亲和母亲会唱什么歌曲。但她能哼出很美、很有味道的小调，说明母亲的五音很全，很有音韵。音乐是人的心灵的外现。人的心灵更需要音乐的温柔和抚摸。我能有一个美好的歌喉，喜欢唱歌，应

该说来自母亲的基因。谢谢！我的妈妈。

三口之家的第二站就是市郊的大民屯了。1940 年父亲工作调动任龙江县大民屯警察署长，我的家也就从市区搬到大民屯。住在大民屯警察署的院内两间平房。住宅条件改善了不少，室内宽敞了，阳光也很明亮，做饭还是一口大锅。当然烧柴随地都有更便宜了。这时妈妈又有用武之地，养猪，养鸡也就开始了。我的父亲又可以待弄园田种菜了，从经济上来说也是不小的帮助。我的父母很喜欢这样的田园生活。从此开始，我寄宿学校读书，那时的我已是中学二年级的学生了。我每周回家一次，那时已有公共汽车从市内通向大民屯。

三口之家的第三站就是远离齐齐哈尔的碾子山了。1941 年的夏季，我父亲工作调动任碾子山警察署长。碾子山是滨州铁路线上的一个重镇。这里风光美。有山有水，嫩江支流雅鲁河从这里流过，清澈见底。真是好山好水。碾子山盛产花岗岩，是石料的重要产地，这里土地也很肥沃，黑土地的土层很厚。我的家就在那一年搬到碾子山。我的父亲一看是这样好地方就喜欢上了，和爷爷商量那一年的积蓄用在买地买房子上了。在碾子山镇里买了五间平房还有一个院落，另外还买了一方子荒地（45 垧）。那时买荒地很便宜。父亲是想在这里安营扎寨了。但身不由己，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父亲又被调任达呼店警察署长。这一年多，我除寒暑假回家外，一般说至少一个月要回家一次，坐火车需要三、四个小时。这时的家，也住在警察署院内，房屋和大民屯相比差不多，但毕竟是城镇院子小了，尽管这样，母亲还是照样养猪养鸡。

这样，三口之家第四站就是达呼店了。达呼店距市里 45 里路，还要过两道江。从市区通向达呼店，过了江就是大马车压出来的土道。在这里设警察署主要统管江北一带；甚至是嫩江水西北一带。从父亲任过职的三个警察署可以看出，当时龙江县广阔。东边与林

甸为界，南边与泰来为界，西边与内蒙为界，北面与依安为界，县公署也就是县政府设在齐齐哈尔市区，也就是现在第一百货商店哪个位置。达呼店警察署纯是乡间的警察署，有一点门路的人，谁也不愿意到穷乡僻壤的警察署当署长。正因为这样，我的父亲在这里一任就没离开，直到伪满倒台。也就是说这一站我的家住的时间算是长的了，至少也有四年吧！

达呼店就是一个农村，民居多是土房，树木很少，尤其冬季特别荒凉，是一个穷乡僻壤。母亲在这里每年至少要养活两口肥猪，鸡就更多了。养猪的目的不是自食用，而是卖掉挣钱。园田种菜就更方便了，我家的手动农具都很齐全，父亲一有时间就去田园里干活。警察署还有一块园田地，父亲有时还带领警察去田里干活，免不了还有临时拘留的“犯人”参加。我不知父亲是怎样想法，一个伪满的警察在农村吃菜还用自己去劳动取得吗？但他就是这样干的。也许就是他看到的伪满农村农民遭受的苦难，不忍心再让农民遭受警察的干扰吧！从他吃素念佛，行善待人角度来看，这个猜想，也许就是他的心理。他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1945 年秋，抗日战争胜利了，达呼店的警察署的警察也不过十几个人，纷纷逃亡，有的还未来得及逃跑就被农民打死了。在警察署院内的居住的警察各家都迁移了，惟有我的一家却安然不动。1945 年底我从长春回到齐齐哈尔连夜回达呼店。在我的劝说下，父亲才同意离开达呼店而转住到姜家地房子一个富农的厢房。1946 年的春节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在这里我家遭受一次土匪骚扰。父亲这次才感到农村呆不了啦。1946 年 2 月，我家搬到市里，结束了在农村差不多五年的生活。

家搬到市里先是住在我的表叔那同院内的东厢房的一间小屋，继而又搬到安裕胡同东头的一间正房。这时我已去中学校代课。国民党接收大员跑了，那是 1946 年的四月，我随着政权的更替而参

加了革命。那年的夏季学校合并到联合中学任教，我就把家搬到一中西侧的“八趟房”的一所日本人居过的一套房子。后来又搬到一中院内的一套房子，也是日本式的房子。就在这所房子里，我与朝珍结婚，那是1946年12月1日。从此，结束了三口之家的生活。1946年春——1946年冬这一年是我家动荡不定的一年，家有过六次搬迁，生活靠父亲卖破烂和我的供给制粮米收入维持生活。这一年又遭受了“清算斗争”的考验，度过了政治运动的第一关，也是“善有善报”的第一次灵验了。家虽然是漂泊不定，三口之家却是安然无恙，我且完婚于这一年的严冬。

三口之家经历了十一年，有十年在伪满时期度过的，有一年是动荡的年代。这十一年主要靠父亲的工资收入过活的。父亲的工资在那个年代也算中等收入，按理说我可以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但都不是那样。祖辈的遗训，省吃俭用，勤俭持家，就是这个小这家的主调。这十一年，我从小学三年级读到大学的三年级，算是这个小家的主要成果，也就是我的父母的重要功劳。他们从大家庭出来的愿望，就这一点是实现了。在他们的晚年还有一棵独苗，陪伴着他们。这棵独苗，尽管小器未成，尚能为他们送终，而不使他们有后顾之忧。人的一生，在临终不留心事，不再为儿女们担忧，我看也该是善终了，还奢望什么呢？我做为人子没有完全辜负父母的希望，也算是尽责尽孝了，尽管我没做到他们完全希望那样。

我的父亲和母亲

父亲生于 1899 年农历正月十一日，卒于 1983 年 3 月 23 日，享年 84 岁。父亲虽然读过私塾，也念过公学堂的高小，但是他是农民出身，做工时间较长，当过 10 年伪满警察长，又做过 10 年车夫，晚年开荒种菜。应该说他的一生，从未脱离过劳动干活，就是当警察署长那个时期也是那样。他始终是一个劳动者，没有退色的劳动者。他当过伪满警察为敌人服务，解放后他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的考验，盖棺论定，他是一位尚有中国心的伪满警察。他的一生，路程坎坷，为后人留下了不少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母亲生于 1895 年，生日是那天我也没记住，大概是农历九月份。这也说明在这个家里很少人想着为母亲过生日。母亲是一位典型农妇，她深受封建大家庭的煎熬，尽管她也沾了父亲的光，人们叫她“署长太太”，可是她的模样，穿戴，打扮，在任何时候，谁也看不出她是一位“太太”。和父亲一样，凡是有条件，她从不脱离劳动，也可以说是一位永未褪色的农妇。她的一生受苦受累最多，汗水，泪水流的最多。可怜的妈妈，她卒于 1967 年 1 月 16 日“文化大革命”的斗争高潮期间，她享年 73 岁。

一、父亲是一位粗通文化素食的劳动者

父亲的童年的家境，我想不会太好。有两点可以为由。第一，他学业未竟，十六岁那年就开始为家业奔波了。父亲先是读私塾继而入了公学堂，读完了公学堂之后，他考上了旅顺师范学校，当要入学之际，爷爷以家境困难为由，断了父亲的学业生涯。为这件事，父亲遭到了校长（日本人）骂了一句“马鹿”，意思是你混蛋，太糊涂了。第二点是我父亲 15 岁那年（满 14 岁）就与 19 岁母亲结婚了，为什么呢？就是为这个家一下子就增加了两个劳动力。这样说来，父亲起码读过八年书，相当于现在的初中生了。他 15 岁开

始做工，先是学管工，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做农活。就因为一次轧草把右手大姆指轧断了，这对他继续做管工带来了困难。于是他改行去旅顺工科大学物理实验室工作，这个工作需要一定的文化程度才行。其实他的工作主要是体力劳动，装卸实验设备就是了。父亲在这里工作十年有余，同日本人一起工作，当然其日本语言文字也得到了相当地训练。父亲念了八年书，开始是诗书五经，后来是近代文化，加上其刻苦，写起文章也能之乎者也，而其毛笔字写得很好。在我们这个家族里，他的字算是写的最好了，村子里的对联，碑文，好多都是他的手笔。

在我懂事的时候，从未看到我家有过佛龕，佛像之类的东西，只有厨灶墙上的灶王爷，灶王可不属于佛教，是道教的。但这个家从小时候起对我最深刻的教育就是为人要行善，做善事，做好事。佛爷是普渡众生，要善人善事。这一点在我父亲身上体现得最充分。父亲很信梦，他是在梦中受佛爷的点化才吃素的。他从20岁开始就吃素了，先是不吃飞禽走兽，继而在梦中有鱼在其身边游荡，这又是佛爷的点化了，鱼蛋之类的食品也不吃了，成了一个净口的素食者了。在他看来不杀生就是最大的善事，吃素的人就是善人了。父亲在这个村子里有一个绰号——张善人。

二、在伪满任职时的父亲

前面已经讲过，1934年父亲来齐齐哈尔是要做工业学校的庶务工作，没做成而去龙江县公署，先是做翻译。不久，就转到县警务科当了卫生股长。当上股长就是当官了。从1939年开始就被任命为县的警察署长，直到伪满倒台，共做了六年，三个地方的警察署长。警察署的上司就是县的警务科，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那么警察署就相当于县下区级的公安分局。警察署下面还有各地的分驻所，也就是今天的派出所。警察署长同卫生股长是同一个级别，伪满都称为“委任官”，那么县警务科长则是“荐任官”，县长更升一

级就是“简任官”。就官衔来说，“委任官”就是最低的官衔了。但是，警察署则是伪满统治中国老百姓的最基层的暴力机关。日本人就是通过这些暴力机关维持其统治中国人的秩序。伪满的警察署对中国人来说就是罪恶机关。当过警察署长的，一般来说都要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而成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当初，我的父亲对此没有觉悟。他觉得没有做过亏心事，还背着日本人为老百姓做了一些好事呢！

1. 卫生股长

伪满县公署的卫生工作设在警务科内，不知其用意何在？那时的公署不设卫生科可能是原因之一吧！但有一点很奇怪，就是在这里还管发放烟票和监管烟馆，当然是大烟而不是卷烟了。日本人对中国人抽大烟既管又不管，抽大烟的人有烟票就行。就可以到烟馆去抽烟，也就合法了。伪满不是禁毒而是放毒。只要是侵略者日本人和英国人没有什么区别。那时，我就亲眼看到在永定街的路东，也就是我家住的胡同口旁边就有一个烟馆。馆里摆着一张张烟床，人们躺在床上点着烟灯抽大烟。屋内烟气很浓。人们路过这里就可以闻得烟味，有点香气。人们可能会问父亲有烟票大权，这不是一个掠夺烟民，大发其财的肥缺吗？我可以肯定地回答、告诉我的后人，他没有那样做。他知道抽大烟是件坏事。不仅当卫生股长是这样，就是后来当警察署长，权更大了，也是这样。

2. 大民屯警察署长

大民屯警察署管辖的地区不算小，几乎是包围了齐齐哈尔的南、东、西、的三个方向，而齐市的北面要归达胡店警察署管了。大民屯虽然是一个郊外僻壤，但是这里有日本人的军用机场和军事用地。父亲在这里任期一年。在这里曾发生这么一件事。他收到一特务送来的情报，在军用机场服役的劳工里，发现一个人是中国的八路军。真的也好、假的也好，被举报的人是肯定要遭殃了。父亲

对这件事持隐瞒的态度，说服了那位警长，当时把这个情报烧掉了。后来，他把这件事情的处理说给当时的警务科长，那位警务科长回答是：你这样做就对了，胆子也够大了。从中可以看出在伪满任职的中国人，不都是死心踏地的汉奸。而那位警务科长和父亲一样都有一颗中国心。不然；父亲也不会把这件事告诉他。

3. 碾子山警察署长

碾子山是今日齐齐哈尔的华安区。碾子山警察署是滨州铁路沿线路上的四个警察署之一，即昂昂溪、富拉尔基、朱家坎子和碾子山。它们都是交通要道商埠重地。在这样的地方当警察署长就是个“肥缺”，是能捞钱的地方。他在这个地方也只做了一年就被调离了，当然有人挤他。在这一年里，父亲曾对我说过三件事。在父亲这一任期内，龙江县派来一日本人，据举报来调查一位中国人私藏枪枝和弹药。这不是一件小事情，特别是日本人来调查处理。父亲为保护这位中国人说：举报不实，纯属报私仇，说服了那日本人，使这位中国人起码要免受皮肉之苦。这与父亲会说日本话有关。会说日语，可以为日本人服务，也可以保护中国人。会说日本话也不就是坏事。

第二件事。伪满皇帝溥仪到满州里视察要路过碾子山，碾子山警察署要承担一段警卫任务。火车通过后，担负警卫人员要吃饭。可是，日本人说了：日本人、朝鲜人可以吃大米，中国人要吃高粱米。父亲说，那不行！同是保卫“皇帝”的人，不能两样待遇，以理力争，结果中国人也吃上了大米饭。两位日本人像说戏言似的：“张君，你的思想坏了坏了的有”意思是说你和日本人不是一条心。那位日本人是言中了父亲的心。

第三件事。他的表妹夫，因赌博输了很多钱，侵占公款上千元。当时这个妹夫是在碾子山兴农信用社任职，父亲是他的保人。按当时他的权势是可以疏通疏通，向赢钱那方要回那笔钱，赌博在当时

是违法的。但父亲反倒自己跑到丹东表妹夫家，找到他的父亲——表舅，卖了房子还上这笔公款，才算了事。他这样做，事后还惹得其表妹夫很不满意，认为父亲不帮忙，使其家产这遭受了损失。其实，说未帮忙也不对，如果不是父亲的周旋，占公款是要蹲监狱的。

4. 达呼店警察署长

1941年父亲从碾子山警察署调任达呼店警察署长。这是他任警察署长时间最长的一任，也是最后的一任。连续四年在一个地方任警察署长，应该说是他的“善与恶”表现最为充分的四年，也是当地老百姓对他的为人认可最充分的四年。1941年日本人偷袭美国的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人叫“大东亚战争”。在东北日本侵略者对中国老百姓加紧搜刮，实行“粮谷出荷”政策，即老百姓的粮食，说是留有口粮，其余一律上缴。农民私藏粮食，城里老百姓私买粮食都是“经济犯”，抓经济犯就是警察署的任务。对父亲来说是一个严重的考验，他亲眼看见农民的痛苦，他该怎么办呢？他当时对我说过：他告诫他下属说，老百姓够苦的了，对农民要宽厚，能不抓就不抓，能放就放，抓来的按“出荷”价处理。当然，他的这种态度也未必行得通，他的下属难免乘机勒索农民。

他自己是绝对不抓的。他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冬季夜里，他骑着马到村里巡查。他的目的是抓赌。东北的农村冬季很长，农民没事干，赌博成风，使农民生活更加惨重。在巡查中，他发现一家有亮灯，以为是赌博，就推门而进。他看到的情景是一对夫妻在藏粮食。夫妇二人当即跪在父亲面前求饶。父亲对他们说：“站起来，你们不藏吃什么？我是来抓赌的，你们就说我没来过就行了。”

还有一次，他还是骑着马去县公署办事。碰上了一辆停着的马车，上面装的是柴草，可地面上却撒出了粮食，又是农民跪着求饶。父亲对农民说：“你们就当没碰上我就行了，快点收拾，赶紧走吧！”

能放就放的事就更多了。他不抓不等于别人不抓。抓来怎么办

呢？如果是农民的而不是倒买倒卖的，就放了。如果是倒买倒卖的，一般是按“出荷”价给卖了。这也是一种放。这样的就是“经济犯”了，“经济犯”在经济上是吃亏了，但这要比上交治罪可便宜多了。这也是一种放。

这样一来，达呼店警察署向龙江县警务科送的经济犯就少了，甚至没有了。这就触犯了警务科一些人们的利益。县里的警官们就吵吵嚷嚷起来：达呼店怎么没有经济犯呢？于是县公署就要撤掉父亲署长的职务，让他离开警界到“兴农合作社”任职。可是，没有来得及，日本鬼子就投降了。

有一件事情令人难以置信，却是实事。在他任职中的一年夏季，达胡店地区大旱，老百姓只好向“老天爷”求雨。求雨就要到庙上来。父亲知道了这件事，就跟着老百姓一起，也光着脚跪在长发屯的庙前。“庙不在小，有仙则灵”，这回他们真是诚心求神下雨了。不多时这回可真的下起雨来了。有的老百姓对父亲说“署长你就是神仙”。从此，“张神仙”的绰号在达胡店就传开来。其实父亲这个绰号早在县公署任职时就有了。那是因为父亲吃素，同事们会他去吃，喝、嫖、赌的事，他一概拒绝。加上他当时用的是别名“张仙庭”，人们就叫他“张神仙”了。

苏联红军已经进城了，父亲还不知道日本人完蛋了，他还穿着伪满警察衣服到城里。在路上老百姓看见他还是那样打扮都说“署长，你怎么还穿这样衣服，城里到处都在抓警察呢？快回去把衣服换了吧！”。老百姓叫他换衣服这件事，说明他，一个敌伪的警察和老百姓的关系，已经不是敌对的关系了。在这个节骨眼上，老百姓到关心起他来了，还叫他“署长”呢！

三、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

1945年的8月15日，在东北的日军关东军向苏联红军投降了，伪满州国倒台了。被压迫十四年的东北人民无不兴高采烈，狂呼胜

利了！

伪满当警察的怎么样呢？只要他们还有一个中国心的当然也高兴，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但当警察的毕竟是日伪统治的爪牙，他们能不恐慌吗？在老百姓的眼睛里最恨的就是警察，所以在当时警察署院子里住的警察及其家属，很快都跑光了，有的还未来得及跑掉的，就被老百姓打死了。那时候，只有一家“署长”之家 我的家却安然不动。父亲的亲友都劝他“快点搬出这个院子，到城里去。”但他还是那句话：“我没做过亏心事。”他就是不动。一直住到 1946 年春节前。只有他一个人还在看守那个警察署大院。

日伪倒台后的农村，谁也管不着，完全是无政府状态。在城里倾向于国民党势力组成了“维持会”，借用伪残余，维持社会秩序了，城外则兵荒马乱，土匪四起了。但开始慢慢地，后来很快就成了八路军活动地盘了。达呼店警察署还有十几条枪和一些弹药。别人都跑了，只有父亲一个人看守这些枪支弹药。有一天国民党的人来到这里后，送给他一个布条上面写的是“少校营长”，意思是这些武器就是你的资本，可以拉起队伍当“营长”了。但幸亏党的八路军也来了，他们不是采取国民党的办法，而是把这些武器全收缴了，也写了一个布条交给了父亲；做为收缴的证据。幸好，八路军来得早，来得快，不然在土匪四起的日子，他想留住这些武器是办不到的。没有武器，又不去拉队伍，那个“少校营长”，也就自消自灭了。

1945 年 8 月 15 日，那时我在本溪钢铁公司实习，日本人跑了，我在等待中国人来接收，等了一个月也没信息，我只好回到长春，和几个同学组建了工大校友补习班，根本没想回家的事，一心一意想尽早恢复学习生活完成学业，到了年底，这个梦想落空了，加上吃的，穿的成了问题，这时我才想回家。我从长春到哈尔滨，住在同学家，再偷乘在通往满州里一辆货车的煤仓里，在苏联红军的枪

林弹雨中，好不容易在昂昂溪下了火车。身上只穿一套劳工棉衣，可冻坏了。出了火车站改乘上毛驴车，回到了齐齐哈尔，当然去了赵家。我家仍在达呼店，也顾不得等朝珍回来，那时朝珍已做了小学教员，我急行四十五里路，回到了我的家。在齐齐哈尔的工大同学都回来了，只有我这个独苗还在外地，我的父母能不提心吊胆吗？儿子回来了，他们喜出望外，老泪横流了。我当即问道：“为什么还不搬家”。我的父亲说，过冬的东西都准备了，还养了两口猪，等开春再说吧！我明白他还是为了钱，为了省钱！

1946年的元旦过后，国民党接收大员接收了齐齐哈尔，按国际协定，八路军要退出齐齐哈尔。其实齐齐哈尔的周围早已是八路军的天下。达呼店也在八路军的管辖之下。听说，八路军要退到甘南，路径达呼店。当时父亲心有底，警察署的武器已缴给了八路军了，他仍想不动。但为了避免麻烦，我劝父亲马上搬家。这回他听我的了，在一个清晨，找了两辆马车，就把家搬到离达呼店不远的村庄姜家地房子，租住了一家农民的厢房。我和父亲随车，只留下母亲看守他们两头大肥猪，准备下次再搬。就在这时，八路军进村了，当然要进驻警察署大院，母亲只好丢下肥猪，到姜家地房子了。如果母亲还有一点“署长太太”的模样，我想她很难走出警察署的大院。两口肥猪就算是“劳军”了。

元旦过后就是春节了。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我们是在姜家地房子里过的，很有情趣。父亲领着我在原野里向南方叩头，遥拜祖宗，也有接财神、福神的活动。在兵荒马乱的日子，他，我的父亲仍未放弃兴家发财的念头。春节三口人家团聚在一起，毕竟我赶回来了。这是两位老人最大的心愿。在动乱的日子里，平安就是福啊！

春节过后，在农村不安宁。在郊区虽是八路军的天下，但政府还未建立起来，小股土匪时隐时现。在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和父亲进城找房子，要往城里搬了。就在这一天，土匪进村了。他们听说，

张署长在这里，别人家不去就进我家来了，他们说“张署长是神仙，我们不抢不闹，吃顿饭就行了。”吃完了小米饭，一个土匪对我母亲说：“署长那双马靴很好，我穿走了。”这个突发事件，坚定了父亲要搬家进城的决心。不久，我家就搬到城里来了。

国民党大员接收了齐齐哈尔，“光复军”成了他们的武装。这时候龙江县公署也开始运作办公。有一天父亲到那里探听情况，看看老同仁。那里的人又在“封官”了。他们看到父亲就说：“你过去当过大民屯的警察署长，这回你可以旧地重游了”回来后，父亲对我说“大民屯是八路军的地盘，去找死呀！”这回，父亲还很明智些。又有一天，父亲一夜没有回来，我和母亲也一夜没有合眼。第二天的午前他回来了。说是“光复军”的人，认出了父亲是原达呼店署长，就把他抓起来了。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他还不是他们的一位“营长”吗！光复军里什么人都有，其中有不少就是伪满警察，到这里躲几天的。说他们是胡子兵也不过分。

国民党在齐齐哈尔占据了两个月的时间，随着苏军的撤退，他们的光复军就得跑了。这是当时的苏联和国民党的政府上演的一出政治戏在东北也就结来了。共产党，八路军又回来了。一方向外跑，一方向里进了。免不了一些枪战，好在是规模不大，很快就停了。从此，齐齐哈尔解放了，人民政府成立了，人民当家作主了。那是1946年4月23日。

四. 秋林公司的马车夫

家搬到城里来，生活有困难。父亲先是到破烂市摆摊子，买你的东西，也卖你的东西。对他来说警察署长的架子早就没有了。不久，有人介绍他到秋林公司当马车夫了，承担公司的运输任务。做车夫他在老家干过，他做事很认真，很快就得到公司老板的赏识，不时地看到俄国老板向他提起大拇指，意思是说：一个警察署长能赶好马车，很好！很好！这个差使他一干就是四，五年，直到把公

司干黄了，那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时候了。

五、荣归与辱归

荣归，就是光宗耀祖，辱归就是对不起祖先了。在一个家庭里，有荣归又有辱归，可以说是荣辱与共了。

四叔投笔从戎抗战八年，音信皆无。抗战胜利了，四叔被派回老家大连，据说是随欧阳钦一起到大连的。为避免国民党跟踪，他在一个夜里偷回家尽管时间只有十几分钟，重要的是他告诉我的奶奶，妈妈我回来了！八年了，日夜思念老儿子的奶奶能不喜出望外，老泪横流吗。四叔荣归了可是当时在北方的我家，对这一切毫不知道。

大概是在锦州战役之后，全东北解放了，齐齐哈尔的秋林公司要给驻旅大的苏军发运东西，需要一个压车的人，父亲被选去了。天赐良机，一个马车夫可以借机归里了。他多年没有回去了，他无时不在想念年迈母亲和手足兄弟。他到了大连交了差，就直奔旅顺口，他的老家。从警察署长到马车夫回家了。他与四叔相比。这是辱归了。虽是辱归，但是兄弟会面，多年不见，一个伪警察署长还活着回来，也不免一番庆幸。父亲也未想到，出走八年的四弟，胜利而归了。他感到光荣，高兴。第二天他就返大连四叔处探望我的奶奶，他的老母亲。奶奶和四叔都很高兴，抗战胜利后这几年奶奶最忧心的是大儿子的死活。特别是奶奶，抗战八年她最忧心的是她小儿子的死活。现在一大一小都在她的膝下，能不高兴吗！

父亲在四叔家住了几天和奶奶在一起，叙不完的母子情长。但马车夫的任务在身，当齐齐哈尔的货车返回时，他又跟着货车返回到齐齐哈尔。

父亲回来的时候，感动极了，滔滔不绝说了许多话。至今还给我留下这样一些印象。

第一，他为四叔胜利归来感受到高兴，而且当上了共产党的大

官了。第二，他为奶奶还在，又住在四叔身边安度晚年，非常放心。第三，他对四叔的生活看不惯，娶个小媳妇，每到周末就在家欢歌跳舞。对此，他格格不入。第四，他对四叔没给他买客车票返齐有意见，说共产党不讲手足之情。孰不知那时的四叔是供给制，那有钱给他买车票呢！最后，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四叔对他说，你信佛，毛主席就是佛，你就信毛主席吧！那时的父亲对共产党最赞赏的就是尊重劳动，尊重劳动人民，父亲对毛主席也是非常崇敬的。

六、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父亲

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从解放初期的“清算斗争”算起，接着就是“土地改革”，“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派斗争”，以至“文化大革命”。除“三反五反”，“反右派”时他不是主要斗争对象外，其余的，他都成为斗争的主要对象，可以说是阵阵不落。他甚至不耐烦地说：只要不死就没个完了。其实，看穿了，人的一生，那一个不受到至死的考验呢？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的考验，对他说也是历史的、人民的审判。是一件好事。他是一个好人，一位善良的中国人。

1、清算斗争

齐齐哈尔解放了，最先开始的运动是清算斗争。斗争的锋芒，直指齐齐哈尔的首富十二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旧中国时期当省长的于驷兴家了。我的小学同学于尔同的就是于驷兴的孙子。这真是个大家，论家产、家私在齐齐哈尔是首富。但这个家的后人再也没有当过大官的了。于驷兴死了，他的后人孙子当了小学教师而成为这个家庭的代表人，也就成了斗争对象。很好，只有文斗没有武斗。也没有收监，他很自得，财去人安乐，平安就是福啊！没想到，这首先开的政治运动，竟落在我的家。父亲在破烂市摆摊子，有一天被一个伪满时期的“经济犯”发现了，于是他上告到当时的政府，要清算父亲对他的损失，当时父亲是按“官价”处理了他的“经济犯”

但这时他不讲那时的宽大了。父亲就被政府抓起来。这是他第二次进了牢房，第一次是“光复军”的牢房蹲了一夜，这次蹲了一周时间。据我了解这个人伪满时就抽大烟不太讲良心，可谓是恶人先告状。有一天我碰到见当时报社的记者，我和他是在长春失学后，同吃同住的学友，希望他向政府反映伪满处理经济犯的实际情况。经过他的周旋，政府决定放了父亲，只拿出很少的钱就了事。可是那个人还不依不饶挨了一顿批。从此，父亲再也不卖破烂了，而去秋林公司当了车夫。这是1946年夏季的事情。

2、土地改革运动

1947年的冬天，解放战争由北向南冲，节节胜利，在北满已经是老解放区了，在城乡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当时我家住在联合中学就是后来的第一中学的院内宿舍。这一年的夏天，我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在前线慰问解放军官兵。秋季，学校任我为数学组长，还做了一个班的班主任，可谓重任在肩。到了冬季，运动开始了，学校为配合社会上的政治运动号召教职工和学生有问题的人主动献出“浮财”。当时我思想比较进步也曾劝说父亲把浮财献出来。父亲却说“咱家有啥可献出的”？确实也是那样，父亲过去积累的钱，买了房子，买了地，真没有金银财宝。我说服不了父亲，父亲却说服了我，只好挺着了。到了这年的腊月，斗争就直逼我的家。这是由一匹马引起的。父亲在抗战胜利后，曾买一匹马准备务农。家搬到城里时，把这匹马寄养在人家。在运动中那家人说出这匹马的来历。农民一听，张署长还在城里，是斗争对象，就到城里来抓人了。

在一个夜幕降临的晚上，由二区的警察带领，几个农民赶着两辆马车到家就搬东西，我家四口人，当时我已完婚一年了，被押到二区的公安局，塞进了牢房。我和父亲都带上脚扣子。而母亲和朝珍则被关进隔壁的牢房里。夜中，听见朝珍喊叫妈妈的声音：你怎么了？我和父亲都惊呆了。稍许，平静下来了。这是我、朝珍、母

亲第一次进了牢房。父亲是第三次了。

第二天，农民用两辆农用马车，把全家凡是能搬动的东西都装在车上。一家四口人也装在车上，过江向北进发。中午，就到了一个村庄——大（小）哈拉坑子。我和父亲带着脚扣子被关进一个由木栏封闭的北炕上，算是简易牢房，朝珍和母亲则被散放在隔屋的南炕上，比起我和父亲还有自由。土改斗的是地主、恶霸。伪满的警察在数难逃，何况是警察署长呢！

在我的牢房的外面堂屋，摆着一张桌子就是农民的“公堂”。在这里每天晚上都要“过堂”审讯。大棒打人，火烧人毛的情形，我亲眼目睹，不寒而慄。我和父亲在等待着这一关。在一个晚上“过堂”临到父亲身上，我在想父亲要惨遭毒打，要受皮肉之苦是在所难免了。但出乎我的意料，审讯父亲的是一位农妇——老太婆。他就提出一个问题，你那个警察署的枪枝、弹药都那里去了。父亲当即回答：都交给八路军了，并从身上取出布条为证。我真没想到，这个证据总是带在他的身上，成了他的护身符了。父亲，他真是那个有心计的人啊！就这么简单，这一堂过去了，又没挨打、又没受骂，又是一次吉人天相了。父亲赢了。这一堂过去，我的脚扣子被摘掉了，仍和父亲住在一个牢房里。而父亲的脚扣子并没有拿掉。我有自由了，可以到屋外散步，但不能离开这个村子。

在我们等待进一步发落的期间，农会的人就动员我和朝珍留在农村，我和朝珍可以做小学教员。我没表态，朝珍则明确说不行。她很有主见，这一点她高于我。实际上，在我们被扣押的第二天，第一中学的校长吴伦（女），已向中共市委书记王盛荣做了报告和请示，当即指出：“按当时的知识分子政策、张元士、赵朝珍应立即放回，他们没有罪过。吴伦校长就派张健同志（女），也从二区带来两位警察到达胡店区政府交涉此事。达胡店政府做了放人的答复，他们才回来。但农民还是又派马车去我家拉运当夜没有搬动的

立柜和写字台，这都是朝珍的嫁装，而被吴伦校长制止。当时我家和吴伦校长的住房是邻居。这一切被关押的我们是不知道的。

当春节即将到来的时候，翻身的农民，享受胜利果实，欢天喜地要过年了。大概过了小年，农会用一辆马车把我、朝珍和妈妈，还带一床被子送回了一中。到家一看只剩下一个空立柜和一个写字台，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吴伦校长向我讲了我们走后的经过，令我感动，我感受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温暖。回来的当天晚上，我只好一个人留在空荡的家里烧炕、温暖屋子，母亲和朝珍只好住在赵家。学校为我们能生活下来又送来三床被褥。1948年春节，对我家来说虽不团圆，还算幸运，人都活着，只有父亲在农村等待发落。

春节前，农会要对在押的斗争对象进行清理。该杀的杀、该放的放。除夕前的一个夜里，父亲得知明天要押送他们赴刑场，要枪毙了，同时农民也告诉父亲你不要害怕。结果，第二天父亲是做为陪绑，只枪毙了一个人。

过春节，中国人都要吃饺子。真没想到，农民还给父亲包了一顿素馅饺子，真是格外照顾。农民还对他说：本来我们想放你回去过年，但你是警察署长，管过一个区，对你的处理，我们一个村子说了也不算，只好春节后全区开会再说了。父亲是死是活，还要等待。

春节过后，达呼店区召开了所辖村的农会主席会议，其中有一项就是对张署长的处理。经讨论，认为张署长是个好人，十八位农会主席一致同意：释放父亲。就这样，父亲在那年的正月初十那天步行回到家了。他说，农民发给他路条，即通行证，在路上碰上了不少农民，认识他的还向他问好，有的竖起大姆指称赞他。一个伪满的警察署长，农村的警察署长，在农民翻身闹革命的斗争中，居然能活下来，这也算一个奇迹了。善有善报这句话灵验了。经过

这样暴风雨的斗争。保全了四口之家的生命。我们高兴、亲友高兴，是运动解除了压在我们全家身上的包袱，压得太沉重了。我真感到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而且从未有过的一片蓝天，太轻松了。父亲在他回来的第二天就去秋林公司报到上班了，连秋林公司的俄国老板也为他高兴，又竖起大拇指了。

土地改革，农民翻身闹革命真是一场暴风骤雨。经过这场斗争，革除了中国上千年的地主依靠占有土地剥削农民的封建土地制度，农民解放了。从社会进步，发展生产力看这场运动无可非议，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我的家人都亲身经历了这场洗礼，也可以说是暴风骤雨的洗礼。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也是一个在痛苦中解除痛苦的过程。不错，我家是丢掉了衣物、瓶瓶罐罐，几乎是全丢了，都是身外之物，何所惜。而父亲的为人得到了农民的认可，全达呼店区农民的认可，这是无价之宝。父亲解放了，全家人解放了，再也不担心受怕了。全家人的精神解放要比肉体解放更宝贵啊！这是没亲自经历过这场斗争人是没办法享受到的幸福时刻啊！1947年的冬天对我家来说是最残酷的，但1948年的春天对我家来说是最明媚的、最美好的春天。真是雨过天晴了，春暖花开了！

3、肃清反革命分子

1951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父亲虽然经过了土地改革，接受了考验，但那是农民的审判。还不能是政治上的审判，这是我现在的理解。这一次的肃反运动是党中央的决策，是由各级政府实施的政治斗争，斗争的对象不同。其实土地改革不也是党中央的决策吗？能不说是一项政治斗争吗？不管怎么说，伪满的警察署长够上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杠了是不错的，父亲应该接受这个斗争的考验，做历史的法律上的审判

从1951年开始到1956年的夏季，市公安局及其派出所经常找父亲审讯，有的是他自己的事，有的是通过他了解别人的事，。审

讯他的人有的态度很好，有的态度很坏，每一次回来他就唉声叹气说：没个完了。其实不仅这五年是这样，其后也不断找他核实。审讯多是了解别人的事。不过说是别人的事，审讯者往往就他的历史，也要给他一些压力。他就一再说那一句话：“不死就没个完了”这能怨谁呢？他有时也说句“不孝”的话：“都怨你爷爷，我是不愿意到这里来的”。我劝他，历史就是历史。怨谁也没有用。坦然处之就是了。

终于有个头了。1956年的夏天，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建华区召开公审大会，对反革命分子，公开审判。在这个会上，对父亲的历史做了结论，不以历史反革命论处，享有公民权。并给他带上了红花走下了审判台。这可是在一个人身上的“荣辱与共”了。父亲回来说。审判台上。摆着高高的一大摞子有关他的案卷，他感谢共产党。他说“共产党办事真认真。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实事求是”。

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对我这一家子太重要了。在这以前。我的全家人都背上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家庭及其成分的包袱。这一下可都卸掉了，思想上解放，精神上轻松了。全家庆幸。全家高兴。但是，后来事情的发展出人意料。这一下子高兴有点过早了。

1963年开始，天又阴了，在一次人民代表的选举中，父亲的选举权被取消了。是说享有公民权那句话没有用了。但这未经法院再审判。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日子里，谁又敢去叫那个真呢？我真感到这个国家无法可依，有法也不依，在权大于法的年月里人权要受侵犯，自由要受侵犯。历史反革命及其家属的“成分”用不着谁来说，我们这一家人都情不自禁地背起来了，这真是没个完了。死也没个完了。人民的审判也没用了

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再一次证明了父亲的为人，他不是光为敌人服务的伪满警察，相反，他背着敌人为老百姓的做了不少好

事。在公审他的案卷的字里行间，都是达呼店老百姓的心声：他是一个有中国心的伪满警察。他是一位善良的中国人，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不应该带在他的头上。

人民法院以事实为据。为其正名：不以历史反革命分子论处，享有公民权，这是法律的裁判，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裁决，对父亲来说是一次光荣的裁决，至于与后来的变故，那都无关紧要，都没有法律依据。

4、文化大革命中的父亲

在中国、在我家，文化大革命都是一场灾难。

1966年—1976年，极不平凡的十年，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文化大革命。这是中国的领导者亲自发动的一场“革命运动”，整整乱了十年的运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突然搞起了文化大革命，而其斗争锋芒直指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这能说正常吗？能让人理解吗？莫明其妙。但细想起来，也不无因由，有其偶然性，更有其必然性。

在这之前，在中国很早就搞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调动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在城乡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社教，还搞了个“二十三条”，结果怎样呢？农村的状况没有改善，农民养猪、养鸭、鸡都说成是资本主义了。老八分，少八分，干好干坏，都八分，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吗？农民种地不打粮食，还要靠国家救济，城里的人又吃什么呢？中国人吃饭问题出来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从来就是世界大事。十亿人口吃不上饭要乱到整个世界的啊！农村是这样。城市里也好不了多少，国家发钱“吃大锅饭”没有好吃的，能吃上流也就不错了。国家全包下来，连看病都包下来，能包得起吗？而对这样的城乡吃饭问题，做为革命的领袖，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面对这样一个社会主义能睡得着觉吗？能不管人民的困苦与死活吗？在他看来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

就有那么一些不听他的话的人，是一批人，一批有文化的不同政见的人，是他们在对抗，而且在中央还有“司令部”，他认为这是病根。他要领导一场新的革命运动，他带头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在全国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搞起来了。这场斗争，同样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当然，一切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一切旧的势力残余，凡是活着的，都同斗争对象联系起来，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的社会基础，历史的老帐又都翻腾起来。全国性大串联，全国性的外调取证，以至从文斗到武斗，把整个中国搞乱了。他老人家叫停也不灵了，没办法动用了军队。军队进驻了机关、大大小小的各个单位，稳定形势。这个运动是学生打先锋，当然学校闹得最厉害，学校的当权派算是最倒霉的了，挨打受骂侮辱是最多的了。学校乱了，几次“复课闹革命”也不灵了，最后还是军队进驻了学校，把局势控制下来了，勉强实现了从大串联，大分裂到大联合，建立了学校的革委会，继续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直到他老人家去世，这场革命还没搞完。现在我可以这样说，那时的毛泽东要搞文化大革命，是当时中国经济状况逼出来的，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尖锐矛盾逼出来的，也可以说是“逼上梁山”，或者叫做“重上井冈山”吧！毛泽东，盖世的民族英雄，晚年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得乱七八糟。悲哉！悲哉！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细想想都会想到，那场文化大革命是偶然的吗？不是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吗？后来，邓小平很聪明，他接受了毛泽东的教训，坚决放弃“阶级斗争”这个纲，他认为“阶级斗争”不是什么时候都一抓就灵。他用改革的办法，解放生产力，这同样也是一场革命。那时毛泽东怎么没提出这个办法呢？他太迷信“阶级斗争”了。同样是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用改革，不用阶级斗争，分三步是，先温饱，再奔小康，奔富强。管它是什么主义，能解决问题就是好主义，这就是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启动了中国的市场经济，这不是倒退吗？不，是前进，是“退一步进两步”。事物的发展从来就是否定的否定，曲折前进！

写吾家与吾人，怎么又谈论政治来呢？哎！熟不知那个家，那个人能离开政治呢？前面写过的吾家，那一段不是都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呢？还得拉回来——《吾家与吾人》，那就回到文革中的吾家与吾人吧！

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回是共产党打共产党了。怎么打法呢？本意是文斗，以批判为武器，斗倒斗臭那些党内走资派。从那里开始呢？最能论战搞批判，又最容易发动的当然是首属学校的大学生了。从北大聂元梓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开始，全国的大小小学生就动起来了，学校的当权派要首当其冲，接着“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把战火引向社会，引向党中央司令部。“红卫兵”——学生兵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生力军。从六月份开始的红卫兵运动，到八月的齐齐哈尔，在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鼓动下，走向社会，直指中共市委——齐齐哈尔的司令部了，齐齐哈尔的当权的一个接一个被打倒，学校的当权派更不在话下了，几乎都是走资派了。红卫兵走向社会，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矛头要指向走资派的社会基础：地、富、反、坏、右。又名曰“黑五类”，我的家就在劫难逃了。红卫兵到派出所一查，还有个‘张署长“，这个家非抄不可了。九月的一天，红卫兵，抄家来了，把我家又翻了个底朝上。我和朝珍学生时代的照片，朝珍婚嫁的“花鞋”我心爱的一个副麻将牌都成为“四旧”抄走了。还有几个银圆和一双银筷子，是朝珍从娘家带来的。红卫兵没瞧上眼，就随便扔在地上了。

全院子里的人都来看热闹，或着说是站脚助威吧，张校长的家被抄了。当时我和朝珍都在班上，当我们晚上到家才知道，父母被下了“驱除令”要流放到达呼店村，户口迁移证都开好了。第二天就要走人了。当时我和朝珍，商量了一下，去达呼店还不如去旅

顺口三里桥。还能有人照顾。这可能是父子情深的缘故吧。第二天红卫兵来了，他们很痛快就答应了，这可能去旅顺口可观光一把罢！这时朝珍又提议，把母亲留下，说母亲患高血压头晕，半路上要麻烦，红卫兵一听这也是，怕出麻烦，红卫兵也同意了。于是红卫兵又去派出所重新办理父亲一个人的去旅顺三里桥的户口迁移手续。就这样，在那天的午间父亲随着红卫兵离开了家，离开了齐齐哈尔。他的胸前挂着‘历史反革命’的名牌。他临走时，看到厨房里还有半碗剩饭，他吃了。不是因为他没吃饭，他怕这半碗剩饭没人吃浪费了。他从容地走了，他的胸怀好大啊！他走向他的故乡，带着牌子，这回可真是辱归了。看他那从容不迫的样子，他没有绝望。他相信还能生还齐齐哈尔，这里有他的妻子、儿孙啊！

两个押送父亲的红卫兵很有心计，人也好。在火车上他们把挂在父亲胸前的“牌子”拿掉了，还以尊老敬老的名义，把父亲按排在座位上，车厢里站着的人很多，还给他买吃的。那时候火车上什么人都有，这就可以防止别人乱打乱斗了。他到了旅顺口，到了三里桥的村头，红卫兵又把“历史反革命”的牌子挂在父亲的胸前。到了家乡，红卫兵把父亲交给了村委会。村委会当然要收下。一来红卫兵是毛主席的兵，谁都得听令，二来他确属家乡的人。他一路平安回到了他的老家。

父亲住在三叔家，也是他原来住的家。三叔是富农，父亲的到来，这个家又多了一层黑色。他们哥俩早请示，晚汇报，随揪随到，再就是每天的劳动改造。父亲从来就没有脱离过劳动，除规定任务外，父亲还主动补修乡间小道。群众对他的表现很满意，态度也很好。他在家乡早就有个好名声——张善人，人们也不怎样难为他。不过劳动量大，加上吃素，吃的就要多。朝珍几乎月月都要给他寄粮票。粮票要全国通用的，我们就得花钱买，求人换。借有人去大连的机会，还给他带吃的和豆油。这期间，祝华、国童，还有我的

同事，有不少人都去过他那里，我的家乡。回来人都说，老人家很好，你的家乡太美了，真好！

父亲回故乡后的 100 天左右，母亲去世了。那是 1967 年 1 月 16 日的事。母亲是由于高血压，脑出血去世的。我从学校党委办，办了证明寄三里桥村委会要求照顾，准许父亲回来看看母亲的遗体。幸好，那时这个证明有效，放父亲十天假，他回来了。他到太平间目睹母亲的遗容，他流泪了。他说，这一辈子，我对不起她，深感内疚。是啊！母亲一辈子受苦，受难，挨打挨骂，都忍受过来了。可怜啊！我的母亲，那个时代的中国妇女。

为了等父亲，母亲的遗体在太平间存放了 20 多天。这期间，我还得照样上班处理造反团交办的事情。母亲就是因为我一天晚上夜里两三点钟才回来，他等我一夜。第二天午前，她正在听我的同事讲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脑出血了。她在为他的儿子的命运担心受怕，她当时还抱祝成呢！，那时祝成刚满一周岁。

文革期间，母亲的丧事办得很简单，火化了就算了事。她的骨灰盒号为 109 号。这就是说在齐齐哈尔她是第 109 个火化的人，也可以说是破“四旧”的一个成果吧！

父亲回乡，母亲去世。走了两位老人，有些人就在我家的住房上打算计。还不时有人来看房子，有男的，还有女的。说他们趁火打劫有点过分。不过，趁乱找点便宜，不算过吧。当然，他们得是“红五类”，“黑五类”敢吗？有人找我谈了，我只能婉言拒绝。最后，学校成立了革委会，同我商量，要我让出半门宽的地方以方便邻居，我同意了。那时的我已是“清队”的审查对象了。

父亲在家乡的劳动改造取得了村委会的信任，把看守村里果园的任务交给了他。他从三叔家迁出住在果园的小屋里。看守果园，自炊自吃，倒很悠闲。这个活，一般是不交给“黑五类”的。不久，经过群众公审。就摘掉了他的“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这是他第二

次“脱帽”了，他又回到人民队伍里来了。从此，到他去世之前，没再发生说了不算的事情了。如果真的要“七、八年再来一次”群众运动，那就不好说了。

1973 年落实政策，我已经是学校的革委会的副主任。我以独生子的名义。申请我的父亲回到我的身边，理由随简单，他老了，我不养活谁养活，他不回到我的身边，不是给社会增加负担吗？就这样差不多 8 年了，他又回到了齐齐哈尔的家，这次回来，他深知再也不能回到故乡了。他把母亲的嫁妆，柜子，桌子，板凳等古老的嫁妆都搬回来了。这些东西已经不适合今天的生活，但他还是舍不得丢掉，他不愿意送给人家是因为这是母亲留下来的嫁妆啊！永久的纪念。这三件东西，老掉牙的嫁妆，谁都不喜欢但他也不想丢掉，至今还留着，为什么呢？那就是纪念了！纪念，还能有多久呢？

5、他们是勤劳治家的典范

我的父母都是劳动者出身，虽然当过“官”和“太太”，但他们从来没脱离过劳动。他们当过农民，工人，养猪，养鸡，种地，一直是他们劳动治家的要素。他们在勤劳中结束了生命。

母亲在文革期间患高血压病经常头痛，睡不着觉。父亲走后，她饲养两口猪，那时她已经 72 岁了。考虑他的健康状况我和朝珍都动员妈妈把两头猪卖掉。同院的高家，愿意议价购买。但是妈妈因为这件事都哭了，我们只好留下一头给饲养，他一边料理家里的事，一边养猪，他没有休息一天。在 1967 年的一月，脑淤血去世了。妈妈留下来的一头猪，正是育肥的时候，只好由我的子女们喂养，冷一顿，热一顿，到这年的春天送屠宰场杀了，猪肉很肥，但皮是红的，明白人说了，这是因为猪吃热食把猪皮弄红了。这头猪是我母亲自饲养的最后一头猪。

父亲由于落实政策，又从故乡回到齐齐哈尔，他已经是快 80 岁的人了。本意是不想回来，曾提出让我拿出一千元钱就可以在三

里桥盖上房子，就在老家安度晚年了。但当时我拿不出这么多钱啊！我也曾想过真能做到，那也不错，将来我们也可以回到老家度过晚年了。

父亲回到齐齐哈尔以后，就修理他常用的农具。他从前种过的一片园田，已被别人占用了，他就在别人看不中的地方，边边拉拉的地方，见缝插针，又开荒劳动。他用的铁锹，不知有多少把，每一把都成了弯月形的，铁锹凸出部分，都凹下来了。他重回齐齐哈尔的差不多 10 年的日子里，从未在家闲过一天。由于他的勤劳，母亲走后的八口之家的菜金少花了不少钱，临终前他为这个家积攒了上千元钱，他去世后，这个钱为他的长孙张祝群成婚时用上了。他是因为感冒染成肺炎，医院治疗失当去世的。可以这样说：父亲是把劳动看成是生活的第一需要了，一时也离不开。他和母亲一样，从未休闲过，他们都是在勤劳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的爹、妈的一生从不讲什么享受，如果说有的活，那就是劳动，劳动中的小憩，劳动后的收获。

三个叔叔及其家人

我父亲有一个姐姐，兄弟四人，父亲是大哥。我10岁那年离开老家，到现在已经80岁了。这七十年间，我曾多次回到老家三里桥，也曾多次去过北京。拜见过二叔、三叔和四叔，也接触过他们的家人。他们在我的脑海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们的身上都流溢着祖父的遗风，和这个家族的淳朴、忠厚。

一、二叔及其家人

二叔张有兰，没有念过多少书，但很聪明，不知他在什么时候患过眼病，有一只眼睛视力很差，可能是因为这个二叔并没学过什么手艺，成年后只好在家从事农活而主要是驾驶旅游马车。那个时候到旅顺观光的主要是日本人，二叔的工作性质决定他接触日本人的机会最多，所以他的日本话说得很流利。论日常用语，语音准确属二叔最好了，这个优势使二叔的马车收入要比别人多得多了。但银钱交柜，这是家规，二叔对爷爷是忠诚的。论对当时家庭的贡献，二叔一点也不比别人差。

二叔在爷爷奶奶的眼睛里好象不占有重要位置，在那时，我的孩提时代，二叔在家里有点常受气的感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的二婶母太厉害。我认识的二婶母是第二个，头一个二婶母我没有见过，但留下一个女孩就是我的翠姐。翠姐的模样我已记不清了。我认识的二婶母嘴巴很厉害。她对大家庭的一些现象看不惯，就要说三道四，免不了要激怒奶奶和爷爷，这样二叔也要跟着受气，气不顺就要顶撞几句，这样二叔就落个“怕老婆”的名声。其实，在当时我看到的情形二叔动不动也要饱拳于二婶母身上，这能说是“怕老婆”吗？现在，我认为二婶母对当时封建家庭倒是有点造反精神。论这一点二婶母比我母亲就要强得多。二叔为二婶母辩解几句也不见得不对，说他“怕老婆”是不公正的，在那夫权盛行的家庭里，

女人总是要受制于男人的。

二叔的车是在什么时候歇业的我不知道，我估计大家庭分家以后，旅游马车是要分给二叔的。解放以后，土改了，我想该是二叔车歇业的时候了。土改时，二叔的成分为中农。主要是从事农活。

我离休以后曾两次归里拜见到二叔。最后一次，我看到的情景是二婶母病在床上有点不认识人了，二叔很悲伤。二叔老了，身体很瘦弱。二叔于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去世的，享年 90 岁。

二叔的后人很旺。他们的生活都很好。二叔有三个儿子，女孩至少也有三个吧，我也说不清楚。

二叔的长子张元第，比我小一岁，儿时读书不多，没念过中学，解放战争时期在四叔的影响下，较早地参加了革命，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战争，转业后在旅大市贸易公司工作。离休后，在村子里盖起了五间房子，有一个小院落，果树葱葱，果实累累。这是我 2000 年归里见到的情景。这一次借埋葬父母骨灰回家乡，多住了些天，元第约我去他家做客吃饭，满桌海鲜很丰盛，吃饭的时候，我一再请弟妹上座皆不许，她已 70 多岁了，他们还保持旧家庭的风俗，男人在一起吃饭，女人是不能上座的，不管是长辈的，还是晚辈的，都到 21 世纪了，在农村的生活习惯，还留有几个世纪前的痕迹，新事物总要有旧的痕迹，纯新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一次，元第领我去他的姑娘家，姑爷在海军工作，借方便我们旅游观光旅顺的军港，过海在一个半岛上我参观了我国海军潜水艇，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怪物。远眺过去，大海与蓝天是连接在一起，一片兰色，好不壮观。我与元第在孩提的时代总是顽皮在一起，到了晚年相叙，兄弟情谊比起其他兄弟要有特别的情趣。

二叔的次子张元斗。他要比我小三、四岁，当初我离开老家的时候，他不过五、六岁吧，他也是在四叔的影响下，较早地参加革命工作。他好象一直在金融界工作，建国初期，大概是五十年代初

期他来到齐齐哈尔出差，顺便到我家看看，从那以后再也没见到他。2000 年他从沈阳打来电话，知道他是在一家银行工作，从那里退休的，他已经 70 多岁的人了。在银行工作待遇要比我这里好得多，晚年生活会是美满的。

二叔的三子张元甲。他是在我离开老家以后出生的，我离休后，第一次归里才认识他。他已经是快 60 岁的人了。2000 年归里时，他住在原老家的西院，可是房子是新建的了，五间砖瓦房，很漂亮。他工、农兼顾，生活也很美满。我葬父母骨灰于故里，他帮了不少忙。

二、三叔及其家人

三叔张有荃。他也没念多少书，学得一身好手艺——木匠。他先是在旅顺船坞工作很多年，后去沈阳兵工厂，爷爷去世后，他掌管原来的大部分家业，三婶母去沈阳期间，爷爷去世的，这就成为爷爷去世的一个“话把儿”了。是这样吗？天知道。大家庭的事情，矛盾就是多，受委屈的事能少吗？

三婶母在爷爷去世后不久，她也去世了。三叔掌管那么多的家业，没有人不行，就再婚第二房，这个三婶母我没见过，据说身体不好，不久也去世了，三叔只好三婚，现在的三婶母念过书，是一位有文化的农妇，身体很好，已快 90 岁的人了，还在干活。我父亲归里改造期间，曾蒙她诸多关照。2000 年哪次我归乡，我住在三婶母家，三婶母向我倾诉到张家后的苦衷。我能理解，我是从这里走出来的人。她很忠实于这个家，到这里她还生下一男一女。现在只有这位老人守着、看护着这个老家。满院的果蔬花草，由她饲养着，还养鸡养鸭。她每天晨起，就在院子里来来往往忙乎着。虽说家里通了自来水，院子里还有一口水井，她还能从水井打水，浇注院子里的各种植物。好一个老人，愿她长命百岁。她是我张家唯一尚有的老一辈人了。

三叔掌管大家庭的大部分家业，时间也不过三、五年，土改时就给他划了个“富农”。就其本人来说是一个长期从事木工手艺的人，确实有点冤枉，在这个村子里没有地主，富农算是最高的成分了，据父亲说，在文革中，挨斗挨批属三叔多，甚至也挨过打。爷爷要不早逝，这个帽子肯定要戴在爷爷头上。按当时分家的情形，也只能如此。但是三叔亲手侍奉奶奶多年，至少也有六、七年的时间吧！四叔在大连稳定后才把奶奶接到大连。在这一点上三叔是有功的，功不可没！后来的三婶母也是有功的。

“三中全会”后，三叔就过得很兴旺。他靠一身好手艺赚钱，并培养其小儿子张元融学木匠。子承父业，父子一起干，日子很快就兴旺起来了。三叔于1998年去世，享年90岁。

三叔的后人，子女很多。我知道有两个儿子。姑娘要有四位吧！

三叔的长子张元仲，赶上好时候，就读过大连工学院。在这个家族里，在我这一辈里，他算念书多的一个了，和我差不多。他留校在大连工学院的机械厂工作。至于后来他做过什么工作，我就知道了。我几次归里，曾两次见过他。他的夫人我也见过，好像是搞体育工作。2000年归里时，我和他相聚在他的大姐张秀芬家。颇感亲切。

三叔的长女张秀芳，比我小一岁，孩提时代在一起打闹顽皮、过家家，童年的欢乐，在我的脑海里总是抹不掉了，永远的欢乐。她也是在四叔的影响下，较早地参加了工作，工作在财贸战线上，搞外贸出口，她也曾来过齐齐哈尔，到过我家，晚年他退休在大连。她嫁给一位国民党起义的飞行员。人很好，我两次见到他，但他曾经受两次政治运动的洗礼，精神上免不了受过不少创伤。晚年，他们生活很好，老两口在一起，子女不在身边。

三叔还有几个女儿，有的在长春，有的在沈阳。我知道后来的

三婶母生下一个女孩，念过中专，曾给我父亲来过信，颇有感情，她的名字我没记住，也不知她在何方？

三叔的次子张元融，没念多少书，学得一身好手艺——木匠。“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给他大显身手的好机遇，他包工木匠活，包工盖房子，发家了，就在我老家房子的后面，他盖起了一座二层的楼房，自住一小部分，大部分出租。2000年归里时，参观了这座小楼，好漂亮啊！只是楼的周围环境不算太好，因大部分租给外地来的客商，堆放货物，显得零乱。元融有一个儿子，2000年刚读完高中，在家待业，在大连，旅顺口，就业是不会像北方那样困难。

我离休后，曾归里几次，都住在三婶母家，也就是元融家。元融待我如亲兄弟，很热情，是他为我父母骨灰按放在祖坟莹地上，按放他父亲我三叔的墓旁，兄弟二人可以朝夕相处，不会孤单。二叔叔的墓地，按放在村西山，不在祖坟莹地上，不知道为什么如此安排。

我想明年，也就是2004年，只要身体状况允许，我要再次归里扫墓，但望宿愿克遂。

四、四叔及其家人

四叔张有萱生于1911年，故于2001年享年91岁，在吾家他的寿禄算是最高的了。不仅是这样，他可以说是这个家庭之最了，他学识最高，他觉悟最早，觉悟最高，他为民族解放，抗日救国，建设新中国贡献最多，应该说，在吾家他是最显赫的光宗耀祖的人物了。

1、抗日救国 离家出走

四叔在旅顺工大苦读六年，获得学士学位。那是1937年一月的事，四叔是一位爱国者，在读书时期就曾参加过爱国运动，并早有打算毕业后不为日本人服务，要去关内为救国救民服务，这才有

前面讲过的婚变与出走的故事。

四叔大学毕业论文是有关造船方面的学术研究，毕业后就在日商大连造船厂工作，不多日，在一个夜里，他身藏在去青岛的货船里，逃往青岛，他离家出走了，不告而别，家人谁也不知道，为救国救民，他铁石心肠，不告父母，抛弃了妻子，离家出走了。临走前他给我父亲一封信，希望父亲辞去职务回家帮助我的爷爷料理家务，但丝毫看不出他要出走的信息。

四叔的出走，可苦了我的爷爷和奶奶，人们估计他是走向关内了，可能是打日本鬼子了，父亲当然也挂念着他的四弟，常在家叨咕着。但谁也没有奶奶想的最厉害。奶奶夜间做梦，梦见四儿在坟莹地里走来走去。奶奶就找一个巫婆圆梦，说四叔已不在人间了，奶奶悲伤极了，八年了没有音信，全家人都以为他不在人间了。

1945年的八月，抗战胜利后的一个夜里，四叔突然回家来了，还带了一位卫兵，爷爷早已去世，奶奶见到了四儿，喜出望外，老泪横流，自不待说。四叔见不到老父，当然也要流悲伤的眼泪，但这夜里意外归来，也只有十几分钟。他就离开家了，离开了妈妈。原因是当时的旅大，按国际协定还属国民党的地盘，苏军占领，行政权属于国民党政府，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为了安全，他不得不乘夜色返回大连。

2、走向抗日战场 走向共产党

四叔去青岛，唯有报国之心，但找不到报国之门，举目无亲，只身他乡，住在一个小旅馆里，几个月过去了也找不到工作。在他窘迫潦倒之际，遇到了一位中学同学，告诉他另一位中学同学，从日本留学归来，正在太原从事实业工作，于是他就投奔到太原，找到了他的同学董万丰，两人相见，志同道合，暂栖身于太原实业公司，寻找八路军，要走向抗日战场。他们找到了驻太原的八路军办事处。第一次办事处的人，见他们西服革履，未予理采，第二次他

们换了服装，说明身份，说明来意，仍然婉言拒之，动员他们去找东北抗日同盟。第三次他们见到办事处的负责人南汉宸，再三申请抗日要求，南汉宸被感动了，请示周恩来，才同意他们参加革命，参加八路军。他们两个人当时被派到八路军总部工作，承担对敌工作任务，做对敌宣传工作，情报资料工作，俘虏工作等等。他们的工作很出色，受到朱总司令的赞赏，朱老总很关心他们，常来看他们。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与变化，他们相继离开八路军总部，四叔被派到 129 师，战斗在冀南平原和大山。

四叔在一次与日军战斗中，部队被打散了，他身负重伤逃往一座寺庙，剃了光头，伪装和尚，逃避敌人追捕。在另一次战斗中他胸部中弹，险些丧命，他曾对我说过他的胸部还留有弹片。他享受二等残废军人待遇，真是九死一生啊！他的那位好同学，好同志、好战友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他曾写了一篇缅怀这位战友的文章，登在大连日报上。我剪出了这篇文章，读起来令人感动，他们是大连人的光荣与骄傲。

附：

忧国忧民 追求真理

——缅怀亲密战友董万丰同志

大连，是我的故乡，我在大连山与海的怀抱里，在美丽富饶而又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度过了二十六个春秋。后来为了投身革命，我离开故乡大连，一去就是四十余年。在这四十多年中间，有四年多我又回到大连工作。按理说，有许多往事，许多故人，许多感受应该写，也很想写，无奈公事繁忙，力不从心。但是，有一个故人，四十多年来，时时勾起我对他的缅怀之情，他就是抗日战争时期亲密的战友董万丰烈士。我有责任，也有义务把他的事迹告诉故乡的人们

张有萱

大连儿女

董万丰，又名董秋农，大连市金县三十里堡人，一九一〇年出生，他从小学到中学都在大连读书。在旅顺第二中学时，我和他是同班，他长的浓眉大眼，为人耿直，胸怀坦荡，是一个乐于助人、见义勇为的热血青年。他数学好经常为别人讲解难题，他喜爱运动，一有比赛活动，他总是到场助兴，乐于为运动员做些服务性的事情。

当时。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的影响下，爱国思想的春风也吹进了旅顺二中，我们教训了一个一贯欺压中国学生的日本校役。这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注意，校方以殴打日本校役为借口，开除了几个中国同学，为了反对学校当局无理开除学生，同学们决定举行罢课。董万丰是罢课的积极倡导者，罢课开始后，他坚持把斗争进行到底，拒不返校复课。最后，他转到北京宏达中学攻读。

从宏达中学毕业后，董万丰和当时很多爱国进步青年一样，怀着经济救国的思想，东渡日本，进神户商业大学求学。

忧国忧民

一九三七年一月，董万丰从日本神户商业大学经济系毕业回国。学业成就，要走向社会，摆在董万丰面前的是出路何在？走向何方？当时。东北三省沦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凭董万丰的学历和一口流利的日语，只要愿意出卖灵魂，甘心做亡国奴，更不难谋个一官半职，飞黄腾达的，然而，董万丰这个忧国忧民的热血男儿，决心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光明之路。光明在哪里？在中国的大西北。延安的红星，照亮了黑暗的中国大地，召唤着董万丰追求真理的心，年轻的董万丰，以他的同乡、著名的共产党人关向英为榜样，毅然背井离乡，只身奔向中国大西北，开始他寄身于太原西北实业公司，等待时机寻找共产党、八路军。

同乡、同学、引路人

我和董万丰自中学分手后，他去了日本，我考上了旅顺工科大学。一九三七年一月，我从旅顺工大毕业。同样的救国救民的愿望，我也背井离乡，只身冒险偷渡到青岛，想以自己所学为国家富强和民族解放做一些贡献。然而，事与愿违。在青岛，我目睹国民党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报国无门，流落他乡。生活无着，前途渺茫。我整日彷徨于青岛街头，困留在一个小店里达三个月之久，一天，我正在小店里苦于没有出路，意外地见到同学王兆炳，他也来这里住店。他问我为什么到这里来？我以实情相告，他想了一想，对我说：“咱们同学董万丰从日本回国，现在太原西北实业公司，可以请他帮你找个事做。”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线希望，我们当即拍电给董万丰询问。不几天接到董万丰复电，要我速去太原。我喜出望外，立即乘火车去太原，火车抵达太原车站时，恰逢天降阵雨，董万丰冒雨在车站迎接我。他乡遇故知，我们都非常激动，他把我接到他的寓所，久别重逢，我们促膝诉说别后各自的情况和救国救民的理想，情同手足，志同道合，他对我说：“我先介绍你进西北实业公司，有个落脚的地方，以后的事情我们再想办法。”翌日。他拿了我的工学士文凭去公司联系。事情很顺利地谈妥了，从此，我就到西北事业公司去上班了。

西北实业公司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官办的，经营煤矿和工厂，实力还算雄厚，待遇也不错。但是仰人鼻息做一个公司雇员，混迹于小市民中间，过浑浑噩噩的生活，既不是董万丰的愿望，也不是我的愿望，董万丰在政治上敏感的。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参加八路军把日寇逐出中国，才能拯救故乡的土地和人民。他经常给我讲有关共产党的事，带我听八路军干部讲演，看抗战文艺演出。每当看了《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演出，听到《我的家乡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时，我们都禁不住热泪盈眶。

董万丰对我说：“西北实业公司虽是栖身之所，但决非久留之地，我们不能忘记东北大好河山还在敌人手里。不能忘记故乡旅大的父老同胞！”

三找八路军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董万丰再也不能等待了，他决心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他征求我的意见，这也正是我的想法，于是他带我去找八路军。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三找八路军的事。

第一次，董万丰带我去听八路军负责人彭雪枫同志，提出参加八路军的要求。彭雪枫同志要我们去找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联系，我们找到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提出请求，但办事处没有应允。

董万丰没有因受到挫折而灰心，还要继续要求参加八路军。为了活动方便，我们暂时离开西北实业公司，住在一个旅店里，不上班，也没有请假。我们第二次找到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要求参加八路军，这次见到了南汉宸同志，他听说我们是旅大人，东北籍的大学生，就建议我们先参加太原的东北救亡会，对我们参加八路军的要求还是婉言拒绝。

没想到参加八路军还这样难，但是，虽然一再被拒绝，董万丰的决心没有动摇，而是更加坚定，他理解在当时的国共合作时期，象我们这样在日本人办的大学毕业，西装革履的打扮，冒冒失失地要求参加八路军难免引起疑虑的，他相信心诚则灵，于是他把分头剪成光头，脱掉西装革履，换一身市面上买来的次等军衣，又第三次带我走进了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见到南汉宸同志后，董万丰慷慨陈词，诉说了我们追求真理的艰难曲折的经历和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决心，情真意切，声泪俱下。南汉宸同志相信了我们，经请示当时正在太原的周恩来同志，最后同意了我们的要求，接受我们参加八路军，给我们开了去八路军总部报到的介绍信。我们的愿望

终于实现了。

几天以后，我俩抵达山西五台县河头镇南茹村八路军总部驻地，穿上了军装，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走上了革命的征途。

对敌工作的勇士

参加八路军后，组织上根据董万丰和我的学业专长，分配我们在八路军总部敌工部工作。

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董万丰一旦找到真理，走上革命道路，就以忘我的精神拼命工作，不管工作条件怎样艰苦，他都是愉快的完成任务，为了从缴获的敌人文件中得到有用的情报。他夜以继日地查询、搜集、翻译、和整理大量日文材料，提供给上级研究分析敌情之用，有一次，朱总司令来到我们的工作的房间，为了不惊动我们，他把警卫员留在门外。一个人悄悄地等着我们，我们聚精会神地伏案工作，没有发觉。直到我们无意中抬头，才发现总司令，朱总司令。朱总司令看了我们翻译的材料，点头称赞，为了瓦解敌军士气，董万丰呕心沥血，细心推敲，编写了大量针对日军的宣传品。还经常亲自刻板、印刷、散发和张贴传单。行军时，他在墙壁上涂写大标语，然后赶上队伍，为了深入群众了解情况，他经常一个人翻山越岭，披星戴月，步行到几十里外的村庄去。

一九三八年三月，我被调到一二九师工作，和董万丰暂时分手，一九三八年五月，我调到冀南平原检查工作我们又见面了，那时他刚二十八岁。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相约不久以后见面，谁知，这竟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

英雄血染抗日沙场

这次见面以后，董万丰被调到冀鲁边军区工作，任敌工部长。一九四〇年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最艰苦的阶段，由于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日军采取“对国民党休战，对共产党激战”的方针。停止

正面进攻，集中兵力于华北，加紧对我八路军根据地进行“扫荡”。华北平原的游击战争，更加激烈残酷，我在这年四月一次攻打日军据点的战斗中，负了重伤。

一九四〇年十月，董万丰参加我军围歼恩县日军的战斗，据说打得很艰苦，战斗临近结束，枪声已息，董万丰为了抓俘虏和获取敌人的文件，勇敢地向前冲去，就在这时，一个躲藏在汽车底下的凶恶敌人，从暗处向他开了一枪，罪恶的子弹穿过董万丰的头部，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时年三十岁。

幸存者的怀念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董万丰生于内忧外患的旧中国，在民族危难的年代里成长，他不贪图安逸，不随波逐流，百折不挠追求真理，最后成为一个先进的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他的一生是短促的，也是光辉的，他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忠诚坚贞的共产党员，他是故乡大连人民的骄傲。

我和董万丰同乡、同学，同事，是同时参加革命的战友，志同道合和知音，他是我走向革命的引路人，当年，他的牺牲曾使我万分悲痛，今天，作为幸存者，我只有深深的怀念。

董万丰同志，你的战友没有忘记你，故乡人民不会忘记你，我们将学习你的忧国忧民，追求真理，为了事业和理想奋不顾身的精神，为祖国的繁荣和富强，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努力工作，以慰你九泉之下的英灵。

3、建设国家 再立新功

抗战胜利后，四叔先在大连市工作，任大连市工业厅长，在此期间，他主持召开大连工业博览会，当时的东北日报广为宣传，我引以为荣。

建国后，成立了东北人民政府，他被调到东北人民政府的工业部，任东北机械管理局局长，我的奶奶也随四叔家到了沈阳，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在沈阳的机械工业北迁时，四叔亲自带领苏联专家来到齐齐哈尔，主持迁移第一，第二机床厂。借机，他来到我的家，探望兄嫂，并在我家吃了一顿晚饭，也只有过这一次。我记得四叔对东北的酸菜很感得味，吃了一盘又要一盘。过几天，他又把父亲和我接到他的下踏处——当时的第二机床厂的小白楼，请我和父亲吃了一顿饭。父亲喝了不少酒，他很高兴，似乎忘记了那次没买火车客票怨意，醉于手足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四叔对我说：富拉尔基将要成为重工业基地。可以想象到，那时他已参与了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了。

1954 年东北人民政府撤消，四叔被调去北京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不久国家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时，他被任命为副主任，他提升的很快，已经是副部长了，主任是聂荣臻，我的一个工大同学在国家科委工作，他说你四叔在国家科委是主要干将。四叔参与了国家科学技术规划工作，为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在这里工作了十多个年头。前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聂荣臻元帅的记录片，其中还提到了张有萱。他在这里工作时间最长，如果包括文革 10 年在内，那差不多就是 20 年了，应该说他是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功臣之一了。

4、文化大革命中的四叔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国家科委是国家机关的一个重灾户，有关国家科委的文革小报，传单，传遍了全中国，也传到了

齐齐哈尔。我记得：其中有：国家科委的黑干将——张有萱；国家科委的“大连帮”——韩光、武恒、张有萱……等等，把持了国家科委的大权，他们都被打倒了。这些消息的传来，我不奇怪，不管党内，党外，知识分子都是文化的主要载体，那个能躲过这一劫呀！何况他又是个当权派，我听说在文革期间在国家科委他是挨批最多，最重的一个，他的大哥又是伪满警察署长不能不是一个原因吧！

文革后期，国家科委的外调人员来齐找我取证。主要是问我：张有萱到齐齐哈尔去过你家没有。来过几次。都说了些什么，不错四叔到齐齐哈尔，来过我家两次，一次是50年初的迁厂，一次是58年大跃进年代来齐考察“积木式车床”——这次与他同来的有原市联合中学校长霍世章，那时他已是国家科委的办公厅主任了，这时霍世章才知道我是张有萱的侄子。我对外调人员如实反映了情况，写了证言就算完事。我问他四叔的情况怎样？健康状况如何？他说：一切都很好，不用挂念。我意识到了四叔不会有什么问题，该落实政策了，从那以后不过几个月，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四叔又被任命为国家海洋局的局长，国家标准计量局的局长等职，最后是第六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后改为国家船舶工业总公司的副董事长。

在他任六机部副部长期间，他曾去过哈尔滨船舶学院、大庆视察，借机他再次来齐看望他的兄嫂，但在途中，毛主席去世了，他只好掉头赶回北京，这是他后来对我说的。我的父亲一直在埋怨四叔把他忘了，不给他写信，实际上，四叔没有忘记他，每当我去北京四叔处，四叔总是要给父亲带些东西回来，他们是一奶同胞啊！

打倒“四人帮”以后，可能是1977年，我去北京轻工业部办事，在火车上遇见了四叔，在火车上叔侄相见，实在难得，一路上。不用说两顿饭四叔全管了，四叔又问起我的父亲，我告诉他父亲已

经落实政策，摘了帽子，返回齐齐哈尔了，他说：这就好啊，要善待父亲。

我离休以后，去北京的机会少了，只有一次 1994 年，借我与朝珍去避暑山庄观光之机，我和朝珍去了四叔家——北京百万庄 7 号，他到北京就住这里，我第一次来这里是 1957 年，到轻工业部开会，四叔用小车把我接到他家，共进晚餐，而 1994 年这一次，就是最后一次了，我们同四叔还有新的婶母（第四个了）在四叔家合影留念。新的婶母比我和朝珍还年轻，临别时，四叔送我到门外，恋恋不舍伫立多时，挥手送别，预示着再见难矣！这是我和四叔最后一次会面。

四叔亲生的后人，只有两个女儿，一个是前妻留下的小云，抗战胜利后，婚变四婶母将她还给四叔。四叔把她送到军校参军了，据说他嫁给一位军人。再有一个就是第三任婶母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大学毕业后又去日本留学深造，学成后受聘于日商，做商务工作。

写到这里，我的三个叔叔及其家人的情况就算写完了，人们可能会发现，兄弟四人的妻室数的排列也是 1. 2. 3. 4. 个很有意思。

我的人生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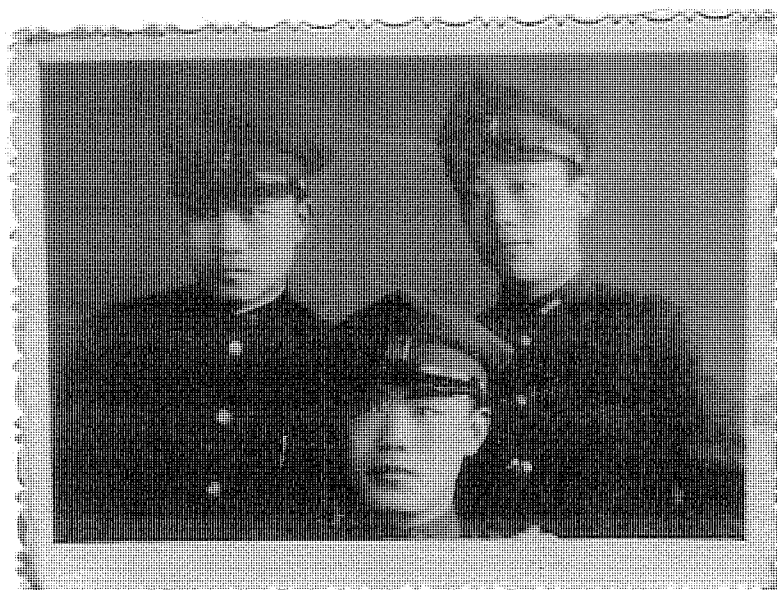
1942 年冬中学四年级毕业留影



长春工业大学二年级留影



我与张雨华同学在长春工业大学时合影



我与李达、张雨华同学在长春工业大学时合影



在齐齐哈尔的长春工业大学同学会同学合影



长春工大在齐冶金科同学合影

左起：沈建文、陈庆乾、韩玉斌、张元士



我在齐市政协会上与齐市民革名誉主委姚日成合影



我主持齐轻工学院 30 周年校庆大会上留影，右起第一人



1943 年张元士、赵朝珍订婚纪念照



岳父母、祝华与我们夫妻合影



我们银婚纪念与子女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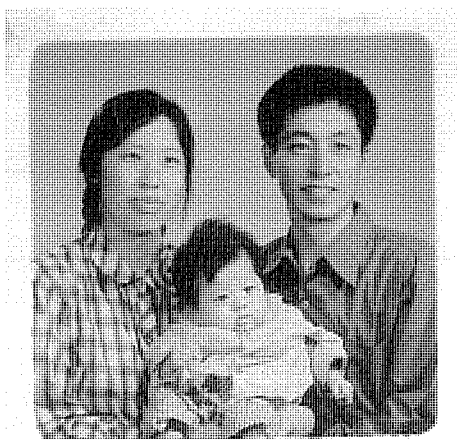
我们金婚纪念与子女合影



朝珍病中春节家庭聚会留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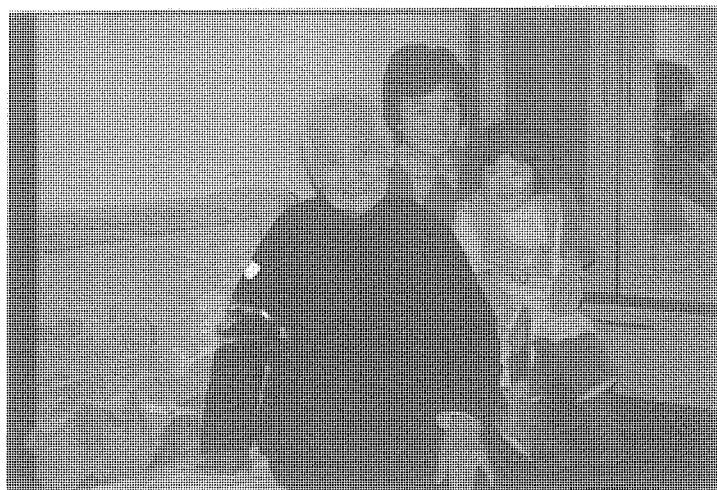
朝珍病中夫妻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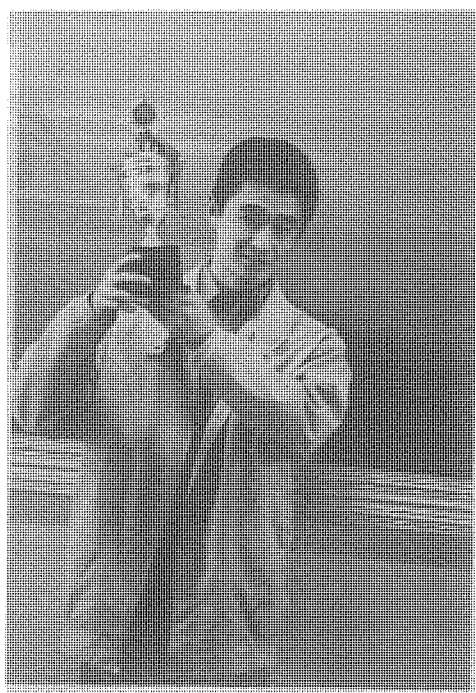
大女儿一家三口



二女儿一家三口



岳母晚年与小敏和雪娇



齐市围棋赛冠军赵小军

我的人生之旅

我的一生是平凡的。“人生如梦，岁月如梭”这句话不知是谁发明的，我觉得它很有哲理，把人的生命同时间联系在一起了，那就可以说时间就是生命了。我今年已经 80 岁了，我的人生已经走过了 80 个岁月。还有多少时间属于我的？谁能知道？不管有多少，岁月如梭都是短暂的，愿人们珍惜生命就要珍惜时间。人们又常说，“时间就是金钱，”也有道理。但“寸金难买寸光阴”不是更有道理吗？到了晚年有了这点感悟，太晚了。我的一生浪费的时间太多了，否则，我的一生就不会平平庸庸，愿我的后人都明白“人生如梦，岁月如梭”的哲理，做正面的理解，而不是负面的影响。

一、出生与乳名

1924 年夏历九月十日，阳历就是十月十一日，也就是九九‘重阳节’的第二天，日落时我出生了。那年是鼠年，鼠出日落逢吉辰。这是算卦先生说的，我不管，我觉得这时辰不错。

金秋九月，天高气爽，正是农忙季节。“三春不如一秋忙”，日头快要下山了，临产期的母亲还在田里忙活着，日头落山了，她才往家走，刚到家就把我生在厕所里了。对母亲来说，我是第五胎了，她可以独立处理生孩子的事，很快就把我抱进屋子里了。那个年代的农妇，生个孩子就这么简单了事。厕所成了产院了，我生来第一个嗅觉就是臭味。直到今天，我不怕臭。这能联系在一起吗？

到我这儿，不算小产，母亲已经生过四个孩子了。一个也没活下来，他们都因为出麻疹喘死了。在我前面有一个哥哥，‘小九子’是得麻疹喘死了，在我后还有一个弟弟，‘得庆子’也是得麻疹喘死了。当然，我也要过麻疹关，我是喘过来了。母亲一辈子不算小产一共生了九个孩子，只留下我这根独苗。人们都说我命大。在同

样的条件下，比起没活下来的兄弟姊妹，说我命大也不算瞎话。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不知有多少孩子过不了麻疹关，如果都过了关，那中国人口就更不得了啦！

那个年代，孩子生下来都要起个乳名。我爷爷给我命名为‘得十子’，‘得石子’，‘得实子’。至今，究竟是哪个我也说不清，我也没有问爹爹和妈妈，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从前面喘死的哥哥‘小九子’那说起，应该是‘得十子’了‘九子十成’吗！母亲生了九个孩子成了一个，也可以算是对上来了。爷爷的命名是不是这个意思呢？那么‘得石子’我看也很好，石头和宝玉都是一路货色——硅酸盐，而石头比宝玉更实惠些，对人类的贡献更实惠，也就是‘得实子’了。总之，我觉得爷爷给我起了个美好的乳名，至今我仍欣赏这个乳名，不管是哪个都很好。现在中国人有了孩子一般都不起乳名了，我倒觉得起‘乳名’的习俗能保留下来为好。‘乳名’常常是同时代、国家、家庭等环境条件联系起来的，可以留下美好的或是悲惨的记忆，不管是哪个都是一种记忆。

人生下来，一个人一个样，再也找不出和我一样的人了，尽管是同胞胎，也总是要有差异。但我的两脚脚心上都有一个‘黑痞子’，这是母亲给我留下的特殊记号。讲迷信，脚踏两个“痞子”是好是坏都无从谈起，都无所谓。不过，我常以这个“独特”而“孤芳自赏”，管他好坏！

二、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大部分是在农村度过的，儿时的农村情趣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人在童年，不管是穷家、富家都有大人管。童年总是快乐的，无忧无虑。好动、好玩是童年的常情。在那个年代，我的家不算穷，可有什么“玩具”取乐呢？没有。一群孩子，无非是这跑跑、那跳跳。再不就是找一般大的男孩子、女孩子在一起打打闹闹，在吾家

一个是张元第（得祥子），一个是张秀芳（秀芳）他们都比我小一岁，我们就可以在一起玩了，我喜欢和秀芳在一起玩，他是我的堂妹，男孩子和女孩子在一起玩，玩什么呢？“过家家”当两口子，六、七岁的孩子当两口子可真有意思，从小我愿意和女孩子在一起玩，这可能是人性所致吧，“红楼梦”里的贾宝玉，非常喜欢同女孩子在一起玩，不管她们身贵、身贱！这是不是男孩子的天性呢？曹雪芹写的很对，那是人性。

我在童年的时候就不利索，鼻下总拖着鼻涕，我的妈妈也无暇照顾我，我穿的布鞋是妈妈亲手做的布鞋，一个好动的孩子，几天就把一双新鞋的后帮踩扁了，没办法母亲在鞋的后帮上缝上两个带子，让我系上，可是我是常常不系上。有一次，我从奶奶的屋子里往外跑，不知怎的，后脚踩在前脚的带子上，向前一扑，我的前额盖就撞上风箱的角上，哎呀！不好了！血直往外流，摔开了一个大口子，足有寸长。那天是四婶母当值在家做饭，她一看血流不止，急中生智，就把四叔用的牙粉抓一把就给我糊上了，还真管用，血止住了。在这个家里只有四叔用牙粉刷牙，他刚上大学，那时候在中国还没有牙膏呢！现在，这个大口子还留在我的头盖上，幸好，我的头发至今还很厚实，有它掩盖着人们不易发现，如果我的头发都掉了，拔顶了，那可就难看了。

童年，我六、七岁的时候就干活了，“捡粪”是我天天要做的事，清晨要和大人一样的早起，背个粪筐，拿根五爪叉子，早晨捡的是狗粪，早饭后，随着出车，跟在后面，要把马拉的粪捡回来，多么盼望拉车的马快点把粪拉出来。人粪呢？在我那个村子很少能拾到，因为每个家里都有一个粪坑，而且都是用瓷罐装在里面，不仅是粪，就是尿也都跑不掉，粪在每个家里都视为宝，“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这里的土地太瘠薄了，化肥？那时，没见过谁家用，放马、放羊，放牛的事没做过，因为在这个村子里根本找不到

草原。种地时，我能干的活就是牵着小毛驴拉着石头碾子压地格子，这是为了保墒，防风。农忙时，爷爷吩咐我干这干那，凡是力所能及的都要干，童年的这段经历就是劳动教育和锻炼，因为这样，我对劳动从未惧怕过，解放后，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进行劳动改造，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对此我不以为苦，也可以说是根基的。

中国人很重视“端午节”、“中秋节”，但童年时期的这两个节日并未给我留下多么快乐的景象。吃“粽子”吃“月饼”的事情，在我的童年岁月里是否有过都想不起来了，不过有一点很深刻，就是端午节的早晨在我醒来的时候，我的手脖上带上了五彩的色线，是母亲给我带的，这就是为了好养活啊！妈妈的孩子死的太多了，“五彩线”怎么没在他们身上显显灵呢？

春节，在我们那儿叫过年。过年对中国的孩子来说是最快乐的节日，我忘不了童年的过年，童年的快乐。进入腊月，孩子们就数日子还有几天过年了，那时候过了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了天，就要蒸面食，杀猪，打扫房屋和院落，年三十那天贴对联。给我最深刻的对子就是：“忠厚传家远，积善庆有余了”。我的祖辈们，多么希望这能成为我们的家风。这个家的对联，都是出自父亲的手笔，四叔虽然上了大学，但论写字，他比不过我父亲。也是在年卅那天，挂家谱，一卷长长地挂着，挂在堂屋里的北墙上，家谱上写的都是男人的名字，那女人呢？则是“张某氏”了，在家的女人在家谱上是找不到位置的，因为他们是要嫁出去的。叫外姓人。这个家谱，分家后，保存在三叔家里。文革期间，这个家谱失落了，很遗憾，“除四旧”连祖宗都不要了。

年卅那天，日落时就开始接神了，先接的是坟莹地里的先人，我随父辈们到山上，在每个坟头上叩头，口里念着：“请××回家过年”，到夜间还要接财神，福神、喜神，还要到村头的土地庙前，跪请“土地爷爷”，新“灶王爷”也在这天登座了。

孩子们盼了一年，也在年卅这天都换上了新衣服，能不高兴吗？到了午夜，放鞭炮了，孩子们都欢跳起来，接着就是拜年了，先是全家人跪在摆有供果的檀子前，面对家谱，向祖宗拜年，向父辈们，母辈们拜年，不白拜，爷爷奶奶要给压岁钱啊！当然这个钱要交给妈妈，成为妈妈的体己钱，以备明年换新衣。接着就是父辈们领男孩子们到所有有族内长辈的人家去拜年，当然是互相走动，全村都热腾起来了，好不欢乐，但女孩子只能在家，不能和我们一起去别人家拜年。这真是一个快乐的夜晚。

来到齐齐哈尔我不满 10 岁，在这过年比起老家就差多了，一家三口人怎么也热闹不起来，这里的人迎接过年的重要节目就是包冻饺子，为的是正月里吃的方便。在这里我没地方去玩，只好到邻居家看人家赌麻将，也不管人家烦不烦，有时也让人撵过。但有一件事至今我也忘不了，大概是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吧，在过年的夜晚，我去父亲的同事刘姓家玩“升官图”抓色子赌运气。一玩就是几个夜晚，好不快乐，更吸引我的是一个女孩同我一起玩。我们年龄差不多，我愿意和她玩，她也愿意和我玩，不然，为什么几个晚上她都到刘家去等我呢？她是和刘家住在一个院子里，后来这个女孩上中学时同朝珍是一个班级里的同学，她知道我和朝珍早已订婚时，她说：“张元士小时候可埋汰了”，可见她对我的印象很深刻，已经七年多了，她还能记得我的丑模样，埋汰像，可那时，她不嫌我丑，也不嫌我埋汰，愿意和我玩在一起啊！也可以说是童恋吧！尽管是短暂的时光，可那是美好的。

三、小学生

1931 年的春天，我开始上学当学生了，那一年我刚满六岁，四叔领着我到水师营普通学堂报名，办完了手续，我就成为这个学堂的学生了/那时四叔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已经戴上四角帽了。水师营，前面说过了，它是北洋水师的营地，是一个大镇，这里有

一个“水师营会见所”，那是甲午战争，中、日两国的将领会见的场所，可能是停战议和吧？水师营在我们村子的北面，从村子绕过山道步行 30 分钟左右就可以到学校了。

水师营有两个学堂，一个是普通学堂，一个是公学堂，也就是初小、高小两所学校，日本人统治的殖民地，小学分两级，意思很清楚。中国孩子一般念四年书就行了，考入公学堂的学生就不多了，接着再念高等公学堂的就更少了，至于能念上大学的那就是凤毛麟角了。

我在水师营普通学堂念了四年书，成绩很差，没学好的原因就是贪玩，不用功，我也不懂为什么要念书，说点客观原因，上学了还要照样干活，农忙季节还要罢课忙农活，特别是四年级的时候，父亲北上不在家，更没人管我，四年级的学业成绩差得最厉害。在这里念四年书没有留下可回味的记忆，但有一件事至今仍记忆在心，那就是念四年级那一年的四月十八那一天，放学回来正赶上庙会，庙就在学校与村子之间的山上，我独自一人上山逛庙会了，看野台大戏，不用花钱，看杂耍站脚助威用不着花钱，尝各种食品，吃的喝的你去看看闻闻，也用不着花钱，就这样东张西望看个够，玩个够，没花一文钱，我也没有一文钱。不知不觉天色晚了，人们开始散开了，我才觉得该回家了，也觉得要坏事了，我饿着肚子回到家。爷爷先是拽耳朵，接着就是下跪把我训斥一番，好半天才让我吃饭，母亲和我都哭了。幸好，爹爹不在家，否则要挨一顿毒打无疑。可以看出，一个孩子玩起来，淘起来真是啥也不顾了，一切清规戒律都忘了，都不管用了，人生下来，到底性什么？性本善，性本恶，争到现在还是争不清，依我看性“自由”到有点道理，因为人们都争自由，就彼此碰撞起来，人与人之间争斗就产生了善与恶，一切清规戒律也就有了，自由也就受限制了，这个限制将是永远的，那么“争自由”必将成为人类进步永恒的主题，就这一点，

我倒有点同情“存在主义”与法国的萨特。写我小时候的顽皮，淘气，又讨论要自由了，真有点多余，也许不多余。我想把这一段删掉，前而说了，信笔由之写到哪算到哪，多余的就让它存在吧！不删了。

1931 年我开始念书了，这一年是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的不平凡的一年，就是这一年的九月十八日，日本人的扩张侵略占领了东北，整个东北成了他的殖民地，而有了个“满洲国”。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政治事件，都可以改变一个家庭，一个人走向与命运，吾家的变化，和这一家人的变迁都与“九一八”不无联系。

1935 年，我随父母来到齐齐哈尔，在故乡我念完了小学四年级的课程，如果我不来齐齐哈尔，我的学业也就终止了，按我当时的成绩是考不上公学堂的，到齐齐哈尔本应该读五年级了，但这里的学制与故乡相差半年，那也该重读四年级吧。但没有想到经过学校测试，认为我念四年级也不行，我只好从三年级重新读起，这样就等于降级一年半了。这个小学要求很严，就是当时的华北小学，后来又改为龙江国民优级学校，这是天主教堂私立的小学，同院还有华北中学。

从名落孙山到榜列前茅

这所学校实行月考制，每月考试一次，并张榜公布名次，第一次月考，我排在倒数第二名，这可把父亲气坏了，我又挨打又受骂，对我的刺激太大了，降级一年半，考了个倒第二，太糟了，遭透了，大失父亲所望。父亲带我来齐齐哈尔原因之一就是叫我念好书啊，第一次考试没考好也有点客观原因，到这里来，我的乡音未改，我的语调和同学的语调很不和谐，同学们常以此耍笑我，受辱的感受令我有点厌学。因此和同学们争吵起来，甚至打起来，对侮辱我的人我是不客气的，从小好斗也算是我的一个品格，这样一来耍笑我的人慢慢地也就没有了。而我的乡音不知不觉也就随乡从俗了。痛

定思痛，第一次月考失败，我发奋读书了，小学生进步也快，退步也快，到第二次月考我就上去了，榜列第三名，从倒数第二到头数第三，可谓是大跃进了。从那以后，我就是这个班级的第一、第二名的学生了，一直到小学毕业，因为那时候小学就学日语，不用说了我的日语比他们念得早，念的多，是强项，在这个班级里谁也比不了。

小教徒

华北小学是天主教私立学校，课外活动有个“要理”班，大概是四、五年级的时候，同学们约我参加“要理”班，这个班讲的是天主教的教义，也参观天主教堂的仪式——“弥撒”。天主教的“弥撒”很隆重，肃穆，比我家的“灶王爷”要气派得多，就这样我信奉了天主教，成了一个小教徒。天主教每周六都是忏悔日，信徒们要到一个小屋子里忏悔做了哪些坏事，或有了哪些坏思想，包括你的隐私都要暴露给“神父”。利用“神父”当特务是最好不过的了，“牛虻”那本小说就有这么一段故事吧，哪管他们是亲生父子啊，小学毕业以后我考上了中学，再也没有进过教堂，时间久了，我忘记了天主教，天主教也忘记了我，但在我的人生里毕竟有这么一段经历，所以在参加革命以后写自传时向组织交代了，认为这是一个污点，现在我认为向组织交代是对的，不能算是什么污点吧。

全面发展教育的小学

小学我念了八年，在这所华北小学我念了四年，这四年的学习对我太重要了，在这所学校，老师给我很多好的东西，好的营养培育了我，

伪满初期，那时的小学保留了不少旧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依我看这所学校实施的是全面发展教育，设课是全面的。文化知识、音、体、美，样样都有，而且实施得都很认真，可以说是今天强调的素质教育吧。

我的语文、数学老师是李凤鸣，他至少教我三年书，他的教学非常认真，非常严格，在他的教育下，我长进很快。那的作文课的作文要用毛笔小楷写下来才能交卷，老师批改要用红色笔，批的很认真，好的地方给你画上圈，不好的地方给改写或画叉，最后还有个总批语。数学课开始我学的不好，但在他的启发下，我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我的劲头上来了，他是我终身忘不了的一位好老师。

我的音乐老师是一位孙老师，他的年龄在当时看比较老一些，他是一位令人严肃可敬的老师，。他边弹琴，边教唱，边教你识谱，上他一年的音乐课后，我可以独立识谱，拿起歌片，就能自学自唱了，他教唱的“吹泡泡”至今我还能唱下来：

“吹泡泡，泡泡向天飞，清风送你上云去，放心飞去，莫飞回”。

我的孙子张天正，念完了小学，也上过音乐课，但其学习效果太差了，成绩单上写个“优”我一点也看不出他的唱歌优在什么地方。

我的体育老师姓陈，可能叫陈占元，这位老师上课一丝不苟，做体操每个动作必须到位，作体育游戏，就得满头大汗，一堂体育课安排得很和谐，大家都愿意上体育课，可以说是快乐的体育课。

美术课，不仅要画画，还要做手工，我记得一个手工作业是用铁丝做一个小筐，和市场卖的差不多，很适用可以装东西，这个作业我记忆犹新，现在我的孙子念完了小学他会做吗？

三年级的时候，学校还有“童子军”训练，童子军的服装很漂亮，帽子和鞋子都是统一式样，后来取消了，大概是日本人不让搞了吧！

那时的学校很注意品德教育，校长由述孔老先生亲身讲授“修身”课，这是一位既严又慈的好老师，他给我们讲“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至今我还能背下来，这句话对不对，另当别论。

学校课外活动很活跃，那时小学好玩小皮球，可以当篮球打，也可以当足球踢，一群孩子分成两伙，就比赛起来，我喜欢竞争体育，争输赢。对一个人的成长太有好处了，我认为一个人总得爱好一项体育活动，而能爱好群争，群斗的像篮球、足球这样项目是再好不过的了。

讲演比赛

在我读五年级时候，学校组织了讲演比赛，稿子可以自己写，也可以找一篇别人写的也行，起初我没想参加比赛，后来，临比赛日期很近了，我的班长张玉斌同学找我，说他有一篇稿子不用了，你要讲就给你吧，他另有一篇稿子了。既然有了稿子，我就试试吧，就用那篇稿子报名参加了。

这是我一生第一次参加讲演比赛，也只有这一次，比赛那天，会场上人很多，连女校的学生也参加了，座位都占满了，评委老师坐在前排，讲演要怎样讲我不知道，临上场时老师嘱咐几句，不要慌，要注意吸引听众，注意声调手势等等，该我上场了，我登上讲台，少停片刻没发言，人们就开始注视我了，怎么不讲呢？我就这样吸引他们。接着我就讲起来，我的声音比较动听，加上抑扬顿挫，手势配合，我感到听众被我征服了。当结束时，听众鼓着热烈地掌声，我成功了。这同我喜欢唱歌有关。唱歌要有一个好嗓子，还要动情，讲演也同样，我感谢我的爹妈给我一个好嗓子，“公鸭嗓”谁愿意听呢？讲演比赛结束了，评委评定我获第一名。我的班长张玉斌获第二名。我感谢他给我发挥才智的机会。

学校教育，特别是小学教育，应该组织一些适合少年特点的一些有益活动，不要把孩子都关在教室里，都绑在课桌上，做父母也要注意培养孩子多样兴趣。对孩子成长很有好处。

我是中国人的觉悟

我生在日本人统治下的旅顺口，在童年时也知道我们是中国

人，但为什么日本人到我们这里来，也没有人告诉我。

1937 年读小学四年级时，抗日战争爆发了，我从父亲们的议论中，知道日本人和中国人打起来了，我父亲的同事们对中国的廿九路军的英勇杀敌，宋哲元军队的大刀片如何厉害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父亲的同事们虽然在伪满做事，但从他们的言谈中可以感到他们希望早一天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抗日的烈火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也碰出了火星，应该说在这个时候我才明白我是一个中国人——一个有了觉悟的中国人。也就是在这一年我的四叔走向抗战，走向革命，当然，我们家谁也不知道，他在哪一边，是死是活，父亲老是叨咕着这件事情，他去打日本鬼子去了，也曾提起过他在学生时期曾有过的抗日活动。这些在我的心灵里也仿佛产生了要抗日的心气。

我当过日本人的家教

在我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父亲说有一位日本人要学中国话，要找一位小教师，你去行不行。我答应了，一个星期两次课，每次一小时。有酬劳动，一个月也能赚个 10 元钱左右。当日本人的家教，从中也可以锻炼我的日语能力，也就半年时间，那位日本人调走了，家教也就停止了，半年的时间，我对日本人的家庭生活的习俗有了初步了解，他们很讲究礼貌，很讲究卫生，待人也很和蔼，这时候的日本人就不摆出那副法西斯的样子了。对我也很尊重。既然是个小学生，这半年的家教，对我也是个锻炼，对我的成长不无好处。

小学毕业

1938 年末，我读完了小学六年的课程，其实我念了八年书，我 15 岁了，我以比较优秀的成绩读完了小学，并代表全班领取毕业证书，那时这个小学，每年只有一个班级毕业。不像现在学生很多，为了领取毕业证书，老师还亲自训一把，怎样走步，怎样前进

一步，怎样后退一步，这是为了给毕业典礼增加庄重的氛围。

小学的几个年头，我走的是一条曲折的道路，念过两个小学，从不好好念书，到发奋读书，从名落孙山到榜列前茅，这些都得到了父亲、老师的严格管教，按我的天性贪玩，随其自然发展，肯定要落个“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句话是对的。

我的小学是快乐的。我是个觉悟晚的小学生。

四、中学生

考上了中学

1939 年的春天，该读中学了，小学毕业后要报名参加中学的入学考试，齐齐哈尔有三所四年制的国民高等学校，人称国高，还有一所私立的龙江国高是三年制的，只有四年制的国高毕业后才可以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另外还有一所师道学校，也是三年制的，这些学校都是男校。女校也有两所国高。二高是当时最好的学校了，我当然要报考这所学校，为了防备落考我还报考了龙江国高，也就是原来私立的华北中学，是商科，为了好谋就业。考试结果，两所学校我都考取了，成绩都榜列前十名，我的小学校长由述孔老先生，亲自找我谈话，鼓励我上二高，还要考上大学。

1939 年的春天，我入学齐齐哈尔第二国民高等学校，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它的前身是清朝光绪年间 1908 年初建的工学堂。旧中国改为工业学校，伪满初期也是工业学校，就是我同宗叔叔张有昌任校长的那所学校。我入学的二高仍是工科，我报考的是机械科，这所学校只有两个学科，另一个就是土木科，我入学后才晓得土木科师资力量较强，而机械科只有一、两名专业老师，在这里学机械是难有成就的。

住宿生

入学一年级时，我家住在市区安裕胡同 11 号，每天走读上下

学。1940年春，父亲任大民屯警察署长，我的家就搬到大民屯去了，大民屯距市区只有廿里路，我先是试骑自行车上、下学，以减轻家庭负担，但试骑一个星期，我的屁股就磨破了，走读失败，只好寄宿于学校了。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独立生活，那时我16岁了，离开父母到学校住宿，对我的成长，可以说是关键的一步。

这所学校的学生宿舍很简陋，一个四十平方米的大房子花园里，靠墙边搭成两层大板铺，一个屋子里要装三、四十人，每个人只有一床褥子那么大块地方，房子的前面是一趟带盖的走廊，屋子里就难见阳光，阴暗潮湿。

食堂也很简陋，因为二高、三高同在一个院子里，两个学校的住宿生就同在一个食堂吃饭，估计也得有二百人左右，几十张长条桌，摆上几十条板凳，挤在一起吃饭，包米楂子粥，高粱米干饭，土豆白菜是家常便饭，一个月能吃上一、两顿馒头就很不错了，我记得吃饭时要有一位舍监老师陪餐，其中有一位老师叫张临清，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常常吃着饭就把碗、筷放下，拿起笔来就写一段，也不知他写些什么。解放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爱国者，后来他参加了中国民主民盟，同我是一个党派了。他出一本诗集“葵园集”曾赠我一本，其中有一首诗是写给我的。

附：：

浪 淘 沙

张 临 清

游龙沙公园赠张元士

蝴蝶舞翩翩，
人笑花妍。
新秋风景雨晴天。
十载忧心今放眼，
无数青山。

脱去旧衫，
一展眉宽。
诗思清隽到云端。
同写复活新历史，
寄天安。

选自张临清《葵园集》（1990年）。张临清（1909--1983）原名张万兆，早年毕业于吉林高师国文科，1941年来齐任教。

解放后，历任齐市临时参议员、行政委员、政协委员；联合中学、齐一师和省高中教导主任；北安农校和克东一中语文教师。

1960年以后，先后在齐师院中文系和图书馆工作。民盟盟员。

1979年，张元士组织民盟盟员游龙沙公园，作者赠诗一首。

伙食是由学生自己办，一个月选一次伙食委员会和伙食长，伙食长都是由高年级学生担任，到四年级时候，我也当过一次伙食长，伙食长是给大家服务的，但也有特权，每当月底结帐时可以吃一顿油饼、猪肉粉条汤，但还得小心点儿，如果当月伙食大家不满意，就要闹成一场油饼大战了，这样的事情是发生过的。

患上了疥疮

在孩提时期，我就好尿床，这是一种懒病，在家的時候，母亲可以叫我“撒尿”，但住宿了就没人叫我了。就这样，我住宿就时有尿床的时候，尿床是丢人的事，褥子又不愿意拿到外面去晒，这样我就得睡在湿床上，那时候宿舍里放一个尿桶，可是我又住在二层铺上，有尿就硬挺着不尿，就增加了尿床的次数，日久我就患上了疥疮。那是中学二年级刚住宿的那一年，没办法，我只好回家治病“疥是一条龙，先从手上行，腰上绕三遍，屁股根上扎老营”这个全过程我都经历了，真是一个痛苦过程，咎由自取，全是懒惰造成的，痛定思痛，从那以后，我力克惰性，也就很少尿床了。

伪满的中学教育

伪满的中学教育实际上是职业教育，即农、工、商教育，或是师范教育，这种中学教育还不如家乡的高公的中学教育，那是可以全面提高文化水平，而职业教育就是培养普通文化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

奴化教育是伪满中学教育的唯一特色，每天早晨的早课就是列队，面对东方，“遥拜”日本天皇，中文课说成是满语课，日本人当校长，一些没有多少文化的日本浪人。也可以去当中学的教师，随便凌辱中国学生，我所在的二高虽然是齐市的最好的学校，但它的设课、设施、教学水平并不算好。要想在这里学得一技之长，那是很困难的，完全靠课堂上学到的那点东西，要想考大学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在这里毕业的学生考上大学的真是屈指可数了，在我上一个年级只有王文玉一人，他考上了“新京工业大学”。

我所在的班级，入学时有 50 人，念到中途就有的人不念了，去关内就读的，还有两个人通过关系去日本读书了，还有几个不知去向，当我们毕业时也就剩下 40 人左右。这 40 个人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是要考大学的，人不太多，剩下的就是对付到毕业就行了。到考试时，就临阵磨枪，有的就得打小抄了，其中一部分人对找女朋友很热衷，对象当然是女高学生了，常常是尾随女高学生，送送情书，也真有搞成的，玩一些日子再散也不少。总之，中学四年的学习风气不好。当然，仇恨日本人的情绪都是有的，把日本人校长上西操，叫“三块豆腐”，因为他个子很矮小，也发生过“夜袭”上西操事件。

中学时期的学生，风华正茂，可是这里的学生心情压抑、仇恨，青春年华多是浪费了。如果说，我的小学生活是快乐的，那么中学生活主要是沉默。

备考大学

念完中学，我的父亲和老师都希望我能考上大学，在这个班级

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前面，尤其是住宿以后，我和一部分同学，早起晚睡攻读课外课程了，那时的“查理斯密”小代数、“温德华士几何学”都要从头到尾演一遍。还不够就学日本人的“チセト代数”“登龙几何”我的数学大有进步。

伪满时期考大学，身体检查很严，要检出“沙眼”视为传染病，就别想考上了，为过这一关，从三年级开始，每天课后都要去一家私人医院，父亲认识这个医院的院长。院长的小姨子是护士，由她天天洗。有一次，我去晚了，她正在做饭，看我去了，就放下炊事，赶忙给我洗眼睛，没想到她的手染上辣椒。哎呀！好辣呀！这一“呀”，她的脸红了。至今，我还能忆起她那不好意思的面庞。后来，由于效果不太好，我又转到“车安医院”用的是兰矾，也就是硫酸铜吧，总算过关了，那位女护士给我洗了一年的沙眼，能一点感情也没有吗？她的姐夫曾向父亲提起过我和她的婚姻问题，虽然没成，也总算有那么一段情缘，情缘是美好的，温馨的。

我的衣着太差了

中学生的服装，那个时候好象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中学生都要穿一套毛料衣服，一般是哔叽的，帽子都是带沿两道白杠，以示是二高的学生，衣着都是黄绿色的，冬季都要有一件黄绿色的大衣，要置全这一套行头，也得花上百元钱吧！对此我的父亲很刻薄，硬是不给买，也不是买不起，而我只能穿上黄绿色的布衣了，而穿不上毛料的了，那大衣呢？我父亲认识当时被服厂的师傅，从他那里弄来一件很不合我体的呢子大衣，背后还有一条横带。我一穿这条横带就落在屁股上了，这太难看了，而遭到同学们的要笑，我也就不穿了。其实改一改不行吗？弄得合体一点不行吗？就是这样也没做到。我的衣着就这样对付到毕业。现在想起来这也太寒酸了。好在，我这个人对此不太在乎。直到现在我对衣着也不怎么讲究，没有象样的衣服。这不算美德，人常说“人是衣服，马是鞍”，人

的衣着还是要讲究的。它能体现一个人的风貌，给人一和谐、美感还是对的。当然不必追求华丽就是了。我记得有一次，是在哈尔滨出席民盟黑龙江的代表大会，那是 1958 年的事了吧，我穿着一身当时化校奖给学生和老师每人一套兰布衣服。出席会议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几乎都是西服革履，而我这套打扮与他们为伍，就觉得太不和谐了。这时，我才觉得衣服也得讲究在什么场合，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你看，现在的江泽民，胡锦涛他们出席军队的会议不是都换上黄绿色的立领的服装吗？而不是翻领的西装了。

我爱好音乐、体育

我喜欢音乐，但没有一件乐器。父亲是不会给我买这些东西，在他看来玩弄这些东西都是不务正业，是要丧志的。但是我会吹笛子、会吹萧，也吹过黑管，都是借用人家的。弦乐如胡琴、提琴等也能奏出个调子尽管很不是味道。那么什么乐器也不用，就是唱歌了。在中学生时代的流行歌曲，几乎我都会唱。“何日君再来”、“天涯歌女”、“夜半歌声”、“黄河之恋”等等我都会唱，而且很好听。对京剧的调子，我很喜欢，我觉得京剧的曲调，很能表达人的情感。可惜我没学会它的曲、拍。文革期间，出了几个样板戏，曲调很好。那时流行唱样板戏，“红灯记”里几首，唱，我也能唱下来。那时我家住在全福胡同的东宿舍。在一个星期天，那天停电，我唱起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邻居，周大夫家里听见了，就问：停电了怎么张校长家的电匣子还唱呢？可见我的功夫了。有时，我也常想着，我要是学唱戏，也许能成为一个名角吧！这些都得益于我的小学音乐老师——孙老师。到老了，我决不放弃任何一个大合唱的机会，可惜齐大的老干部处，在这方面组织得太少了。

我更爱好体育运动。从小学我就爱好体育运动，特别是竞技体育。到了中学，凡有机会我从不放过。但由于身材矮小，就难以入选班队，校队，甚为遗憾。各种球类运动我都试过，比较好一点的

是篮球，足球我也踢过，而且在比赛中，曾踢进一球，引为骄傲，终身不忘。在二高这所学校的排球，在伪满打过全国中学比赛，获得冠军，教练是朱玉珉老师，那时，我们很尊重他，抗战胜利后，我们有联系，后来他去台湾，80年代中期，他来过齐齐哈尔并合影留念。

大概是中学四年级，全市中学举行体育运动大会，有一项比赛就是“马拉松”，报名就可以参加，平时，我也没练过长跑，但我觉得是一次机会，我就报名参加了。路程是从师道学校的体育场（现在的二中）。跑到大民屯一个来回。总有20多公里吧，一声令下，那么多人绕场一周出发了，很壮观，跑到中途我就落后了，有不少人中途退出比赛，我和几个落伍者，坚持跑到大民屯，领了一条红带子往回跑，越跑拉得越远。跑在前面的人已经进场，再绕场一周，马拉松比赛就算结束了。而开始进行其他项目，可是，我们几个落伍者，刚跑回学校门口，就听到场上响起喇叭声：场上比赛暂停，欢迎马拉松比赛的最后队伍，我们几个人一进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同样也绕场一周，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们几个人身上，仿佛是说：好样的，跑回来了，这是我的感觉，不是耻辱。我想，我们这一出，应该成为运动会的一道亮点，一个花絮。

体育运动能治痢疾

我在中学四年级的时候，突然患了一次赤色痢疾，肚子痛、发高烧，怎么办呢？那时的学校没有医务所，什么药能治我也不知道，到医院我没想过。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挺着肚子痛、高烧就拿起一个篮球，我一个人从这个篮球架，跑到那个篮球架，足有半个小时，我出了一身透汗，我觉得烧退了。肚子也不怎么痛了，进厕所的次数也少了，到第二天我的痢疾症状全消失了，这是个奇迹，但这是真的。

从此，我相信，人生病了，不一定都需要吃药，靠自身的力量

能够战胜病菌的。我也觉得，我这个人抗病的能力就是强，我战胜过麻疹，疥疮，赤痢，都是很厉害的病，痢疾病能致人于死地的。我知道日本人就很害怕痢疾的。大家都知道，在我中年时期，患过肝病，而达到初期硬化，都腹水了，我也过来了，当然岳父的一剂丸药很起作用，不过也说明我的抗病能力不一般吧！

中学毕业

1942 年的冬天，我读完了中学四年的课程该毕业了，按原来的学校计划，毕业要有一次旅行，到日本国去，可是由于战争的局势改变计划，在东北几个城市走了半个多月就算了事，也就是哈尔滨，吉林，长春和沈阳，连大连都没有去，那年我满 18 岁。

中学四年，值得回味的东西不多，由于住宿，我和外县来的同学交往就多一些，就亲密一些。张雨华来自白城子，后来他考上法大，也是在长春，还有马树长、马斌，他们都来自讷河，家境比较好，李成章，李明章不是哥俩，都跟我很好，后来李明章去关内走了，还有在小学我们就是同学的宋延亭，荣英杰，到老了，想起他们，就引起中学生活回忆，马树长是革命烈士，在讷河就义，讷河烈士馆有他的事迹记载。荣英杰到台湾去了，朱玉珉老师回齐时谈及他的情况，张雨华和我都在齐齐哈尔，常相聚，话题总是中学生活多一些，辛酸多于快乐。

中学四年我的学习成绩在这个班里，算是好的，我的学习比较努力，但不刻苦，优势在于记忆较强，四年成绩总和，在全班我算第一名，这给我报考大学创造了条件。伪满报考大学要把中学四年级的成绩和操行鉴定都要报送到你要报考的学校，在中学不考在前面的学生就推荐不上去，考试资格就没有了，在毕业前夕，我得到了“新京工业大学”的“受验票”也就是准考证，那年二高毕业两个班，得到这个大学准考证的只有两个人，另一个是土木科的张占庆。

五、大学生

我又考上了两所学校

1942 年的年末，是伪满大学入学考试的日期。隆冬季节，我带好准考证和旅行用具，只身一人乘火车，提前一天到了长春。我在旧城二道街附近找了一家旅店，安排好住处，就去找“新京工业大学”的地址。我看见了学校的校舍和周围环境，教学本馆四层大楼，样式很美，我憧憬能在这里读上大学。

第二天我准时进入考场，经过两天考试——笔试，我觉得发挥的不好，估计各科成绩也就是勉强及格吧，日语成绩要稍好一些，考试的第三天是身体检查，确实很严，各部位都查个遍，我最担心的就是沙眼这一关，谢天谢地总算过去了，为这一关，我几乎用了两年的时间，经历了两所医院，我感谢为我治疗的人们。最后一天是口试，面试，这一关是很难过的，主要是口试日语了，当时有五六个考官坐成一排，而我就象受审一样坐在他们的对面，大约经历了 20 分钟左右才考完，他们提出的问题很宽，包括家庭成员状况，及时事等方面的问题，我得益于日语会话能力，可以说是对答如流，从考官的表情上看来，他们是很满意的，其中有一个问题是问我几个叔叔，他们都是做什么？我回答四叔时，只说到大学毕业后在大连船坞工作，他们没再追问下去。这一关，我过的很好。

在报考工大的同时，我还报考了伪满军官学校，那是怕考不上工大，作预备的，免服兵役，当兵不如当军官吗！考军官学校在齐齐哈尔有考场，可见伪满要考军官学校的学生还是不少的。

1943 年的一月份，两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都来了，我当然要入“新京工业大学”了，只是所学的专业是由机械科改为冶金科了，这可能是因为我的笔试不太好吧。那一年，我中学毕业那个班，只有两个人考上了大学，另一个就是张雨华，他考的是法大，可见在伪满考上大学是很不容易，那时候日本对中国人上大学控制很严，

能考上的算是状元及第了。入学以后，我才知道，伪满的国立工业大学，竟被日本学生占领了，这所学校的学生 80%以上是日本人，等于是给日本学生办的学校了，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殖民政策的体现，也是日本一种殖民政策。

大学的生活

1943 年春节过后，又是只身到长春工业大学入学，不像现在的孩子。还要父母陪送，办完入学手续，由上班生的中国学生照顾，安排好宿舍。我记得是土木科的陈赞堯老大哥领我到宿舍的，他是龙江县七棵树村人，毕业后在齐齐哈尔市政工程处工作，他早已去世了，他的小儿子陈集在轻院毕业留校任教，已是教授了。

这所学校的教学本馆和学生宿舍不在一处，本馆与宿舍距离要步行 20 分钟左右时间，教学大楼很漂亮，近万平方米的四层楼房，教室采光明亮。宿舍楼有四栋，都是二层，其居室完全是日本式的，每室有八块垫子，日本叫“踏踏密”，居室隔着走廊对面就是自习室。每人一张二屉桌子，和一把椅子。桌子上面有书架和吊灯，这样的条件，比起中学时期的宿舍，真是天壤之别了，宿舍区设有一个大食堂和浴池，还有一个健身房来搞武士道训练的，这一切都是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建造的。

这一期同我一起考上工大冶金科的只有我和刘长林两个人，刘长林是长春二高毕业的，我们同住在冶金科的学生宿舍，可是我们不能同住一个居室，我们都要和上期同科学生住在一起，因为我们同班的日本学生要在一年后才能入学，他们不需要入预科。

每次新生入学，就像节日一般，要庆贺热闹一番，但当天晚上就要当心了，上班生告诉我们今晚小心点儿，半夜就要刮起“暴风雪”也就是“STORM”，日本话说“ ストム”。果然，半夜一阵喊叫声，惊天动地，一群人进来了，他们穿着和服，头上围着毛巾，有拿酒瓶子的，有敲洗脸盆的，手舞足蹈，边喊边叫，冲进每个居

室，这时你就得迎上去，也跟着喊叫，否则就要挨骂挨打了，这几乎成了这所学校每逢节日、庆典必不可少的传统节目了。

入学后的头两年，我们和日本学生都吃一样的伙食，日本人的饭菜，大米饭，酱汤都是餐餐少不了的，头一年还可以吃个饱，第二年就不行了，大米饭里掺黄豆了，饭量也不足了，我们只好到南岭小街吃煎饼。日本人也一样，日本人为了多吃大米。就发生了第一次分伙斗争，他们叫中国学生吃高粱米。由于同学们罢餐抗争，我们胜利了，没有分成。但因此开除了一位中国学生，第二次分伙是在三年级的春季，虽然我们也进行过抗争，但在日本人的高压下，我们中国学生忍气单独办伙了，这已经是 1945 年的春季，日本人快完蛋了，分伙激起中国学生的愤怒与觉悟，人总是在压迫下觉悟的。

预科学习，不外是数学、物理和日本语文课，我们这期的预科班共有 60 人左右，其中还有朝鲜人和日本人，讲数学和物理的先生都是中国人，但得用日语讲课，预科学习一年，提高了文化水平，还是很有必要的。

这所学校一年放三次假，春假，暑假和寒假，春假是四月份，时间不长，不过两周，第一个春假我回家了，回到达呼店农村，

第一个暑假，1943 年的夏季，全校学生都去宁安县的东边道的原始森林，“勤劳奉仕”修筑日本人的备战公路，火车开到道河站就是终点了，这里是一片森林。

下了火车，就开始“行军”每个人都要背上大米，锅灶等餐具和食品，在原始的大森林里，整整走了一夜，这次我可尝到边走路边睡觉的滋味了。修一段路，还要再行军，在一次行军中，天刚亮，我看到了一位中国劳工被绑在大树上，这一夜的蚊虫叮咬，他是何等痛苦过来的呢，日本人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我们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这一次，“勤劳奉仕”有一位日本学生患了痢疾，死在

那里。

1944 年的春天，进入本科学习，从日本招来的学生，在冶金科这个班不过 20 多个人，加上我和刘长林，全班不超过 25 个学生，冶金科的中国学生一直很少，四个年级加在一起，在我入学时只有 8 个人，后来入学的两期稍多一点，在这里学习的中国学生很团结，互相照顾，相互勉励，学好技术，准备报国，我们心照不宣，日本人快要完蛋了。

和日本学生在一起学习，我们中国学生不比他们差，在一次金相学的考试中，我的成绩在这个班级里算是最好的了，日本教授在总结这次考试时，训斥了日本学生，说你们还赶不上张元士，真是可耻。本科的学习任务很重，有基础课，专业基础理论课，总的看我的智商跟得上，并不落后，这里学习的突出特点，很多课程没有指定的教科书，我们的学习主要是靠笔记，课后，就是读参考书，整理笔记，主要是靠自学了，星期天到街上主要是去书店买参考书。这里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

当时，这所学校的体育课已改为军训课了，每周一次军训，累得你要命，在二年级也就是 1944 年还有一次兵营生活，日本学生去日本部队了，我们中国人则集中到热河——承德伪军兵营，夜间有一次紧急集合演习，说是八路军来了，可见当时的日本人已经把八路军做为主攻对象了，这同四叔回忆的当时抗战形势是一致的，（见大连日报登载的四叔文章）如果当时真的和八路军对峙起来，我想，我们这些中国学生一定会倒向八路军的。

大学的课外活动很枯燥，只是在节日庆典活动开展文艺活动，在 1944 年的新生入学文艺晚会上，我被班级推荐上台唱歌，我唱了“十字街头”影片的插曲：“郎里格郎”大意是：人生好比上战场，没有钱也得吃碗饭、住间房、遇到了一位好姑娘，不用悲，不用伤，努力干一场，老板娘怪模样……等等，我唱得很激情，博

得了喝彩声和掌声。晚年，同学集合，沈迪文同学说，我现在还能想起你当时唱歌的情景。应该说，比起其他“靡靡之音”，这首歌在当时也算是有点进步的意思。

我读过禁书

进入本科学习，我接触了一些思想较进步的中国学生，最先与我发生读禁书联系的是土木科的刘植田，我们单独联系，我读过“爱国者”（日文版）讲的是一位中国学者，在日本有了妻室，抗战后，毅然与妻子分开，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主人公同郭沫若先生的经历相似，也许写的就是他，还有“新生活运动”讲的是文明礼貌与政府的举措等，从中可以了解中国内地的生活情形，也觉得很新鲜。另外就是巴金等文学作品，那时巴金的书已被列为禁书了。

在这所学校，曾发生过因读禁书而被捕的事件，也有过“读书会”的组织，我的同事董连毅先生，就是因为参加读书会被捕入狱的，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读禁书还在蔓延，仍在地下活动。解放以后，我才知道刘植田是国民党的地下党员，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为国捐躯了，他是一位爱国者。

冶金科中国学生的集会

1944 年的夏秋之际，我们冶金科的中国学生加上预科生一共十二人，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分头到预科生杨姓的家集会，这是一次带有政治性的集会，我们上期生白家声是这次集会的主要人物。白家声是一位非常沉稳，平时很少说话的人，但在这次集会上，他大讲中国的抗战形势，日本人快要垮台了，讲了我们的任务要收集有关科学资料，好好学习，准备报国等等，我们都很兴奋议论起来，在杨家吃了晚饭，又是先后离开杨家。这次集会使我们感到抗战胜利的希望，我们报国的日子就要到了。解放后，我从同学那里知道，那时的白家声已经是国民党的地下党员，解放战争后，他作为锦州市国民党的骨干分子，被我方捕获入狱的，据说是病死

在狱中。但我认为他不失为一个爱国者，他是抗战的青年学生，在抗日烽火年代的青年，有的在共产党一边，有的在国民党一边，但他们的共同愿望就是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都是爱国者，都是好样的。

又一次“勤劳奉仕”

1944年暑期，学校组织“勤劳奉仕”，这次与上次不同，中国学生在一起到孙吴县修筑公路，当然也是日本人的备战公路了，日本学生上哪去了呢？大概是去兵营了，这次劳动，不过是给公路添添沙子，在这次劳动中，我们看到了鄂伦春族人的生活情形，他们确实把孩子的摇车挂在树上，孙吴县与隔岸的苏联相望。那时，我们对苏联一无所知，同样，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侵略隔岸的大片土地也一无所知，这就是殖民年代的伪满大学生的悲哀，日本人就是叫你忘记中国及其历史，不知道是中国人才好呢。现在台湾的台独分子干的就是日本人干的那一套，他们能得逞吗？我看办不到，今天的中国早已今非昔比了。

刘长林被捕

1945年春假前的一个夜间，刘长林被捕了，冶金科的几位中国学生都很紧张，不知是什么原因，而在全校的中国学生这次也只有他一人，不像那次读书会捕了那么多中国学生。毕竟在这之前，冶金科的同学有一次集会，我们深怕他供出来实情。刘长林是吉林省农安县人，为人很老实，我和他的关系密切，他什么事也都对我讲，他告诉我，他上大学后，就和一位地主的姑娘结婚了，这位新娘常常来长春看他，我也见过她，长相显老，不漂亮，但她家有钱，有地，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成亲了呢，还是早有婚约？我不知道，因为她常来长春，刘长林在课外也就常出去，有时就夜不归宿了，这可能是遭到日本人怀疑之因吧。其他，我还看不出他有什么反满抗日的活动，连禁书他也未读过。

刘长林被捕后，就是春假了，春假后，学校决定我去本溪制铁厂实习，时间要长一些，为做准备，这次春假我回家了，为办半价票，我去学生科办证件，一进学生科门，我就发现在学生科的黑板上写了张元士的名字，我很吃惊，这是否与刘长林被捕有关呢？我故作镇静，也不去问有啥事，办完了事，我心理琢磨着，我已被日本人纳入视线了，也有被捕的可能，确实心情不稳，在回家的火车上，我注意周围是否有人跟着，到了齐齐哈尔我对朝珍谈起这件事，要做精神准备。

春假后，我和朝珍一起来到长春，那是因为她报考长春的中医学院，参加考试。回到学校以后，看不出什么动静，我的心才稳定下来，到了六月份，我就去本溪钢铁公司实习了，事实证明，刘长林是好样的，他在狱中遭受日本人的毒打，他一只胳膊打成残废了，他没有供出那次集会，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刘长林，胜利后，刘长林出狱了，回到了学校，我的下期生王树人，沈迪文都见到他了，是他们告诉我刘长林的出狱后的情形，我很怀念刘长林，我的好同学。工大同学几次长春集会，都没有见到他，据说他早已不在人间了。

两次生产实习

大学念了三年，有两次生产实习机会，还不算少，日本人的大学教育，倒很注意接触生产实际。

第一次是 1944 年的冬季，我被分到抚顺制铁厂，伪满的大学生产实习，几乎都是一个人去一个地方，这个工厂主要是制铁与炼钢，我所在的部位是电炉炼制海绵铁，因为有了那次集会，我很注意记录有关资料，也绘制了一些图纸，但是这个厂子整个技术都是日本人掌管，很难拿到机密资料。抚顺这个城市当时给我的印象很不好，污染太厉害，每天早晨烟尘太重，让人喘不过气来。

第二次实习是 1945 年的六月份，我被分到本溪钢铁公司，在

宫原一号高炉，这次也是我只身一人来到这里，同时来的还有哈尔滨工大的一名电科学生，我们两个人同住一个宿舍，当然也睡在“踏榻密”上，这次实习时间比较长，我几乎每天都专攻在一号高炉上，当然要收集各种数据与资料。这个厂子很大，自己发电，自己炼焦炭，但主要是炼铁，以矿石为原料，中国工人很多，工厂专为工人建了工人住宅区，一片红砖房，排在山坡上。这里同样是日本人掌握技术，见不到中国工程师，干脏活、累活都是中国人，光着膀子，汗流浹背，真苦呀，尤其是出铁的时候。

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投降了，我在这个工厂里同工人们一起欢呼抗战胜利，当时我的想法是工厂是我们中国人的了，我应该留在这里，以技术报国，日本人都跑了，那时，中国人学冶金得太少了，义不容辞，我应该留下。但一等再等没人理睬，快一个月了，工厂的烟火熄灭了，机器都不动了，一片凄凉。这时，我才想离开本溪去长春，而不是回家，

我的大学生活就这样结束了，在胜利后的狂欢中，在困惑的彷徨中结束了我的大学生活。

六、胜利后的困惑与彷徨

回到长春的日子里

抗战胜利后，我在本溪宫原钢铁厂足足等了一个月，我的愿望破灭了。那位和我一起实习的哈工大学生早已走掉了。在本溪有一位我的下期土木科同学，他的家好像是开当铺的，我就把我的衣物存放在那个当铺里了，早已成为死当了。我记得在他家住过几天，还吃过苏子叶饼，也算是本溪的特色食品，一生中我只吃过一次这样的食品。

1945年的9月中旬，好不容易回到了长春。工大的校舍也被苏军占领了，并从那里拉走了机器。我又去“兰樱寮”那个学生宿舍，房子还在，但屋子里被捣得乱七八糟。凡是老百姓能用的东西都一

扫而光了。满地都是散乱的书籍。我从中选捡了一些，我认为有用的书离开了这里。没地方去我只好去张有昌叔叔家。他是我的同宗叔叔，其夫人是我奶奶的亲侄女，我叫姑姑。凭着关系他们对我一直很好。在工大读书期间，我常去那里，每次都为我做些好吃的。我没有忘记他们对我的关照。在这里我住了几天，每天都出去找同学。有一天，我遇到了上期生已毕业的范化民同学。他约我到他家去。他的家在九台县的一个农村，松花江畔，离长春很近。这样，我们一同去他的家。胜利后的中国青年，怎能在家闲呆呢？范化民就常去长春探听情况。有一次他回来说在长春有个“竹中工务店”是日本人留下的包工房子。在那里有姜忠贤（后改名姜伸）、赵同两位同学在那里筹办“青年学会”。我一听很好，我们就一同去长春，找到姜伸、赵同，从此，我和范化民都住在这里，和他们一起张罗“青年学会”事宜。赵同家在长春不在这里住，范化民家离长春很近，也不常住在这里。姜伸是丹东人，他和我就是这里的常客了。

住在“竹中工务店”的差不多都是暂时回不去家的青年学子。其中几位是伪满被日本人逮捕的刚出狱的青年，多是伪满的大学生，有建大的、军官学校的。而齐齐哈尔的有几个：王祖鹤与夫人，常吉、刘玉书等。我和王祖鹤就是在这里认识的。常吉是军官学校学生时被日本人逮捕。王祖鹤的当时夫人曾是常吉的恋人。后来王祖鹤割爱，还恋人于常吉，都是自愿的。

这么一些人在一起商量怎样办“青年学会”，经协商，这个“学会”既不国民党，也不共产党，而是搞学术研究。实际上这里的人，有的是倾向国民党，有的是倾向于共产党。就这样把“青年学会”的牌子挂出去了。这个“学会”分两个部。一个是社会科学部，一个是自然科学部。我们工大的同学当然是自然科学部的主要成员了。社会科学部是建大、军官学校那部分人了。

到10月中旬，我们自然科学部的人就多起来了，最多时能达到50人左右，而他们那边则很少。他们组织过几次报告会。有宣讲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有宣讲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的，他们都约我们听课，来争取我们这些人。但是有政治倾向的人是不甘心于寂寞的。后来，社会科学部的人就分道扬镳，各干各的实事去了。“竹中工务店”就成了原工大学生的独家店了。聚集在这里的工大学生愿意在这里继续学习。相继开了两门课程：高等数学和英语。我主要选学英语，当时只梦想学好英语，远洋深造。

人多了，吃饭就成了问题。我们找到了原工大冶金科毕业的李大哥（名字我记不清了），他在市公安局任临时差使，是他给我们弄来几袋高粱米，就这样多方求援维持生活。

到10月末，国民党接收大员到了长春。给我的印象很不好。他们穿着漂亮的军装，伴着女人在市场上抢购东西，令人反感。在接收大员的队伍中有一位原工大的学生，中途辍学去关内，他随大员们一起来长春接收。我们请他到我们这里开座谈会，并希望快点接收学校好复课。不错，过了几天来了一位大员，到“店”视察。我们正在上课，想请他讲话来个答学生问。没想到他一句话没说就走了。我们很失望。

大概是十一月初，苏联红军退出了工大校舍，我们要回学校上课了。闻景阳、朱士博和我三个人先去学校做上课前的清理工作。我们三个人住在冶金科实验室里。也就呆三天吧，苏军又回驻了，继续搬运学校的机器与设备。我们三个人也只好搬回工务店。

我们对苏军搬运学校的机器设备很反感。我还忘不了一件事，在工务店住的一个夜里，一伙苏军，在一位军官带领下，闯进我的屋子里，我的手表放在枕头旁边，那位军官伸手就把手表带在他的手脖子上，成了他的胜利品。这块手表是我父亲给我买的，是作为升大学的礼物，送给我的是日本“精工舍”的方形手表。这块表可

以说是有生以来父亲给我买的最珍贵的东西了。我很心痛。当时的苏联红军，应该说不是一支胜利文明之师。为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对东北老百姓做了多少艰苦的说服工作啊！我们也只能从全局着想，理解就是了。能服吗？联系今天驻日，驻韩美国大兵的胡作非为，能不激起两个民族的义愤而产生反美的情绪吗？美国大兵，早晚都得从那里滚蛋！

原工大的学生，在伪满时期就有加入国民党的。“竹中工务店”里的政治气氛越来越浓起来了。曾与我有联系的刘植田也来了，他劝我加入国民党，我婉言谢绝。当时的想法，国民党是正统，但共产党也不无道理，谁是谁非说不清楚。更主要的是我想继续读书，而不想参与政治。后来，这个“店”倾向于国民党的人，竟印起“中国之命运”了。

到了十二月份，天气冷了。一些没有回家的同学有点吃不住劲了。没有棉衣怎么过冬呢？还是找了那位李大哥，他与苏军有联系，就以为苏军清理仓库为名，干一个上午活，每人可以穿一套日本人留下来的劳工棉衣出来。就这样解决了过冬的服装。我回齐时，就是穿这套棉装回来的。

随着这里政治气氛日浓，上课也就不正常了，生活也难以维持下去。这时，我才想该回家了。其实在这里住的几个齐齐哈尔的人，早已回家了。我只好取道哈尔滨，因为那里可以找到同学，我找到同期生土木科的杜据田，在他家住了两天，他给我买双棉鞋，我准备逃荒回家了。第三天，在哈尔滨车站打听着一列货车要开往满洲里，当然是运输物资的了，我当时决定偷乘货车，爬上火车头的煤仓里。被司机发现，说明原由，就给予了关照。火车时走时停，又不时听到苏军的枪声，那是吓唬老百姓的。到了半夜，火车停在昂昂溪站了，我感谢司机一路照顾，跳下火车头，又是一阵枪声。凡是火车停下的时候，苏军总是要放枪的。在昂昂溪车站等到天亮

了，有往齐齐哈尔的毛驴车，我就坐上这样的车子回到了齐齐哈尔。身穿一身劳工棉袄棉裤，又没洗脸，真是一副逃难相。赶到赵家。那时，朝珍已当上小学教师，她没在家。从赵家知道我的家仍在达胡店。见爹娘心切，赵家留我不住。我先找到同学王文玉，当天下午日头快落了，我飞步出城，正碰上朝珍下班回来，她不顾苏军的不规行为之险送我到江边。四十里路，我走了四个半小时，当夜我就平安到家了。

我的爹娘意外地看见儿子回来，能不喜出往外吗？兵荒马乱的日子，四个月没有儿子的音信，能不提心吊胆吗？在警察署院子里人家都跑了，只有我这个家还住在这里。我问父亲说，为什么还不搬家进城？他说：“冬天了往哪儿搬？到哪儿都一样，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都四、五个月了，这不顶好呀！”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的日子。从这一天起到那年的年末，五个月的时间，我狂欢过，企盼过、困惑过、彷徨过，谁是谁非，中国向何处去我不清楚。但是，要继续读书，准备技术报国的念头，始终没有丢。

七、走向人生新的征程

走出校门，走向社会，走向人生新的征程。人的一生干什么，事业在那里，常常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是学冶金学科的，虽然没学完，但也学了三年，也积累了不少这方面书籍与资料，都没用上。我的技术报国的愿望破灭了。我从未想过做一名教师。“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那是旧社会留下的俗言。当教员注定一生清贫，是穷教员了。这些都是从个人利益考虑的人生哲学。处于中国大变革的年代，时局的变迁，我走上了教育岗位。当上了一名教员，中间也有机会离开教育岗位，但机会错过了。就这样，教育成为我的终生事业了。我做了六年教师，上教育学院深造一年，在省教育厅机关一年，参加组建原黑龙江省技术教育学校，继而调到

省化工学校（院）、轻工学院一干就是三十三年，而后告老回家。整整四十年啊！四十年的教育生活，辛勤耕耘，桃李满天下，我的技术报国愿望在弟子身上实现了。到了晚年，我可以说是无悔无怨了。

1、走向社会、走向革命

1946年春节过后，我家从农村迁至齐齐哈尔市区，住在王兆吉表叔同院的一座厢房里，屋子很窄小。整天无所事事，好在距离赵家很近，朝珍常来看我，我也常去赵家。我等待机会重返大学校园。朝珍还是做小学教师工作。

三月初，这时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已经到了齐齐哈尔。市区的中学都要开学了，但上课的教员却配不齐。原来的中学教师都到哪里去了呢？日本教师跑了，原籍不在齐齐哈尔市的教师也都归籍了。这样，学校有些课程就没人上了。学校的教师听说我在家无事，就找到我这里来了，约我做代课教员，教化学课。我答应了，因学冶金，化学课是基础课，尚可胜任。我到学校一看，还有一位80来岁的，拄着拐棍的一位老人，也被请来上课了。可见，受日伪统治十四年的齐齐哈尔文化状况真是太贫乏了。

当时的国民党大员彭继群接收齐齐哈尔是按国际协定，苏军把他们接来的，他也带一点军队算是国军，而地方的“光复军”就成为他们的统治支柱。也就一个多月的工夫，苏军要退出齐齐哈尔，苏军又按协定把他们送走了，因为没有苏军他们在这里是站不住脚的。“光复军”就得逃跑了。可见当时的西满形势已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天下了。

1946年4月24日，齐齐哈尔重新解放了，重建省人民政府，于毅夫任主席。人民政府接管了学校。当时人民政府下令，学校的教员一个也不能动。我说是代课教员，那也不行。从此，我就成了正式的教员了。前面，已经说了，我想继续上学读书，也从未想过

当教员，但在这中国大变动、变革的年代，阴差阳错，把我逼上了教师的岗位。就算“逼上梁山”走向革命了，虽然不很自觉。我从1946年4月24日就算参加革命了。

2、在联合中学、第一中学的风华岁月

1946年夏季开始——1952年的夏季，整整六年时间我工作在齐齐哈尔的联合中学、第一中学。22岁——28岁是人生风华正茂的季年，是最活跃、最风流，也是最值得珍贵的季年，永难忘却的六年。

1946年暑期，齐齐哈尔的所有男子中学都集中到现在市第一中学成立了联合中学。我当然成了联合中学的一位教师。原齐市一高、三高、龙高、师道留下了学生统一组成普通中学，唯有原二高的学生，也是我所在的学校则组成联合中学的工科部。我也就是联合中学工科部的教员。学校把工科班安排在旧社会留下的博济工厂院内。这原是一个被服工厂，它紧挨着敌伪时期的日本小学校。即联合中学的校本部。也就是说敌伪时期的一座日本小学就可以容纳了敌伪时期的所有男子中学，原齐市的五所男子中学合起来也就是1,000多人吧！真是少得可怜啊！

解放战争期间的联合中学很不稳定。为了引导学生走上革命的道路，政治、时事教育成为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政治大报告是主要形式。当时来校做报告的有党和政府的领导，还有民主党派人士；如车向忱、闫宝航、高崇民、关梦觉，还有外国老太太史特朗等。当然文化课也要上，但很不正常，要让路给政治教育。我想这可能就是“抗大式”的教育。我们，作为教师的，“教育者要先受教育”，当然也要和学生一起受教育。这样很好。我对那时的中国、抗战时期的中国知道的太少了。受教育，我的认识在转变，我的觉悟在提高，我的思想自觉倾向于革命了。在此期间，有一位原法大的同学李达曾约我一同回长春读长春大学。我没有去，他走了。李达后来

在我的故乡旅顺口中学任教员，至今还有联系。

联合中学的工科学生共有两个学科六个班，四、三、二年级各二个班。四年级是将要毕业的班级，年龄大一些，因为是学工的，不太关心政治，听大报告也多溜号。学校让我讲机械科四年级的金属材料课。同样，上课的学生很少。我每次上课也就 10 人左右。但我还要认真备课。当时，一无教学大纲，二无教材。好在，我能从日文资料里寻找适合中学生材料，边查找，边翻译、边整理，准备教案。而学生只好记笔记了。应该说当这样的教员是很辛苦的。有一次，我正在讲课，学校的校长在事先没有通知的情况下，来查课了。我对着挂图讲述金相学方面的知识，而学生只有 10 人左右，他们是否认真听了，是否听懂了，只有天知道，可能是，这位校长被我的辛勤劳动感动了。在这年的寒假前，学校后勤部门，送给我一个红包，内有金钱，虽然不多，千里鹅毛情意重，我也感动了。这是我第一次得到共产党的奖励。

3、全省教育工作者大会

1946 年的寒假。齐齐哈尔市的教员，包括中、小学的，还有外县中、小学教员都集中到原齐齐哈尔女高（现三中）的校舍，省政府召开了全省教育工作者大会。在一个不大的校舍里，集中食宿受教育，都能装得下来，可见当时的黑龙江省的教育状况，受教育的人太少了，全省的中、小学教员也太少了。旧中国是一个文盲充斥的社会，加上十四年敌伪统治。那时的黑龙江省教育真是太惨淡了。

教育工作者大会主要由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人做报告，对教员进行思想改造。教育者先受教育。这是使黑龙江省教育从根本上改变教育性质的最具有关键性的一步。教员是学校实施教育的主体，毫无疑问教育者的政治倾向，要直接影响学生的政治方向。这一步太重要了。当时，人们的思想问题主要集中在：苏联问题、美国问题、八年抗战问题。摆事实、讲道理、大讨论启发人们思想觉悟是

大会的主要教育方式。我和朝珍就在这年的十二月一日结婚，我们一同参加大会，和大家一样都住在那里。经过教育，我们的思想觉悟都得到了提高，都觉得应该投身到革命运动。我的重返校园，继续读大学的念头几乎是破灭了。

4、齐齐哈尔旧中国工业学校教育的终结

1947年的春天，学校要把工科班调整出去。我所教授的工科学生就在这一年的上半年被调整到哈尔滨铁道学院。教员也要随学生一起走。我也应该走。但学校并未征求我个人意见，就把我留下来了。工科学生没有了，叫我教什么课呢？也未征求我个人意见，就把我放在数学教研组了。

工科学生的调出意味着，从清朝光绪年间建立的工学堂在齐齐哈尔结束了。一个有五十多年历史的工业学校就这样终结了。令人遗憾。但是战争的年月，就是要打破一个旧世界，重建一个新世界。那时，我又怎能想到在后来重建的日月里，我又亲自参加重建齐齐哈尔的工业学校教育呢？这也是缘分。

工科学生调走后不久，就有一部分学生跑回来，又回到联合中学，前后能有30人左右。学校对这部分人采取办班训练的措施，责成吴伦（女）同志负责。吴伦同志是一位女同志，也是学校的领导成员，她又调我同她一起办班。主要是时事政策教育，有时还带他们去农村访贫问苦，提高他们的觉悟。到了暑期这部分学生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有的在当年暑期参加了战地服务团而参军参战了。这半年，我身在数学组，但没上一天数学课而是做政治教育工作了。我感到吴伦同志很器重我。

5、我参加了1947年夏的战地服务团

1947年夏季东北的解放战争节节胜利，长春已被我军围困起来，兵临城下。战事休整期间学校组织了战地服务团。我报名参加了。我被分到长春附近的乾安县，驻在那里的是骑兵独立师。这时，

学校改为联合中学——分校，实行男、女生合校了。我们这个团有男女学生 50 人左右，加上四位老师，其中有一位是孙叔石先生，他是一位话剧导演。我们在这里下连队扭秧歌，演秧歌剧也去演歌舞和话剧，慰问子弟兵，同时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砍“大树”，清算斗争恶霸地主。在这个团里我算是文艺骨干，导演当然是孙叔石先生了。他和我曾在这里编导、演出“韩麻子”的话剧，类似“白毛女”那样的剧情。还演过“上海风云”的现代话剧。受导演的偏爱，我主演男主角。后来，回到学校还要汇报演出，孙导演还让我演男主角。我的爱妻提出意见，一个男老师同一个女学生合演一出有爱情关系的戏不合适。我也以为然就谢绝了。在战地服务团总共有两个月时间。在这里我看到了从长春跑出来的男女青年，有的就是长大的学生，有的就安排他们到解放区了。

到了九月中旬，我们四位老师才从战地回来，大部分学生就地参军参战了。老师有规定想就地参军也不行。如果可以的话，按我当时的思想状况，我也可能就地参军了。

我们回到了学校，学校已经开学了。这时，学校已改名为齐齐哈尔市第一中学。我被任命为数学教研组长，同时又任一年一班的班主任。还教两个班的数学课，任务真不轻啊！也说明组织对我的信任。在当时，我是这所学校最年轻，最有活力的教师了。可谓风华正茂。

6、在土改的日子里

1947 年的冬季来临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展起来了。当时学校号召老师和学生凡是成为这次运动对象的家庭，要主动上缴浮物：黄金、白银、衣物等。前面已经讲过了，我家缴不出黄金和白银，还要动员学生缴出浮物，我的包袱沉重，日子很难过啊！真是难过的初冬，这比没吃没穿还难过啊！

到了隆冬腊月，农村的风暴刮到我的家里来了。像前面说过那

样，抄了家。东西没了，在农村过了一个月没有家的生活。1948年春节时，我们全家四口人，又先后都回到了一中的那个家。日子照样过，好像进行了一次大清扫，倒觉得清静利索了。特别是放心不下的那个缴浮物的包袱，是农民兄弟给我们卸掉了。我轻松了，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家财万贯不如一身轻啊！

我回到学校以后，学校就组织土改下乡学生文艺演出活动，庆祝土地改革的重大胜利。我刚回来，吴伦校长又找我谈话，让我参加演出，作为演出队的教师之一。这时，一身轻松，浑身是力量，在乡下走村串户，一演就是一个星期。学校开学了，我们才回来。这时吴伦已是副校长了，她又立即派我去农村招收农民干部参加学校办的文化学习班，我和另一个姓丁的同学走遍了龙江县农村，一共招来了 30 多名的农民兄弟。他们都是翻身农民，渴望学习文化。我任这个班的数学课。也就一个学期，他们就回乡了。土地改革运动审查了我的父亲，清查了我的家。也审查了我这个人。从运动中学校对我的任用，足以说明学校的党组织对我更加信任与重用了。

7、第一中学的数学教研组

1947 年的秋季，我就任市第一中学的数学教研组长。当时这个教研组一共有 20 多位教师，其中有不少是我的老师和名人。裴景仁老先生，人称裴几何，后来被任命为齐齐哈尔师专的首任校长。程薪老先生，人称程代数，后来被任命为齐齐哈尔市的副市长。李榕令先生原是齐女高的名师，后来去大连师专任教。李德林老先生，讲授几何很受学生欢迎与爱戴。施福申老先生是原三高的专业教师，也是一位名师，后来他去会计统计学校任副校长。中年人有黄春藩、聂鸿璞。后来黄春藩任黑龙江省水利厅厅长，聂鸿璞任齐齐哈尔市城建局局长。年青人则有我和王朋令等。王朋令是留学日本，后来去沈阳一个专科学校校任教。可以说当时一中的数学组是集中了全省数学教师的精英，我不是学数学的，我算是最后的一个了。

但却让我做这个教学教研组的组长。我对他们很尊重，他们也很爱护我，支持我。这是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集体，也是一个团结、合作很和谐的集体，是学校的先进集体。我理解，学校让我做这个教研组的组长是为了培养年青人，寄希望于青年人身上。其实，当教研组长也没啥权力，无非是安排课程。做些检查督促工作。再就是组织政治学习，过好每周一次的生活会就是了。当然了那时的生活会，主要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促进改造。有时也闹笑话：“发言积极，诚心（程薪）不改”，活跃气氛。一中的数学组长，我一直做到1950年末。三年时间吧！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当上个头目，是正职的。一中的数学组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快乐的记忆。

8、我错过了“归队”的机会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全国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学校的工作也开始走向“正规化”、“啃青”现象减少了。所谓“啃青”，就是随时抽调学生参军参战参加地方革命工作。我那个班级，入学时50多人，这时就剩下40多人了。与此同时，政府也提出“归队”措施。所谓“归队”，就是让学有所长的人，去做他应该做的工作，这是一次人尽其才的措施。当时的一中就有不少这样的教师归队了。如王祖鹤、聂鸿璞、黄春藩、赵大兴等都“归队”了。这时，我也心动了。

我写信给四叔，介绍我的情况，四叔回信同意我去大连工作。我把四叔的回信出示给当时的校长方行同志，请求批准我去大连工作。但他一个不行，两个不同意。并说：“你是学冶金的不错，可当教员就是老母鸡，可以浮出更多的学工人才，对革命贡献不是更大吗？”大道理，我讲不过他，再加上当时我的组织观念又强。这次“归队”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这时吴伦同志已经离开学校了，我想她会放我走的。如果当时，不顾一切，执意走了，我的人生旅

程，将不是今天的结局了。时也！运也！

9、第一中学的“球星”

中国人习惯于把人看成是从天上星座落到地上的“一颗星”，每一个人那应该有自己的亮点，让人们看见他的存在并认识他。在联合中学，第一中学我教过多个班的代数课，也当过几个班的班主任。学生们可以从我对他们的接触中，认识我。但一中每年都有30来个班，上千名学生，更多的学生是从球场上、文艺活动中认识我。我喜欢球类体育竞赛运动。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等大球、小球我都喜欢玩。并希望在球场上展现自己的风采。我喜欢唱歌，歌声也比较动听。每当学校开展的业余文化活动中，人们发现我在闪耀、耀眼，引起学生们的欢乐。人们说，我是乐天派。送我一个绰号：“浪人公子”有褒有贬，这些我都不在乎。篮球是我体育项目的第一爱好。我是第一中学教师篮球队的骨干分子。并成为当时齐市教联篮球的后卫成员。我个子不高，还不到1.7米，但论弹跳、把握时机、抢篮板球，高个子的往往要落在我的脚下。打排球，我承担二传手的重任。我忘不了聂长林（当时一中的副校长）、王祖鹤和我三个人的前排组合，构成强大的攻击力量。同我们经常比赛的有市工商联队，每次比赛都会吸引大量学生围观。每打一个好的配合，学生们就叫喊起来，场上是那样欢腾、壮观。论足球，我踢的次数不多，但也永远忘记不了在一次比赛中，我踢进的那个带有孤线的远角进球。直到今天，当年的学生见到我，都会谈到当年一中球场上的我。有不少人是从球场上认识了我，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尽管我只是一个中学校园的一个“球星”，但我常引为骄傲，并告诉我的后人，人的一生不能没有值得自己骄傲的地方。如果啥也没有，啥也不行，那么你的一生就太平淡了。

10、齐齐哈尔市的先进工作者

我当过齐齐哈尔市的先进工作者，时间是1950年的春天。我

被评为市的先进工作者。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奖市级的先进工作者。第一中学还有另一个人是马家骥。我们两个人出席了在京剧院举行的奖励大会。但马家骥在 1951 年镇反运动中被枪决了。他隐瞒了他是国民党骨干分子的历史。我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也只当过这一次市先进工作者。这是第一中学对我当时工作的肯定与鼓励。但是我的后续工作，离开第一中学后的工作，其工作的艰苦性，我的努力和成绩，并不比一中时候差，贡献可以说是更大、更好，但从未当过单位的先进，更谈不上市级先进了。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身居单位的领导岗位了，就是够了也得让啊！其中还有什么原因呢？我没想过，……现在，没有必要想啦！不过，这次当了市级先进。对我个人后来的发展是有影响的。

我离休以后，据说凡是当过市级先进工作者的，每月要领一份津贴。但至今我没享受过这个待遇。据说是查不到那次奖励大会的档案，我也没要求组织给予调查。是时也命也。算了吧！我心地坦然。

11、东北教育学院的首期学员

1951 年春季开学，我突然被提升为第一中学的副教导主任。没几天，省教育厅来令，要我到刚成立的东北教育学院学习一年。一中的教导主任工作，对我可以说有其名无其实，我一天也没干过。我也没想到，这一年的学习，使我离开了第一中学。但是我想，过去是用非所学，这回可是学为所用了，那时还有丝毫的技术报国念头的话，这回可就藕断丝也不连了，注定了我要为教育事业献身一生了。

1951 年东北人民政府在沈阳成立了东北教育学院。三月份，我作为这所学院首期学生入学了。当时的院长是董纯才，他也是东北人民政府的教育部长。在这里主要是学习《新民主主义政治》、《哲学》、《教育学》三门课程。头两门课程主要由当时政府的要人上课，

教育学则由苏联专家讲课，主要参考书就是《凯洛夫教育学》。“习明纳尔”是主要上课形式，也就是讨论式的。我在这里学习不感怎样困难，但第一次接触哲学、教育学的课，觉得很新鲜，我比较喜欢哲学课。毕业考试以论文答辩形式进行。我的毕业成绩是优良的。哲学、教育学是优等，而“政治”是良。这可能同当时开展的肃反运动有关，我觉得我的政治课学习不比那两门差。时也命也。

教育学院的一年生活，我很满足。重当学生，虽然年龄大一点，那年我 27 岁，毕竟是学生。我喜欢文艺、体育。我被选上六班的文体委员，因为在这个班里，我的年龄还算年轻呢？我还选上学院篮球队的队员，代表学院参加比赛。我也参加过学院的文艺演出，还演过话剧。这一年可算是我一生中最风光的一年，最快乐的一年。1952 年的春节前毕业了，我获得了东北教育学院的毕业证书。毕业证书的背面印有三门课程的成绩。毕业证书盖上院长董纯才的大印。后来，董纯才当上了国家教育部长。

最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年，个半月我可以去四叔家看望奶奶。建国后，四叔被调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作任机械工业管理局的局长，他是学机械的，可以说是学有所用了。奶奶是随四叔来到沈阳的。奶奶已经是 80 多岁的老人了。多年不见，在沈阳相逢，格外高兴。奶奶看到大孙子成人了，在当时她的孙子们，我算是成“材”了。常去四叔家看奶奶，有时要在四叔家吃饭，但我也不常在那吃饭，我四婶是第三房，给我的印象是不怎么热情。四叔在家时，他诚心留我。叔侄之情不能不吃。四叔不在家，我肯定不在那里吃饭。人不能吃冷眼饭。

1952 年春节前，我从东北教育学院回到一中。当时学校正在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我回到学校不几天，当时的市教育局刘青萍，也是一中的校长，就调我参加市五反工作队。他是市行商工作队的队长。他的用意我理解，让我参加这场阶级斗争，争取加入

中国共产党，再回到一中承担领导工作。谁能料想到，正是这个时候，中央要在全中国发展中等技术教育，并发表社论。黑龙江的中等专业教育，前面说过了，在战争年代都已终结了，黑龙江要重建中等专业教育的是不可避免了。我在“五反行商工作队”工作到六月份的时候，省教育厅的调令来了，调我去绥化初职任教导主任，而且是省政府的命令。我正准备行装赴任的时候，又来调令了，叫我去省教育厅报到，参加创办黑龙江的中等技术学校。就这样，在1952年的夏天我离开了第一中学。

1946—1952年夏，六年的联合中学、第一中学的岁月，我终生难忘的岁月，风华正茂的岁月，是我走向社会、走上革命的岁月。在这里，我开始展现我的人格、品德、智力和许多方面的爱好，渐露头角，为人们所认识，从一个教员走上教育行政岗位，奠定了我的终生从事教育事业的基础。在这里，我教过的学生不少，和我感情最深的学生要属1947年秋入学的一年一班的学生。我教过他们三年半的代数课，当过他们三年半的班主任，一千多个日夜相处在一起，情深意重。直到今天，常来我家的，电话联系的，送节日贺卡的，祝我健康长寿的学生，就是他们。我感到做一个教师的光荣和欣慰。享受到其他任何职业都享受不到的快乐。后来做学校教育行政工作了，学生更多了，但论感情都不如第一中学，1947年一年一班—1950年三年一班的学生。从这一点来说，当学校的领导，不如当一个教师好啊！

八、我与齐齐哈尔的工业技术教育

从1952年开始的重建齐齐哈尔中等工业技术学校教育，并发展到高等工业学校教育，是一个上上下下，艰难进取，曲折发展的过程。沧海桑田，我亲历了这个全过程，也倾注了我全身的心血和精力。从1952年开始，到1986年离休，整整三十四年。可以说，我是重建齐齐哈尔工业教育参加者之一了。如果加上联合中学、第

一中学的六年；那么整整四十年我干了学校教育工作，教育工作成为我终生事业。我是学工的，干的是教育，用非所学了。但也不是，大部分时间我干的是工业学校教育，也可以说是学以致用、无怨无悔。到了晚年，倒觉得教育工作，教师的职业是伟大的、神圣的。我享受到其他事业、职业享受不到的、独有的快乐。

1、创建齐齐哈尔中等工业学校教育

新中国成立了，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了。1952 年国家行政学院向各部门、各省市发出指示，要从快速发展中等技术教育，培养人才，迎接经济建设的高潮，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社论：《发展中等技术教育》。当时的黑龙江省只有一所农业专科学校，而其他技术教育处于空白。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立即做出决定，筹建工业、会计统计等技术学校。并责成教育厅、工业厅、人事厅三家共同筹建工科高职、工科初职两所工业学校。当时，我刚从东北教育学院毕业归来，我被看中了，先是调我任工科初职的教导主任，宣即改令我去省教育厅专职筹建两所工业学校。在一无校舍、二无教师、三无学生的情况下，要求当年秋季就要把学校办起来，并开始招生。仅仅三个月 100 天的时间，在“三无”的条件下把学校办起来真是太难了。怎么办呢？用革命精神、革命办法，因陋就简先把学校办起来。这是当时国家政务院的指令。我代表教育厅的工作人员穿梭于人事厅、工业厅之间。沟通交换意见，同时起草学校的教学计划、还要招募、抽调教员，以及招生事宜。我是六月份到教育厅的，到了九月份了就是一百天的时间，两所工业学校筹办就绪了，奇迹般两所学校办起来了。工科高职在借用北安农专一部分校舍，工科初职在绥化借用一个旧烧锅的厂房为校舍。教员是全国招募一部分，全省抽调一部分人。学生是抽调一部分干部，并招收一部分初中毕业生。就这样，到了十月、十一月份，两所学校都开学了。想起当时的作风，真是雷厉风行，说干就干，

干就成功。后来，这两所学校都于年底和来年的年初都迁回齐齐哈尔市，并合并成一所学校——齐齐哈尔工业学校。前面说过，齐齐哈尔的学校工业教育起始于清朝光绪年间建立的工学堂，而终结于解放战争年代的1947年。1952年，齐齐哈尔市工业学校的建立，开创了原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工业学校教育的新纪元。这是党和政府在祖国北疆用革命办法亲身创办的工业学校。我经历了齐齐哈尔市旧工业学校的停办与终结，又亲自参加了齐齐哈尔市工业学校的创立。时也运也。

2、我与齐齐哈尔化工学校

1952年是全国大办中等技术教育的一年。那一年有国家部委办的，有各省、市办的。可以说中等技术教育在全国开花。这里就有一个管理体制、学科专业设置等问题。1953年国家政务院发出通知，对全国中等技术学校的管理体制进行调整。强调条块结合，以条为主，即部委领导管理为主的领导体制，并强调学校的设置以单学科为主，而不是综合性的了。就这样，刚成立的齐齐哈尔工业学校，经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地工局对全东北的工业学校进行了调整，而改为化学工业学校，即齐齐哈尔化工学校，以东北地工局领导为主。学校的机、电两科的学生调往锦州，而锦州、辽阳、沈阳和呼兰的部分学生调来齐齐哈尔。这是一次大调整，包括师资、设备、学生在内的大调整、大迁移。我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省教育厅的厅长梁志超找我谈话：李活（李志超）要你去他那里工作，你的意见如何？我说：我愿意去。于是省政府下令任我为齐齐哈尔工业学校的教导主任，而参加了学校的调整工作。那是1953年八月的事情。从此，我就与这所学校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亲自参加了这所学校的创建，这回又直接参与这所学校的管理，应该说缘分早就有了。就当时情况，我在省政府教育厅已经工作一年多了。我很不适应这里的工作，整天坐在办公室看文件，起草报告，下去视察回来还是写

报告，这种文牍工作，不是我的长项。前面说了，虽然念了大学，但中国语言程度连初中文化都不够，那是敌伪奴化教育造成的。我不适合作政府官员工作。

经省政府下令的工业学校的教导主任是科级干部了。但那时我没觉得“科级干部”对我是一种需要，可以说我那时当官的观念很淡薄。其实省政府早在头一年不是已下令我是工科初职的教导主任吗？这次，不过是再任命就是了。中国人有一句话“学而优则仕”，可是对我们学工的人来说，“学而优则事”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个“事”不能看成是错别字，而是真字，人的一生能做事，而事业有成是最幸福的了。不管做什么事，能力有大小，只要认真去做就是了。人各有志，行行出状元。龙与蛇，狼与狗各有各的本事，何必一定要成龙呢？

调整后的化工学校，刚成立一年就有三个年级，两个专业了。我主管学校的教学工作，既管教员又管学生，文化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几十门的课程几乎是同时开讲。而且是在没有规定的教学计划，没有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没有规定的教科书的情况下进行的。好在有一个苏联的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学计划可以借鉴参照。要从整体上保证教学内容的规格性，以保证教学质量，我的工作是积极的，教师的工作也是努力的，好多课程要教师编写讲义，多数教师还要兼做班主任。想起那时的老师，他们的辛勤耕耘，应该说他们是教育战线上的最可爱的人了。及至 1958 年，作为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科书以及教学管理等文件，基本上都确定下来了。随着校舍、设备的建设与完善，一所规格和 800 人规模的工业学校算是成型了。五年的辛苦，边建设，边教学，边招生，边毕业。毕业的学生全国分配，供不应求，由北向南冲，受到全国各地、各部门、企业的欢迎与好评，桃李满天下不是空的，是实在的。苦尽甜来，我于 1956 年被任命为这所学校的教学副校长。“官升一级”，工作

依旧，同样，我的感觉只是工作需要而已。

齐齐哈尔化工学校的五年，我受到李活校长的器重，我也参与选拔一批年轻教师去高校进修培养，造就了一些骨干教师，王墨林、陈一鹏、吴绍新成为这所学校的相关专业的三大支柱。后来，他们都成为轻工学院的教授。王墨林又是后来的齐齐哈尔轻工学院的院长。很遗憾，他们都先离开了人间。写到这里，也算对他们再次缅怀。

这五年，我28岁—33岁，五年总的来说，还算是朝气蓬勃的五年，球照样打，歌照样唱。由我带领的教工篮球队，在齐市教工的篮球比赛中还拿过一次冠军呢！学生篮球队，由邵文斌带领的那支篮球队，也曾齐市无敌手。应该说，这五年化校的人气，无论是教工还是学生都是好的。1956年我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7年就开展了“反右派斗争”。我把这两件写在一起，对我来说是有关联的。

“反右斗争中”说我在助党整风中开了“黑会”向党进攻。“黑会”不错，是在一个夜间开的，而且是在家属北宿舍开的。就因为这次会议，鸣放出“反党言论”，张洪斗、索化远二位被定为“右派”了。我是民盟支部的主委，当然“罚责”难逃了。我争辩，“黑会”不是我要开的，是党支部布置的，又查不出我的“反党言论”。据说给我定为“中右”，也就是不带帽子的“右派”。这是当时市委文教办的人告诉我的。又是时也运也。我在斗争的日子里困惑、惆怅，夜间睡不了觉，在院子里来回走动，真难受啊！精神压力比物质压力哪个轻、哪个重。经过人的会说精神重于物质。

“反右”之后，到1958年学校开展了“教育大革命”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叫做革命，就要涉及人。一些老教员就要首当其冲了，拔了他们的“白旗”就在所难免了。学生还演了“拔白旗”的活报剧。人们还说“拔掉了白旗，露出了个大窟窿，红旗也插不上”，我在笑声中感到辛酸。

“师道尊严”，就不能讲了。经过“教育大革命”。学生参加“勤工俭学”，参加各种劳动，学校兴办各种工厂，为学生参加有关劳动创造了条件，学校变样了，学生的课堂不就是在教室了。学校得到一些收益，学生、教师每人都穿上一身蓝衣服，是学校给做好的。学校教学程序是乱了一些，后来，经过调整，把劳动纳入教学计划，也就正常了，只是劳动多了一些。

3、我与齐齐哈尔化工学院

1958，再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教育战线也热起来了，大办高等教育。在这一年，哈尔滨成立了化工学院、药学院，省在哈工大成立了化工系，齐齐哈尔市成立了化工专科学校，而省轻化工业厅组建了省化工学院的筹备处，牌子挂在齐齐哈尔化工学校。除筹备处尚未招生外，其他院系都于1958年招了学生，正式成立了。针对这种情况，1959年春季省委、省政府决定要对新成立的化工院、系进行调整合并，在全省集中力量办一所化工学院。在那里办呢？省委决定召开调整会议。当时的化工学校已由轻工业部下放到黑龙江省领导管理。学校决定由我代表学校出席会议。在这一年的夏天，我作为非党干部出席由省委副书记王一伦主持的、在省委大楼里召开的调整会议。在会上各院校陈述各自的办学条件与师资力量。我是最后发言的。都谈完了情况，王一伦书记请大家发表意见。当哈工大原副校长高铁发言之后，王一伦书记就拍板定案：三所院校，包括哈工大的化工系都集中到齐齐哈尔化工学校，办一所化工学院。并决定由省教育厅负责召开调整合并会议。学校名定为黑龙江省化工学院。后来根据教育部命名规定而定为齐齐哈尔化工学院。

这一年的上半年，我穿梭于齐齐哈尔，哈尔滨、大连等地。参加学院的合并与调整事务，编制四年制的本科各专业教学计划，选拔教师去兄弟院校备课，主要是基础课，以应对学院的成立与开学。

1959年的9月14日齐齐哈尔化工学院正式成立开学了。学院一成立就有两个年级，1958、1959两届学生。李活则集中抓学院教学主楼的基建工作。五月一日开工，到九月一座7,000多平方米的教学楼基本建成，可谓大跃进了。这座教学楼则是成立齐齐哈尔化工学院的唯一标志。至今仍矗立于齐齐哈尔大学的中区。

学院成立不久，在党内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谁能想到这场斗争竟斗到校长李活的头上呢？李活同志1953年任化校的校长。工作勤勤恳恳，吃住在学校、日夜操劳。学苏联那会儿他很积极。教育大革命那时也搞得轰轰烈烈。大跃进一点也不比别人落后。他是一位好校长。在教职员工和学生中颇有声望。怎能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呢？最后以“校长治校”的莫须有的罪名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纯属冤案，后来于1962年平反了。李志超同志被任命为学院的副院长。他的名字又复活了，他的原名就是李志超。

这场斗争的后果，刚成立的化工学院起码在人气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李志超同志一直是这所学校的掌舵的，是人心所向。斗倒了他，人气能不下降吗？在斗他的会上，让我出席党内的会议，让我受教育洗脑袋，不能说是陪斗。斗倒了李志超可苦了张元士，学校的业务工作几乎压在我一人身上。特别是1959年冬天，大跃进，浮夸风大刮起来，动不动就开大会报捷献礼。领导讲话的稿子还得我来写，真难为我了。学生还得参加土法炼焦，学校的周边一片烟火腾腾。刚成立的化工学院乱了，教学秩序极不正常，到了冬季时因主楼没接上暖气，教室里竟生起大炉子了，外面薰黑了，如果不斗倒李志超，能这样吗？没办法，提前放了寒假。

1961年春省委派刘钊任书记，崔志林任院长。两位老同志都是党的好干部，他们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我被任命学院的教务处长。他们对我信任、器重，我感到温暖。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

的年月，吃糠楂子的年月，生活很苦。但为办学院，劲头实足，我日夜操劳，可以说是疲于奔命了。那时，我总觉得腹部很痛，但也不看医生，实际上带病工作了。

1962年，李志超平反昭雪，任副院长，我也从教务处长提升为副教务长。同样还是那些工作，还是工作需要而已。从1961年开始，大运动不搞了，整顿又开始了，学院的教学秩序进入正规了。教师、学生的积极性又都上来了。但没想到，1963年省政府决定齐齐哈尔化工学院下马了，刚上道的化工学院下马了。太可惜了。本来，当时全国院校的调整工作，已基本上结束，而齐齐哈尔化工学院已属当时国务院认定经过整顿后的学院，却下马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不明真情的人都说是刘剑、崔志林不愿意干的结果。这是错怪了他们。根源还是在条块管理的体制上。轻工业部下放学校时有文件：学校下放后不许改变学校的性质——即轻工性质。而黑龙江省把学校改为化工类的院校了。轻工业部当然要提出问题，要求学院与学校分开办，这就难为黑龙江了，学校与学院又分不开，那只好停办化工学院了。如果当时办的是轻工学院，我想就不会发生停办学院的事了。学院停办了，轻工业部就把学校回归轻工业部领导。轻工业部重新任命李志超为校长，我为副校长。

齐齐哈尔化工学院的停办，对这所学校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损失，主要是人才流失大半，而流向轻工业院校。齐齐哈尔化工学院培养了五期学生，质量尚合规格，尽管是四年制的本科，和五年制相比只是外语水平差一些。毕业生全国分配，还是由北向南冲。最后一批学生1965年毕业，学院摘了牌子。

1959—1965的六年，人到中年，生活最苦，工作最累，健康最差，精神最苦的六年。特别是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日月里，我的父亲又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岳父因右派被加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关进了监狱，我的精神负担太重了，多管齐下，我染上了肝病

就不奇怪了。我带病坚持工作，手不断揣摩肝区病痛，我的毛背心有两件都捅出个窟窿。但是我没倒下，硬撑过来了，也算是个铁人了。可没能得到“铁人”的荣誉，在那个年月里，我再“铁”也是没用的。

4、文化大革命中的“党外走资派”

1965 年化工学院摘了牌子，1966 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前面已经说了，这场革命是把“阶级斗争”集中到党内来了。依我看这场斗争是从党的八大以后就开始了，斗争的焦点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当斗争到 1966 的春天，中国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应该说十亿人口吃饭都成了问题。在毛泽东看来问题不在党外，而是党内，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他们阻碍与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进步。“阶级斗争”一抓就是灵，一场斗倒、斗臭党内走资派的大革命开始了。他老人家决心很大，不斗倒他们，就要“重上井冈山”了。那可就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武装斗争了。所以说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是偶然的，而有它的历史必然。毛泽东他自己否定了党的“八大”的正确性，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应致力于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如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全国专心致志于国家建设，那现在中国会是什么样呢？

在这场斗争中，每个人都有角色，都要亮相。到 1966 年的 9、10 月份，化校的当权派都打倒了，那时我是非党校长，学校是乱了，但生活还要运转，要钱、要房子的事天天有，科室人员就把责任推给我了，说那还有个副校长没倒呢？你去找他吧！其实我也早就倒了，不打就倒了，不过是“造反派”随叫随到就是了。我忍受着精神上的折磨与痛苦，按着良知办事，尽可能减少损失。学校闹一阵“经济主义”风，要钱，我顶着不给。“造反派”各头头都要进实验室，我找他们谈，谁也不能进，达成了口头协议，避免了实验室

遭到破坏。他们是学生，好话、正确的话他们还是听进去的。当然运动中间也挨过触动，叫我批斗“走资派”，我决不胡说八道，把我揪到大会上也是这样，绝不无中生有，借事乱咬，事是谁的就是谁的，不能陷害人，至于对与错另当别论。

经过一年多的折磨，当解放军进驻学校的时候，我的肝病大作，到了吃不了东西的状态，喝口水肚子都涨啊！我才感到病情严重去医院诊断。先去二院找我的学生李占恒，他是中国医大毕业的。他很惊讶！老师，你的病情严重，必须马上卧床。我只好把诊断送给驻校的解放军。很好，他们允许我在家养病。接着我又去解放军 203 医院找内科主任给予诊断：说是早期肝硬化，肝边已尖锐了。我本着中医吃啥治啥的理论，去屠宰场买猪肝，主事的正好也是我的学生，他每天都给我留新鲜猪肝，吃不了就和张兴厚、张殿魁、张海都是姓张的共同分吃。他们都是肝病患者。张兴厚病情和我差不多，他终于没挺过来，在文革中去世了。

“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是这场革命的一个环节。到了 1969 年 10 份，“造反派”到家叫我参加学习班，养病也不行。最后没毕业而转入“重点人学习班”，反省交代问题，不准回家，同“反省室”没啥区别，一直住到 1970 年的“五·一”，把学习班住黄了，才把我放出来。1970 春的春节上，学习班放了三天假，年三十那天我回家了，进屋一看我的居室全挂白霜了，真惨啊！孩子们煮的是包米碴子，哪有心思过年啊！朝珍也同样在小学受审查。她可以天天回来。

我进重点学习班，是以莫须有的 101 专案立案审查的。查我是伪满工大的 101 支部的党员，也就是国民党的地下组织。我交代不出来，又查无实据，就不了了之。最后给我下的结论是“党外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原因是：你虽不是党员，但常参加党委的常委会，是“黑党委”的“高参”，当然就是党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了。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重点学习班出来之后，就把我分配到学校机械厂铸造车间参加劳动。带着重肝病，参加重体力劳动，对我的体质又是一次严重考验，我顶着肝区的病痛，干了近一年的翻沙活，我挺过来了。后来，落实政策，学校革委会决定我去省柳河五七干校参加锻炼，叫着“吃小米，爬大山，恢复革命青春”。这中间发生了“林彪事件”。毛泽东决定的接班人，叛逃了。我强忍着肝痛，完成了锻炼任务。我的体质又经历了一次考验。柳河归来，我只好在家养病。又出台一项措施，叫“干部下放农村落户”工作队的领导找我谈话。我说：我个人可以去，但把全家都带下去我养活不了，请组织考虑。这个难题解决不了，也只好作罢了。我继续在家养病。这时，我的岳父十年狱期已满，放回来。经岳父一剂中药，药到病除。吃饭也香了，能吃了。从此，我的肝病就好了。到现在，症状已除，只是在气候变换季节有隐痛。病愈的肝和无病的肝还是不一样啊！到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之后，接着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批邓，最后是批“孔”批“儒”批“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都是自觉不自觉地总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一下子就谁也跑不掉了，他们挨批挨斗都是应该的，都得认账，认领。看来，文化大革命到了尾声了，而开始落实干部政策了。随着落实干部政策的深入，我于1972年10月被任命为校革委会副主任，我又“官回原职”了。还是那我熟悉的工作。

学校于1972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主管学校的教学工作。这时的政策是“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我理解是以学习文化、科学为主、再学别的，当然文化、专业课程就要作为“主”进行安排。但到“反击右倾翻案风”刮起来时，又遭到了批判，说这是“没有李志超的李志超路线”，弄得人们无所适从，真难啊！大字报又出来了，“警惕资产阶级路线反扑”好在当时党委书记陈鸿声不予理

采，没有造成很大的风浪。

1974年的上半年，我与党委书记陈鸿声，工宣队员孙师付一起去大连检查学生实习。在火车上谈话中，我提出一样的工农兵学员到我们这里就是中专生，到大学去就是大学生，我们为什么不办大学办中专呢？我提议：我们应该办大学，我们办过大学，可以复办大学。陈鸿声一听有道理，并说：“我们回来就到省轻化工业厅谈复办大学的事，元士你来谈。”就这样复办大学、办轻工学院的动议在火车上形成了。这时候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之际，我提出这个动议，也够胆大的了。我并未想的太多，只觉得化工学院下马太可惜了，办大学的心没有死啊！这就叫做：“人还在心不死”。

5、齐齐哈尔轻工学院的成立

齐齐哈尔轻工学院于1977年7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办轻院从1974年春天动议到1977年夏天成立。历经了四年时间，可谓筹办轻院的“马拉松”了，中途没有退却，坚持就是胜利。事在人谋，事在人为。

1974年春季，在大连视察学生实习之后，我们一行三人从大连直奔哈尔滨，去省轻工业厅找到了古士淼厅长，提出了我们的动议，讲述了办大学的理由、条件与可能。古厅长当即表态：可以考虑，我得去你们那里考察一番。

陈鸿声书记对办大学非常积极。他起草报告，呈轻工业厅与市委。在当年的国庆节前夕，古厅长来校视察，并召开了办大学的座谈会，找了一些教员。在会上绝大多数人都发言表示应办大学，我们能办大学。我记得只有一个人表示不同意见。后来大学办成了，他走了。其实他完全可以不走的，是人的心理、面子在作怪。人就是这样一种动物，比其他动物都怪、更怪。

从动议开始，我就穿梭于齐齐哈尔、哈尔滨、北京之间，到各处游说。1975年省轻工业厅才作出决定，复办齐齐哈尔轻工学院。

那时大学归省委文教办管，省文教办宋副主任提出异议：你们原来办的是化工学院，复办应是化工学院。我当即以化工学院停办的原因为由说服了他，他理解了。我说：办轻工学院能得到国家轻工业部的支持，要接受教训，中专必须停办。省文教办于 1975 年表示同意办轻工学院。

由于省文教办同意办大学，当年学校就申请招收大专班。招生归教育厅管，我又要往复于教育厅进行沟通。终于跑成了先招生。招那个专业又成了问题，本来我们是想先从学校有基础的专业招生，而省招生办则强调制糖工艺与轻工自动化。制糖工艺还可以，学校已设了这个专业，但自动化，学校根本不具备条件。招生办的高主任最后给我下了通牒：你们办不了今年就别招生了。机不可失，我当即去了省厅找了古厅长。古厅长很痛快说：老张可以办嘛，没教员我给你调！我又当即打电话给陈鸿声书记，他当然高兴，先招了再说。就这样，从 1975 年学校开始招了大专学生，当然是工农兵学员了。这叫做“先上车后起票”这一上就是进了大学的门槛了。

“先上车后起票”也许是事物发展的岔道。从岔道到大道，可能是事物发展的特殊规律。虽然省文教办同意这里复办大学，但省政府迟迟不报给国务院批准，我去轻工业部，部里同志很积极，说你们省没有报批啊！1976 年的夏季，轻工部的两位司长来省，在大庆召开轻工业职工教育工作会议，约我去谈办轻院事宜。经与两位司长研究决定，我去哈尔滨请文教办杨辉主任一起商议及早申请报批轻院事宜。我去哈尔滨文教办，他不在，只好打听他的住处，下班后去杨辉主任家，我与杨辉，过去只是在会议上认识，从未个别谈过话。这是我第一次在杨主任家面谈工作。我感到他很亲切，不像在会议上那样严肃。他听了我的陈述，立即答应与我同去大庆会见轻工业部两位司长。杨主任与刘亚萍司长早就认识，都是老同志。谈起复办大学之事很容易合拍。大庆会见之后，我邀请杨主任同两位

司长一同来校视察，他们同意了。我当即与陈鸿声书记通了电话，他很兴奋，在家又邀请了市委的张蒲家书记。就在齐齐哈尔召开了省、部、市、学校有关领导参加的座谈会——办轻工学院。会议取得共识、成功。这是批办轻工学院的又一关键一步。这次会议之后，省文教办起草，以省政府的名义报请国务院审批复办齐齐哈尔轻工学院。国务院的工作，就靠轻工业部了。终于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于1977年7月27日国务院行文批准成立了齐齐哈尔轻工学院。这可能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务院首批的普通高校。

办齐齐哈尔轻工学院，我动议、我跑道、我游说，终于办成了。我忘记了辛苦，我高兴在齐齐哈尔——我第二故乡的工业学校教育从中等到高等，几经曲折，根基算扎实了。人的一生太短了，能办成一件有利于子孙后代的事就很不错了。当然，这件事只能说我尽力了，如果没有陈鸿声书记支持与领导指示根本办不成的。陈鸿声同志是我的学生，早已离开人间，我怀念他。写到这里也是再次对他的缅怀。我也怀念杨辉、刘亚萍、杨宪民、古士淼等领导同志。祝愿他们晚年平安、幸福。

在申办轻工学院期间，我也不能忘记在我家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的父亲患上了急性前列腺肿大，尿不出尿来，憋得不省人事还说：元士怎么还不回来？就在这时，我从北京回来了。当即用门板把他送进医院，经穿孔导尿才度过了危机。这次父亲住了一百天医院，总算把病治好了。父子连心，时也命也。如果我回不来……

6、艰难进取的齐齐哈尔轻院

文化大革命中化院遭到了严重破坏。学校从主楼一角到南楼整个楼被无线一厂占领了而成了生产车间，学校仅剩“半壁河山”。1965年化工学院摘了牌子。加上文革期间对“老九”的批斗，教师流失大半，教师队伍也遭到严重破坏。轻院成立之后，正赶上全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国家和省都无力投资于学校的建设。这样，

刚成立的轻工学院面临三大难题。一是校舍严重不足.二是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三是经费严重不足。刚成立的齐齐哈尔轻工学院，人气很盛，但实际上是存在着生存的危机。尤其过了两年之后，不见明显起色，人们又怀疑，轻院是否要重蹈化院的复辙。

1978年，省委任命刘毅为学院党委书记、院长，钱广昌、陈鸿声为副书记、副院长。其后，又于当年任命我为副院长，又官升一级。1978年的11月5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宿愿克遂。一年后转正，又任命我为党委常委。就这样，我真正成为学院领导班子成员，还是老行当，主管学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并进而成为学院的常务副院长。可以看出当时的轻院党委对我的信任与器重，并华以不实之词：“人才难得”。现在，回头看当初的情形，应该充分肯定轻工学院的第一任党委带领全校师生，团结一致，渡过危机立下了汗马功劳。事物的发展都是起步难，而轻院的起步更是难上加难啊！

学校为解决校舍问题，从1972年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开始，就申请政府迁出占领学校楼房的工厂，到处呼号，无人理睬。1979年我当上了省政协委员，每次会议都提出方案，成效甚微。校舍解决不了，完不成省里下达的招生任务。两年不得不减半招生。及至1982年学校建校30周年之际，无线电一厂才全部迁出。十年抗争才“完璧归赵”。这时，轻工学院已成立五年了。这能给学校的教学工作带来困难而影响发展吗？

学校从中专到大学是规格的提升，是一个质的变化，而决定性的东西就是基础课的档次问题，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原化院的师资几乎全流失了。数学、物理、外语师资的高档次扩充是个最大的难题，而且是急开的课程。经过10年动乱，高校没有毕业生，难以补充。没办法，只好求援于东北重机学院教师从富拉尔基到这里代课。外语从俄语改为英语就更没着落了，刚从专科毕业的工农兵学员都成宝贝了。原俄语教师改教英语，谈何容易，但也得硬改。好

在文革期间，在齐齐哈尔有一批外地归来的本科毕业生，其中有不少是我在一中时期的学生，有的就投奔到我这里来了，这些人也搭救了轻院一驾，算起来要有十几个人吧！补充、提高师资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就地选才，办班提高，因为等、靠、要在当时是等不来的。建学院之初，共有教师 141 名，层次偏低，其中本科毕业生 50 人，专科毕业生 42 人，中专毕业生 50 人，当然中专毕业生一般都经过了进修和提高。经过五年的调整、充实与提高。教师总数达 315 人，其中硕士生 3 人，本科生 75 人，专科生 32 人，中专生 22 人。教师的结构已经发生了质变化。作为主管学院教学工作的副院长，这五年，我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基础课的质量，确保大学的规格。二是师资队伍的建设，提高师资的规格与质量。三是抓实验课与设备的落实，确保实验课开出。经过五年的努力，可以说完成了从中专从大学的转变，才达到了化工学院时期的水平，可以想像到，动乱的十年对学校破坏的严重性。当然，有些地方还是超过化院时期，尤其是在科研方面，有了很大突破与提高，这应归于王墨林、陈一鹏、吴绍新三位骨干教师的努力。这三位教师是这所学校之初的骨干教师，尽管他们当时层次不高，但他们敬业精神，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令人赞叹。他们最终成为这所学院的学科带头人，而在全国的同行里，也享有一些声望。这是他们的庆幸；也是学校的庆幸。写到这，我再次缅怀他们，这所学校应该永远缅怀他们。

1982 年的校庆 30 年是这所学校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学校已完成从中专到大学的过渡，但不能说轻工学院已经建成。学院仍属于建设中的学院，任重道远。

1983 年学院党委决定要召开第二次党员大会，改选学院党委班子。开好这次会议，选好班子，领导师生继续前进，建设学院是太重要了。由于当时从校外调进干部特多，在班子人选过程中在学院领导中与干部中都有分歧，意见不一。这显示着学校人气不怎么和

谐了。在这里我几次讲到学校的“人气”。我觉得人气就是一种精神力量。“人心齐泰山移”说的就是人气的力量，在一个单位是这样，在一个家庭也是这样，大到一个国家，何尝不是这样呢？

1983年的夏季，学院第二次党员大会召开了。我感到大会的气氛就不和谐，选举班子，虽然提名的人都当选了，但有些人得票太少了，个别人差点没落选。这样的结果总要刺激和伤害了某些人的感情，而群众对这个结果，对这个班子多少也失去一些信心。这次大会，我继续当选党委委员、常委。1983年9月，由于强调领导班子要年青化、知识化、专业化、省委任命王墨林为院长，作为一种平衡和安慰同时任命我为常务副书记、副院长。人称“双枪老太爷”了。但党员大会的不和谐气氛免不了要带进新一届的常委会，在一些问题上我的意见免不了以“少数服从多数”而遭到否定。这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

1983年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整党的决定》，1984年冬季，省委又派人到学院考核班子，进行民意测评，学院的班子处于待调状态。显然，省委已感到轻院的班子有问题了。1985年的1月，根据中央的整党决定，市委布署轻院开始整党，能整好吗？整整停停，快两年了仍无头绪。在处理文革中干部犯错误的问题上，我与刘毅书记的意见产生了分歧。在我看来，文革中的党员干部他们不是“造反派”的头目，又无过激行为，只是做些外调审干、定案工作、就没必要定为犯错误的干部。而我的意见，又是以“少数服从多数”被否定，我只好说，把我的意见记录下来就行了。在某些人看来，我是“派性”作怪，因为他们多是我的学生。整党其中一条就是反对“派性”，那能整好吗？肯定要鼓动这个单位派性而分裂。我成为这次学校整党的“拦路虎”了。是不是只有天知道。

从党员大会之后，我的工作感到困难，越来越困难，特别是整党开始之后。过去我比较器重的中层干部，甚至拒绝出席我召开的

会议，而派秘书参加，据说是有所授命，“你别给他干！”。在这所学校我干了三十二年，到最后竟发生了这样的情形也够惨了。可以说是咄咄怪事了。这也预示着，我在这里的工作干到头了，该退休了。

1986年4月23日的午后，突然刘毅书记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你现在就可以离休了，说这是省委的意见。这时我已经63岁了，也该退了。我当即表示同意。第二天，1986年4月24日召开了党委会，正式宣布我和钱广昌同志一同离休。是不是因为我钱广昌也不得不退呢！很遗憾。1946年4月24日我参加革命，真是巧合，我整整干了40年。这是天意吗？

刘毅书记待我不薄，我记得，他来校那年的冬季到我家看望，发现我的房子太冷，亲自找后勤部的人为我家送来了电热器，超出电费由学校支付，并一再对朝珍说“元士好，人才难得”。我的入党，是他亲自到省委一手策划的。我离休后，在住房问题上刘毅书记仍予以照顾。没想到，到最后我与他不欢而散。我与他的分歧主要是对干部、对人的看法上的分歧，退下来之后，我还常想起刘毅对我的赏识与恩情。没什么，我们毕竟同舟共济，渡过了轻院初期的难关。想想这些，我们都会心安理得了。要记着，人都是有感情的，理智是控制感情的，但理智又常常控制不了感情，就有可能做了他不应该做的事、甚至坏事。历史上有多少英雄人物又何常不是这样呢！那么又何去呵责我们这些小人物呢！理解万岁！宽容万岁！

从1983年开始，到我退下来的1986年，这四年，学院发展缓慢，有些工作处于停滞状态。这几年，我又不去常跑轻工业部了，本来轻工业部计划在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要收回这所学院，归轻工业部领导。那样对学院的发展，起码对学院的基本建设会大有益处的，没实现，怨谁？上面、下面都有原由。

7、离休后的日子里

我突然离休，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一时觉得空荡荡。头几天有人不知道，还找我谈工作，没多日子，我还得操起学院留给我的校史与校志的编写任务。到 1986 年第一部校史已经写完了，但审定了三年，于 1989 年 8 月出版发行，这又不知道为什么，不去想了。接着我又编写了第一部校史的后续部分，于 1992 年正式出版发行了。校志的工作，几起几落，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齐齐哈尔轻工学院志》于 1997 年 10 月正式出版发行了。这三本史志书，都是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正式发行的。

我从学院的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社会活动却多起来了。民主党派工作，抓我不放，省、市政协工作也有我的任务。就像“前言”里说的那样，退下来之后，我没休息一天，而都不是因为家事。只空荡荡几天，退下来的生活依然充实，因为有活干。而是接触社会机会多了，倒显得丰富多彩了。

1996 年 11 月 21 日齐齐哈尔轻工学院与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合并，成立了齐齐哈尔大学。这对齐齐哈尔来说是一件大事，是齐齐哈尔教育史上又一个重要里程碑。这时，我刚编完《齐齐哈尔轻工学院志》，这部志时限到 1995 年，就差一年，我只好来个“编后记”，把轻工学院 1996 年的大事及其重要发展，写在这里。这样，《齐齐哈尔轻工学院志》就完整不缺了。再向前，就是齐齐哈尔大学的历史了。

齐齐哈尔大学把建校纪念日定在 1952 年，也就是齐齐哈尔轻工学院的建校年。因为它早于齐齐哈尔师范学院。2002 年的 10 月 18 日齐齐哈尔大学举行建校 50 周年庆典，会场设在新建的现代化的齐大体育场。它的前面就是新建的齐大教学主楼，也就是轻工学院时期规划的教学主楼。体育场的左前方是正在修建的现代化、功能齐全的“综合体育馆”，右前方就是扩建后的原轻院的图书馆。体育场的右侧就是“格迈纳尔”职业学院的样式美观的教学楼。齐大

西区的建设，可以说是完整了，非常壮观。学校的中区也就是原轻工学院的本部，大变样了。增建了“计算中心”楼，和两座化工楼。50年代的建设，只剩下三座不太高的楼房，那就是南楼、北楼和中间的化院时期的教学楼。齐大的东区也就是师范学院那部分也大变样了，新建了“生命科学楼”。“文史大楼”，又把传染病院那块地方买下来，正在建设“艺术中心”大楼和现代化的“游泳馆”。矗立在劳动湖边的齐齐哈尔大学，真的成为环湖大学了。市政府已对劳动湖进行了改造，死水变成活水，加上美化、绿化、这里已经成为齐齐哈尔的名胜景点了。还有，轻院时期一直要把“看守所”迁出的梦想，也终于在这一年实现了。建设中的“综合服务楼”和“学生公寓”也矗立在劳动湖边，据说“武警”小楼在一两年内也要迁出，而要成为齐大的领地。剩下，湖边还有两家小单位，早早晚晚它们也得迁出，而成为齐大的属地，到那时，环湖大学的齐大就完美无瑕了。这一切都是在1996—2002年的六年时间内发生的大变化，令人赞叹。

建校50周年的庆典在当日九时隆重召开，中、外嘉宾、省市领导到会祝贺，国家领导人周铁农发来贺电。校长唱江华发表讲话，掌声四起。会场隆重、热烈。我坐在主席台上，心里美滋滋。我为齐大的发展感到高兴、骄傲。我也为校长、齐大的第一任校长唱江华，在经过六年时间，带领师生们取得的成就，欢心鼓舞。我们有师生的缘分，我也深感欣慰。现在的齐大正在争创省一流大学而继续奋斗。齐大是祖国边疆最北方的大学，有地域弱势。但事在人为，我相信齐大人有志气，终究会成为名校，北方的名校。这会是一所很有希望的大学。

九、我的政治生涯与社会活动

政治这个词，在词典里是如何注解的我没有查过。但这个词关系每个人，谁也割不断与政治的关联。说政治就是治人对不对呢？

对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说的就是政治吧！治人，治于人，不是前者就是后者，谁能脱离这个网络呢？我年青的时候对此就很不觉悟。在做年终鉴定时，动不动就被写上“轻视政治”。历尽沧桑，到了晚年，我要劝说我的后人：不要忽视政治。而他们在这一点上，常常是听不进去，对政治没有自觉性，就可能是个糊涂人了。治人，治于人都要有觉悟才行。

到了近代，政治的发展到集团形式，政党与政党之间的斗争与合作，各自代表其人群的利益。在中国则有国民党、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

国民党、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都是为救中国、救人民而成立的政治集团。他们的主张都是好的。国民党的功绩在于推翻了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还政于民。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人们称之为“国父”但是他的继任者蒋介石背叛了“三民主义”，背叛了国共两党合作，国民党失败了，共产党胜利了。根源在于民心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的民主党派多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成立的知识分子政治集团、或者说是联盟。他们为救亡、为抗战、为施行民主政治而奔走、呐喊。他们在斗争中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而拥护共产党，并与共产党合作。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政党斗争与合作，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这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人民的意愿。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长春我才接触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我觉得都有道理。由于传统观念，我比较倾向于国民党，也曾有人约我加入国民党，我拒绝了。我有一个“君子不党”的观念，而在当时我的愿望是：抗战胜利了，共同建国图强才是正事。太天真了，事与愿违，这才有在长春那段日子里的胜利后的困惑与彷徨。

我参加革命，前面说了是逼出来的，是不自觉到自觉，当我觉悟了，我愿意也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是由于家庭成分、社会关系、阶级斗争，渴望而不可及。

1、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56年，这一年也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周恩来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讲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这一年也是中国各民主党派的春天，他们可以在全国大中城市发展组织了。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市委统战部约我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在齐齐哈尔市建立组织的座谈会。我才知道，我已被共产党纳入统战对象之中了，那年我32岁。到会的人多是我的师长，我算最年轻了。在会上我没发言也没表态。事后，统战部长找我谈话：知道你要求加入共产党，但统战工作也是党的工作，你加入民盟也是党的需要。话说到这份了，我只好申请加入民盟。

我加入民盟，在当时的化工学校产生了影响。接着就有一些非党知识分子要求入盟。经我介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发展了七、八名盟员，并建立了民盟支部，先由史怀文老先生任民盟支部主委。他去世后，我只好担任民盟支部主委。在当时的齐齐哈尔，化校民盟支部是成立最早，人数最多的支部了。我们这些人当时所以要加入民盟，一是因为民盟是爱国的，并与共产党有过长期合作历史，二是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民盟不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共产党的友党。

好景不长，春光太短，1957年是中国又一个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共产党整风，民主党派要助党整风，助出来“反右派斗争”。“民盟的动向值得注意”一篇评论员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民盟成了反右派斗争的重点户了。民盟的化校支部在劫难逃了。整风期间，党总支书记找我谈话：民盟支部要开会助党整风，要对党的干部提出意见。我说没有时间。他又说：晚上开也行啊！我只好在一个月晚

上在北宿舍白老师家，召开了支部会，让大家提出助党整风的意见。第二天，我汇报会议的情况，并把会议的记录交给了总支书记。没想到，反右斗争一开始，这个会就成了“黑会”，而且是在晚上，在北宿舍，召开了一个向党进攻的“黑会”。因为索化远老师说了一些“党天下”的话，张洪斗老师说了一些“三种干部”不能领导学校的话（土改干部、担架干部、军队干部）而被打成“右派”，我呢？主持会议，而且召开了向党进攻的“黑会”，也得说清楚，我争辩那次会议是总支书记亲自部署的会议，并非我的主意。记录里有我的讲话，又查不出我的“反党言论”就这样没法定罪，结果把我定为“中右”分子，也就是不戴帽的右派了。在这个支部里定为“中右”的又何止我一个呢？

这场斗争对民盟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损失。入盟的人都有悔不当初之感。还有一些要求入盟提申请的人，都要求我退给他们的申请书。当时化校定了三个“右派”民盟占了两个。谁还愿意加入这个组织呢？

反右斗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部分”的话不灵了，各民主党派都姓“资”了。这样的民主党派只好承认现实，接受改造，要“脱胎换骨”。改造成为盟内生活的主要内容。一开始，盟内生活是紧张的，后来有了“三不”政策，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的政策，“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仍是有点提心吊胆，再后来又有“神仙会”的政策，盟内的生活开始生动活泼了。及至三年灾害时期，中央在广州召开了知识分子座谈会，陈老总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了”。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这时正是那年的中秋季节。白绍昆老师说：“这比送给我月饼更温暖，再高兴不过了”。可以想像我们这些人那时的心情，由紧张到轻松。

曾几何时，到了 1963 年中国的政治风云又变化了。阶级斗争

又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知识分子虽然“脱帽加冕”了，但是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日子里，他们的精神世界不会是轻松的。盟内的生活又是趋向紧张。

1966年的春天，阶级斗争斗到党内来了，而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共产党的组织瘫痪了，民主党派的牌子都摘掉了，盟内的生活也停止了。这时的知识分子不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了，也不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而又是资产阶级一部分了。不仅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就是新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了，因为建国以来的教育战线都是“黑线”统治，怎么能培养出红色的知识分子呢？听起来也在理，不认也得认了。

经过10年动乱，到1976年的10月政治风云突变，粉碎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欢腾的十月，胜利的中国，全民欢呼，这回可好了。受折磨的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复活了。真是“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四人帮”打倒了，受“两个凡是”束缚，经过两年的徘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阶级斗争为纲”被取消了，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更扬眉吐气，欢呼跳跃起来了，要放开手脚，大干社会主义了，随着“拨乱反正”的日益深入，知识分子又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民主党派开始恢复了组织。这时齐齐哈尔轻工学院于1977年成立了，1978年11月5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当上了齐市民盟恢复组织的领导成员，民盟轻院支部在齐齐哈尔首先恢复组织，从而带动全市民盟组织的恢复。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过程，经过多次反反复复，人们对民主党派仍是疑虑重重。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对人们的教育作用很大，增加了人们的信心。民盟支部恢复后，我仍任支部主委。

1979年，齐市民盟召开代表大会，我当选为民盟市委的副主委

员兼任盟市委的秘书长。从此，我进入市民盟的领导班子，还进入省盟的班子而成为省盟的常委。

1987年，我被推举为代表，参加民盟全国代表会议。这是我入盟以来参加最高层次的民盟会议。各民主党派是同时召开这样的会议，中央统战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祝贺各民主党派会议胜利召开。平生就这一次参观了人民大会堂，并在大会堂吃了国宴。这是我加入民盟的“最高奖赏”。

1986年我从轻院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可以休息了，但民盟的工作仍抓我不放，也好，当时我60多岁，体力与精力尚可，主要参与民盟的社会服务工作：办学、科技咨询、科技扶贫等。有偿服务，为民盟也赚了不少钱，五年多，总有30多万吧！资助民盟的经费不足，和干部的住房等问题。

1991年1月市盟领导人周宗鲁先生去世，又逢换届之年，有一个谁来接班的问题。当时盟省委、中共市委举棋不定。我曾在省盟的会议上和省盟领导人及市统战部领导谈话中，一直表示：我年龄大了，退休了，又加入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代表性，不应再做市盟的主要领导人了。但是中共市委却认为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就找我谈话，不许再说“不干了”等类似的话，我只好服从。这时齐齐哈尔市委的各民主党派都已经完成了换届工作，只有民盟一家遇到了困难。及至1992年的一月，中共市委下令任命我为民盟市委换届领导小组的组长，由我负责组织换届工作。并要求在1992年春节前完成换届任务。仅有一个月的时间，太紧了。而1991年1月我骨折受伤，几乎一年不去民盟市委了，对周老逝世后的民盟市委也有些生疏了，人员状况与思想动态也不太了解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压力太大了，时间太仓促了。特别是这个决定挫伤了有些人的积极性，不仅合作不好，而且出难题，制造麻烦和困难。换届的工作报告只好我亲自起草，班子的人选工作只好交给统战部把

关而由驻会副主委推举了。就这样，急急忙忙召开了民盟齐齐哈尔市第七次代表大会。对这次大会能否顺利进行，我没有把握。果然，在选举时出了问题。秘书长的候选人落选了。而我只多一票超过了代表名额的半数，而不是每次出席会议的人数的半数当选。不知道这次选举为什么这样定。事前，我也没去过问。市盟的“七大”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我虽然当选了委员，但在委员会第一次选举主委时，仍然有几个人提出我任主委不合适。其理由也就是我自己提出过的那三条。但经投票获得多数票，我当选了。

市盟的第七届委员会是在盟市委的创始人之一的周宗鲁先生逝世后开展工作的。我能否接好这个班，做好工作是个严重的考验。我首先感到过去市盟的组织建设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后备干部的培养大大地落后了。尤其当市人大、市政协换届时，民盟、九三、民建三家主委因年龄大，都没做市级安排。我虽然在市委的协商会议上提出意见，这不合适，不是个人年龄的问题，而是对党派组织安排，涉及参政议政的问题。这个意见，未被采纳，我更觉得应该提前退出才是了。

我任市盟七届委员会主委，一开始我就着手选拔培养新人。调整班子。辛培之、张万起都是我与中共市委协商而定下的人选加入民盟。并经过两次全会，补选他们为市盟的主委与副主委。我于1995年主动提出辞去市盟主委的职务，而被推举为“名誉主委”。这时，我才如释重负轻松下来。

市盟的七届委员会头一年遇到了困难。工作也出现不利。但从1993年开始，工作走上了轨道，人心也较顺，参政议政，组织建设，各个方面均不落后于其他党派，尤其在社会服务方面，成绩突出。并代表盟省委出席东北地区民盟交流会和中共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各党派交流会，获得奖励。

市盟的第八次代表大会1996年举行的，大会开得很顺利。由

于我提前一年辞去职务，辛培之为主委，所以辛培之、张万起都顺利当选第八届委员会的主委、副主委，马炳竞继续当选秘书长。这时，我为自己能顺利交班，完成七届委员的工作任务而欣慰不已。大会继续推举我为名誉主委。我的民主党派工作，从此，就完全息手了。

2、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我对中国革命运动有了觉悟，就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但终因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因素，宿愿难遂。1956 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那一年有多少要求入党的知识分子入党了，而我在那一年加入了民盟。其实，那一年我已被基层党组织列为党的积极分子的名单中了。当我入盟以后的那年的冬天，我还被邀参加市教育总支举行的入党宣誓大会，并作为非党积极分子的代表在大会上作表态发言。接着，在党支部的大会上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并获得支部大会通过。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得到上级组织批准。但到了 1957 年之后，机会似乎不再来了。

轻工学院成立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也就是 1978 年学院党委书记刘毅到中共省委汇报工作时，提出我的入党问题。省委组织部认为时机已到，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可以入党了。并说，你们可以直接报省委批准。刘毅同志当即找我面谈，要我再写申请书，报省委批准。当时，我说：由市委审批不是更省事吗？刘毅认为也行，当即用电话与省委组织部联系，省委同意并向市委传达意见，由市委审批。就这样，我在 1978 年 11 月 5 日在轻工学院礼堂宣誓入党了。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新闻媒体对我的入党广为宣传，轰动一时。连在林甸下放的赵朝枢，我的内弟都知道了。省委组织部还在内参上发表信息：像张元士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还有重大问题的知识分子可以入党了。接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在齐齐哈尔市就有一大批像我这样的

知识分子入党了。

我的入党是当时轻院形势发展的需要，对我来说也是工作需要，绝无个人企图。那时我已经是学院的副院长了。但是因为我是1956年就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在省、市级盟内任有领导职务，入党之后我仍不失为非党干部的角色。在社会活动中，总是作为民主党派成员的代表。

我入党以后，使我有可能在领导岗位上任正职，而不总是副职。80年代初，省文教办杨辉主任曾向刘毅提出建议，调张元士去师范学院任院长。刘毅说张元士可以在本院任院长，何必调出轻院而提出意见。杨辉当即表示同意，并让轻院提出申报。但当轻院提出申请时，中央提出了年青化的要求，这个申请也就作罢了。这是刘毅亲自对我说的。我的子女，常问我：爹爹你怎么总当副手而不是正手呢？我说副手当好了也不容易啊！是的，我在工作岗位总是配角。当配角，总的算演得还可以。只是最后一场演砸了。所以，我这一生最佳配角奖也得不了啊！如果不入党的话，也许能得个“奖”，那也得另说。

3、人民代表与政协委员

自从我被任命为学校的副校长，作为非党知识分子而被纳入齐齐哈尔市政界的视线，不时应邀参加市里组织的座谈会。及至化工学院成立，我开始被选为齐齐哈尔市的人民代表。从1960年开始当选为市四届、五届、六届、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共七届的人大代表（第七届因文革而空缺）。大概是在市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在选举常委时，实行差额选举，我被推举，但差额落选了。我被提名出乎我的意料，被差下来意料之中。我不以为然。但当时的市委组织部孙部长要找我谈话。而没有找到我，有点遗憾。其实没什么，能被推选为候选人已经够荣耀了，起码让更多人知道有个张元士。现在不是还有“提名奖”之说吗？

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当代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经济发展计划与财政预算等。每一届的第一次会议都要选举市长。如果市长中途调走，还得补选，那我就是不只选七个市长，而是更多了。这就叫作代表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是共和国的象征。当人民代表是进入政界了。

文革以后，从 1979 年开始我被协商推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的第四届、五届、六届、七届委员会的委员，并当选第七届委员会常委。在这期间我还当选为市政协委员常委，直到 1997 年我不任民盟主委才退出常委。现在我还是市第九届委员会委员。我的政协委员工作也该画上句号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现代政党制度的体现形式，它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作为政协委员一般都是社会各界有代表性人物。通过政治协商，使他们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也是人民行使政治权利的一种形式，是具有特色的现代中国民主制度。在政协会议上，委员们可以对政府工作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会议是生动的、活泼的。我作为省、市的政协常委参加政协组织的视察工作，了解社会，体察民情。

人民代表、政协委员都是一种荣誉，更重要的是一种义务和责任。当你尊重这种荣誉时，你就会尽到你的义务和责任。否则，就是徒有虚名了。

我的婚姻、家庭与后人

一、千里姻缘 相会龙沙

我与朝珍订婚于 1943 年的夏天，成婚于 1946 年的冬天，朝珍于 2001 年 11 月 17 日晨离开了人间，享年 77 岁。我们共同渡过银婚、金婚，组织家庭，生儿育女，共同生活了 55 年，加上婚前的四年多的时间，那就是 60 年了，可以说是结发夫妻白头到老了。

千里姻缘一线穿，我们是同一年，同一个春天，一个来自大连的旅顺口，一个来自海城的验军堡，都是辽宁人，谁能料到那时相逢的少男少女，竟成了终身伴侣呢？那是 1935 年的春天，我家先于她家来齐，住在薛家的左暖阁里，不几天，薛家就接来了海城的赵家母子三人，其中一位少女就是朝珍，只有半天时间，赵叔就把她们接走了，我们是相逢不相识，八年之后薛家竟成为我们两家的媒人，我与朝珍订婚了。真是个千里姻缘，相会龙沙。

谈起我与朝珍的婚事具有时代特色，那时虽已兴起自由恋爱婚姻思潮，而我们两人都有旧观念束缚，于是就有了父母之意，媒人之言，自主选择的这种自由又不完全自由的婚姻了。

1935 年的春天，我就读于齐齐哈尔华北小学三年级，下读了一个年级。朝珍入学于华北女子小学一年级，在这之前，朝珍在海城念过一年书了，我们同一年来齐齐哈尔，同读一所学校，又同下读一个年级。三同合一，真是巧合，讲三合莫过于天、地、人而我們也能找出个“三合”，何其和也。

当我 15 岁，小学毕业的时候，就有人来向我家求婚了。这么小的年龄，就有人求婚了，怎么说呢？比起父亲 15 岁就结婚了，能说小吗？依我父母的婚姻观，男儿 15 也该有婚约了。到了中学三年级向我求婚人家的节奏加快了，先有李家女，后有郭家姑。他

们都是我家的同乡，郭家姑娘美貌动人，也曾惹我动心。但到了中学三年级，我的心力集中于备考大学就淡于婚约，而李家女、郭家姑都只有小学文化，他们当然不是意中之人了，应该说，这时我对婚姻有自主之见了。

朝珍读小学，学习成绩名列班级前茅。她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齐齐哈尔女子国民高等学校，用今天的话说，那就是中考女状元了。她入学后即当班长，胸佩红花，以示标记，她相貌端庄，身段匀称，皮肤白嫩，白里透红，特别引人注目。她上学、下学都要结伴同行，小心男高学生尾追戏语。曾记得，我的同班同学庞姓，其妹与朝珍同学。他有朝珍的照片给我看，并写信求爱，但遭到朝珍拒绝，并令其同学把照片要回来。后来，我的同学写信致歉，把照片送回。但那时我不知道照片的少女竟是朝珍。还记得，在中学四年级的夏季一个下午，我去天齐庙观光，碰上了同班的两位同学在追逐一对女高学生。婚后朝珍对我说，被追逐的一对之中就有朝珍，追到她们没办法而躲进一所大车店里，才得以逃脱。我与朝珍订婚后，仍有一位男高学生，几乎天天尾追其后，甚至追到家门口叫门，求爱信一封又一封，朝珍均弃之不读。凡此种种，均可见朝珍的高尚情操。

中学毕业，我考上了大学，向我求婚的女性就有四位了，其中两位都是女高学生，其中一个是朝珍，另一个是与父亲同事的妹妹张姓，是龙女高的学生，我与张家女有过多次数相遇在巴士车上，当时我们两家都住在大民屯。在我患疥疮病期间，她还为我带过药物。应该说，我对她，她对我都有印象，感觉都是好的。那时，张家女比赵家姑娘更急于约见订婚，我记得在大学的第一个春假，在归校的一个午后，我与父亲来齐赴约相会，但她失约了，我感到她无诚意，我就执意作罢了。其实是她把时间记错了，并非无诚意，还等再约，她还以为我们这门婚事已是板上钉了。如果真的那时相会了。

我想会与张家女订婚的，因为那时薛家尚未谈及我与朝珍的婚约问题。我与朝珍订婚后，朝珍一位同学还说“张元士不是已经与我表妹（张家女）订婚了吗？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只能说我与她无缘啊！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个时候向朝珍求婚的人家也不少，其中就有我的两个同学，有一家，人称是财主，这时薛娘也为我向赵家说媒。在“财与才”的争夺中，我的岳母很有主见，他力主我与朝珍的婚约，岳父有疑义，认为我父亲太小气，而朝珍则倾向我这边，岳父也只好顺从母女了。

说起这段婚姻，也有逗趣人乐的小品，父亲信佛，当有四位姑娘，让我选择的时候，他祭起香炉，点起蜡烛，在观音塑像前，摆上四位姑娘的名签，让我抽取一个。这个时候，我已心向朝珍，但愿菩萨保佑，果然，佛随人愿，我抽中了朝珍，父亲说“这是天意，这是缘分，就这样定了”。这是一个真实过程，后来，我曾对人说过，为抽中朝珍，我耍了诡计，把四个名签都换了朝珍的名字。这是戏言，只是表明我对朝珍的爱慕，不是迷信而已，在当时我们还谈不上爱情，我与朝珍之间，只有照片相看，而无实际接触。

1943年的暑假，是我与朝珍订婚的夏天，就在我要乘晚上的火车去长春的午后，我与父亲应约去赵家相会，薛娘与李娘已先去赵家等候，我们一进赵家，朝珍面带笑容迎接我们，我还以微笑，两眼相对，心照有宣。进屋后，相叙片刻，薛娘问朝珍，李娘问我，各自意向如何。我们都表态同意，就这样我们订婚了，并都在订婚证上签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我们去“立石照相馆”照了订婚像。照像时，我有些紧张。这是我第一次与姑娘比肩照像，紧靠着，我紧张得连呼吸都不均匀了。而朝珍却显得平静文雅。相比之下，我的心理素质不如朝珍啊！当晚，朝珍送我到车站。开车前，我们漫步站前广场，相互鼓励，憧憬未来。相恨时间太短，临别前，朝珍送

我一幅手绢，作为纪念。而我呢！没有准备什么，颇感遗憾。朝珍心细、心重于我也。一夜火车，我陶醉在婚约的幸福之中。

两家婚约之后，已定为亲家。父亲来城里公务，赵家就成了他的落脚之地，并把朝珍视为自己的儿媳。不管朝珍学业如何，就把一些活计塞给朝珍。曾记得一个冬季就让朝珍针织三条生毛线的毛裤，把朝珍的手都磨出茧子了。这有些过分，误了朝珍的学业。

1943年的寒假，我从长春回家。火车到齐齐哈尔是早晨六点钟，我下车急奔赵家。我的突然造访，弄得赵家措手不及，不见朝珍的踪影。岳母热情接待，并说“元士来了”示意朝珍，但仍不见朝珍下炕。我有些尴尬。稍息片刻，我快然离开赵家，心理很不是滋味。心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走后，岳母埋怨朝珍太不尽人情。而朝珍却说：我没梳头，没洗脸怎能见人啊！原来她一大早正在忙织那生毛线的毛裤呢！她没想到，我怎么那么快就走了？

那天，我离开赵家去大车店，便乘去达呼店畜力大车回家了。到家以后，我当即写了一封信寄给朝珍，其中有一句话是“我的心情很不是滋味”。没想到这句话竟成朝枢取逗姐姐的话柄。不几天，朝珍回信约我去赵家度假几天。1943年的冬天，对我们来说是美好的，是甜蜜的青春之恋的冬天，我们的恋爱开始了。在一个岳父、岳母避开的晚上，我们贴身相抱，我吻她，她吻我，吻个不够。我们都感到地球上只有我们俩个人了，其它一切都不存在了。

1944年朝珍从女高毕业。这一年的暑假，朝珍同我一起乘火车去长春，她是应试长春中医学院。到了长春车站，正是夜半，我们到处找旅店投宿。不管是中国人开的，还是日本人开的，均以客满为名而拒之。我们两个人只好相依相偎在长春的火车站与街边，过一个不眠之夜，一个幸福之夜。第二天清晨我送朝珍去其堂叔家。这次应试，朝珍没有录取，朝珍并不死心，第二年也就是1945年朝珍又第二次只身来长春投考这所学院，自我感觉良好，有望录取，

没想到，日本人投降了，她的希望落空了。这时，朝珍已经就职于她的小学母校，当了小学教员了，这个学校的校长还是她读小学时的那个小脚女人，人称“李小脚”她对朝珍的印象很好，她知道朝珍是一位好学生，从此，教师的职业就成为朝珍的终身职业了。朝珍一直想学医术，继承父业，掌握生存本领，她是一个不依男人，不靠男人生存的女性，就当她中年患病长休在家时，我一再劝她辞去职务，均不允，而拖着虚弱的身体在大跃进的年代又上班了，她是一位性格刚强，充满自强、自立之心的伟大女性。

祖国光复以后，我们两个人都在教育岗位上从业，朝珍也想继续读书，并报名入女子高中，但两家都奈于生计，只好都从业了。我家搬到城里，住在赵家附近，早晨我们结伴上班，几乎天天见面，后来，参加革命了，我家搬到联合中学的院外“八趟房”后来又搬到院内的房子，都是日本人留下的住宅。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我不管朝珍忙不忙，约她相聚。有一次她没有来，我生气了，恨她，就把我们订婚照片的玻璃框子砸了。后来，朝珍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你不来我就恨你。人的感情就是这样，爱和恨是相连的，爱到疯狂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常常理智控制不了感情，甚至可能产生悲剧，警惕啊！人们。

1946年12月1日，我们结婚了，这主要是我的要求。赵家觉得政局不稳定，应再等时日。而我家执意要成婚，赵家只好同意了。为此事，我的岳母追问朝珍，你们这样急于成婚是否已发生关系怀孕了，说实在的我们没有那回事，我们订婚快四年了，均保持了男女应有的情操。

1946年12月1日结婚那天，天空飘着雪花，我们乘一辆马车到华国饭店成婚。婚礼算是新式的。证婚人请“查仪长”为证。这位老人，在旧社会当过仪长，与我岳父有交，证婚人的资格不算低了。我记得当时联合中学校长，女小校长都参加了。当时的联中的

工科学生来的很多。这可苦了我们，一阵暴风雨似的米谷夹着纸花向我们袭来，从楼下走到楼上就是上不去，这场袭击确实很厉害。我们婚礼成了年轻人——我们的学生们欢乐的海洋。

婚礼那天，我第一次穿上了西服，穿上了皮鞋。这可都是工大同学王文玉的，王文玉在我之前刚完婚不久，他这套行头还很新，为结婚，我应该置一套西装和皮鞋，人生就这么一次婚礼，再穷也不能穷了婚礼啊！可那时家境确实太难，刚遭清算斗争，父亲靠卖破烂维持一家的生计。而我的工资是以粮谷为价，这时我不能逼父母去置婚装。借衣服结婚也算没招的好招了。这件事朝珍也知道。她很理解。可是赵家就不这样了，为朝珍的婚事，借钱为朝珍置了嫁装，一个立柜，一个写字台，两把椅子都是新的，到今天，只有那个立柜还在家里立着。如果没有吴伦校长在土改时的阻挡，这个立柜也不会有了。这个立柜就成为我们成婚的永久纪念了。谁知道它还能立多久？我的后人能喜欢它吗？我的婚礼，有些地方也够寒酸了，可见，我这个人什么事都可以对付过去，不拘一格，也可算是一种潇洒了。

二、 同甘共苦 风雨人家

我和朝珍共同营造一个三世同堂，共同生活了 55 个春秋，在一个多灾多难的家庭里，有苦有乐，有喜有忧，哪个多哪个少也计较不清，其实苦与乐、喜与忧都是相联的。一个家庭的苦与乐都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曲调。我这个家庭的晴雨，总是同政治风云联系在一起。有时晴，有时阴。晴转多云，多云转晴，也有风雨交加的时候，真是风雨之家。时间长了，我们都认了，忍了，习以为常。重要的是我们都能正确对待大局，心声相通，相互慰藉，同甘共苦，同喜同忧。我们都努力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气氛，组织一个和睦的家庭。

中国的家庭，三世同堂在旧社会是比较普遍的。但那时都是以

损害女人的利益为代价，以封建意识，礼教传统为精神支柱的。新中国成立后，旧的三世同堂逐步瓦解了，越来越少了，代之以新的三世同堂也不多见，从1949年我的大女儿出生算起，到1983年父亲去世，我这个新的三世同堂共维持了34年，在当今的中国，也是少见的。都是三世同堂，新的总是带有旧的痕迹，免不了要有新旧两种思想的碰撞，和不了的，只好解体分居另过了。但是，我与朝珍从未有过与老人分居过的念头，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亲情、爱情。亲情、爱情都是人间的真情。在大变革的年代。政治界线是要划的，我们也是分得清的。而真情是界线是难以割舍的。起码，在我与朝珍身上是这样的。朝珍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她的一切。她热心教师职务，操劳家务，侍奉公婆，养育子女。她是一位优秀教师，又是一位贤妻良母。

朝珍是一位优秀教师，在教师岗位上奋斗一生。朝珍于1944年中学毕业后，就被当时天主教私立小学，也就是她的母校聘任为教师了。那是因为那位小脚女人校长，深知朝珍的底细，是她的得意门生。当然是情愿、主动聘任了。

解放以后，朝珍继续在这所学校任教师。土改后，我们从农村回来的那个春季开学，市教育局的周局长找朝珍谈话，给朝珍看一个条子，上面写着“调赵朝珍到吴伦处工作”。这显然是第一中学的吴伦校长看上了朝珍了。朝珍问局长调我去一中做什么啊？回答是：“你去问吴伦吧！”吴伦校长看上朝珍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事前也并未与我沟通，那时，我与吴伦两家是同住一趟房，两家

是邻居。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与朝珍常在家唱歌，她以为朝珍也擅长音乐，就调朝珍到一中任音乐教师。这真是阴差阳错，其实朝珍的辨音能力差，合唱还可以，但她独唱就常常跑调，她并不适合做音乐教师。当时一中又缺音乐老师，只好“拿鸭子上架了”。好在朝珍识谱能力较强，五线谱、简谱都行，上课就得按风琴，边教

边唱。她很认真，还和另一位教师组织一中的大合唱“铁树开了花”。唱歌毕竟不是朝珍的长项，后来在朝珍的一再要求下，改做一中的教导干事，继而又调回小学做她的教师工作。

当小学教师，朝珍就可以大显身手。先是“六完”“八完”继而是龙华路小学。这都是因为有了大女儿祝华，随着岳母家的搬迁，为便于岳母照看祝华而主动要求调换学校的。朝珍每到一所学校都深受学校领导的欢迎，都认为她是一位合格的好老师，她每到一所学校都让她组织学生合唱团，这是因为她在一中教过音乐课，不管她行不行。朝珍做什么都很认真。“天下无难事，就怕认真二字”。她的小学生合唱团被齐市广播电台看中了，建国前后那个年代，她的小学生合唱团就成了市广播电台的常客了。

龙华路小学很重视朝珍，把一个“速成班”交给了朝珍。速成班就是把一部分年龄大点的学生编成一个班，要四年完成六年的教学任务，这个任务是很繁重的。朝珍成功了。但也把她累坏了。到后期朝珍不得不忍着头痛，额上捆着毛巾上课。当年未选先进工作者时，群众一致推举她当先进。但校长不同意。要朝珍主动提出不当先进。为什么呢？我的家庭原因吧，当然是政治条件不合格了。

朝珍做小学教师是完全称职的教员。50年代初工资改革拿工薪分时，当时的市教育局选朝珍做全市标杆，开展评定工作。可见赵朝珍在当时的小学教师中是小有名气了。

两年的“速成班”教学，累坏了朝珍，她的健康状况日益下降。1953年春天的一场感冒，朝珍高烧不退，说明其免疫能力急剧下降，经岳父诊治，虽然高烧退了，但身体虚弱，难以维持，加上神经衰弱，睡不好觉，没办法只好告假在家修养。这一病就是五年没上班。1956年的工资改革她当然上不了车，工资也就上不去。我劝她辞职回家，我养活你就行了，但朝珍坚决不同意。到大跃进的1958年。她在家呆不住了，拖着有所恢复的虚弱的身子上班了。

朝珍重新归队上班，她被市教育局分配到天齐小学。她在这所学校一干就是 24 年。最后从这所学校离休。开始时，她身体虚弱，学校离家又远。她完全靠坚强意志坚持上课，批改学生作业，样样是一丝不苟。她在这里工作应该是出色的。学校凡是遇到乱班、差班的时候，学校就派她去整治，而且很快就上道了。她从不打骂学生，从不挖苦讽刺学生，而施学生以爱心，用高尚“师爱”感化诱导学生，不管如何调皮捣蛋的学生，经她的教育，都很快归顺了，而且确立了良好的亲密的师生关系。学生也很尊敬关爱他们的老师，几乎是天天的上班和下班时节，总是有学生帮助朝珍推着儿童车上班下班，那时，祝红、祝成白天都寄住在学校的托儿所。他教的最后那个班，有个学生叫张 xx，家里有钱，父母娇惯他，在班里好打架骂人。当时毕业开班会时，朝珍说：“张 xx，我对你很不放心，现在虽然已经改的很好了，但到了中学你要警惕你的毛病不能再犯，否则你要犯大错误，甚至不可饶恕。”果然，那个学生到了中学因为打群架，伤害致死一个学生而被捕入牢狱。当那个班的同学来探望朝珍时，都说：赵老师你怎么看得那么准呢？

朝珍在天齐小学的工作是出色的，是优秀的。但同样是每当选先进时，群众拥护她，而领导拍板时就没有她。为什么呢？还是那个政治标准，尤其是岳父受屈入狱，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就更没门了。我只好劝慰朝珍：我们都认了吧！朝珍说：没啥，优秀、先进老师我当不上，可是学校还给我一个“工会积极分子”的称号，也算是一种安慰吧！在学校她担任工会委员，管工会财务和福利工作。群众信任她，学校的各届领导也都信任她，每当群众福利工作，校长都找她商量。当她年龄大了，学校办工厂，学校就派她主管学校的工厂，带领学生参加劳动。这时如果学校出了差乱班级，又要请她出山整顿。学校工厂停办了，学校又派她和另一位老师负责学校后勤工作，管学校的财务、公费医疗等事项。后来的校长，也是

朝珍的最后一位领导，嫌她们工作太细太慢，就说她们“俩不顶一个”。这可把她们气坏了。人到急眼的时候什么都不怕，年终快到的时候，她认为该是出气的时候了。她用心编写了一篇顺口诗，她用了几天的时间进行准备，想一段，写一段，在学校写，在家写，甚至推着孩子在路上也再想，再写，年终总结会上该她发言了。她滔滔不绝发表了这篇“佳作”，历数了学校全局工作的成绩与问题，也历数了后勤工作的艰辛与困难，批判了“俩不顶一个”的怪语。与会的校长、主任、老师们都震惊了。她讲完了，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有的老师向她翘起大拇指，有的老师说这是一篇好诗，有的老师说赵老师有水平，敢说敢为，她是“女高毕业的啊！”那位校长事后还赖帐对朝珍说“俩不顶一个”不是我说的。这篇发言是朝珍离休前对其从教生涯的最后宣言，可以说，她从教一生，一生的苦闷，一生的怨气都倾泻出来了。她是一位果敢、有勇气的女性。很遗憾这篇佳作没有保留下来。

第一中学家属宿舍

1946年夏天，齐市中学合并，联合中学成立了，我家从安裕胡同搬迁到现在一中院外西边的“八趟房”一所日本人留下来的住宅。到了冬季，为了方便、安全，我又把家搬到一中院内的仍是日本式的住宅，面积不过50平方米左右。因为是供给制，房钱用不着花了。

这所住宅，虽然面积不大，但设施齐全。有居室、有厕所、有厨房。还有浴缸和自来水，房子中间竖一个用铁皮包装的砖砌的圆筒式的取暖设备——俗称“别拉答”。居室是用木框纸板拉门隔成两间。1946年冬季，我和朝珍成婚的洞房之夜就是在这里渡过的。我的大女儿——祝华出生在这里，那是1949年8月2日。三代人，老两口，小两口，加上一个孩子，住这样小的房子确有诸多不便，但在那时已经不错了。我们在这里共住了将近八年的时间，直到

1954年。我一生随着父亲和我工作变迁共搬住了13处家。可以说，在漂泊的人生中，我有过13处避风港。在一中宿舍我们生活了八年，算是比较长的住所了。1946年那一年，我就搬了六次家，从农村到城市，从城东到城西，从一中的院外到一中的院内才稳定下来。

1946年冬到1947年冬是我成婚的第一个年月，这一年，父亲在秋林公司赶马车有工资。在住宅的西南有一片未开垦地（后来改为一中的植物园）父亲就开园种菜，自给有余。两代人四口人，有三人收入，当然，吃、穿都不愁了。尽管经历了1946年的清算斗争劫难，我和朝珍都无苦无忧，一心一意干革命，这是我们婚后最快乐的一年。

1947年末，一场土改风暴，一夜之间，我家被洗劫一空，家没了，我们全家四口被捕往农村，接受农民审判，在这之前，我们学习过“土地法大纲”，要革除封建土地制度，我们拥护。当时我家虽有45晌荒地，但没有开发，没有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没想到这场风暴竟降临到我家头上，我们没有精神准备，像前面讲那样，“吉人天相”我们全家四口人，在风暴中都相继平安地回来了，又回到了一中院内的家，这要感谢当时一中的女校长吴伦同志，如果没有她的关怀与阻挡，这个家也许要被人住了，这个家还在，我们有落脚之地了，尽管空荡荡，一无所有，它毕竟是一个避风港。这一年，也就是1948年的春节我们与母亲在这里渡过的，谈不上吃什么，穿什么，这是一个不团圆的春节，主要是都牵挂着父亲的命运，正月初十那天父亲回来了，安然无恙地回来了，全家人都为之兴奋，高兴，劫后余生的快乐。我们都深感当时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温暖，深感达呼店老百姓明辨善恶的恩德。暴风雨中我们丢掉的是坛坛罐罐、破东烂西，暴风雨中的恐惧，精神负担也随之一扫而光了，在我们的内心世界又重新燃起革命的火花，享受这个家独有的欢乐。人世间的痛苦与欢乐总是相伴的，乐极生悲、苦尽甜来都是

这个意思。

1948 年到 1953 年这个家的生活状况，总的说来是美好的。经过了“土改”这一关，人们对这个家庭有了一个新的评说“父亲是一位吃苦耐劳的好人，是善待老百姓的警察署长。都刮目相看了，没压力了，我们和别人一样，轻松地愉快地享受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欢乐。

这毕竟是一个三世同堂的家庭，免不了有两种不同思想的碰撞，父亲封建意识浓厚，免不了因家庭琐事，而不断发出闲言碎语，家庭里的叽叽咕咕的事，也就出来了，母亲遇到这些事总是站在我们这一边，动不动就说“你这个老死鬼，怎么不死呢！”这是气话，朝珍是尊重老人的，特别是婆媳之间是和睦的。尽管这样，朝珍也要有伤感伤情的时候，心情不悦。我当然要好言好语来劝，时间久了，也就习以为常了，都能让了、忍了，直到后来 30 多年我们都听惯了这个三世同堂的家庭曲调，也都不觉得难听难受了。

在一中的家属宿舍，我购买了两件值得回味的东西。一个是口琴，那是我给我的大女儿购买的，我记得，在抗美援朝开始不久，为给在齐齐哈尔的伤员输血，我被验中了，我共输了一次血。第一次输血后，给我补养费。我觉得身体没什么变化，用不着补养，我就自己决定买了一个口琴给大女儿玩。小孩不会吹，弄个响声她也高兴啊！朝珍埋怨我不注意自己的身体。这是我第一次给小孩买玩具，也是最后一次，是不是不喜欢其他几个孩子呢？绝对不是！论说喜欢，我更喜欢晚来后到的祝红与祝成，但后来，就没有那份闲情去考虑孩子们的玩具了。

第二件事就是于 1953 年春，我买了一台自行车，是进口的波兰车，在哪个年代能买起自行车的人家是不多的，那时我家有五口人，三个人有工资收入，加上父亲勤劳，开园种菜，节约度日，有所节余，以到教育厅上班路远为由，父亲开恩，我才买上了我心爱

的自行车。那时，市场上常见的三种自行车，一种是日本进口的“宫田车”一种是民主德国进口的“红钩子车”再一种就是波兰车了。波兰车比那两种要便宜一些，国产自行车没有吗？很少见，这就可以想象到那时的中国工业状况了。在我家，我见到的祖辈们还没看谁骑过自行车。这台车很可能就是吾家历史上的第一台自行车了，这台车子很轻快，我很珍惜它。不久，我调到化校工作，学校远离城区在东郊，这台车子的用场可就大了，当时学校的交通工具很少，我的这台车子几乎成了公车了。我这个人好说话，谁用都行，消耗磨损就大了，到第二年学校迁到现在的齐大校址时，我这台车的齿轮与链条的磨合就不行了，当时就得不时地修理。我的儿女们都较早地会骑自行车，都和这台车子有关，后来，这台车子老掉牙了，就放在全福胡同那座房子的仓房里，谁也不骑了，不知哪位后人把它卖掉了——我家的第一台车子。我很后悔，当我上楼房时，怎么不把它带上来呢，我心爱的车子。

写完了一中的家属住宅，油然想起我的好邻居，先是吴伦校长，接着是方行校长，其后是关文英校长，还想起同院住的一些老朋友王文玉校长，聂长林校长，王祖鹤老师，张天顺老师。聂长林在北京已经有几年不通音信了，想他还在人间。现在我最想知道的是吴伦校长，愿她还在人间，祝她长寿！

全福胡同化校家属宿舍

1954年，化工学校从城郊迁到现在齐齐哈尔大学的校址。这年的夏季我家从一中院内迁到全福胡同化校的家属宿舍，这主要是因为这里的房屋面积比较大一些，两代人可以隔开各住一个居室，有利于朝珍病休，从此朝珍就不再常住赵家了，而祝华仍常住在姥姥家，由姥姥照看。

化校全福胡同家属宿舍位居全福胡同的西头，俗称西站，地势较高，是齐齐哈尔居高点之一，这是一所较大的院落。此前是市干

部学校占用。解放前是谁人的，是做什么用的就不知道的了。我家住的那座房子很高大，屋脊很高，房前有两根很粗很高的 大原木柱子顶着，显得很庄严，听说这里是旧社会理教成员集会场所。一座五间大瓦房，我家住一半，建筑面积能达 70 多平方米，这里曾是市干部学校领导的办公室，室内举架很高，足有五米。我家在这里一直住到我与朝珍搬到轻院 8 号楼就是 35 年了，而小儿祝成现今仍住在这里，快 50 年了。我与朝珍在这里渡过了整个中年时期，直到晚年离休。我们在这里侍奉两位老人，养育儿女，最多人口达九人，接着就是送走两位老人归天，儿女们就业成家，三世之家也是在这里逐一分解了，而没有旧三世同堂分家之说了，说实在的，也没什么可分的。那时候，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又无积蓄，到最后两个子女成婚时，靠借债达 3,000 元之多了。这就是当时一个大学副校长家庭生活的窘状。现在的人能相信吗？但这是实情。

1954 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进入社会主义了，这时我已年满 30 岁了，人到中年了，而朝珍则疾病缠身，一病就是五年，应该说她是积劳成疾，在家修养的病人应该加强营养，促进康复，但很难做到。我国刚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就开始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物资就感到贫乏，只好实行凭证供应，粮有粮票，油有油票，肉有肉票，布有布票，煤有煤票，甚至还有菜票、瓜子票、棉花票等等，国家实行的是低工资政策，高低差距很小，而且是长期不动，处于冻结状态，可以想象到那时的人们生活水准低下。好在全国都一样，穷富都一样。1954—1957 年，我的父亲因为秋林公司倒闭而歇业在家，为补助家庭生计，他就到化校东面劳动湖边，也就是我现在住的轻院家属宿舍楼群里的地方，开园种菜。母亲在家养鸡、养猪。蔬菜可以做到自给有余。应该说，我们的家庭生活要比一般人家好一些。朝珍的身体健康状况逐步好转，1955 年 1957 年两年，祝生与祝群相继来到人间。

1958年“大跃进”，这是一次全方位的大跃进。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都跃进了，连人们的家庭生活也“跃进”了。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家庭的养殖，种植业都视为非法，父亲的种植、母亲的养殖只好洗手不干了，学校大办工厂，父亲来到化校的化工厂当了工人。1958年秋后，我们那个大院建立了“公社食堂”家家户户都到公社食堂吃饭了，吃饭都一样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了。1959年的春节，我们都从食堂买回饭菜，还有饺子，倒很省事，但没有素馅饺子。父亲只好过一个吃不上饺子的春节，还不如土改风暴那年，他还吃上农民给他做的素馅饺子。吃食堂是省事了，春节气氛淡薄了，钱是多花了，不仅是春节多花了，过日子长了，特别是北国的冬季周期长，人们是靠做饭烧炕取暖的，可是这一冬，不做饭也得烧炕取暖，能不多花钱吗？1959年秋后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来临了，吃饭食堂化行不通了，人们又都回家吃饭了，粮食不足，蔬菜又极度缺乏，人们靠添加“糖渣子”充饥，浮肿病多起来了，从此我患上了肝炎。好在共产党有个好主张，共产党员从上到下都要和老百姓一样，有难同当，赢得了人心。可以说是万众一心渡过了难关。

1962年我国经济形势好转，政策又放宽了，父亲又重操园田，母亲又可以养猪养鸡，我家的生活水平又超出一般了，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家能有近千元的积蓄。那时的千元可以说是今天的万元户了。说起这十年家庭生活变化，也就是全国城市人民生活状况。它说明一个问题，这就是十几年的社会主义，人们的生活物资太贫乏了，没有办法只好实行“平均主义”，一切靠计划，凭证供应，穷富都一样。后来邓小平说的对，“穷不是社会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有理想的共产主义。那么“计划经济”是不是社会主义呢？这十几年来的“计划经济”并没有明显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城市是这样，农村更是这样，在中国是这样，在苏联、东欧各个社会主义国

家又何尝不是这样，看来，“计划经济”是计划不出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苏联、东欧巨变的社会根源，绝不是偶然的。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闹就是 10 年。这是我家遭殃，巨变的 10 年，先是家被抄掉了，父亲戴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牌子，被送回了老家，母亲担惊受怕，脑溢血去世，大女儿，二女儿相继到农场、农村落户。九口之家几乎走了一半。但对我们来说并不清闲，牵肠挂肚的事就多起来了，父亲在老家劳动改造，又吃素，就要多吃粮食，每月要给他寄粮票、钱票，而且要全国通用的。这都要靠朝珍去张罗。大女儿在农场，难事最多，我曾几上农场，看望女儿，也是为了与农场领导沟通关系，说实在的，共产党的不正之风，在这个时候就兴起来了。有本事的、能花上钱的子女就可以返城。否则，就呆在那里好了。招收工农兵学员上学，第二期招生，先实行文化考试。祝华成绩属上等，但张铁生一张白卷，说考试成绩不算了，我当时已落实政策任学校革委会副主任，靠这点权势，祝华上了化校，如果我的权势大一些那就不是中专而是大学了。相继祝生也上了哈尔滨卫校，那一年不考试，全凭表现，祝生能干，人缘又好被群众推荐上来了，但上来的人多了，就得找人拉关系，他的宫姨认识乡里的干部，出了不少力，门子不硬，若再硬一点的话，祝生就不是中专而是大学了。祝群比祝生小二岁，因为家里已有两个子女下乡了，他就去纸厂当了工人，姐、弟三人，务农务工也就算就业了，这是包下来的国家政策，倒也省心。那个时候“望子成龙”不敢想了，知识分子太臭了。

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我被送进了“重点人学习班”失去了人身自由，我带着严重的肝病被关押了半年，朝珍和孩子轮流给我送饭，他们看我憔悴的样子，免不了泪如雨下。在这最难熬的日子里，最难忘的是 1969 的春节。春节到了，学习班放假三天，我带

着学习“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任务在年卅晚上回家了，到家一看，我的居室四壁，尤其是北墙挂着很厚的冰露，这一冬朝珍和孩子们就更要受冻了。

说起更要受冻，是因为我家受冻何止这一冬呢，这座房子外表看很高大，很壮观，但年久失修，墙壁透风，保温太差，烧火有限，几十年来的冬季，室温一直低下，齐齐哈尔的冬天不是东北风，就是西北风，火炕总是犯风病，不好烧，为治理火炕，把北炕搬到南炕，南炕又搬到北炕，都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我发现最关键的部位是烟筒透风，只好把烟筒内壁打开，重抹一层泥巴，算是解决了一些问题，几十年的动手磨练，我对治理火炕也略知一、二。“透风的烟筒，好烧不了的炕”这就是烟筒内部要套上一层内管的道理。但是这座房子高大，室内空间太大，几十年我家冬天一直在低温下生活，我工作任务重，晚上又常开夜车到深夜，手脚都感到冰冷，放在桌子上的水杯，第二天早上一看，都冻成冰块了，室温要低到零下七、八度，因为这个才有刘毅书记到我家“雪里送炭”的故事。

说 1969 年的春节，引出了上面一段话，那是实情。话再拉回来，我是带着“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学习任务回家过节的，那天晚上锅里煮着包米馇子粥，朝珍比我回来还晚，包米馇子粥是孩子们煮的，全家人好象都没有过节的心思。春节三天假，我投降了，我写了一篇“我的生来都是有罪的”投降书，我的出生、成长的家庭都是有罪的；我读书到大学，读的日本人的书是有罪的；我工作几十年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有罪的；我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是资产阶级的，是有罪的；我接触过国民党、三清团，虽未参加也是有罪的。凡此事事都是明摆着的，都上纲上线有罪就是了。但我并未说瞎话，关于 101 专案追究的那件事，我没参加，就罪不得了。朝珍呢，虽未被关押，但“国民党妇女促进会”的事总是纠缠不放，她比我强连“有罪”也不承认，就是硬顶着。

文革期间，由于心情不好，我的肝病日趋恶化，经 203 医院内科王主任诊断是初硬、边锐，有肝硬化的危险。我们一同看病的同院的张兴厚，因肝硬化去世了。朝珍为增加我的营养，每天订购一斤牛奶，我成了这个家特殊照顾的对象了。我的岳父于 1969 年的冬天，狱期已满，被释放了。经岳父诊断调理，有所缓解，1970 年的夏季岳父为我特制了一剂丸药，30 粒的大药丸，还没有吃完，我的肝病就明显好转，到医院检查“转氨酶”的+号不见了。岳父的医术，令我惊叹折服，从此我确信中医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此后，几十年的考验，虽然，初冬。初春气候变化季节，肝部尚有隐痛，但常吃“护肝片”也就过来了。得过病的肝和没得过病的肝是有差别的。据岳父讲治肝病，不能就肝治肝，肝病是整个消化系统不畅所致。我觉得中医是讲辩证施治，这就是科学，“吉人天相”我闯过了严重肝病这一关。岳父治好了我的肝病，给我以生命的希望，我记得，在肝病严重期间，也有过悲观情绪，我曾对我的大女儿说过“我的生命不会太久了，最不放心的就是祝成太小，你是大姐多照顾吧”！

1973 年，故乡的父老乡亲为父亲落实政策，摘掉了“帽子”。他曾提出要在故乡建一所房子，只要寄去近千元钱就可以了。他想在故乡安度晚年，可那时我确实拿不出那么多钱，曾积蓄的上千元钱，这七年几乎又都寄给父亲吃饭花光了，怎么办呢？我与朝珍商量，老人还得我们养活，只好动员父亲重返北国。我向组织提出申请得准，父亲于 1973 年秋季回来了。他这次回来把母亲留下的三件老式家具，通过火车运回来了。都是老掉牙的旧货，谁看都说，这样的东西运回来干啥呀！可是父亲就是舍不得丢，其中有没有情难舍的意味呢。两位老人都离开人间了，这些东西还在，其中一张桌子，他的重孙子天正当书桌用着，那个大木柜还一直放在祝成住的全福胡同家属宿舍。在动迁的时候，我对祝成说把它卖掉吧，

可他还是把它留下来，搬迁又搬到楼上来了，不知他怎么想的，其中也有情难舍的意味吧！

全福胡同的化校家属宿舍，我的家族，我和朝珍住了 35 年，到祝成住到动迁时迁出，那就是 50 年了，在动迁迁出的日子里，我几去那里看望，也有情难舍的意味。这个避风港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也有痛苦的记忆。

三、我的后人

我与朝珍共育成五个孩子，其实，朝珍共怀胎七次，第一个不是祝华。那是 1947 年的夏季，我去战地服务，不在家，一个星期天，朝珍因家务过量，洗衣服倒水，突感腹痛难忍，母亲又照顾不当，朝珍把一个怀胎六个月的小女孩生在室内的厕所里了。当时母亲找岳母去了，朝珍很坚强，完全靠自己，硬是把脐带掐断，把一个早产的小女孩扔到厕所里了，据说她还会哭呢，如果我不参加战地服务团，我想是不会发生这件事。如果这个孩子不是早产丧命。那她该快 60 岁了，我该见到四辈人了。再一个是难产发生在 1960 年的秋季，朝珍只身一人去了 203 医院分娩。走到中市场就破水了，到了医院经检查是难产，医院的意见是破腹取胎，朝珍不同意，坚持常产，结果孩子生下来了，但气已断了，他是一个男孩，如果活着今年该是 44 岁了。朝珍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后出院，我因学院的工作太忙，无暇顾及朝珍，我一次也没去医院看望她，在一天晚上，我要去医院看望她，祝华说，明天就回来了，这么晚了！别去了，我有探望朝珍的心情，未能实现，只是因为学院工作太紧张，那时正是学院（化工学院）初办，又赶上三年灾害时期，我的心力几乎全倾注在工作上了，而是日以继夜。这是实情。这两个孩子，一个是我不在家早产丧命的，一个是我无暇照顾难产丧命，都与我有关。

我与朝珍共有五个孩子：张祝华、张祝生、张祝群、张祝红、

张祝成。为什么都犯“祝”字，那是因为祝华生在新中国成立那年。就起名为：祝华。后来就顺下来都犯“祝”字了，以示他（她）们是兄弟姐妹，一奶同胞。按祖宗的家规，他们这一辈该犯“恒”字，这是对男孩子说的，女孩子就没有份了。祝生的名字有特殊意义，那是因为朝珍病情有所好转，有所康复而得名。原是“甦”字，后来通俗就改为“生”了。五个孩子都没起“乳名”，很遗憾。但他（她）们小时候，我们的叫法是：小华、生子、群子、小红、成子就是他们的乳名了。至今，我们仍是这样称呼他们。也可说是“爱称”了。现在的中国人给孩儿起名字有三个字，有两个字的，依我看还是三个字为好。但我又想了，都是独生子女，手足兄妹、一奶同胞都不见了，那也就无所谓了，还能有一奶同胞那一天吗？

论长相，这五个孩子五官都很端正。其中像我的就是祝华与祝成，其他都像朝珍了。而他（她）们的性格区别也是这样。只有生子有点介于两者之间。我的长相从我的父亲，那么这五个孩子有没有像我的母亲，他们的奶奶呢？想来想去只有小红长像还能找出我母亲的痕迹。这就是遗传基因。

论天资，他（她）们都不笨，不成大才，也该是小才。这是我的期望。现在他们已都过了“而立”、“不惑”之年，怎么说呢？就高，我看那一个也没达到我的期望。就低，都成人了，都获得了生存的本领，都从事于有益于人民的事。这就可以了，够了。做父母的总希望孩子们成材、成龙。现在我老了，倒觉得先成人才是第一位的。曾记得在成子有一段浪荡的日子里，我曾几次同他笔谈，祝成、祝成祝你早日成人啊，而且都是在深夜睡不着的时候写的。

讲天资，成子在这五个孩子里算是最好的了，但最使我失望的也是他，给这个家庭制造麻烦最多的也是他。他在读中学时期，没有把握好，高中毕业后，交友不当，破罐破摔，甚至染成酒癖，醉酒后连父母、兄弟姐妹都不认了，亲情、手足情一切真情都丢了。

醒酒后尚能追悔莫及，但又屡戒屡犯，他成了这个家的心腹之患。成婚之后仍未收敛，铸成了妻离子散的悲剧。再婚之后有所收敛，但积习难改，仍不时发生家庭纠纷，好在新媳尚能控制，宽容对待，不致分裂。宽容是一种美德，在一个家庭里，宽容比什么都重要。在朝珍临终时，是他们夫妻二人守候身边，朝珍放心了，瞑目矣！现在成子好多了，我对这个小家庭也放心，也不放心。叫作放心不下，但愿他们的夫妻情、子女情天长地久。在我临终时，他们能守候在我的身边，那时我就放心地走了。这就算他们尽孝了。

写我的后人，专门写了成子的一家，教训太深了。“养不教父之过”这是至理名言。成子小时候很听话，不用爹妈怎么管，我们都很喜欢他，爱他，小学时期的学习成绩也是好的，当他到了中学时期，青春期，我们没有诱导好，而且做了错事。我不该望子成龙心切。逼他一再转校转学。成子爱面子，自尊心很强，他经不起闲言碎语的敲打，心理逆反，情绪不稳，这样他怎能学好呢？写到这儿，应该承认我不懂当时成子的心理，妄为人师，我不是一位好父亲，咎由自取，父之过也。

我们对三个女儿的婚姻总的来说是满意的。祝华与国童是同学，完全是自主结合，祝生与尔学、祝红与洪明都是经人介绍，两相情愿父母同意，也算是自主婚姻，她们都组成一个和谐的家庭，当然也都有各自的难唱曲，也有吵闹的时候，但她们都能相互理解。相互宽容，也就可以雨后天晴了。

两个男儿的婚事，一开始我们就很不满意，但“儿大不由爹”我们是勉强为他们成婚，其结果是相继遭到婚变，怨谁呢？也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但我们做父母没把好关，也不应辞其咎也！

我们的第三代人也是五个，各家都有一个独生子女。

李家星，祝华与国童的独生女。大学毕业后考中硕士生，令人羡慕。她还有读博士的愿望，现就读天津大学为博士生，祝她成功。

张晴，祝生与尔学的独生女。大学第一榜考取齐大，她不满意，决意重读，第二次考中上海东华大学，毕业后考中硕士生，是一个有志气，自信心很强的女孩。

张一楠，祝群之子，少小读书不努力，父母娇惯，养成坏习惯。高职毕业又无一技之长，难就业，就业难，愁煞人也。怨谁呢？父母之过也。

陈哲。祝红与洪明之子，天资较高，读书也较刻苦，现读初中三年级，榜列班级前排，是一个好苗子。

张天正，祝成之子，四岁时父母婚变，影响其身心正常发育。祝成再婚，他只好留住在爷爷奶奶身边。奶奶走了，与我为伴至今。小学受父母婚变的影响，没有学好，到中学就费劲了，现读中学二年级。尚能追悔自奋蹄，不为晚也，孺子尚可教矣。

写到这儿，我的后人就算写完了，我的后人都是三口之家，时代的产物。对这样一个家庭，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培育好子女，使他们成人，成才、成为社会上的好公民，否则那就后患无穷，该遭殃了。

最后我把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的家庭观，送给我的后人。他说：“家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他认为“婚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是一对一的民主，一加一的自由”

我赞成他这种独特的家庭观。

四、休戚与共 赵家亲人

赵家是满族正黄旗人。其先人曾做过清朝的官，封过顶子的。到了岳父年代，家业没落了，仅留土地数顷、房子数间。靠佃农耕种，维持一家生计。

岳父赵鹤翔，又名赵云溪，曾就读于北京中国大学。他能文、能画、习过中医。伪满时期曾与我父亲、薛叔、李叔同事于龙江县公署任职员。岳父在敌伪时期，因思想犯被敌寇逮捕入日本宪兵队

牢狱，遭受毒打。出狱后，从事中医，直到逝世，从医谋生。由于其文化底蕴深厚，医术比较精湛。我的肝病已到初硬有浮水，就是岳父一剂丸药，药入病除。老人一生多难，先入敌人牢狱，50年代末、60年代初，又以“右派”、“反革命”为名被投入人民牢狱达10年之久。“拨乱反正”为其平反了。冤哉，悲哉！他于1969年出狱后，正是文革期间，从医无门，在家苦研医术，作诗作画，有志难遂，有才难展，苦闷游水身亡。享年70岁。他留给友人的工笔画，草、虫、花，为日本友人看重，高价售出。尚有遗作三幅留存我家，是写给我和我父亲的。看画如见人，永久纪念。

岳母李氏，汉人，是大家闺秀。于1991年去世，享年90岁。她相貌端秀，身材窈窕，质显靓丽，气轩不凡。如有文化定是一位才女。她为人处事通情达理。岳父一生多难，家务全靠岳母支撑。记得岳父十年狱中，她每年至少两次，由朝珍陪同探望岳父。有一次母女日落归途，错走荒径，过夜才归。我一夜不眠，等待天明，怕出危难。丈夫遭难，妻儿同苦。时值内弟朝枢征战朝鲜，屯垦北大荒，两个女儿留在岳母身边养育。两家的下一代儿女中只有赵晓舒（朝枢的二女儿）一人就读大学本科并获吉林大学的学士学位。首功应归岳母。岳母能人也，一位伟大的女性。

内弟赵朝枢，中学就读于我任职的联合中学、第一中学。此前曾在齐市电报局工作过。在学期间，抗美援朝，他投笔从戎，在总后司令部任机要秘书。在朝鲜战场与战友赵曼如（苏州姑娘）成婚。因受岳父错划为右派牵连，两人到北大荒屯垦。其后，两人转业到嫩江专员公署工作。文革期间下放到林甸县卫生口工作。落实政策又回到嫩江专员公署卫生口工作。地、市合并两人又都到齐市纪检口工作，直到退休。朝枢享受离休待遇。朝枢与曼如千里姻缘，相会在朝鲜。他们受过朝鲜战争的洗礼，又在北大荒的原野上，受过战天斗地的洗礼。一对恩爱夫妻，和谐到老，历经苦难，无怨无

悔。他们已都是 70 多岁的人了。

朝枢与曼如有三个孩子，两女一男，都很有才华。长女小敏赶上文革下乡下厂。他下厂到齐齐哈尔造纸厂。经我周旋在轻院大专班进修，毕业后转为干部。现已退休。其夫关利民是同厂的工人，为人忠厚。其女雪娇高中毕业考入黑龙江大学法律学科，是个好孩子。次女小舒，吉林大学化学系毕业，与其同学李明成婚。李明追恋小舒。李明是大连人，毕业后他们同在大连化工厂工作。他们有一个女孩叫小文，聪明过人，能文能画。现就读于大连重点中学，名列班级榜首，是一个好苗子。小军是朝枢、曼如的男孩儿，天资很好，在读高中时休学一年。高分考上大学，宁念专科，因厌学中途退学，宁愿当工人。曾苦力于齐纸的园木工，灯泡厂的窑工。终因体力不支而退厂。他酷爱围棋，爱棋书不释手。他的书架上塞满棋书。在市棋赛中多次夺冠，并代表齐市参加全国“晚报杯”比赛，也曾获得好的名次。有多少家长慕名而来送子求艺，有棋校聘其为教师。小军棋艺高超，名震齐市棋坛，年过卅，尚未成婚。小军奇人也。

结 束 语

这篇对家的记忆，对家人的记忆，从 1997 年 7 月开写，写写停停，写了七年，到 2003 年 10 月才算写完。2003 年的金秋九月重阳节的翌日，是我年进八旬的第一个诞辰。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同志与同事、我的学生、齐大的领导、齐大的统战部、民盟市委员会、民盟齐大委员会、分别举行寿宴为我祝福。前前后后持续了两个多月时间，我沉醉在祝福声中，享受着人生夕阳的美好时光。

在民盟市委举行的寿宴上，有市人大的领导、建华区的领导参加，我深感荣幸。特别是前中共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金呈祉先生的祝福与馈赠令我十分感动。

在齐大的祝宴上，校长唱江华的讲话和轻工学院最后一任党委书记宋国栋同志从北京寄来的贺诗都热情洋溢颂扬我的为人与功绩，

品 高 寿 长

——贺老院长张元士老师八十大寿

宋国栋

2003 年 10 月 4 日

轻院建校称元勋，
几度复兴皆由君^[1]。
范影深印校园里，
佳话长铭桃李心。
严格带出校风谨，
善意更聚一代人^[2]。
德如日月光明磊，
寿比青松万年春。

注：[1]1959 年在齐齐哈尔化工学校的基础上创办化工学院，张元士同志是主持筹办人；文革后复办轻工学院他又是“火车上决策”之人。

[2]张老院长，待人以善，不论什么风向，不论哪个同志，一以贯之，与人为善。因此，他凝聚了一大批各类办学人才。

我感动中深感愧对，盛名之下其实难付。在席上，我抒怀讲了《1953—2003 的感言》：

“今年的重阳节后，我年进八旬。今天，承蒙齐大为我设宴，祝福我年进八旬的第一个生日。对我来说，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也是一种特殊的奖赏。我深感荣幸，忘不了的生日快乐。首先让我诚表谢意，谢谢各位领导。下面请允许我讲讲 1953 — 2003 年这五十年的感言。

50 年前，也就是 1953 年的金秋，我奉命从教育厅到当时化校工作，一直工作到 1986 年离休。33 年，这所学校从中专到大学，又从大学回到中专，再从中专到大学，走了一个“之”形曲折的过程。我经历了这个艰辛的全过程。33 年，我 30 岁到 63 岁，我的全部中年时期是在这里渡过的。在这里，我经历了政治上的，思想上的，文化上的，工作上的，家庭生活上的方方面面的种种磨练。可以说，我倾注了心血和精力，也拨动了我的心弦，激发了我的情感，酸甜苦辣，喜怒哀乐都有了，构成了我中年时期的生命乐章。红与黑，是与非，功与过，赏与罚都过去了，时至今日，有的可能成为今人的茶余饭后的笑料，面对这些，一笑了之就是了。如果把这所学校比做大海中的一只航船，我不过是一名水手而已。

时光太快，人生太短，不过三个卅年。最后的卅年，到现在我已走过了廿年。这廿年，我品味着陈年的酒，晚开的花，迟到的爱。末了的情，人生的夕阳生活。在齐大领导、老干部处的同志们的关

爱下，总的来说是美好的，叫着夕阳红。但叫作生活，同样是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样样俱全。生活总是不平静的，叫作“树欲静而风不止”，人生从来就是风雨人生。生命之钟对我来说也不过再嘀答一十年。我希望能走好，走完这十年，既或走不完也不遗憾。一个人的生命之路，错综复杂，走多远归根到底是自己走出来的。明知道抽烟有害，我还要抽下去，这叫积重难返。

晚年，幸逢中国盛世。中国发生了巨变，变得好，好得很！我渴望能过上中国式的全面小康社会的生活，但生不逢时，可望不可及了，当然，变革中的中国，前进中的困难与问题都不少，有喜也有忧。但我更关心的是这所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喜看齐大的今天形势很好，人气很盛，非常高兴。由我主编的“轻工院校史”的结束语中，我写了一句话“事在人为”，在同一条件下，有的可能把事情办得多、快、好、省，有的可能办得少、慢、差、费。这叫做事在人为。那时，我弘扬了轻院的人气，说这是一所大有希望的学院。今天齐大的发展大大超过了我的希望与梦想。同样，我今天更看重齐大的人气很盛，人心齐，泰山移，我相信把齐大办成黑龙江省一流名校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今天，我很高兴说了上面的一席话。

今天，大家为我祝福，现在我提议请大家举杯，为齐大的今天，明天祝福，为在座的各位领导祝福，为我的学生，朋友们祝福。

我的老朋友，诗人汪泽斌先生在齐大的祝宴前写了一首“生命之歌”这首歌是为我写的，也是为所有的老朋友写的，我们曾约定他在齐大的祝宴上朗诵这首歌，很遗憾，因故他未能到场。现在，我把这首歌志在这篇故事的结尾，做为结语，画龙点睛了。

生命之歌

汪泽斌

—献给张元士先生八十寿辰齐大的祝宴上

序

时序，2003年，古历九月，正是菊花姿放，在张元士先生八十寿诞祝宴上我郑重说道：“先生是一位薄己厚人的人，是一位真正大写的人。薄己厚人还是厚己薄人，马克思主义者区分人的首要标志。”先生一生好事暖千家。在共和国先生为齐齐哈尔的科技教育的创建和发展起了先锋作用，贡献是不可估量的。人称教育界老功臣，不为过誉。特此祝寿歌之。

年华似水，卷走的青春叶子飘飘流：仍在嫩水江上，思绪纷纷无尽头。春春秋秋，绿绿红红，万千世界，人谁不老，但老有思力，这思力仍有你的春夏秋冬。看朝霞，有过叹息；看夕阳，有过悲伤。独有云淡风近午天，春阳辐射，激情难已，万木竞秀，人间绿透，鸟语枝头亦朋友，蝶媚花羞皆文章。风情万种，流韵不止。绿水青山人未老，一年更比一年青。

水秀，树绿，草长，鹤飞。远天一片片云，白蓝相逐，恋情绵绵。天底下，湖堤上，谁说地老天荒？你依然情海涛涛，思绪菲菲，林荫小路，低低吟唱。龙沙，红岸，松林，湖畔，花开花落，绿叶一片又一片。岁月悄悄，绉纹不减。天底下，湖堤上，谁说人易老？银桥座座，月满楼窗，你依然青灯绿酒，笑谈古今，千秋人物，还在评说。什么康熙大帝，什么雍正王朝，他们百年挂冠，千年粪土。他们生时真真假假，死后事事非非，谁能全晓？好事者歌之，臆其理，理各有方；答辩者追之，溯其源，源无出处。情悠悠，理茫茫，

天地虽大，说方可方，说圆可圆。无怪道家有云；天外有天缘无极，玄之又玄日月长。呜呼：方方圆圆，圆圆方方，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惟有绿情长久，寿高老年。绿情就是生命，一切生命都是绿色织成的。大地上香花，他在风雨中出土，他在激雷闪电中直腰，他在百草毒汁隐害中延伸，不管风霜刀剑，总是长了再长，挺了再挺，直到林间花满，沧海潮生。绿情啊！天地绵绵，日月生辉，生生不息。

编 后 记

元士同志很早就开始着手撰写《吾家吾人》这部传记，它凝聚着元士同志的一生心血。一些老朋友，建议让我为这本书写一个编后记，出于与元士老会长在老科协一起工作应有的责任和对元士同志的崇敬，我欣然的接受了这一任务。

我年轻时在原齐齐哈尔师专工作与原齐化校（后升格为齐齐哈尔轻工学院）毗邻，元士当时为齐化校副校长。在那时，我对元士同志的高尚品质和有超常的工作能力就极为敬佩与崇拜。1986 年省委调我到原齐齐哈尔轻工学院工作，有幸与元士同志近距离接触，尤其是从 2005 年开始，我们同在齐大老科协共事五年，我默默的向他学习，受益匪浅。在工作中我们结下了更为深厚的友谊，他是一位可敬可爱的师长。

元士同志很早就开始执笔撰写《吾家吾人》，但始终没有最后收笔。原因是他想在老科协届满之后，将这五年最愉悦、最有意义的可圈可点的光辉一页纳入其中。可天不随人愿，离老科协换届仅差十几天，我们最最受人爱戴的老会长与世长辞了。今天我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为他的遗作，《吾家吾人》写上这最后一页。

元士同志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一生，他在轻工学院工作期间鞠躬尽瘁，呕心沥血。退休后依旧，譬如：退休后被轻工学院聘为顾问，为学校的发展建设出谋划策，同时还为轻工学院撰写了校史、校志 和校友录等。他身为齐齐哈尔市政协委员，直至去世前依然向齐齐哈尔市政府建言献策，极为关心地方经济的发展与建设。2005 年，老人家在广大老科技工作者一致推举下，就任了齐大老科协会长职务。年过八旬的老人以年轻人一样的活力与激情活跃在老科协 这个广阔的舞台上，充分展示了他那 与时俱进的新思

维和新创意，以及不断进取、奋力拼搏精神。她凭借这种精神与强大的人格魅力，不但凝聚了广大的老科技工作者，尤其建设了一个奉献、进取、和谐、与坚强的老科协领导班子，使齐大老科协荣获省老科协先进单位称号，多次在省、市老科协会议上介绍经验。齐大老科协在他的主持下，制定了协会章程和一整套工作制度。为使工作有序、高效的不断向前推进，实践老科协的办会宗旨，付出了他的聪明才智和最后的心血。在建会开始或每次开展重大研究课题，他总是率领有关人员不辞辛苦的到校外、省内外进行调研，以此丰富自己智慧，寻找科学答案。正因如此，齐大老科协在科学研究、科普教育、科技开发、高教研究、社会办学以及大学生的科技制作指导中，才有令人震撼的表现。尤其是在齐大办学特色的科学描述与解读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的人格魅力吸引人，他的奉献精神感召人，他的处世哲理教育人。元士老先生不仅是我们这些老同志的学习榜样，更是广大年轻教师的楷模。

元士同志从参加革命工作到离开我们，60 多年来一直为党的事业在努力的奋斗着，拼搏着。在举国欢庆祖国 60 华诞之际，老科协受党委的委托，授予元士一座铜铸“华尔街牛”雕塑，上刻“俯首耕耘 60 载，桃李芬芳誉天下”，以此表达我们对元士老先生的崇高敬意。

在编辑与出版“吾人与吾家”过程中，得到了齐齐哈尔大学原校长唱江华、齐齐哈尔医学院党委书记邱福利、齐齐哈尔师专校长薛宝林以及陈奕兴老先生的全力支持。他们这种尊老、敬老，不忘恩师、忠于朋友的优秀品质令人敬佩，在此深表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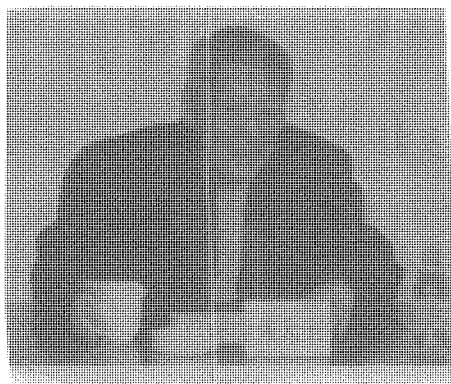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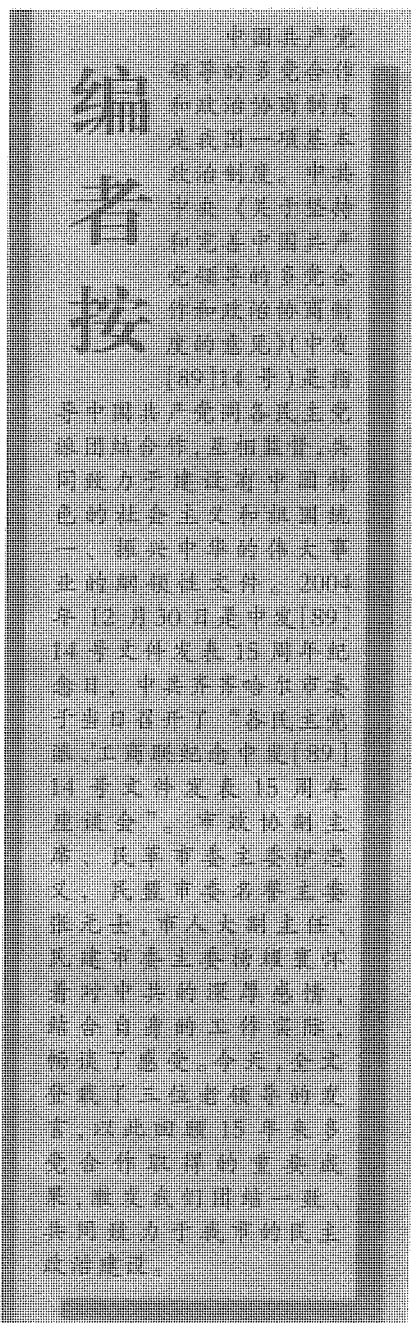
薛秉昌

2010，10.

附 1： 在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纪念中发[89]14号文件发表 15 周年座谈会上发言

历史经验 值得重视

中同民主同盟齐齐哈尔市委名誉主委 张元士



中国到了现代，政治斗争发展到集团形式，有了政党之间的斗争与合作，各自代表其人群——阶级的利益。无论是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的民主党派，他们的主张都是好的，都是为了救中国、救人民。国民党的功绩在于推翻了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蒋介石反动派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背叛了国共合作，国民党失败了，共产党胜利了，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的民主党派多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成立的知识分子政治联盟。他们忧国忧民，追求真

理，为救亡、为抗战，为在中国施行民主政治。反对独裁而奔走、呐喊，唤起大众开展斗争。他们在斗争中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护拥共产党的主张并与之合作，风雨同舟，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形成了当今的中国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这是现代中国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在几十年浴血奋战、英勇斗争的结晶，来之不易。

回顾 55 年的风雨历程，中国的民主党派经受了考验。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民主党派始终是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政治力量，始终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祖国统一的政治联盟。

我是 1956 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到现在快 50 年了，可以说是走了全过程的人。我们这一代民主党派成员，有过 1957 年以后的苦恼与困惑，有过“脱帽加冕”的欢乐与鼓舞，有过阶级斗争天天讲的磨炼。在岗位服务，参政议政之余，我们都在各自的组织生活中接受教育。我们始终是把“教育者先受教育”、“当先生要先当学生”、“人活到老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等至理名言，作为我们的座右铭。

十年寒窗铸就了我们这一代民主党派成员的共同政治品德，那就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坚定不移的。有了这一点我们民主党派就能同共产党一道经得起任何考验。我们经受了西方封锁、苏联制裁、霸权主义的武力威胁和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考验。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一场灾难，民主党派何能幸免。这使我们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民主党派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进入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民主党派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

监督进入了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我们经受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兴风作浪的考验，为维护稳定，制止动乱做了大量工作。曾记得，市盟主委周宗鲁同志在齐齐哈尔日报上发表了《和衷共济、稳定局势、为制止动乱做贡献》的文章，表明了我们民主党派的鲜明立场。1989年中共中央发表了[89]14号文件，在文件精神指引下，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更加规范化、制度化。这15年我深感，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生活已经进入了毛泽东同志1957年提出的、令人向往的“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令人振奋鼓舞。

我讲了这一过程的感受，无非是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民主党派都有一个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我们的武器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知识分子是追求真理的。经过学习，我们懂得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经过学习，我们懂得了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道理；经过再学习，我们才懂得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主党派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千万不能丢掉！我们手中的武器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千万不要丢掉！

在庆祝[89]14号文件发表15周年之际，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坚持好、完善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与完善相辅相成。坚持才得以完善，而完善更有利于坚持。当前，综观我国改革发展的稳定局面，形势很好。我们也必须看到国际上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蓄谋没有改变。我国的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社会群体更为多样化，影响稳定的内外因素仍然存在。在目前形势下，要坚持好，完善好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就显得更加重要。历史的经验

值得重视。要坚持好就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刻警惕来自内部的“左”的“右”的干扰与破坏，来自外部的西方反社会主义思潮的渗透与侵蚀。对全民进行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始终不能放松。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时刻保持警惕。要完善好就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要发扬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参政能力，以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中，在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问题上，把坚持与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写进了这个(决定)。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民主党派长期参政，坚持好、完善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任重道远。

中国的民主党派是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联盟。忧患意识、爱国爱民意识、民族意识是中国现代历史造就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 55 年了，我们的国歌还是《义勇军进行曲》，不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日，这个国歌是不会变的。让我们居安思危，在《义勇军进行曲》的号角下，为坚持与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完全统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中国共产党一道，携起手来，奋勇前进！

附录 2: 《齐齐哈尔轻工院校史》(1952—1985) 结束语

张元士

三十三年,学校经历了创业建设、院校合办、动乱破坏,恢复发展四个阶段。同时也是两治中专、两办大学的四个历史时期。三十三年,学校及专业的调整,隶属关系的更迭,办学层次的上下,校址的搬迁等变化,不下 20 次。每一次变化无不对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产生或大或小,有利或不利的影 响。其中,对学校发展有决定影响的变化有 3 次。第一次是 1953 年东北地区中等专业学校的调整,确定了学校的主要学科性质与发展方向。第二次是 1959 年到 1963 年的化工学院的上马与下马,教训深刻。第三次是 1977 年经国务院批准,结束中专,改建为齐齐哈尔轻工学院,确定了办大学的发展方向。

学校是在变革中成长的。变化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回顾过去,正确认识学校变化的主、客观因素,总结经验教训,对建设与发展这个学院是有意义的。三次大变化都是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联系在一起 的。总的说,是大局决定小局,但是,如果没有我们对大局的正确认识,自身建设的基础与积极进取的精神,也不会推动事业,有所作为。纵观学校发展的历史,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事在人为。

当前,我们国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已经走上了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康庄大道。这是一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伟大变革时代。党中央已经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科技改革的决定》、《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三个《决定》都强调了培养人才,发展教育的战略地位和作用,都为发展教育、改革教育指出了方向。我们黑龙江省资源丰富,振兴黑龙江的经济,必须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轻工、

食品、纺织与化学工业，必须补上我省轻工业的短腿。这里是黑龙江省唯一的一所轻工学院，中共黑龙江省委对这所学院的发展十分关注，并且作出过扩充与发展轻工学院的决定。振兴轻院是振兴黑龙江经济的需要。纵观大局，齐齐哈尔轻工学院必将应运而兴。

事在人为。在同一条件下，人们可以把事情办得多快好省，也可以办得少慢差费。特别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时代，这是一个竞相建功立业的时代，优胜劣汰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三十三年的建设，特别是改建学院八年来的建设，已为学院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为办好一所在校学生 3000 人以上规模的学院，创造了一些基础条件。更重要的是，在曲折的发展中，学院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我们相信，这里的同志，决不会辜负这个伟大时代和党的殷切希望，一定会在建院的第二个八年内，为建成一个质量高、效益好，进入全国轻工院校先进行列的轻工学院而奋斗不息！

看大局大有可为，看小局大有作为，这是一所很有希望 的学院。

附录 3: 《龙沙教育史料》:

北方技术教育的重要阵地 ——记齐齐哈尔轻工学院的发展历程

张元士

我在中学、大学受的是工业技术教育。参加工作以后，又主要从事中等、高等工业技术教育工作；一直在齐齐哈尔化工学校、齐齐哈尔化工学院，即现在的齐齐哈尔轻工学院。

一、旧中国的工业技术教育在齐齐哈尔的终结

在旧中国，齐齐哈尔有过一所工业学校——齐齐哈尔工业学校。这所学校缘源于清朝光绪年间。1906 年的工业学堂，延续到伪满时期。当我考入这所学校时，早已改为齐齐哈尔第二国民高等学校。地址是现在的齐齐哈尔市劳动技校。学校设有两个学科：一个是土木科；一个是机械科。学制都是四年。我在机械科学习。每年两科各招一个班学生，两个班充其量也就是 100 人。那么，这所学校的规模就是 400 人了。学校设备简陋，土木科有几台测量仪器，机械科有几台车床。我从这所学校毕业后，考入伪满新京工业大学（长春），读了三年书。抗日战争胜利了，我辍学回到齐齐哈尔。1946 年春天，国民党政府派员接收齐齐哈尔，也接收了齐齐哈尔工业学校，改为嫩江省工业职业学校。学校开学，缺乏教员，我的老师找到学校当代课教师。未几，齐齐哈尔解放，人民政府接管了这所学校。于当年 8 月，这所学校合并于齐齐哈尔市联合中学，成为学校的工科部。我和学生一起也都合并过来。就半年时间，1947 年春，这个工科部的学生和一部分教员被调整合并到哈尔滨铁道学院。我被学校留下来，改教数学课，并任数学教研组长。到此，旧中国留下来的中等工业技术教育，在齐齐哈尔也就终结了。

二、新中国工业技术教育在齐齐哈尔的诞生——齐齐哈尔化工学

校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 1952 年我国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完成，全国正在准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了《关于整顿与发展中等技术学校的指示》，以解决国家经济建设迫切需要的中级的、初级的技术干部问题。对当时的黑龙江省来说，中等技术教育是个空白，没有整顿任务。所以，黑龙江省政府于 1952 年 4 月决定要成立两所工业学校，即黑龙江省工科高级职业学校，黑龙江省工科初级职业学校（简称工科高职、工科初职），并要求于当年秋季开学。在一无校舍，二无教员，三无设备的情况下，要办一所工业学校是极为困难的。当时的省政府根据政务院的指示，“在办学方针上，必须掌握革命建设初期的特点，采取革命的办法，不怕因陋就简”，先把学校办起来。省工业厅、人事厅、教育厅、各负找校舍、调干部、请教员、招学生的任务，几管齐下，共同筹办学校。我就是在当年 6 月从市第一中学调到省教育厅工作的，给我的主要任务是编制两个学校的教学计划，并联络另外两个厅协调工作。我成为筹办两所学校的工作人员之一了。经过 5 个月的紧张工作，高职在北安借用校舍，初职在绥化借用校舍，都于 1952 年 10 月正式开学了。1952 年冬，1953 春，这两所学校都提出搬迁到齐齐哈尔市，后来经过调整，合并成一所学校——齐齐哈尔工业学校。但就全国来说，整顿中等技术学校的任务还在继续。1953 年秋，经过东北大行政区的中等技术学校的整顿，将全东北地区的化工类学科的教员、学生和设备，都调整集中到齐齐哈尔，把这所学校定名为齐齐哈尔化学工业学校。我也就是在这年的秋季，随着整顿，被调到这所学校任教导主任工作。因此，可以这样说，齐齐哈尔化学工业学校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祖国北方创立的第一所中等技术工业学校，而填补了原黑龙江省工业技术教育的空白。这所学校从 1952 年成立到 1978 年停办，经历了 26 年的战斗历程，设

置过 8 个轻化工类的专业，招收过 19 期学生（“文革”大部期间停招）计 4,380 名，毕业生计 3,698 名。由于“文革”前学生毕业由国家统一在全国分配，所以这里的毕业生由北向南冲，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了。他们的绝大多数，都已是高级职称、企事业单位的技术骨干了。有的担任行政职务达到副省级，有的成为全国十大企业发明家之一。我为这所学校取得的成绩，深感欣慰。

三、齐齐哈尔工业技术教育的升级—齐齐哈尔化工学院

齐齐哈尔的工业技术教育是从中等工业教育开始的。及至 1958 年，我国的经济建设出现了大跃进形势，同时也出现了工业技术教育大发展的新形势。1958 年，齐齐哈尔市轻工化工局办起了一所化工专科学校。在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为地方办起了化工系，哈尔滨化工局办起了哈尔滨化工学院、哈尔滨药学院。这些学校都已在 1958 年招了学生。黑龙江省化工轻工业厅也于 1958 年决定筹办黑龙江化工学院，并决定在齐齐哈尔化工学校建立学院筹备处。1959 年 5 月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决定对 1958 年成立的全省化工院校（系）进行整顿。当年 6 月 9 日省委召开整顿座谈会，我代表齐齐哈尔化工学校参加会议。这时我已经是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了。这个会由省委副书记王一伦主持。实际上这个会是一个论证会，即论证全省集中力量办一所化工类的高等学校，应该在哪里办？各方代表都讲了自己的办学条件。齐齐哈尔化工学校已经建校 7 年了，论校舍、师资、设备要比其他几所院校有明显的优势。经过一些专家发言，最后王一伦书记当即在会上拍板定案：调整合并几所院校（系）的师资、设备的力量，在齐齐哈尔化工学校的基础上，成立黑龙江化工学院。后按国务院的校名规定，定名为齐齐哈尔化工学院。学校又经过一次紧张调并，齐齐哈尔化工学院于 1959 年 9 月 14 日正式开学。在齐齐哈尔办起化工学院的同时，东北重型机械学院也于富拉尔基宣告成立。这样，齐齐哈尔的工业

技术教育就进入了高等教育的阶段。

在齐齐哈尔化工学校基础上，成立化工学院，本应该停办中专，但因条块关系在当时没能做到。这是因为齐齐哈尔化工学校曾是隶属于国家轻工业部主管的学校，1958 年学校下放时，轻工部曾下文规定：不准改变学校的专业设置和轻工的方向，当然也就谈不上停办中专了。这就形成了院校合办的局面，也就留下了齐齐哈尔化工学院短命的根子。院校合办，带来了诸多矛盾和困难。再加上 1959 年开始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院校合办难以继续下去，导致 1963 年秋季省委决定化工学院下马。齐齐哈尔化工学院办到 1965 年秋，学生全部毕业，摘掉了牌子。齐齐哈尔化工学院从 1959 年到 1965 年结束，设三个专业，学制四年，共招收学生四期计 547 名，毕业生 470 名，毕业生同样是全国统一分配到祖国各地，集中在化工企业工作。他们为发展我国的化工事业做出了贡献。

四、齐齐哈尔高等工业技术教育应运而生——齐齐哈尔轻工学院

1965 年化工学院下马，继续办齐齐哈尔轻工业学校。这个校名是学院下马时，轻工业部收回这所学校，于 1964 年改的。我想是轻工业部接受教训，怕再上下折腾，而改变学校轻工的方向。1966 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学校遭到了严重破坏。果不然于 1969 年末轻工业部又把学校下放到黑龙江省，省又下放到齐齐哈尔市，市又下放到市轻工化工局，一放到底。学校处于无人照管的局面。部分校舍被工厂占用，形成半壁河山。及至 1972 年学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边授课、边闹革命，学校秩序很不稳定。1974 年在“批林批孔”反回潮中，我建议学校党委并请示市委，提出复办学院的意见。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共齐齐哈尔市委、省轻工业厅、省文教办的支持。当时省文教办的意见，复办学院应办化工学院。但是，学校接受历史的教训，说服了省文教办应办轻工学院。于 1975 年开始，在学校的制糖工程、轻工自动化两个专业招了大专班。在中专

学校办大专班，学校登上了大专的车。1975年、1976年直到1977两年多的时间，学校党委责成我穿梭于省文教办、省教育厅、国家轻工部之间，沟通情况，反映意见和要求，申办请批轻工学院。终于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之后，于1977年7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齐齐哈尔轻工学院应运而生，中专的历史结束了。“先上车后起票”是社会上常见的现象，也许是推动事物发展的一个规律。回头再看这所学校的历史发展，如果在1959年办的是轻工学院而不是化工学院，我想学院在1963年决不会下马。那么，这所学校就不是今天的样子了。可见，“决策”的重要性，事在人为啊！

齐齐哈尔轻工学院从1975年算起（因为1975年招的大专班学员发的是轻工学院毕业证书），到现在整整20年了。这所学校属于地方普通高等学校，是黑龙江省唯一的轻化工类的高等学校，一直得到中共黑龙江省委的关怀和重视。1983年11月15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会第23次会议，做出了扩建齐齐哈尔轻工学院的决定：“为充分发挥我省资源优势，补上我省经济发展的短腿，培养适合我省经济发展所需的人才，齐齐哈尔轻工学院要进一步充实，加强轻工专业，并增设化工、纺织专业。办成轻、化、纺综合性的轻工业学院”。贯彻省委决定，学院有了较快发展。现在这所学院的专业设置达26个，在校生规模达4000人。现在，全院师生员工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积极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为建一所以化工学科为主体，以轻化工专业为重点，学科比较齐全，专业比较配套的综合性的轻工业学院而努力奋斗。

这所学院，到现在还不算全面建成。但看大局，大有可为；看小局，大有作为。我相信，这是一所大有希望的学院。

1995年5月15日

附录 4：：天齐小学教师节祝贺信

敬爱的赵老师

您好！新中国的第三个教师节既将来临，在这个欢乐的时候，让我们向您致以节日的问候。

教师是辛勤的园丁，为了哺育祖国的花朵呕心沥血，付出了自己全部的爱。虽然您已经离开了教师这神圣岗位。但是，在学生的心里却没有把您遗忘。因为您用慈祥的笑脸，和谐的语言，赢得了我们的心。课堂上，您细心的传授知识；课后，又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们感动。在您的教导下，我们得到了许多知识，得到了许多温暖，您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母亲。

您象细细的春雨，哺育着我们这些刚出芽的小树；您象勤劳的春蚕，无私的作出牺牲；您象蜡烛，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们要赞美您敬爱的老师，辛勤的园丁

啊，老师！您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待到二十一世纪的早晨，喜看燕子展开翅膀，飞向蓝天。我们再看老师的笑脸。

祝老师节日快乐！

天齐小学全体少先队员
九月九日

附录 5:

曼如的吊唁信

敬爱的朝珍大姐，您走了，从此世界上失去了一位最善良的女性，我失去了一位至亲至爱的亲姐姐，心中的悲痛，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

朝珍大姐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将自己毕生的精力献身于齐市教育事业。曾记得，朝珍大姐一手推着婴儿车，一面啃干粮，匆匆上班，那有多难，我劝过她：姐夫挣的钱够养家的了，您就别干了！可是朝珍大姐目光远大，她舍不得那些孩子们，义无反顾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接班人，她的学生遍布省内外，为齐齐哈尔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朝珍大姐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您和我姐夫坎坎坷坷，风风雨雨五十多年，共同为教育事业奋斗终身。朝珍大姐以伟大、无私的母爱、无微不至的关怀、培养教育了五个孩子，使她们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才，如今她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真是您值得自豪的。

最使我刻骨铭心的是朝珍大姐对弟妹的无私、无怨、关怀备至、亲密无间。当我和朝枢参加抗美援朝奔赴朝鲜作战的时候；当我们响应祖国号召，开发建设边疆的时候；当我们在文革中被下放农村锻炼的时候，朝珍大姐为我们解除后顾之忧，上为我们侍奉年老的双亲，下为我们照顾幼小的孩子，在孩子的心目中，姑姑是世界上最亲的亲人。此恩此德，终身难忘。

如果我和朝枢为革命做出了一点贡献，那么，这其中也有朝珍大姐一份功劳！

朝珍大姐永朽！

弟妹赵曼如敬挽

11月19日晨

附录 6:

天 啊、开 晴 吧！

儿子就要上班就业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不会再变挂了吧！
为了这个，熬过了多少个忧愁的夜晚。三千多了吧！

儿子高兴吗？妈妈高兴吗？姐姐高兴吗？爸爸都不知道。爸爸仍然放心不下，高兴不起来。

夏天的“阴雨”还没有过去。一场“阴雨”加“雷电”，闹得几乎是家要破，人要亡，儿子不认爹娘了。这是真的么！但愿这一场恶作剧，不是真的。

不过，一场雹灾，向爸爸揭示了一个秘密——儿子变了。变得几乎不是原来的样子。世上的事，那有那么简单啊！

就业转变不了一个人的世界观。就业只不过给人一个机会，一点光亮，一线希望。但愿机会不要错过，光亮不要灭掉，希望不要落空。

阴雨还没有过去，天还没有开晴。不能高兴得太早啊！

天啊！开晴吧！在爸爸还活着的时候。

一九八七年九月一日

附录 7： 《齐齐哈尔市民主党派史料》

对民盟四十年的简要回顾

民盟市委名誉主委 张元士

为抗日救国，中国民主同盟于 1941 年在重庆成立。在我国的东北三省，我想至迟于建国后 1950 年就有了民盟东北总部。因为原我省教育厅长关梦觉和齐市第一中学的副校长聂长林同志是在 1950 年被调到东北民盟总部（沈阳）工作的，分别就任总部负责人高崇民的助手和秘书。在黑龙江，首先在哈尔滨于 1951 年初建立了民盟松哈支部，负责人是杜光预。松黑两省合并于 1954 年，随之，民盟松哈支部改为民盟黑龙江省支部。在齐齐哈尔于 1956 年 7 月 12 日建立了民盟省委齐齐哈尔直属小组，负责人是周宗鲁。

一、1956----1958 年的齐齐哈尔民盟

1956----1958 年是齐齐哈尔市民盟从建立直属小组到成立民盟市委的两年。

1956 年对我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美好的春天。1956 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党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同志在会上第一次明确指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口号。那时，我国的知识分子十分雀跃，纷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我已受党的教育 10 年了，也是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1956 年对中国各民主党派来说，同样也沐浴着美好的春光，都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建立与发展组织。民盟在齐齐哈尔于 1956 年建立组织，正反映了当时我国各民主党派组织发展的形势。民盟黑龙江省支部，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根据民盟中央的决定于 1956 年改为民盟黑龙江省委员会。并当即于 1956 年 5 月开始在中共黑龙江省委的支

持与帮助下，派员到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北安等四个大中城市同时发展组织，到6—7月份，共发展盟员44名，齐齐哈尔就有15个人。嗣后于1956年11月在哈尔滨召开了民盟黑龙江省第一次盟员代表大会，正式宣告民盟黑龙江省委成立了。我市的程薪、周宗鲁当选为省盟常委。民盟在黑龙江省的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1956年我在齐齐哈尔化工学校任教导主任，已被党组织列为积极分子进行培养。没想到，就在这年的夏天，市委统战部邀我参加座谈会。会议由武文博同志主持，在盟省委派员贾云波，另一位是省委统战部的老于同志参加了会议。他们在会议上介绍了民盟的性质、任务及其光荣历史。我明白了，这是动员我们这些人参加民盟。对此，我没有精神准备，甚至一时难以想通。那时，我对党的统战知识知道的太少，对党的统战对象的理解更是片面。认为在旧社会我是个大学生的，那天参加会议的人大多是我的前辈，我的老师。当时我32岁，觉得成为党的统战对象是否太早了，难以表态。会后，武文博同志亲自找我谈话，大意是：知道你要求入党，第一，入盟不影响入党。第二，统战工作是党的工作，你入盟也是党的需要。就这样，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成为齐齐哈尔第一批盟员15人中的一个。这15人是：周宗鲁、范文璇、张采亭、陈竹影（女）、王景槐、关文经、曹荣、张元士、关锡昆、由潜如、王紫琼（女）、王柏冬、王俊琮、许树武、何铎朋，于当年7月由这15人成立了民盟省委齐齐哈尔直属小组。

我们这些人，当时所以加入民盟，共同的想法有两条，第一是因为中国民主同盟有过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历史，并有爱国救国的光荣传统；第二是因为党中央已明确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由中上层知识分子组成的民盟，不会也不应该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自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

党，是党联系广大知识分子的纽带，共同致立于社会主义建设，入盟标志着更靠近了共产党。我们这样认识，也这样宣传。在我们之后，就有比较多的知识分子要求入盟。仅半年多的时间，到 1957 年春，发展盟员就达到 140 多人。几乎 10 倍于当初 15 个人。中共齐齐哈尔市委统战部为齐盟的建立、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派市教育局长，党员王雁冰加入民盟班子，派党员冯玉田、于永臣、胡蹊等同志到民盟做驻会副秘书长、秘书长。直到 1987 年。

1956 年 10 月 23 日民盟省委齐齐哈尔直属小组召开了盟员大会，成立了民盟齐齐哈尔市筹备委员会，当时有盟员 97 人。省盟主委杜光预到会讲话，方行代表中共市委讲话，我们很受鼓舞。在这个会上，副市长程薪当选为筹委会主委，周宗鲁为副主委。这次会议在齐市知识分子中影响较大。会后的几个月时间，盟员又增加了三分之一，达到 140 多人。那时，民盟中央提出的总方针是“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盟的任务是要担负起团结、教育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责任，协助党贯彻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

可惜，春光太短，好景不长。不平凡的 1957 年的夏季来临了。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中国民主同盟的形象一落千丈。尤其是人民日报的“民盟的动向值得注意”一篇文章更为民盟罩上一层阴影。那时，盟员的心情沉重，大有悔不当初之感。一些提出过申请入盟的人，几乎都要求退回申请，而当时的市盟也不再发展盟员了。在反右斗争中，盟内有 10 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都摘了右派帽子。反右斗争之后，又进一步明确了民盟同各民主党派一样，都姓“资”了，几乎没有人再申请加入民盟了。

反右斗争之后，从 1958 年初开始到 5 月中旬，用五个月时间，在盟内开展了集中整风运动。从 4 月中旬到 5 月中旬，用一个月时间，每天下午盟员到原十八中校舍（现一职）集中，向党交心。都聚精会神，挖空心思，写大字报，自我批判。经过整风之后，于 1958

年9月14日----15日召开了民盟齐齐哈尔市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选举产生了民盟齐齐哈尔市第一届委员会12人。程薪任主任委员，周宗鲁任副主任委员。正式宣告民盟齐齐哈尔市委员会成立了。我想，如果没有反右斗争扩大化，民盟市委可能提前一年在1957年该成立了。

二、1959----1965年的齐齐哈尔民盟

1959----1965年这七年时间，经历了市盟的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委员会。到1962年召开第三届盟员代表大会时，盟员减少到126人。这期间三届委员会的负责人都是程薪主委，周宗鲁副主委。

这个时期的市盟贯彻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自我思想改造为主要任务。当然，民盟做为党的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有代表参加人大、政协，参与国家市政建设的方针、政策的讨论和事务管理，实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在参加国家政权方面，先有程薪出任齐齐哈尔市副市长，进而有周宗鲁出任市教育局局长、这在我市也是比较早的。但是，这个时期的民盟工作的重点，是教育盟员着力于思想改造，搞好岗位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个时间在盟内坚持贯彻服务与改造相结合的方针。

民盟市委第一届委员会成立，首先通过了决议，贯彻执行《民盟齐齐哈尔市委社会主义改造三年规划纲要》，把思想改造看成是各级盟组织、全体成员必须实现的政治任务。怎样进行改造呢？大会提出三项任务：一是学习，二是参加体力劳动，三是结合业务实践进行改造。那时，我们这些人，对思想改造都有自觉性，都是认帐的。特别是反右斗争之后，都感到不“脱胎换骨”进行改造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说的“要当先生，首先要当学生”，周恩来同志说的“人活到老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对我们都是很大鼓舞，对改造都充满信心，也都认为改造是服务的需要，都自觉地自我改造。

在反右斗争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的思想改造，强调上纲上线，搞批判，盟内生活比较紧张，心情不怎么舒畅。有伤感情的事，在所难免。1959年下半年开始，实行“三自三不”方针，提倡和风细雨，用“神仙会”的办法搞改造。盟内的生活还比较轻松，也有了活气。及致1962年情况有了变化。周恩来同志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重申“要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对知识分子的估价要以这个为纲”，继而在当年秋季，在广州的一次会议上，陈毅同志传达了周恩来同志的讲话，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知识分子又回到劳动者之中，成为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对此，大家高兴极了，这下子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了。同时也极大地增强了自我改造的信心和工作干劲。但未几何时，及致1963年又强调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从此，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不再强调了，“神仙会”也无影无踪了，盟内生活更是紧张有余，活泼不足，难以生动起来。不管怎样反反复复，这个时期的思想改造是盟内生活的主线，我们这些人都受益非浅。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坚定不移的。我这个人，在这个时期确实是学了不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我树立和巩固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作用很大。我也不放过任何一次参加体力劳动的机会。我能种地种菜，收割庄稼，都是在这个时期学会的，确实是增加了同劳动人民的感情。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至今我仍认为是正确的。我在工作中也确实多一些唯物论，辩证法和群众观点。这对我个人进步、搞好工作帮助很大。

三、1966----1978年的齐齐哈尔民盟

1966----1978年，是市盟停止活动到恢复组织活动的12年。1966年的春夏，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到8月，由于“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民盟市委的牌子摘掉了，办公地点也没了，基层活动也都停止了。盟员几乎都成为“红卫兵”攻击的资产阶级对象。“反革

命”、“特务”、“反动权威”的帽子随便戴，广大盟员身心受到摧残，有的致死。“士可杀不可辱”，辱不欲生自杀就有3人，其中得救者2人，后来都成为市盟的领导人之一。市盟的主要发起人周宗鲁遭到审查批判后，又被迫去清真寺参加劳动，直到1978年。那时，我是化校党外副校长，住反省室半年，查不出问题，还被扣上“党外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盟市委主委程薪同志于1971年10月23日病逝，享年73岁。当时的市革委会，落实政策，在市委小礼堂，为程薪同志召开了追悼会。那时，我从柳河干校带病劳动锻炼三个月后回来，做为他的学生，被邀参加了追悼会。遗憾的是，当时我们竟不能以民盟的名义为他献上一个花圈。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党和国家都遭到了灾难，民主党派何能幸免？党和民主党派荣辱与共是实实在在的。

1976年胜利的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也挽救了民主党派。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新时期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民主党派又开始恢复组织，也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1978年9月，民盟黑龙江省委临时领导小组成立，周宗鲁参加了省临时小组，着手恢复组织工作。1979年5月民盟齐齐哈尔市的临时领导小组也正式成立了。成员共7人。有周宗鲁、张采亭、张元士、刘文汉、关锡昆、王炯和胡蹊。周宗鲁任组长，张采亭、张元士任副组长。我从这个时候起，成为齐齐哈尔市盟领导集体的成员之一。那时，我已经55岁。1978年11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就任齐齐哈尔轻工学院副院长。

1979年民盟齐市临时领导小组成立时共有盟员104人，比1958年盟市委成立时减少了40人。当时盟员的思想状况是：愿意恢复

组织活动的不超过五分之一，大部分人顾虑重重，不愿再当盟员，还有少数坚决要求退盟。在中共市委的领导和市委统战部的帮助下，临时领导小组走访了盟员所在单位，在基层党组织的帮助下，做盟员的思想政治工作，经过半年的努力，到 1979 年的国庆节前夕，各基层都恢复活动了，在全市召开了盟员大会，正式宣布市盟全部恢复活动。我认为在当时所以能顺利实现恢复组织活动，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我们这些人虽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折磨，但是拥护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没有动摇。二是邓小平同志在 1978 年 3 月 18 日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话，重申社会主义时期的我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段的一部分。我们很受鼓舞，我们拥护新时期的党的基本路线。可以说，我们又重新沐浴了 1956 年的春光。

四、1979----1995 年的齐齐哈尔民盟

从 1979 年市盟恢复组织到现在，已经 16 年了。经历了第四届到第七届委员会。前两届任期三年，后两届任期五年。这个时期的市盟，盟员从 104 个发展到 670 人，基层组织从 15 个发展到 51 个。

这个时期，我们从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到明确参政党的地位，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盟内思想比较解放，组织生活比较活跃，较好地履行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责，为齐齐哈尔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献计出力，做了不少实事好事。应该说，这是市盟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说实在的，我们对民主党派在社会历史时期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起来的。特别是在较长时期受“左”的路线、思想影响，民主党派的地位与作用是难以全面地体现出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实践中，总结历史经验，直到 1989 年末，才逐步明确起来。明确了民主党派的参政党的地位与作用，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

是我们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明确了我国的政党制度是有别于并优于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的。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意义的。可以说，我们市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逐步进入了全面履行参政党职责的新时期。

1980年5月，市盟召开了民盟齐齐哈尔市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委员会，周宗鲁当选为主任委员，我和我的三位老师张采亭、关锡昆、盖亚麟当选为副主任委员。其实周老也是我的老师。我还兼任秘书长，延续到第五届委员会。在这个班子里，我是最年轻的了。尽管这时我已就任轻工学院常务副院长、党委常委，工作比较繁忙，周老师常找我商量盟务。我是随叫随到。我觉得，我虽然已是中共党员了，但是作为政治生命，民盟是我的第一生命。因此，对盟务尽些力，是义不容辞的。

市盟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首次市盟代表大会，在市盟历程中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把民盟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在盟内第一次明确提出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责。直到第五次代表大会，又明确提出要发挥民盟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作用。可以看出，从第四届委员会开始，我们实际上已开始全面履行参政党的职责，只是参政党的地位还没有明确而已。

民盟怎样实现工作重点转移，怎样发挥政党作用？从第四届委员会开始，特别强调要积极发动盟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强调立足本职，搞好岗位工作。并根据这个要求。从1982年开始，在盟内开展评选先进支部和优秀盟员活动。1982年就评出5个先进支部和45名优秀盟员。这5个支部和其中的17名盟员还被省盟命名为省盟先进支部和优秀盟员。其中有四位盟员在省的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会上作了大会发言，申石虎、黄继华、于国富被市政府命名

为市劳动模范和标兵，为民盟增加了光彩。在第四届、第五届委员会期间，几乎每年都召开全体盟员大会，交流为四化服务的经验，以调动盟员为四化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还开始注意开展社会服务工作，从市盟的特点出发，并利用自身优势于 1982 年 10 月创办了民盟文化补习学校，为后来市盟筹办职业培训大学创造了条件。

从第四届委员会开始，盟市委又开始注意发展与巩固组织工作，把自身建设提到日程上来。这是因为文革前的老盟员已经减少到 103 人，并有三分之一的盟员相继退休。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组织发展势在必行。市盟停止发展 23 年之后，于 1980 年 10 月，盟市委审批了文革后第一批盟员 8 名。他们是：申石虎、赵景文、左强、关斌、刘佐汉、张德甫、薛守山、胡蹊（副秘书长）。前三名都是重机学院的，应该指出，老盟员重机学院副教授王国维同志，当时对发展组织非常积极，是他在东北重机学院开创了民盟支部。要发展组织，我们就得在知识分子中宣传贯彻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宣传民盟同党并肩战斗，风雨同舟的战斗历程。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活动是，1981 年的市盟抓住民盟建盟 40 周年之机，举行纪念活动，召开了盟员大会，并邀请盟外知识分子 30 多人和基层组织的党政负责人参加会议。周宗鲁同志在会上，着重讲了民盟同党并肩战斗的历程，经受了三次重大考验，以及盟的现状和任务。还请市委统战部领导的各兄弟党派代表到会讲了话。这是一次很有影响的会议。另外，我们召开的为四化服务的经验交流会、游园会等大型活动，也都邀请基层党政领导和盟外知识分子参加，不失时机地宣传民盟。因此，在 80 年代的前期，民盟组织发展较快，到 1984 年盟员达到了 320 人，盟员人数比恢复活动时增加了三倍。针对组织发展这个态势，盟市委于 1984 年 3 月决定在一年内，在自身建设方面，要着重巩固提高，放慢发展，适当个别发展。并决

定举办基层干部培训班，共办了两期，每期三天。还举行辅导报告会，全体盟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也参加。辅导报告了三个专题：周宗鲁讲了盟史，于瑞聪讲了统一战线问题，我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参加学习班的基层干部，还都写了心得体会，做为培训总结。这次培训，实际上是对全体盟员进行一次“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教育，是一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自尊自重的教育。对巩固组织，加强自身建设作用很大，影响很好。新盟员申石虎教授于1983年做为特邀代表参加民盟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盟中央候补委员，于1984年6月省盟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盟副主委。

市盟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84年11月召开，周宗鲁做了题为《团结起来，勇于改革，为两个文明建设贡献力量》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第一次提出了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发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作用，并作为第一条任务。同时，仍强调盟员要搞好岗位工作，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作为第二条任务。第三条是加强民族团结，为祖国统一做贡献。第四条是要加强自身建设。可以看出，这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职责主要是：参政议政和加强自身建设，为振兴中华和祖国统一服务。这次代表大会选举委员31人，开始设常委9人。周宗鲁继续当选主委，副主委增加到6人，他们是：申石虎、张元士、盖亚麟、刘文汉、陈恩普、程兰英（女），上届副主委张采亭、关锡昆和上届委员王炯（女）、荆玉成、黄继华、赵文哲任常委顾问。这实际上，市盟已开始了新老交替与合作。我仍出任市盟的秘书长。于1985年刘文汉任驻会副主委，但不久由于筹建市民进的需要。刘文汉同志转到民进任主委。

第五届委员会期间，市盟全面地履行了参政党的职责，特别是在参政议政方面，逐步走向经常化、制度化。定期参加中共市委召

开的“双月座谈会”，参加市政协召开的有关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问题的研讨会，体现了政协是民主党派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重要场所。这期间，有 56 名盟员被推荐为省、市、区的政协委员，有 35 名盟员当选为省、市、区的人大代表。为推动盟员做好岗位工作，于 1986 年市盟做出决定，按年度评选优秀盟员。1986 年评出优秀盟员 51 名，有 36 名盟员的先进事迹，受到省、市级的表彰，12 名盟员的事迹参加省级展出。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参政议政方面，有了新的突破，雅尔塞支部经过调研，为哈拉村脱贫致富提出的养牛、养鱼、植树的三项建议，引起了镇党委、政府的重视，并得到了梅里斯民族区政府的支持而得以落实。乡党委把这个支部的三项建议看成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范例，在中共市委召开的统战工作会议上，做了经验介绍，受到好评。市盟的文化补习学校也开始扩大办学途径，开办了幼师班，电大中文班。教育学院与师范学院支部联合举办了齐齐哈尔市民盟高等文科学校，开招中文、外语自考专科班。为加强海外联谊工作，将市盟的社会联谊组改组为盟市委三胞联谊会。这届委员会在自身建设方面强调巩固与发展相结合，转入正常发展，三年共发展盟员 146 名。到 1987 年末盟员数达到 453 名。

市盟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于 1987 年 12 月召开。周宗鲁做了题为《加强自身建设，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贡献我们的力量》的报告。这次代表大会把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全盟素质，看成是贯彻民主党派履行参政党职责的首要任务。为此，报告中强调要学好党的“十三大”文件。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提出坚持与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大会之后，盟市委成立了中心学习组，强调领导要先学好，要带领全盟学好。在自身建设方面，强调思想建设，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多党合作的基础，是同共产党一道前进的思想之本。在组织建设方

面强调要新老交替与合作，搞好各级班子建设。在参政议政方面，报告提出贯彻“十六字”方针，为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服务，并明确指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就是参政议政，献计献策，贡献力量。报告还着重强调发挥我们的智力优势，在做好岗位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工作是新时期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延伸、深化和发展。批驳了那种认为民主党派是政党，搞社会服务是不务正业的观点，并引用了盟中央主席费孝通的话：“为建设社会主义初级国家出力就是我们的政治纲领”，“多出一些力量就是民盟做为一个政党的特点”，以提高大家的认识。我认为，在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后的新形势下，市盟的这次代表大会是努力贯彻党的十三大精神。周老的报告是全面地、准确地论述了民主党派的地位、作用和我们的任务。这次会议是一次动员全盟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献计出力的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贯彻了年初（一月一日）召开的民盟全国代表会议精神，在各级班子建设上要逐步进行新老交替与合作。对此，盟内思想比较活跃，对盟内职务的人选，人们比较看重。在大会酝酿候选人时，认识不尽一致，甚至有人在会上向周老质疑，认为大会不民主，有人摘桃子，并声言有些人要到会闹会。当即被周老指责。会后，还上访告状达一年之久。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的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在盟内不无反映。经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委员会和常委。周宗鲁继续当选主任委员，张元士、陈恩普、夏述增、程兰英（女）、吕秀中（女），当选为副主委。上届的副主委盖亚麟，常委崔恩涛、胡蹊任顾问。陈恩普兼任秘书长。大会圆满成功。

第六届委员会贯彻党的“十三大”精神，在坚持与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方面，有了新的进展。尤其是在1989年1月1日党中央发出的《坚持与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民主党派是参政党的地位之后，我

们在参政议政方面更加经常化、制度化。我们定期参加市委、市政府、市政协召开的座谈会、协商会、专题研讨会。这期间市明有各级人大代表、各级政协委员 95 人之多，占盟员总数的 17%。他们有的在自己出席的各种会议上以各种形式发表意见，献计出力。市政协委员、盟员祝红叶提出的建立齐齐哈尔图书馆的建议，终于在市庆 300 年时落实了。尤其在民主监督方面有了新的突破，我们有 3 名盟员被聘为党纪监督员、特约监察员、特约检察员。盟员傅博同志任特约检察员，参加案件审理，积极认真，受到赞扬，影响很好。盟市委领导多次参加市政府组织的财税大检查。中共市委、市政府领导与民主党派负责人交朋友，互访制度也建立起来了。市委书记杨光洪于 1991 年元旦前，登门看望我盟的盖亚麟老先生，在社会上引起反响。

第六届委员会贯彻市盟“六大”会议精神，在推动盟员搞好岗位工作的同时，大力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在 1988----1990 年就有盟员 123 人次被评为省市先进工作者和优秀教师。盟员富柏川被命名为全国优秀园丁。于 1988 年春在盟市委机关成立了社会服务部专门机构，相继成立了民盟黑龙江省委职业培训大学齐齐哈尔分校，齐齐哈尔市民盟科技咨询服务公司（后改为服务部）。于 1989 年筹资三万元建立华盛日用化学工厂。因为我已于 1986 年离休，盟市委决定由我主抓这方面的工作，于是我就成为市盟所属学校和经济实体的法人代表。

民盟省委职大齐齐哈尔分校，在资金、师资、校舍“三无”的情况下办学，十分艰难。只好走联合办学之路。针对社会需要，拾遗补缺，兴办各种专业，培养有用人才。在第六届委员会期间，兴办 11 个专业。学历教育人数达 1050 人，其中大专 430 人，中专 620 人，补学历大专专业证书教育 580 人，短期培训 500 多人。总地来说，我们的办学是以服务为宗旨，注重质量，注意社会效益，在社

会上赢得了一定声望。当然，我们也注意勤俭办学，在经济上要有所得，以补助盟内开展活动资金不足和协助政府解决机关干部住房困难问题。

科技咨询服务公司实行聘任盟内外的专家为特邀研究员，实行集约经营，享受国家为民主党派兴办实体制定的优惠政策。我们实行个人得大头，公司得小头的分配制度，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做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工作。由于我们对市场经济活动没有经验，直至第三个年头，才扭亏略有盈余。但是社会效益是好的。SWD 蒸汽喷射泵的节能设备，推广到东北三省和内蒙地区，为节省能源出了力。有七种 255 样器件推广到全国各地。

华盛日用化工厂，生产肥皂，终因设备落后、不会经营，停停打打干了三年，因扭亏无望于 1995 年春停产。

在参政议政、社会服务方面最值得提出的是雅尔塞支部的智力扶贫的三点“建议”，见到了实效，哈拉村开始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1988 年市统战系统为四化服务的经验交流会上，盟市委的社会服务部、雅尔塞支部被评为选进集体。老盟员张鸿斗代表这个支部在大会发言，交流经验，受到好评。这个支部的袁君保同志，在雅尔塞地区，推广薄膜种植西瓜技术，成绩突出，被农民誉为“致富财神”。

总之，第六届委员会，贯彻市盟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在社会服务工作方面，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为经济建设、社会进步，献计出力，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这期间在组织发展方面，前三年是正常发展，每年发展盟员 60 人左右。后两年，贯彻盟中央《关于发展、巩固、健全组织的决定》，放慢发展速度，把重点放在组织巩固上。90---91 两年间仅发展盟员 25 人。到 1991 年末共有盟员 597 名，基层组织 50 个。

1989 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在关系党和

国家命运的严重关头，我们市盟的广大盟员经受了考验，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广大盟员为维护稳定局面，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周宗鲁同志以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主委的名义，在齐齐哈尔日报上发表了《和衷共济，稳定局势，为制止动乱做贡献》文章，在社会上起到了稳定局势的作用。

1990年12月31日，市盟的创始人之一，市政协副主席，市盟主委周宗鲁同志病逝。这对市盟来说是一个重大损失。他是齐齐哈尔市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是广大盟员的楷模。他为齐齐哈尔的教育事业，为市盟的建设与发展，为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工作，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根据他的一贯表现和申请，在他弥留之际，党批准他为中共正式党员，逝世后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他的逝世，使我们民盟工作遇到了新的问题和困难。周老去世不久，于91年春节前，我骨折卧床达半年之久，半年后走动仍不方便，因此很少参加盟务工作。这对市盟的工作也不无影响。1991年对市盟来说是困难的一年。

按省、市委的统一部署，齐市的民主党派都要在1991年底之前换届改选。市盟的问题谁来接替主委。这是事关市盟的重大问题。但就在这个问题上，在周老病逝之后，几乎一年的时间举棋不定。这必然给换届带来困难。本来在周老病故之后，就应该指定代理主委，事情会好办一些，但都没这样做。直到1991年11月，经盟省委与中共市委协商才决定由我做换届领导小组的组长。对此我缺乏精神准备，我一直认为我做为市盟的主委很不适宜。我已离休五年了，年龄大了，政策上不适宜；我已经入党了，代表性不强；腿又摔坏了，健康状况不适宜。这三个“不”是征求我意见时的一再表态。因此，最后，最晚的决定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就一个多月时间，顾了这边，顾不了那边，可能要出现问题也在意料之中。我主要忙于起草换届的工作报告。

民盟齐齐哈尔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于 1992 年 1 月 23 日在嫩江宾馆召开。这已比其他各民主党派的会期推迟两个月了。在这个会上，我代表六届委员会做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自身建设，为发挥参政党作用做出新贡献》的报告。因为这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地位之后召开的，所以我在起草这个报告时的指导思想是：以市盟六届委员会四年来的实践现状为基础，努力表达对《意见》的理解与体会，进一步宣传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特点和优点，以提高全盟的认识，增强发挥参政党作用的自觉性。这个报告又进一步强调了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性、迫切性，把自身建设、提高素质，看成是能否坚持多党合作，履行参政党职责的首要条件。经各组讨论，一致同意这个报告。

大会选举第七届委员会。在酝酿候选人时，各组并未提出什么意见。但在计算选票上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一张选票错把“O”画在每个候选人名字的下面格内而不是规定的上面格内，并且两种选票都是这样画的。这证明是一个人投的两张选票。而这一张选票涉及到我能否当选为委员问题。为决定这张选票是否有效，专门召开了主席团会议，经过争论，最后主席团决议选票有效。这样，我只有一票之多，超过代表名额的半数当选了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在委员会上选举主任委员时，也有人提出不同意我担任主委的意见。其理由也同我当初提出的“三个不”是一样的，不无道理。最后经举手表决，多数委员同意，我担任了第七届委员会的主委工作。回过头来看，从发扬盟内民主角度来说，这是正常的，是一件好事。自盟市委第五届委员会以来，不管是等额，还是差额选举都有落选的问题。这说明盟内的民主意识，是不断增加的，是一个进步。

第七届委员会常委增到 11 人，但选出 10 人。他们是：张元士、

陈恩普、吕秀中、沈继强、蒋石昆、常治国、于英民、张洪滨、王奎生、李广顺。陈恩普（驻会）、吕秀中、蒋石昆、沈继强等四人任副主委，秘书长空缺。第七届委员会到 1995 年末已经四年了。这四年对盟市委来说是周老病逝之后，能否经受考验，克服困难的四年。尤其对我个人来说，能否团结一班人，带领市盟继续前进，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市盟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不久，赶上市人大、市政协换届。中共市委召开民主党派领导人协商会，协商市人大、政协班子的人选问题。对民盟、民建、九三三个比较老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未做市级安排，理由是年龄偏大。对此，我提出不同意见。主要是不从个人得失考虑，而从多党合作政治协商角度来说是一个缺欠。不应以年龄为绝对条件。这件事，对我是一个触动，更促使我感到我任民盟主委职务，对市盟来说也是一个缺欠，深感内疚与不安，同时也说明过去市盟在自身建设，选拔与培养有代表性旗帜性人物方面注意不够，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深感市盟加强自身建设的迫切性。

市盟第七届委员会，极其注意把自身建设放在工作首位，尤其注意领导班子的建设与团强统一。首先注意思想建设。七届委员会组建了以常委为主体，有机关中层干部参加的中心学习组。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学习中央领导同志各次重要讲话，学习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把一班人的思想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是增强全盟团结的思想基础和关键。为使市盟中心学习组的学习能幅射扩展到基层并带动基层学习，我们还采取了走下去、请进来共同学习的方法。这几年，中心组的学习每年都不少于四次。在强调思想建设的同时，我们还突出了组织建设。在发展组织上，注意引进有代表性的人物入盟。市政协副主席、师范学院教授辛培之，建华区副区长、轻工学院副教授张万起，重机学院教授刘助柏，相继于 1992 年、1993

年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于 1994、1995 年两次召开市盟的代表会议，对市盟班子进行微调，先进后出，为实现领导班子新老合作与交替创造条件。1994 年末补选张万起为委员，补选马炳竞为委员、常委、秘书长，补选辛培之为委员、常委、副主委。1995 年 11 月我正式提出辞去市盟主委职务的申请报告，并得到盟省委批准。在 1995 年末召开的代表会议和七届六次全会上，辛培之选为市盟主委，并补选张万起为常委、副主委，我被推举为名誉主委。这样，为明年盟市委换届创造了有利条件，也理顺了市盟主要负责人在人大、政协任职的关系。这个时候，我如释重负，由衷庆幸市盟顺利实现主要负责人第三次交班任务。我尤为真诚地感谢各位副主委、各位常委、各位委员，以市盟的全局为重，而对我的支持与合作。此时，有的同志说我高风亮节，“功不可没”，我实在不敢当，但我的确敢说市盟的广大盟员是有觉悟的，市盟的班子是团结统一的，市盟是听党话的、跟党走民主党派。

七届委员会在班子建设中，还注意发挥各位委员、各位常委的作用。尽量吸收各位委员参加坚持盟市委的专门委员会，充分发挥委员做为盟市委参政议政的参谋作用。自 1993 年开始，我们注意组建、整顿盟市委在各区的工委会，并尽量使各位常委提任各区工委会的负责人。这样，较好地发挥了委员、常委的群体作用，增强了盟的凝聚力。第七届委员会，到 1995 年末，四年共发展盟员 65 人。基层支部 51 个。盟员总数达到 674 人。平均年龄 53.5 岁，年轻化了。女盟员比例也有较大增加，达 198 名。1994 年各基层换届，经过一年来的工作基本结束，基层班子也年轻化了。

第七届委员会一直把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看成是盟市委的经常性的中心工作，正象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一样。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一个参加、三个参与，这是《意见》中的意见。盟市委自四届委员会以来，最感头疼的事就是一个参加，即盟员参加

政府和司法部门的任职问题，由于历史上的原因，盟员老化现象严重。大多因为年龄过大，推举不上去。七届委员会才刚刚有了突破。轻工学院副教授张万起入盟后，经盟市委推荐，市委统战部、组织部联合考核，于 1993 年经建华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当选为建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另一位年龄比较合适的盟员，也进入市委统战部门非党后备干部的视线，有可能于下一届在区一级政府中任职。我们都为盟员能在政府司法部门中任职感到高兴。三个参与，凡是中共市委、市政协、市政府召开的“双月座谈会”、“协商会”、“讨论会”，我们都认真对待，只要时间允许，我们都为参加会议认真准备，把我们的意愿反映上去，做到了畅所欲言。有的意见得到赞赏并被采纳。盟员个人的参政意识也在增强。于 1992 年，盟员刘长虹的《开发富区油田的风险及策略》论文，经盟市委推荐向政府提出，受到市政府领导的重视，市计委函复盟市委，认为很有价值，表示感谢。

政协是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重要机构和场所，从本届委员会开始，在政协每年的全会上，我们都以盟市委的名义做大会发言。1992 年陈恩普就对青少年进行“两史一情”的教育，1993 年张元士就充分发挥高校科技力量的作用，为振兴鹤城经济服务，1994 年张元士就对青少年加强德育教育，1995 年陈恩普就对青少年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等问题都做了大会发言。对 1996 年政协全会上的发言，辛培之就提高全民素质问题，已经过讨论，成稿并交政协材料组。为了保证发言质量，每次发言都经过调查研究，并邀请盟内有识之士参加讨论，总的来说质量的好的。《充分发挥高校科技力量的作用，为振兴鹤城经济服务》的发言，是经过盟市委组织一班人，参与四所院校四个支部共同调查研究，并请市经委、市计委的有关同志共同研究后才定稿的。这个发言引起市领导的重视，市政协准备以此为基础提出议案。因其后在政府出台的有关调动知识分子、

科技力量的文件已有所反映，经研究后才没再做议案提出。

从 1992 年开始，也就是从市盟第七届委员会开始，中共市委决定建立各民主党派与政府有关部门对口联系制度。市盟可与市“四委四局”对口联系。对口单位比较多，开始也进行了一些联系，但均不够落实。1995 年夏季在市委统战部的帮助下，确定市盟与市教委为重点联系单位。经双方领导协商，制定了联系办法和制度。同政府部门的对口联系，进一步落实与拓宽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渠道，更有利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能的体现和发挥。我们市盟发挥所长，将以教育工作做为自己参政议政的重点。这四年，在民主监督方面又有了新的进展，又有两位盟员被聘为市教育特约督导员和市公安特约监察员。

本着民主党派开展社会服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参政议政的继续，深化和发展的精神，本届委员会继续努力开展智力扶贫与办学讲学工作。从 1992 年开始，市盟一直在考虑如何扩大雅尔塞支部的智力扶贫成果并推广他们的经验。雅尔塞支部的同志们，身在农村，他们亲自搞庭院经济，从市园艺站引进良种，栽种葡萄，取得成果，起到了示范作用，有力推动了附近农民发展庭院经济。1993 年盟市委决定把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做为市盟的智力扶贫点。几经联系，在区政协、区委统战部的帮助下，终于在 1994 年被确定下来，当年我们为该区改进大豆良种一万公斤，经试种，当年就提高产量 20%。还为他们新办的玻璃丝厂解决了柔软技术之急。盟内的畜牧专家也积极为该区的畜牧业提供无偿技术服务，取得了较好效益。进而是 1995 年双方领导多次接触研究，决定以市盟专家为主体，成立了该区促进经济发展的顾问委员会。市盟有 15 位同志被聘为顾问。由区领导发了聘书。1993 年盟省委确立以依安县为省盟的智力扶贫点，盟市委领导在市委统战部的帮助下，多次北上依安，积极参与发展依安县城经济的讨论。并经双方商定为依安县办亚麻

绳、钢丝绳两个大专班。这项任务由重机学院、轻工学院两个民盟支部承办。得到了两院的党政领导大力支持，经过一年半时间的教学工作，修完了规定课程，进行了实习，质量是好的。两班学生共70人，毕业后已全部走上工作岗位。1994年东北三省民盟在四平召开社会服务工作会议，受省盟的委托，马炳竞同志在会上介绍了我们的工作情况，受到赞赏。我们又以《重在参与、贵在坚持》为题，总结了几年来社会服务工作经验，上报盟省委。1995年元月在黑龙江省统战系统为经济建设服务表彰大会上，由我宣读了这个经验，并纳入了这次会议的《材料汇编》。在这次大会上，盟市委和雅尔塞支部被评为先进集体，马炳竞、袁君宝两位同志被评为先进个人。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鞭策和鼓励。

这四年，市盟职大继续走联合办学之路。从1992年到1995年末，共招收俄语大专自考班200多人，电大中专幼师班、服装班两期150多人。1994年受黑龙江省成人中专委托，在齐市招生，达500多人，1994年职大在校生达800多人。1995年市盟申办民盟中学，经市教委批准，当年招生120人。市盟办学的路子又有了新的扩展，继续努力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做出贡献。市盟办学以服务为宗旨，以社会效益为重，同时也有一些经济收入。民盟职大办学八年，已为盟市委提供各种经费及解决机关干部住房问题等近30万元。仅购置机关用车一项就用7万元，分担了政府暂时拨款不足的困难。我们终于在1994年解决了盟市委的机关用车问题，从而改善了盟市委的办公条件。

齐齐哈尔市民盟到明年（1996）走过了40年历程。回顾这四十年，是坚持与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40年。这40年市盟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关怀下，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为坚持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为发展我国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以及为祖国统一大业等各个方面，做出了自己的

贡献。我坚信在今后的 5 年、10 年、15 年中，齐齐哈尔市盟也一定能够为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九五”计划和 2010 年的宏伟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是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结晶。我们一定要沿着这 16 字方针，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走自己的路。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坚定地永远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一道前进。中国一定要繁荣昌盛，中国一定能够繁荣昌盛。做为参政党的中国民主同盟，也一定能够为中国的繁荣昌盛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作者：张元士，1956 年入盟，1978 年入党，原轻工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盟市委七届主委、现名誉主委，此文写于 1996 年。）

附录 8:

我与齐齐哈尔民盟五十年

张元士

二〇〇六年四月

2006 年是齐齐哈尔市民盟建盟 50 年的纪念年。时光太快，五十年了。当初，我们 15 个人组成了齐盟小组，我 32 岁，按年龄排是最后一个。现在齐盟已是千人的队伍了，今年我 82 岁，按年龄排在我前面没有几个人了，而始终站在齐盟这个队伍里的，在齐齐哈尔，在我前面再也找不到谁了。我还勉强当了四年齐盟主委。在齐盟建盟五十年之际，作为五十年的见证人，自觉有责任写一篇纪念文章，也自认为有资格写《我与齐齐哈尔民盟五十年》这个题目。题目太大，又觉力不从心。考卷总是要交的，算是老盟员的心声吧。

这五十年，我始终在齐齐哈尔大学和它的前身齐齐哈尔轻工学院、化工学院、化工学校工作。任过这里的副校长、副院长等职，也任过这里的民盟组长，支部主委。当我写这个题目时，一定要涉及到我在这里的岗位工作，顺便也就写了齐大民盟五十年了。

这五十年是齐盟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五十年，同时也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五十年。就我个人来说，是受党、盟教育、学习改造、成长进步、参政议政的五十年。是我经风雨、见世面，有欢呼、有伤感、品味人生的五十年。

1956 年成立的齐盟

1956 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就在这一年的春天，周恩来总理宣布：我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号召广大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

就是这个 1956 年，中国各民主党派同时宣布要在全中国大中城市建立与发展自己的组织。这时的中国民主同盟已经走过了坎坷不

平、遭受重大牺牲的 15 年，中国民主同盟忧国忧民，救国救民，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胜利，始终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并肩战斗，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同其他民主党派一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合作的友党。理所当然。中国民主同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当时中国民主同盟提出了《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盟的方针，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就在这一年，民盟小组在齐齐哈尔应运而生。1956 年对中国知识分子是最值得欢呼的一年，在我的心境中是最明亮的一年。

齐盟小组是以周宗鲁同志为首的 15 人小组，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本地名师、名人，又都是我的师长。我与他们为伍，无论从那方面讲都自愧不及。我出生在日本人统治的大连市的一个农村。小学、中学、大学受到的都是日本人的“奴化教育”，对照今日台湾当局所实施的，那就是“去中国化”的教育了。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政治文化，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我 13 岁那年抗日战争爆发，从父辈们的谈论中，才觉悟我是一个中国人。不知道中国的历史、文化与文明，只懂一些专业知识，能算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吗？好在我于 1946 年参加革命，和 15 人中的大多数一样，接受党的教育 10 年了。1951 年，我刚当上第一中学的副教导主任，又被省教育厅委派到沈阳东北教育学院作为首期学员学习一年，学习了新民主主义政治、哲学、教育学，补上了这方面的空白。没有党的教育与培养，我怎能成为这 15 人中的一员呢！我作为一名盟员，在当时只能说是勉强够格吧！

我们这 15 个人都热爱中国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主张，都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那时候，我已是党的积极分子了，只是受各自条件的限制，一时难以实现。这不奇怪，我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懂得、并深刻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一个真理。这样一种心情，那时的 15 个人是否自觉自愿加入民盟呢？今年我 82 岁了，说实话，就我来说是自愿，也不是完全自愿。在中共市委召开的建盟座谈会上，我一言没发。会后，当时的统战部长武文博同志找我谈话：“知道你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积极分子，但统一战线工作是党的重要工作，党需要你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话说到这个分上，我只好表态，填写入盟志愿书。志愿书是我亲自写的，能说不是自愿吗？这不奇怪，因为那时对民盟的认识也是一片空白，又没有精神准备，只听座谈会上的简单介绍，能说认识了民盟吗？类似我这种情况，在当时的 15 人中，我想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写到这儿，人们就可以明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指引、教育和帮助，就不会在那时，在齐齐哈尔建立民盟组织。

齐盟小组建立之后，我们主要是学习与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学习与宣传民盟的历史及其政治主张，发展民盟组织。1956 年秋后我已是当时化校的副校长了。仅半年的时间，在化校就发展了 10 名盟员，他们都是化校的骨干教师。学校仅有的两个专业教研室主任都加入民盟了。化校民盟的发展状况，可以反映当时齐盟的发展形势。

1956 年 10 月 13 日—14 日召开了齐盟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程薪副市长当选为主任委员，周宗鲁同志当选为副主任委员。民盟省委主委杜光预、中共市委常委方行同志到会讲话，并邀请盟员所在单位的中共领导和盟友参加大会。这是一个规模盛大，影响深远的会议。到 1975 年反右派斗争之前，齐盟已有盟员 145 人，几乎 10 倍于当初的 15 人

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在齐齐哈尔有这么多的知识分子入盟，我认为主要有三条。首先是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及各级党委的领导与支持；二是中国民主同盟是救国救民，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的友党；三是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民盟不

会是，也不应该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政治力量。

1956年齐盟的诞生年。春光明媚的1956年。

1957年反右斗争中的齐盟

春光太短，风云突变。不平凡的1957年夏天来临了。由于极少数右派分子借国际上、社会上一股反社会主义思潮，向党挑战，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而引发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国共产党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中国民主同盟的形象一落千丈。尤其是人民日报的《民盟的动向值得注意》一篇文章，至今在我的心镜中留下了阴影。那时盟员心情沉重，大有悔不当初之感。

1957年由于史怀文老先生在1956年底去世，我接任化校民盟主委。化校党的整风开始了，党总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要求民盟支部开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那时，学校工作很忙，我说没有时间，他提出晚上开，在家属宿舍开也可以吗，我只好答应。于一个夜晚，在学校的北家属宿舍白绍崑老师家开会（他是1957年春才入盟的）。我是主委，当然要开宗明义希望大家实事求是提出意见，帮助党整风。会上索化远同志就储安平的“党天下”讲了一些意见。张洪斗同志就学校党内的几位工、农、兵出身，身居学校中层职位的干部发表了看法，后被上纲为“三种干部不能领导学校。其他同志讲些什么已记不清了。第二天，我把记录给总支部书记交了卷。夏季，全国范围的反右派风暴开始了，化工学校也大鸣、大放，大字报挂满了走廊。一张非常显眼的大字报挂出来了：“民盟支部召开了一个向党进攻的黑会”。黑夜在一个老师家开会，说“黑”也贴点边。我不服，当即找了党总支部书记争辩，会是你布置的，怎能说是黑会呢？不容争辩就把索化远、张洪斗两位同志的发言上纲，说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我呢？据说找不出反党言论，因为组织了“黑会”而

划为中右，即不戴帽的右派了。

在这场斗争中，齐盟共有 10 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民盟市委当然要开会批斗他们。索化远、张洪斗两位同志就得校内批、盟内批。我带了一种内疚感，也得上阵批斗。那时，我从未想到这是党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齐盟的 10 名右派分子中多数是盟的基层干部，其中一名是市盟的宣传部长。齐盟遭受了重大损失。反右斗争之前，齐盟有 145 人。此后，齐盟的组织发展就停滞了。此前提出申请志愿入盟的。都纷纷要回申请书。在化校就有两位很有专长、很有影响的同志，从我的手里要回了申请书。到了 1978 年，齐盟仅有盟员 104 人，减少了 20 多。反右斗争扩大化，破坏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一大批党内的知识分子受到了伤害，也是党的损失。

在反右斗争的风暴中，我夜不能眠。左思右想，也曾闪过退盟的想法。中国知识分子很看重面子，反觉得这是经不起考验，太不够“面子”了。一再想我为什么要加入民盟。民盟是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提出了《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总方针，民盟没有错。是因为我加入民盟才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不！没加入民盟的不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从入盟那天起，我就有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必须珍贵。经过日夜、痛苦的思想斗争，我的思想觉悟倒有了升华。如果说我入盟时的那点觉悟多是外因在起作用的话，这时的觉悟多是内因在起作用了，是大悟了。我要努力成为一个真正的盟员，纯粹的盟员，一个献身于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盟员。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在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11 月 5 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完全是当时轻工学院工作的需要，也是当时中共黑龙江省委拨乱反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需要，一时成了“样板”了。入党以后，我一再说：民盟是我的第一政治生命，入党只能说是这个政治生命的升华。我入党了，在齐大，在社会上，人们仍然把我看成是党的统一战线上的一员。齐盟再入党的已有不

少人了，我希望他们都不要忘记：自己的政治生命是民盟给的，做一个好盟员同做一个好党员是一致的。

1957 年反右斗争扩大化是共产党犯了错误，是坏事。但激醒了我们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好好学习，好好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讲，坏事变好事了。

自我教育与改造八年的民盟

1958—1965 年的社会主义中国，贯彻党的八大路线，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这八年并不平静。国际上，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制裁依旧不变。而苏联违约逼债，陈兵国境，武力威胁。国内有“左”倾思想干扰，国家遭受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在外有威胁、内有困难的形势下，齐盟的广大盟员，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渡过了难关，经受了考验。这个时期的齐盟，有一些同志当选了省、市、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为发展与完善我国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做出了贡献。但这个时期齐盟的主要任务乃是自我教育与改造，可以说是自我教育与改造的八年。

反右斗争之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再也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而各民主党派又归位于资产阶级那一边了。这个“倒退”与“逆转”，在当时没有人反对过，我也毫不怀疑其正确性。这不奇怪，因为在反右斗争反出来的“右派分子”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而其中代表人物又多是各民主党派的上层领导。

鉴于当时的形势，根据省盟的部署，齐盟从 1958 年 1 月下旬开始整风。先是分散在各基层进行整风学习。可能觉得声势不大，及之 4 月 19 日，改为集中整风学习，每天的下午集中到原四中校舍，用大字报搞大鸣大放。每个人都挖空心思向党交心。据统计，仅 13 天时间就写了 1400 多张，平均每人写了 180 多张，还开展“三

比”活动，比“写的像，写的真，写的狠”。不知这是谁的主意？到5月11日运动结束了，也没有比出个三、六、九等。这种用“运动”形式的盟内整风，还好，在50年只有过这一次。愿从此绝后。但不能否认这次运动成绩是主要的。那就是都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都需要脱胎换骨。叫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自我教育与思想改造的自觉性确实是极大地增强了。

1958年夏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教育大革命，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化工学校的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学校大办工厂，教师与学生都参加劳动。革命就要涉及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又成了对象。化校盟内几位老先生成为批判对象，叫做“拔白旗，插红旗”。市政协常委、盟员盖钦和老先生说了一句话：白旗拔掉了，红旗没插上，岂不出了个大窟窿，让学生听见了。学生以此为题材编成一个“活报剧”在学校的文艺演出会上演了，引起了哄堂大笑。一曲荒唐戏，教师心酸了。几乎与此同时盟内也开展了“拔白旗。”“插红旗”的自我分析与批判，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要把自己改造成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1958年的盟内整风和“拔白旗，插红旗”的自我分析与批判，实际上是反右斗争的收尾，都有“运动”的气氛，紧张有余，活泼不足。

经过一年的思想政治运动，齐盟的主要思想是统一到需要改造的轨道上来。齐盟于1958年9月14日在湖滨饭店召了第一次盟员大会，那时有盟员135名。这次会议选举产生了齐盟的第一届委员会，程薪（副市长）、周宗鲁当选为主委、副主委。齐盟的领导人只有两人，直到文革前的第三届委员会才增加一名副主委张采亭（我的中学老师），不像现在这么多。第一届委员会任命我为市盟宣传部副部长，当时我早已是化校副校长了，是省政府任命的副县

级干部。可是第一届委员中没有我的名字。对此，我不在乎，要说没有想法也不是实话。当是，我想过，如果没有化校民盟那个“黑会”被划为中右，不知要挤掉那位委员了。这次大会的主调就是改造，通过了《齐盟社会主义改造三年规划》的决议，并提出三条任务：一是学习党的方针，二是参加体力劳动，三是结合业务实践进行改造。这三条又何止三年，直到“文革”前，三届委员会都是始终坚持的。

这八年，我们以“团结—批评—团结”为公式，贯彻“三不”方针，用“神仙会”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与思想改造。我是化工学校以及后来化工学院的盟支部主委，坚持每两周一次生活会，互相学习，交流思想，也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帮助。盟内组织生活比较活泼和谐。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们的主要教材。至今，我仍认为是一篇经典、绝好的文章。“当先生要先当学生”、“教育者要先受教育”成为我的座右铭。这个时期，我确实学了不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从不放过一次体力劳动机会，曾记得1960、1961、1962年的三个暑期都是我带领学生到九三农场参加秋收、秋割，和学生一起吃住，一起参加劳动。我在一次劳动结束后回校上课，课间坐在椅子上休息，再站起来就很困难了。腰肌劳损，遗患至今。八年的学习与锻炼，对我树立与巩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群众观点都很有帮助。对我工作中多一些唯物论和辩证法、搞好业务实践与服务，都很有作用。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至今我认为正确的。八年的盟内的自我教育与思想改造，铸就了我们那一代人的共同点：就是坚定不移的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共同信念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到了1962年，我们自我教育与改造所取得的成效，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陈毅同志在广州一次会议上公开了周恩来总理在中央一次会上的讲话：要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中，对知识分

子要以这个估计为纲。我们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我至今还记得化校白绍崑老师那年中秋节前后的一次盟支部会上的讲话。他说：中秋节，党送给我们的不是月饼，胜过月饼，是“脱帽加冕”的大礼啊！其声音都有些颤抖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又一次欢呼了。

1963 年，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不再强调了。盟内的学习与改造又趋向紧张。不管怎样反反复复，在八年的自我教育与思想改造始终是盟内生活的主线，在学习、改造、服务中，在盟内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学习风气，形成了齐盟的自我教育与改造的优良传统。应该说，这是齐盟最宝贵的财富。做为一名盟员，我们手中的武器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一级组织，我们的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一定要发扬。坚持学习，坚持发扬我们传统，就能同共产党一道与时俱进，发挥好参政党的作用。

在完笔这八年的学习与改造，我顺便要点一下，这八年来齐盟的组织基本上是停止发展。但也不是没有人要求入盟。黄继华同志就是在 1958 年申请入盟、坚持四年参加盟内生活，终于在 1962 年批准入盟。黄继华同志是地理学教育的名师，在省内地理学界也颇有名气，后来被评为市的劳动模范，出席过省盟“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会”为市盟争光。民盟形象在社会上不被看好的那个年月，黄继华同志居然勇于提出申请入盟，并说：我终于成为光荣的盟员。令人敬佩。光荣的盟员，盟员的光荣。

十年浩劫的齐盟

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展到 1966 年的春夏之交，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把社会主义中国的“阶级斗争”推向了极端、极广、极深，几乎涉及到每个学生、每个家庭。真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了。本来，这场斗争的锋芒是指向

“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但是，根据当时的“理论”、“党内走资派”身居各级领导岗位，他们的社会基础就是“地、富、反、坏、右……及其知识分子”这就把知识分子放在挨整的地位，成了“臭老九”。而知识分子又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党内走资派”的重要支柱，成为斗争对象是必然的了，作为知识分子政治联盟的民主党派何能幸免。及至 1966 年 8 月，“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把齐盟市委的牌子摘掉了，齐盟的机关不存在了。齐盟的各基层组织和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一样都停止了活动。共产党乱了，民盟散了。分布在各基层组织的盟员几乎都成了“红卫兵”的攻击对象，“反革命”、“特务”、“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随便戴，身心受到摧残，有两人致死，辱不欲生自杀的有三人，其中两人得救了，后来都是齐盟领导人之一。当时齐盟的主要领导人周宗鲁同志经斗争批判后。又迫其到清真寺参加体力劳动，直到 1978 年才恢复工作。

文革期间，我是化校副校长。运动开始不久，“红卫兵”就抄了我的家。我的父亲已于 1956 年经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审：不以历史反革命论处，享有公民权，这回重新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牌子，遣返到我的故乡农村劳动改造。到 1966 年秋，化校的党内当权派都被打倒了，“罢了官”，关进了“牛棚”。我虽未“罢官”，不打也倒了。“造反派”尚未夺权之前，全校 50 多个造反团。他们要钱、要物、要房子，学校有关部门又把责任推到我这里来，说：那还有没罢官的张校长，你找他去好了。我只好穷于应对。那时，我最怕“造反团”进驻各个实验室，破坏仪器设备。我只好找了几个有实力的“造反团”的头目共同商量，晓之以理，“约法三章”谁也不能进驻实验室。他们听了我的劝告，联合出了“告示”。最终化校的实验室及仪器设备保存下来了。但是，“文斗”发展到“武斗”，学校教室的墙壁，有不少被捅出了大窟窿。幸好，“军宣队”、“工宣队”先后进驻了学校，造反派夺了学校大权。我没罢官的那一点

“权”，当然就自消自灭了。我轻松了。那时，我的肝病暴发，有腹水，经医院诊治，初期硬化，批准我在家休息就医，随叫随到就是了。

1969年秋，：“革命”进行到“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学校开办了“清队”学习班。我只好带病参加学习。学习班结业时，我没毕业，升级到“重点人”学习班，全校不过10人左右。这一“重点人”，就等于关进了“牛棚”，不许回家了。早请示，晚汇报。时不时还要接受各造反团的批判、斗争。好在，我没遭拳打脚踢，也没戴牌子，搞“喷气式”大弯腰。1970年的春节到了，学习班放假五天。给我的任务是学习《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写一篇交代材料。我写了篇长达万言的“投降书”。标题是：“我的至今一生都是有罪的”。内容是：出生在富农家庭有罪；受的是日本人的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罪；我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罪及我身；我执行的是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有罪；我加入了资产阶级的民盟有罪。真是大有基督教所说的“原罪”感了，这可能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的同感吧。这种上纲上线的自我批判，在那时我到觉得很自然，没有什么勉强。但这个“投降书”并不适合造反派的意图。他们叫我交代在长春工大读书时参加了国民党的“101支部”的罪恶。不错，那时我确实接触过后来才知道的地下国民党员，而且通过他们读过一些“禁书”，如果那时我知道他们是国民党，也许就参加了。我这个人，觉悟并不高，还有一点骨气，没参加就是没参加，决不胡说八道。让我上台揭发“走资派”，上纲上线我也会，但决不无中生有。因为这个，在一次揭发大会上，被造反派头目推下台来。直到1970年的五一节前夕。“重点人学习班”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学习班解散了。毕业没有？谁也不说。我自认为是“清除队伍”了。

出了学习班，我带病被分配到学校的机械厂铸造车间参加翻沙重体力劳动。我忍受肝区的病痛，要翻起翻落几十斤重的沙型，长

达十个月之久。我的毛背心的肝区部位，硬是被我的手顶出了个窟窿。在劳动期间，和我一起参加劳动的老师、工人师傅，对我都很关心照顾。我感谢他们帮助我度过了这一“劳动关”。

1971年4月，学校革委会落实政策，让我去省柳河干校参加劳动锻炼三个月。叫着“吃小米，爬大山，焕发革命青春”，问我行不行？我怎能放过这个“归队”的好机会呢！当即回答：能行。这一行到了庆安县下了火车，一开始就是“小长征”，从早上走到晚上，才到达柳河干校。这期间发生了“林彪事件”，我又一次闯过了“劳动关”。我回到家里就又卧床了。这回真是“归队”了，应该说是解放了。

1971年11月再落实政策。由市革委会任命我为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官复原职”了。这时的化校是什么样子呢？学校没有学生，无线电一厂占领了学校一大半校舍，成了工厂的生产车间，学校只有半壁河山了。

1971年10月23日，齐盟主委程薪同志病逝。我在家养病，应邀参加程薪同志追悼会。这个会是由黄德民主持的。他是联合中学、第一中学的学生。程薪和我都是他的老师。可能是这个缘故，我才能参加这个会。当时，我想过，很遗憾不能以民盟的名义向他敬献花圈，他是齐盟的主委啊！我没有发现其他盟员参加这个追悼会。我是这个追悼会唯一的盟员见证人了。

1972年化校恢复招生，招收工农兵学员。实行学生“上、管、改”。我仍主管学校的教学工作。贯彻“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学农、学工、学军、批判资产阶级”的最高指示，我按七、三开，以学习文化为主安排了教学计划。当然，要经过革委会批准了。但这仍不附合一部分造反派学生的口味。大字报又挂出来了，说是“回潮”、“没有李志超的反动路线”（李志超，原化校校长）。幸好，当时的党委书记陈洪生同志顶住了，未遭批判。但考试环节被取消了。

1974年的夏季，我斗胆提议复办大学，办轻工学院，得到了陈洪声同志的支持，报省教育厅、轻化工业厅、省文教办。我几乎用了三年的时间，穿梭于齐齐哈尔、哈尔滨、北京有关部门，陈述复办大学的理由。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实行全面整顿。这一年经省文教办批准，学校先招大专班。“没起票先上车了”，为批准复办大学创造了有利条件。但1975年底邓小平同志又被打倒了。复办大学的事又搁置起来。终于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于1977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齐齐哈尔轻工学院成立了。

我写了化工学校“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也写了我个人的遭遇。其实我受的伤害比起盟内其他同志算是比较轻的。有的被投入监狱，长达数年之久，有的全家被迁往到农村落户，化校的“文化大革命”全过程，可以说是十年浩劫中的一所学校遭受破坏，知识分子身心遭受摧残的一个缩影。十年浩劫在我心镜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是同患难、共受辱，真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了。

新时期三十年的齐盟

物极必反。1976年10月，胜利的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也挽救了民主党派经过两年的拨乱反正，落实政策，1978年12月党中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摒弃了以“阶级斗争”那个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齐盟于1979年恢复组织。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三十年了。这三十年齐盟经历了第四届到第九届委员会，贯彻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为坚持与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应该说，这三十年是齐盟五十年历史中最好的三十年。

1977年5月，邓小平同志批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时，就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抓好“科技教育”。这样，1977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齐齐哈尔轻工学院成立了，我的1974年的提议终于实现了。我于1978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年后转正任我为轻工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从此，我得以参加齐盟的恢复组织工作，并进入齐盟的领导层。这时，我已经55岁了。

1979年5月19日，成立了恢复齐盟的领导小组，成员7人。组长周宗鲁，副组长张采亭、张元士。当时的盟员，愿意恢复和不再想当盟员都是少数，多数是观望随其自然了。这为恢复组织工作带来艰苦的思想工作。好在，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及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一再重申：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都是劳动者；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振臂欢呼了。这为恢复组织又带来极为有利的形势。经过三个多月的工作，到当年国庆节前夕，齐盟的各基层组织都恢复组织生活了。当时齐盟的专职干部、老秘书长胡蹊同志，为落实政策、恢复组织，遍走各基层党委，找盟员谈心，有时日以继夜，功不可没。

为庆祝国庆30周年，为庆祝齐盟恢复组织，于国庆节前夕，临时领导小组在龙沙公园举行游园活动。有盟员、盟友、基层党委领导参加。我受周老的委托主持这次游园活动，并讲了话。就在这次活动，我的老师张临清同志赠诗一首。

浪 淘 沙

游龙沙公园赠张元士

张临清

蝴蝶舞翩翩，人笑花妍，

新秋风景雨晴天。

十年忧心今放眼，无数青山。

脱去旧时衫，一展眉宽，

诗思清隽到云端。

同写复活新历史，遥寄天安。

这首诗 是赠给我的，也是赠给大家的，他所表述的是游园人共同心声。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1980年5月齐盟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是自1962年时隔18年，齐盟召开的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会。标志着齐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精神，把齐盟的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推动盟员搞好岗位工作。为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同时，也第一次提出齐盟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责。实际上，早在“文革”前齐盟的主委程薪同志、副主委周宗鲁同志已经是副市长、教育局长了，还有那么多的盟员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了各级人代会、政协会，能说不是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吗？只是没有明确而已。依我看，四届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把重点放在推动盟员搞好岗位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齐盟是这样，省盟也是这样。从1982年开始，省盟、市盟每二年评选一次先进盟支部、优秀盟员，其标准主要是搞好岗位工作，为四化服务。1982年齐盟就评出5个先进支部，45名优秀盟员。其中5个支部和17名盟员，被省盟命名为

先进支部和优秀盟员。申石虎、黄继华、于国富被市政府命名为市劳动模范和标兵，是他们的光荣，盟员的光荣，也是齐盟的光荣。

到 1984 年第五届委员会，我们才明确了作为民主党派的齐盟的职责就是参政议政和自身建设，为振兴中华和统一祖国服务。我们的工作应以参政、议政为中心而加强自身建设。从此齐盟的参政议政工作逐步走向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定期参加中共市委召开的“双月座谈会”，参加市政府召开的有关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研讨会、征求意见会，参加市政协有关专业委员会的座谈会及专题调研等工作。齐齐哈尔市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工作出现了新局面，参政议政自然要成为齐盟的中心工作。齐盟要参加的每一次会议，每一项工作都要认真准备，首先在盟内邀请有识之士参加讨论，吸收他们的意见。总的看，自五届委员会以来到现在的第九届委员会，齐盟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多被有关方面采纳，并有很好的评价，而且愈来愈好，愈见成效。而参加各级人大、政协的盟员的政治热情愈加高涨。到第九届委员会，参加市政协盟员的提案率竟达 100%，难能可贵。其中有不少提案刊登在《齐齐哈尔日报》上。1989 年 11 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坚持与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多党合作的经验与教训。明确了民主党派的参政党的地位，成为新时期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纲领性文件。我们参政议政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这就突显了中国民主党派的地位与作用及其特点与优点而区别于西方政党制度，也显示了中国民主进程的推进和政治文明的新发展。毛泽东同志在 1957 年提出的、我们渴望的“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个人心情舒畅、又有统一意志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正在形成。中国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知识分子笑逐颜开，畅所欲言了。

我始终不会忘记一个农村的民盟牙尔塞支部，在参政议政中为

乡村建设所做的贡献。他们为哈拉村的脱贫致富所提出的养牛、养鱼和植树造林的三项建议，引起乡党委、乡政府和区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并得以落实，取得成效。乡党委把这“三项建议”看成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范例，在中共市委召开的统战工作会议上做大会发言，受到称赞。这个支部的主委就是 1957 年在化校被错划为右派的张洪斗同志。他蒙难后落户农村，任中学教员。落实政策后，他依然扎根农村，并建立民盟牙尔塞支部。他爱国、爱党、爱盟、爱民矢志不渝。盖棺论定，他是齐盟盟员的典范，是一位值得我们崇敬和缅怀的盟员。这个支部的袁君宝同志，被农民誉为“致富财神”。写在这儿，我们还要永远不要忘记的盟员林文炳烈士，在 1978 年 7 月 16 日为抢救出两名游泳遇险的学生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齐盟的好干部，好盟员。1983 年黑龙江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烈士。

作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延伸、深化与发展的社会服务工作，齐盟于 1982 年 10 月就开始了。创办了齐盟文化补习学校，先是为高考落榜生补习课程，以利再考，继而扩大招生，开办了电大幼师班、中文班。贯彻民盟中央社会服务工作“以办学讲学为基础，以咨询服务为支撑”的方针，齐盟的文化补习学校于 1988 年升格为民盟齐齐哈尔职业培训大学，适合社会需要、拾遗补缺，实行联合办学，多种形式办学，多层次办学，兴办十几个学科专业。1994 年在校生达 820 多人，到 1995 年齐盟职大累计共培养学生六千多人。在联合办学中，第一重机厂盟支部，在常治国、丁秀华等同志的组织下，坚持在富区多层次、多专业办学，成为民盟职大的重要组成部分。盟员崔文涛、汪周青、崔恩涛、范中珊、张万起、唐祥、于琼等同志，或参与组织、或参与教学、或献计出力，都为民盟职大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993 年盟省委决定依安县为省盟扶贫点。在盟省委的组织下，

齐盟参与了调研工作,为适应该县兴办企业的需要,由该县选送具有高中水平的学员,由齐盟举办大专学历学制两年的两个专业技术培训班。这两个专业,分别由东北重机学院盟支部,齐齐哈尔轻工学院盟支部承办。在两学院的党政领导支持下,按期圆满完成了省盟在依安县的一项扶贫任务,得到了省盟的首肯和赞扬。两个支部的主委蒋石昆、陈奕兴同志功不可没。

1988年齐盟成立了民盟科技咨询服务公司,实行聘请盟内外专家为特邀研究员、合同经营、个人得大头、公司得小头的分配制度。公司享受国家对民主党派兴办实体的税收优惠政策。专家们的科研新成果、实用技术得以转化为生产力,社会效益是好的。SWO蒸汽喷射泵是一种节能设备,推广到东北三省和内蒙地区,为企业节能做出了贡献,有七项225种器件推广到全国各地。

为适应齐盟的社会服务工作的需要,齐盟机关于1988年成立了社会服务部,从市电大调任马炳竟为首任社会服务部长,马炳竟同志工作认真、公关能力强、不辞辛苦为开创与发展齐盟的社会服务工作做出了贡献。她曾两次参加民盟中央在东北地区召开的社会服务工作经验交流会,介绍齐盟的工作情况,受到好评。齐盟的办学讲学、科技咨询工作始终坚持以服务为宗旨,注重质量,注重社会效益,在社会上赢得了声望。在六届、七届期间,我已是离休人员,才有资格承担了职大、公司的法人代表。

齐盟的基层支部,根据自己的特点与优势也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工作,富区的农业科研支部,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支部,机关联合支部,齐大委员会都在为“三农”服务,送技术、送种子、送医、送药、送文化、救灾等各方面都做了不少好事、实事。

1994年中共黑龙江省委统战部在哈尔滨召开了全省民主党派的社会服务工作经验交流会。省盟责成齐盟总结经验,代表省盟在会上发言。齐盟以《重在参与,贵在坚持》为题介绍了齐盟的工作

情况。该文被收录大会的《文集》中。在这次会上齐盟被命名为先进集体，马炳竟、袁君宝同志为先进个人。

齐盟的社会服务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好成绩，但也有教训。“华盛日用化学厂”是由科技咨询服务公司投资三万元，由在公司任职的胡蹊、于国富两位老同志自力更生亲自动手，不雇工人办起来的。厂子位于南郊，两位老同志早出晚归，辛辛苦苦。停停打打，干了三年，精神可嘉。终因多种原因，扭亏无望而倒闭了。民主党派办工厂这类实体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979年齐盟恢复组织时共有盟员103人，比起1957年春时145人以已减少了近三分之一了。盟员老化严重，我且57岁了，平均年龄要超60岁了。为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齐盟要发展，要年轻化，势在必行。发展组织是齐盟第四届委员会的重要任务。到1984年五年后齐盟共有盟员320人了，是恢复组织时三倍。其后，贯彻巩固与发展相结合的方针，放慢而进入正常。那时齐盟决定在巩固与发展中等学校的已有组织的同时，把重点放在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上来。这是因为时隔28年，齐齐哈尔市的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事业已有了较大发展。

东北重机学院是1958年哈工大重机系分出来在富拉尔基成立的全国重点院校。当时盟员只有王国维同志一人，只好在盟机关过组织生活，长达20年。齐盟在1980年10月批准恢复组织后，首批发展的10名盟员中就有重机学院的申石虎、赵景文、左强等三人，从而成立了民盟东北重机学院小组。王国维同志做了大量工作，继而又使十几位教授、副教授相继入盟，成立了重机学院支部。申石虎同志们是东北地区著名的电工学教授。他入盟不久在1983年作为特邀代表参加民盟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盟中央的候补委员，继而在1989年省盟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盟的副主委，这与他当选盟中央候补委员一样都是齐盟第一人。但进入九十年

代，东北重机学院南迁，到九十年代末，全部迁至秦皇岛而改名为燕山大学。这对齐齐哈尔市、齐盟都是一个损失。同样，位于富区的省科学院农业、畜牧业研究所，也只有盟员袁亚新同志们一人。在他的努力下，相继吸收了程兰英、殷元虎、（后都任盟市委副主委）张树权（研究所所长）等十几位同志入盟，成立了民盟富区研究所支部。他们成为市盟在农业、畜牧业方面参政议政、智力扶贫的一支重要力量。随着齐齐哈尔师范学院、轻工学院、医学院、齐师专的发展与建立，齐盟在高等院校的组织都有较快的发展，并突显了齐盟构成以高校为重点的特色而有别于齐市的其他民主党派。

轻工学院民盟支部恢复组织时只有盟员 6 人。到 1994 年就有盟员 38 名，成为市盟基层组织人数最多的支部了。这是一个层次比较高老中青相结合的队伍 1994 年召开了中国民主同盟齐齐哈尔轻工学院委员会成立大会，陈奕兴同志为主任委员，史景江同志为副主任委员。现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张万起同志就是 1993 年在轻工学院加入民盟的，1994 年任建华区副区长，2000 年任市盟主委。

1996 年末，轻工学院与师范学院合并成立齐齐哈尔大学，两个学院盟组织合并为齐齐哈尔大学委员会。先是由现任齐盟市委副主委王宗明同志当选为主委，换届后，齐大艺术学院院长宗明明同志当选为主委。现在齐大共有盟员六十多人，下设七个支部。齐齐哈尔大学是我省西部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涵盖十大学科，16 个学院，57 个专业，在校生达二万三千多人。建设好、发展好、巩固好民盟齐大委员会，对市盟各项工作开展都有重要意义，影响深远。市盟领导应给予足够的关注。这个意见是从齐市民盟全局考虑，而非我是齐大人。

在谈齐盟的自身建设问题时不能回避齐盟的新老交替问题。1987 年 1 月，我和马炳竟同志受齐盟的委托，作为省盟代表成员参

加在北京召开的民盟全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费孝通同志当选为民盟中央主席。在这同一时间，中国各民主党派都会齐集北京召开各自的全国会议。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如何实现各级领导班子新老交替的问题，老一代领导人年龄都大了，如何实现政治交接交好班，是事关中国多党合作的全局大事。一月份的北京天气很冷，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袭，大学生闹事，我也感到政治气氛有点紧张。但是一个星期的会议开得很成功。党中央统战部组织了各民主党派会议成员参观人民大会堂，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晚宴。这是我一生只有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深感荣幸。关于齐盟领导班子新老交替的问题，实际上从第五届委员会时已经开始了，1990年12月31日，市盟的创始人之一、市政协副主席、市盟主委周宗鲁同志病逝。他是齐齐哈尔市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是广大盟员的楷模。他为齐市的教育事业、市盟的建设与发展、为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工作，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周老的去世，对市盟是一个重大损失，市盟的工作遇到了新的问题和困难。周老去世不久，1991年春节前，我骨折卧床达半年之久，起床后仍行走不便，对市盟的工作不无影响。1991年对市盟来说是困难的一年。按省、市委统一部署，齐市各民主党派要在年底前完成换届工作。市盟内由谁接主委的班，在长达一年时间内举棋不定，这必然给换届带来困难。本来，应该在周老去世后指定代理主委，事情会好办一些，可是谁也没有这样做。省盟、市委在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一再表示由我接任主委不合适。理由有三：我已经离休五年了，不符合新老交替要求；我已经入党了，代表性不强；腿又摔坏了，健康状况不适宜。并提出由当时的驻会副主委来接任。但没想到，直到其他民主党派都换届完了，于1991年11月末，省盟与中共市委协商后，任命我为换届领导小组的组长，并提出“不许再说不干了”，要在1992年春节前完成换届工作。这个最晚、最后的决定对我来说太困难了。就一个月的时间，

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可能要出问题也在疑虑之中。我只好起草换届的工作报告，其他工作都交给驻会副主委。人选问题由市委统战部把关了。为保证换届报告的质量，成立了报告起草小组，经过两次讨论才定稿。第七届市盟代表大会于1992年1月23日召开。我的报告题目是《坚持基本原则，加强自身建设，为发挥参政党的作用做出新贡献》，这反映了我的主导思想。因为会议是在中共中央[89]14号文件发表之后召开的，我要尽我的努力去表达对《意见》的理解与体会。结合市盟工作的实际，进一步把市盟的主导思想统一到《意见》上来。经过各组讨论，一致同意这个报告。并得到了省盟领导的肯定与赞扬，是起草小组共同努力的结果。大会在酝酿讨论委员候选人名单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选举结果却是“于无声处听惊雷”，我仅以一票之多超过代表名额半数当选为委员，真可谓是“无限风光在险峰”。在七届第一次委员会选举主委时，仍有几位同志提出不同意我任主委，他们的理由都没有超出我的那个“三不”的范围，不能说不对吧。经举手表决多数委员同意我担任主委。在当晚市委统战部举行的招待新委员的茶会上我有一个表态。我讲：我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尽早选好我的接班人。我要尽早地退下来。我至今仍认为第七次代表大会并没有圆满完成新老交替的任务。

1992年春节后，市政协要换届。在中共市委听取各民主党派对候选人意见的会上，我对民盟、九三、民建三个主委不按副市级安排时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不合适，不利与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并说这个意见不是从个人得失来考虑的，而是全局性的问题，这个意见未被采纳，这就更增加了我要尽早退下来的决心。我选来选去，只有时任政协副主席的辛培之教授再合适不过了。经与市委统战部商量，做辛培之同志的工作，经一年的工作好不容易才做了下来。我于1995年从市盟主委的岗位上提前退了下来，人们说我“高风亮

节”，太过奖了，是我自己逼出来的啊！齐盟委员会从第五届换届到第七届换届都出现过委员落选问题，也出现过要到会场闹会的问题，第七次代表大会还演过惊险的一幕，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我认为还是自身建设问题，后备干部的准备问题。务须党内、盟内的同志们对这个问题都要提高认识，一定要看重这个问题。

现在齐盟已是上千人的队伍了。人称齐盟是人数第一的齐市民主党派，我们也要在参政工作上争上游、争第一。关键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巩固好；要坚持民主集中制，把我们的队伍组织好；要坚持学习与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把队伍思想武装好。我认为这三条应该是齐盟的法宝。我认为做好这三条，齐盟一定能成为上等的、合格的参政党，一定能同共产党风雨同舟，一道前进的参政党。

十年前，应市政协约稿，我写了《对齐盟四十年的回顾》，并转载在《纪念齐齐哈尔市建盟四十年》文集里。这篇文章算是改写吧，免不了有所重复，请读者谅解。

